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戴高乐评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言

读或写历史必定要遇到许多人物，特别是政治家；因为历史舞台上的演出，首先表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他们，“观众”直接见到的也首先是他们。

然而，在历史上出现的众多人物当中，能称得上历史人物的，却有限。

可以称得上历史人物的人，不一定都有天纵之资，也不一定都是“常胜将军”——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因此成败自然也不是衡量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尺。

我个人以为，一个历史人物无论如何总该遗影响于后世，他必定开创过一种新局面、为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做出过非常人所能的个人贡献。当然这样的人决不是、也绝不能游离于时代之外，就是说他并非“超人”。

周荣耀同志这本书的主角——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我之对戴高乐第一次有深刻印象是在 50 年代后期。那时我正在欧洲工作。那些日子，大家（中国的、外国的朋友）几乎每天都议论法国形势：法国政府的频繁更迭、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等等。在议论中，都感觉着乱烘烘的法国时局正在呼唤着一位“铁腕人物”，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个人选似乎非戴高乐莫属。当时，西方报刊上不断从各种角度介绍戴氏的生平、政绩和言论，誉之者有之，毁之者有之，但都异口同声地正面评价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人们说，若不是他张起“自由法兰西”旗帜，法国怕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又恰恰是他在相当程度上使战后法国得以参与战后的大国磋商。

戴高乐果然再度出山当了第五共和国总统。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是”，什么时候该说“不”。把法国弄得筋疲力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了，原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政策开始了；法国在大国行列里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不管怎么说，欧洲以至世界都不能不接受戴高乐的法国；戴高乐顽强地把曾是内外交困的法国送进“大国俱乐部”里。

戴高乐执政后期似乎不那么如意，退隐后更显得相当孤独。但终其一生，谁也不能否认他曾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1990 年是戴高乐诞辰 100 周年。这一年的 11 月，法国戴高乐研究所举办了很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全世界的许多戴高乐研究者、与他同时期的、现已届耄耋之年的政治家、史学家等等大约 2000 多人，分成为几个专题小组委员会讨论、评论这位在法国和欧洲，乃至在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巨人。中国学者多人应邀与会，我也去了。会后，我感到我三年前出版的小册子《戴高乐》应该大大补充，但是我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周荣耀同志多年研究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今天看到他写的《戴高乐评传》，自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他没有着意堆砌材料，更没有把戴高乐渲染成一个“传奇人物”，而是朴实地写出这一个既是伟人，也是凡人的人。读者不难发觉，戴高乐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戴高乐是属于法兰西民族的。

再有一点想说的：这本书的完稿和付梓，正值中法建立正式邦交 30 周年。这也是纪念这位曾对此作出过突破性贡献的政治家的极好方式。

陈乐民

1994 年 5 月 1 日

戴高乐评传

第一章

人小志大

没有见到过戴高乐对家世和自己童年时代的自传体描述。在他的《战争回忆录》的开头，只有寥寥几笔，匆匆带过，因为那是一本关于“战争”的回忆录。对自己身边的人，戴高乐也不追忆家世和儿时。跟随他 20 年之久的奥利维埃·吉夏尔，将他与父亲一样看待，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对自己的童年和童年时代的家庭环境，都几乎闭口不谈。”因此，有关戴高乐的家世和童年，材料大都来自于旁人撰写的传记或其他（例如戴高乐的世传家谱以及他的先人遗墨）。

戴高乐祖先曾在佛兰德、香巴尼和布尔戈尼等地居住过。1517 世纪，戴高乐家族以戎马生涯为主，曾有人为了法王而和英王打仗。18 世纪，这个家族涉足司法界为官。进入 19 世纪，戴高乐家族又以科学文化为主要职业，成了令人钦慕的书香门第。

这是一个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破了产的、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对戴高乐一生产生直接影响的，当从他的祖父母开始。

戴高乐的祖父名叫朱利安—菲力普。1835 年，朱利安—菲力普同约瑟芬—安娜—玛丽·马约结婚。朱利安—菲力普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致力于史学、古籍研究，1839 年出版了《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但从信仰上来说，他则是保皇分子，是一位信奉正统的保皇分子。戴高乐的祖母约瑟芬·马约，在事业上似乎比丈夫更具影响，堪称文学界女豪杰。约瑟芬·马约出生于一个烟草厂主家庭，也许这个资产阶级出身使她不像丈夫那样受旧思想和旧传统约束，使她不像一般富家闺秀那样胸无大志。约瑟芬·马约也是一位天主教徒，他曾写过许多本关于宗教道德的书。但是，她的思想并没有被宗教精神禁锢住，她在一家《家庭通讯》刊物出任编辑，经手发表了社会主义者朱尔·瓦莱斯的文章，还曾著文颂扬颇为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不过，使她成名的，还是文学作品。她的小说《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可称传世之作。她的作品源源不断，在 19 世纪的法国，是一位数得上的多产女作家，在国立图书馆的目录卡上，她的作品目录占了八页之多。值得一提的是，约瑟芬·马约曾写过几本名人传记。一本是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夏多勃里昂的传记，一本是追随拿破仑多年曾护送他去厄尔巴岛的特鲁奥将军的传记，还有一本是爱尔兰政治家达尼埃尔·奥康内尔的传记，名为《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众多的戴高乐传记作者都不愿放弃如下的联想：戴高乐极为钦佩夏多勃里昂并欣赏他的诗句，戴高乐从小立志报国效力，甚至于戴高乐的历史文学修养，都与他的祖母有直接的关系。戴高乐虽然从他资产阶级出身的祖母那里继承了许多，但他从来都否认自己与资产阶级有任何牵连。1962 年，戴高乐说道：“资产者？我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就是财富，就是占有财富的意识，或是攫取财富的欲望。我的家庭和我，我们一直是贫穷的……我从未感到我与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联系在一起。”

到戴高乐的父辈，共是兄弟三人。

戴高乐的大伯父夏尔·戴高乐，从小患有痼疾，但并没有妨碍他研究凯尔特人。后来，他又学会了威尔士语和布列塔尼语，成了“布列塔尼诗人”和“凯尔特人战士”。他曾幻想布列塔尼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凯尔特人的联邦。他死时才30岁，为了纪念他，父母才给戴高乐取了与伯父相同的名字。他给侄儿戴高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是下面这段话：“在一个遭到夜袭的军营里，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也许正是伯父这段话，在1940年6月18日点燃了戴高乐心头的火种，以他不足称道的军衔地位高举抵抗大旗。

戴高乐的二伯父朱尔·戴高乐，是法国知名的昆虫学家。

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排行第三，生于1848年。他走上了与两个哥哥不同的道路，选择了军人的职业，还考取了巴黎综合工艺学院。1866年8月，亨利·戴高乐同表妹让娜·马约—德拉努瓦在里尔结婚。1870年普法战争中，亨利·戴高乐在巴黎被围时参加了“国民自卫队”。作为陆军少尉，他率领一排人参加了斯坦斯和布尔歇的战斗，负伤后获得一枚勋章。这枚勋章后来被少年戴高乐视若家珍。

普法战争后亨利·戴高乐放弃了继续学业的念头，当上了教师，在位于沃吉拉尔大街389号的圣玛利亚教会学校教授哲学、数学和文学。亨利·戴高乐是个言必称法国的保皇党人。他利用讲台，把上帝、国王和祖国一起灌输给求知若渴的青少年。戴高乐这样评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一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的人，对于法国的尊严充满了感情。他让我了解了法国的历史。我的母亲对于祖国有着坚定不移的热爱，这和他的宗教虔诚不相上下。”父母对事物的看法以及他们在谈话中流露的情绪，深深地影响了童年的戴高乐，使他常常为国家的业绩、英雄的功勋而神往，为国家的衰败和民族的苦难而激愤。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9号外祖母家中，全名叫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他生在里尔，长在巴黎，所以戴高乐后来常自称“巴黎的小里尔人。”戴高乐兄弟姐妹五人。老大格扎维埃——矿山工程师；夏尔·戴高乐排行第二；老三玛丽—阿涅斯，嫁给了矿山工程师；老四雅克——矿山工程师；老五皮埃尔——银行家。兄妹五人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实业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他们的职业取向偏离了这个家庭的传统。唯独戴高乐的道路不一样，他喜爱文学，择业军人，却又从政半生。只有他，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不同志向汇集于自己一身。

尽管关于戴高乐童年的轶事和传闻不多，但像许许多多的伟人传记一样，也不知道是出于对伟人的奉迎，还是出于对天真儿童的抚爱，人们往往从一个伟人的童年时代，就足以考证出这是一个伟人“胚子”。戴高乐也不例外。

10岁以前，戴高乐在圣托马斯——达广学校读书。从六年级起，他进了由他父亲任学监的沃吉拉尔教会学校。戴高乐家族的“史学”和“文学”渊源，熏陶和培养了戴高乐的兴趣和才能。

他喜欢文学和历史。为了使住在拥挤的巴黎的一家人有机会散散心，父

《我的将军》，第7页。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亲在多尔多涅河谷买了一栋房产，取名为“卢瓦尔河别墅”。全家人度假时，戴高乐带的是《法国史》。

戴高乐从小就喜欢诗。他爱读古希腊的抒情诗，朗诵歌德和海涅的作品。法国诗人兼剧作家埃德蒙·罗斯唐的作品，对童年戴高乐的影响极大。罗斯唐的成名诗剧《雏鹰》，描绘了拿破仑的儿子在拿破仑失败后，流亡在他的外祖故地奥地利，尽管努力奋斗，但却未能改变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结果客死他乡。10岁生日那天，戴高乐在父亲带领下看了这部充满爱国情调的悲剧之后，幼小的心灵激动得不能自己，口口声声说长大要去当兵。年龄稍大点之后，戴高乐又迷上了爱国诗人夏尔·佩居伊。佩居伊深受哲学家柏格森的影响，他的作品不循旧俗，充满追求和活力，主要以颂扬和捍卫法兰西为主题。佩居伊的作品推崇为国效劳为己任，将之喻为儿子侍奉母亲。这一思想，使戴高乐毕生受益不浅。

戴高乐还喜欢雨果、高乃依、拉辛、夏多勃里昂的作品，而且也欣赏莎士比亚的剧作。

戴高乐博览群书。跨世纪的哲学家柏格森被称为20世纪初的智慧，是思想自由的代表，是实证主义的捍卫者。戴高乐经常翻阅柏格森的《物质与札记》、《创造性的进化》等著作。柏格森的“活力论”、“生命的冲动”和“创造性的进化”等观点，后来在戴高乐的《剑刃》一书中贯串始终，成了戴高乐论述领袖人物成长的方法论。在《剑刃》的头几页，戴高乐赞扬柏格森的“本能论”，“……由于本能，我们深入到事物的最深层”，他还指责1914年的法国参谋部“未能做到足够柏格森化”。柏格森还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同伟大个人命运相结合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成了戴高乐后来终身实践的原则。

戴高乐从小就引人注目。在同龄人里，他的个子高出一截，鼻子大得出奇。他性格刚毅，好强争胜，不愿屈于人下，显得孤高自傲，冷若冰霜。他的胞兄说“掉进了冰山的夏尔……”总是那么坚硬冰凉。戴高乐的性格，使他很自然地成了“孩子王”。由于生性好动，童年的戴高乐并不看重学校的学业，除了他喜爱的文学和历史之外，学习成绩总是平平。直到他14岁，明确表示要报考圣西尔军校时，才接受父亲的警告——不努力学习，就别想考上圣西尔——认真对待学业。因为问题很简单，光凭文学和历史，是考不上圣西尔的。

学习成绩平平的戴高乐，在童年时代却有意炼出了一项真功夫：他练习把单词倒过来念，锻炼出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后，戴高乐的记忆力，成了众多政治家和要人们议论的话题，在谈到这点时，往往可看到人们脸上那钦慕、忌妒，或迷惑不解的神情。

像出生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的许多法国男孩的童年一样，戴高乐尤其喜欢惊险故事、打仗游戏和幻想未来。但与众不同的是，在这些游戏中，戴高乐并不是为游戏而游戏，他往往是将志向和抱负同游戏融合在一起了。戴高乐要当头，他要为法兰西当头；戴高乐爱憎分明，铁面无私；戴高乐激情满怀，为己所爱，在所不惜……

几乎所有关于戴高乐的传记里，都曾记载过下面两个故事。

戴高乐同孩子们分成对立两方玩打仗游戏，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孩子玩时分成中国和美国一样，那时候的法国孩子是分成法国和德国进行对抗，而戴高乐总是法国一方的头。有一天，戴高乐的大哥格扎维埃，因不满

自己一直扮演屡遭失败的德国皇帝，终于忍不住向戴高乐提出换当一回法国国王。但戴高乐不答应，他生气地高叫道：“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还有一次，戴高乐的小弟弟皮埃尔哭哭啼啼地跑回家，母亲惊奇地问他出了什么争，皮埃尔说：“夏尔打我了。”原因是兄弟们在一起玩打仗，皮埃尔的角色是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令。

“哪个司令官？”母亲问道。

“就是夏尔！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情报交给了敌人”。

虽然是在做儿戏，但戴高乐对“违抗命令、变节投敌”的行为是毫不留情，他用一顿“爆栗”狠狠惩罚了皮埃尔，这也许是那个年龄里最重的惩罚。知道这一点，对于40年以后，戴高乐对待投降路线和维希分子的态度，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戴高乐儿时表达自己的抱负和抒发情怀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写作。他喜欢阅读文学和历史，但更喜欢动手写自己的作品。他写过诗，写过小说，也编过短剧。在他幼稚的笔下，一个博大的胸怀已跃然纸上。

1905年，15岁的戴高乐在他父亲主持下的教会学校读书时，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德国的战役》。小说虚构了30年代一场新的德法战争。

“1930年德国军队向法国宣战！”

“三支德军跨过沃日。第一支德军，20万之众，携大炮500门沿瑞士边界而下，经过贝尔福特进扰巴黎。

“第二支德军直接越过群山峻岭，踏向南锡；这支德军有175000人，大炮480门。俾斯麦将军已经命令第三支军队10万人为第二支军队的后援……”

“1931年1月18日，法国陆军部长从正在维也纳聚会的各国首脑们那里得到了保守中立的诺言。

“在法国，组织工作很快就绪。戴高乐将军统率20万军队、518门大炮……”

“2月10日，各军进入战斗状态。

“戴高乐很快制定了方案，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声援布瓦德弗尔，并赶在德国人实现对我们说来肯定是恶耗的会师之前粉碎之

……”

紧接着，小说里的戴高乐将军策划了南锡战役，率领法军英勇搏斗，将德军围困在梅斯要塞待毙。

如果从文学角度来欣赏这篇少年习作，当然很难说有多大价值。但从研究戴高乐这个人物来说，起码可以告诉我们以下几点：第一，戴高乐少年时代就确信未来德法战争不可避免；第二，德国必败，无论如何，法国要雪普法战争之耻；第三，法国的胜利，将是“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胜利。

多么大胆的设想和抱负。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小说中的故事却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们用不着去推测它预示了哪一次战争，而要注意它的确印证了以后戴高乐的道路。只是有一点需补正的，小说中将各国首脑们保守中立的诺言当作法国胜利的条件之一，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自普法战争后，德国的强大和法国的相对衰弱，已决定只有在结盟的条

戴高乐：《书信、札记和杂感》，第1卷，法国普隆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9页；让·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法国瑟伊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译文见陈乐民：《戴高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件下法国才能进行一场新的德法战争。如果“各国首脑们”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那无疑等于宣布支持战败法国。也许是因为太渴望胜利，也许是年龄关系，也许是从小就希望法国独立于世界，戴高乐当时还没考虑到这一点。

1908年，18岁的戴高乐还写过一首无题诗，诗中写道：

我愿！……
如果我必将死去，
我愿死在战场上，
这时我的灵魂，
依然披着战火掀动的如醉如狂的喧嚣，
那宝剑的威武与清澈的撞击声
使战斗者悲壮地视死如归。
我愿死在夜晚，
逝去的夕阳可以使离别少一些遗憾，
并为死者蒙上遮体的丧服，
夜晚！……与夜俱来的将是上帝赐与的和平，
当我死去的时候，在心窝和眼睛里
我将得到星光凝重的安宁。
为了死而无憾，
我愿死在夜晚，
那时，我将看到
光荣之神在床头向我展示
节日盛装的祖国，
那时，我虽已精疲力竭，
却能够在死神来临的簌簌声中
感受到光荣之神在我的额头上灼热的一吻。

除去这首激情满怀、视死如归的无题诗，许多传记作品中还提到戴高乐写的一个短诗剧：《苦相逢》。剧情描写一个游客与一个奸诈阴险的强盗狭路相逢，最后被抢骗一空。故事毫无奇特惊险之处，令人惊奇的是，16岁的戴高乐将它寄给了正在举办诗歌竞赛的奥尔纳省文学杂志，获得一等奖，并得到通知：作为报酬，作者可在25法郎奖金或者发表作品之间作出选择。戴高乐选择了后者。戴高乐的志趣已经有较明显的脉络可寻了，戴高乐后来回忆道：“法国在我少年时期的命运，无论是作为历史的主题还是作为公众生活攸关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莫大的兴趣。因此，公众论坛上每天出现的事物都吸引了我的注意，同时我也以极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它。出场的人物如万马奔腾一般倾泻出他们的智慧、热情和雄辩，使我不禁为之神往。”

在戴高乐的少年时代，法国的命运，显然是与德国联系在一起的。

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法国蒙受了奇耻大辱。皇帝在色当被围投降，巴赞元帅在梅斯缴械，赔款50亿法郎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像铅一样沉重地压在几代法国人心中。民族自尊心、复仇心态，复杂地交织成了这个时代法兰西人的民族情绪，德国人不安份的几次挑逗行为，加剧了这种民族情绪。

译文引自陈乐民：《戴高乐》，第9—10页。参见让·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30页。

有的传记中译本翻译成《著名的相会》，或者《一次不幸的遭遇》。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2页。

完全可以说，戴高乐这一代人正是在这种民族情绪沐浴下长大的。

但此还不够。19世纪的后30年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国家，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各国垄断资产阶级更加紧张激烈地参与争夺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最后发展，必然导致战争。因此，加紧扩军备战，拼命煽动沙文主义，鼓吹军国主义，成了各国垄断资产阶级政府的统一政策。于是，法兰西人的民族情绪变得更加复杂了。

普法战争失败的教训，使法国人醒悟了一点：在面对德意志这个强手时，如果没有可靠的盟国，法国必败无疑。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开始坚决地同沙皇俄国建立密切关系，法国充分利用自己“高利贷资本”的优势，加紧向俄国资本扩张，使巴黎取代柏林成了沙皇的主要债权人。1891年，法俄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如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另一方应予援助。1894年，法俄正式结成军事同盟。1904年，面对德国的威胁，英法之间也抛弃前嫌，签订了对付德国的协约，并于1907年将俄国拉了进来，形成了俄英法三国协约，以对抗德奥意三国同盟。

为了复仇，在70年代法国就进行了军队改组，实行了义务兵役制，期限五年，1889年减为二年。到19世纪末，法国已拥有军队60多万人，即比70年代初多出20万。战争的乌云越来越浓了，任何一个火星都足以引起燎原战火。

戴高乐在战争阴云下是什么心境呢？他后来追述道：“我必须承认，当我在青年时代想起这一场不可知的冒险时，心中不但没有恐惧，而且还暗自赞美了一番。总之，当时我毫不怀疑法国将要经历一场严重的考验，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为它立下丰功伟绩，而且相信我将来一定能够获得这个机会。”

为了获得这个机会，为法国立下丰功伟绩，戴高乐选择了军人为职业。

戴高乐从小就立志从戎。10岁生日那天看完《雏鹰》，就连声说要去当兵。上中学二年级时对家人明确表示决心要当军人，说道：“我打定主意了，我准备考圣西尔，我要当个军人”。有一天，戴高乐甚至将自己乔装打扮一番，然后去敲自己家门，冒充“费德尔布将军”来访。费德尔布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将军，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打了败仗，但传说费德尔布将军率领的军队从未打过败仗。1895年，费德尔布又成了塞内加尔的征服者。这位与戴高乐的母亲同为里尔人的“常胜将军”，在戴高乐家中常是餐桌上的谈话中心之一。十三四岁的少年戴高乐将自己装扮成全付武装的“常胜将军”，事出有因，充分显露了军人在戴高乐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以及他选择这一职业的决心。

1907年，由于政府的反教权政策，戴高乐父亲执教的沃吉拉尔教会学校关闭，戴高乐被送到法比边境比利时一侧的安托万中学，这是由流亡的法国天主教徒办的中学。1908年，戴高乐又转回巴黎斯塔尼斯拉斯学校，认真准备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

1909年8月，19岁的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

成绩属中等，在212名当中是第119名。10月，戴高乐正式入学。从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3页。

戴高乐的入学名次在不同版本的传记中说法不一，但前后相差不多，均属中等。

此，戴高乐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从此，戴高乐与军队和军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要真正理解戴高乐选择军人为职的意义，要真正了解军队在戴高乐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就必须更好地认识当时法国围绕军队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入伍时，法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之一。当时各方虽然有许多批评指责之词，然而军队还是镇定自若，仍然充满自信地期待自己有朝一日继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失败后，军队成了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希望，成了报复德意志的希望。在来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的不同鼓动下，整个法国热爱并崇敬军队。青年应征入伍，精英汇集圣西尔军校。整个法国舆论，为军队勾画了以下的形象：

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说：“如果人类社会里有人人都赞赏的神圣东西，那就是军人。”

政治家及诗人保罗·戴鲁莱德在《士兵之歌》中赞道：

在四分五裂的法兰西，
哪个法国人把这作为座右铭：
人人为大家，大家为国家？
答案是——士兵。

作家朱尔·勒梅特尔说：“军队捍卫着有形的东西——边疆，无形的东西——祖国，即生根于人民之中的法兰西。”

教育家和批评家埃米尔·法盖说：“军队是祖国的灵魂，即祖国本身”。

夏尔·莫拉斯说：“没有国王，军队便是各派力量统一的唯一因素，它具有稳定和统一两大优点。”

在军队如此受宠的背景下，戴高乐所说的“批评指责之词”从何而来呢？

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戴高乐考上圣西尔军校这20多年里，发生了一连串震撼整个法国社会，并使法国军队的威信受到严重伤害的事件。

首先是布朗热危机。

普法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法国军队在管理、建制和装备上的许多弱点。法国军队从第二帝国旧的职业军队改为普遍征兵制后，迫切需要将陆军改组成适合共和国需要并足以与德意志军队匹敌的力量。可是，在法国陆军界的高级军官中，绝大多数都属于保皇党人或天主教徒。布朗热，曾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和普法战争，参加过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他被认为是陆军将领中少有的最忠诚的共和党人。1886年1月，在乔治·克雷蒙梭等人的竭力推荐支持下，布朗热出任陆军部长。

布朗热就任后，周旋于激进派，保皇党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间，利用一切机会炫耀个人，疯狂煽动对德复仇情绪，鼓吹沙文主义，很快赢得了法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被称为“复仇将军”。但是，法国大多数资产阶级政治家看到，同德国摊牌的时机还未成熟，过激的言行只能给德意志重新挑起战火以口实。因此，这位陆军部长不仅是太出名，而且是太好战了。而且布朗热的政治野心也越来越明显，他要求解散议会，修改宪法，主张设立强有力的行政官为国家首脑。实质是在谋取实权，伺机政变，推翻共和，建立波

拿巴式的军事独裁。

1887年，布朗热被免去陆军部长职务。1839年，布朗热及其追随者试图发动政变未果，布朗热逃往比利时，后殉情自杀。

布朗热的失败，使笼罩在法国政界那种害怕军人控制政府的恐惧最大限度地消失了。同时，也给资产阶级共和派提供了一个机会，它乘机在法国军界清除了一批反共和国分子。“军队和官方的文职人员、政治家组成的法兰西之间的蜜月终于结束了。无论在书刊上，还是在大学里，开始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漫长的历程。爱国主义同军队一样成为众矢之的。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嘲笑复仇，不再为阿尔萨斯—洛林沦陷而悲伤。”布朗热危机过去五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更使法国军队蒙受耻辱的事情——德雷菲斯事件。

德雷菲斯是法国陆军参谋总部的见习军官，上尉军衔，犹太人。1894年圣诞节刚过，德雷菲斯被军事法庭判定犯有叛国罪——将军事机密泄露给德军军事情报部门，他被判终身监禁在南美的魔鬼岛。德雷菲斯被宣判后，在高等军事学院的阅兵场上备受凌辱，他的肩章和军裤上的红色条纹被撕掉，佩剑被折断，在“把这个犹太人处死”的狂呼中，他被押上船驶往魔鬼岛。

事情的缘由是，1894年前后法国军方连续发生丢失机密文件事件，反间谍机关一直怀疑参谋总部内有人向德国驻法武官提供情报。在参谋总部的压力下，反间谍机关仅根据截获的德国武官的信中不可定论的只言片语，便以叛国罪嫌疑将德雷菲斯逮捕入狱。

为了给德雷菲斯定罪，法国陆军部长和军事情报局头目亲自出马，捏造事实，提供伪证，并与新闻界相勾结，不顾德雷菲斯和律师的反驳和辩护，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德雷菲斯这个犹太军官头上。

在此后的12年里，围绕德雷菲斯案件，整个法国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使全法国处于分裂和动乱的危机之中。德雷菲斯是否有罪的大辩论，在法国史上影响深远。在这场大辩论中，温馨的家庭分裂，多年的友谊断绝来往，有人为之垮台，有人为之决斗，有人自杀，有人进狱。右派中的多数人坚持认为德雷菲斯有罪，即使证据不足，政府和军队也不能轻易更改判决，总不能让法国军队的荣誉和威信受人怀疑。他们的口号是：“为了秩序，反对正义和真理”。左派中的多数人坚持认为德雷菲斯是无辜的，他们认为国家荣誉应以真理为基础。作家左拉以《我控诉》为题，冒死为德雷菲斯辩护。

一直到1906年7月12日，这场全法国的大辩论才见分晓，法国高等上诉法院宣布德雷菲斯被“错误地和冤屈地”判罪，确认无罪。德雷菲斯案件是法国反犹太主义的反动军官团恶意操纵下所搞的一个错误的判决。法国军方从上到下狼狈为奸，经过阴谋策划给以定罪。因此，当阴谋被揭穿，德雷菲斯被认定无罪后，法国军队威信扫地。几十年后，戴高乐在谈到法国军队时，曾追述这件他少年时代经历过的事，他说道：

正当民众的感情与军队疏远的时候，由于命运的摆布，爆发了一场足以加深各种敌对情绪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审讯中，恶化民众情绪的做法比比皆是。控告者伪造证据、不负责任，恶意攻击，更增加了司法部门错判的可能性；但也有人或是出于信念，或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不顾一切地维

护为国效力的统治集团的一贯正确性，他们忐忑不安地拒绝承认司法审判上有什么错误。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一大堆纠缠不清的事件、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又是坦白交待，又是撤回证词，又

是相互决斗，又是自杀事件，加上辅助审讯，使对立的双方都火冒三丈，并时而晕头转向。这时出现了一股有害的近似疯狂的情绪，不分青红皂白地伤害了法国人对自己力量象征的尊重（分裂的法国人正在依靠这种力量使自己团结起来），同时也破坏了人们的信念、友谊和相互尊敬。

德雷菲斯事件给法国军队的伤害是灾难性的。不仅如此，与德雷菲斯事件同时伤害军队的，还有政府的政教分离政策。从 1880 年至 1905 年间，共和国政府一直在限制天主教会的地位和权力。由于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和保皇分子，因此对教会的限制就必然与军队中的清洗结合在一起，教会的权力和地位下降了，军队的影响也就削弱了。

戴高乐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在那个年代，许多军官因政府命令去镇压天主教徒的反抗，苦于严守军纪和笃信宗教之间的两难选择，只好离开军队，选择军人为职业的青年已为数不多。1900 年至 1911 年，圣西尔军校的考生从 1895 人减少到 871 人。人们不再赞扬军队，青年不再崇敬军人，戴高乐却在法国军队正处于困难的时刻，毅然进入军界。因为他“暗中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军队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日子将会来临”，他选择的虽然是军人职业，但他心目中实质上是在选择法兰西，他必须到军队中去寻找法兰西。

第二章

坎坷的军人生涯

按照规定，军校新生必须先到部队当一年兵，然后才能开始军校学习，这是一条刚刚制定不久的“不先当兵就不能担任指挥”的原则。19岁的戴高乐在驻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9连度过了一年。普通一兵的生活与这位胸怀大志的青年人的幻想相距太远。单调乏味的军事操练，日复一日；有规律的“公差”勤务，令人心烦。戴高乐打心眼里不喜欢这种生活，也讨厌这种千古不变“有意磨练人”的训练方式。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沉浸在自己随身携带的书和阿拉斯的图书馆里。他给人的印象是个要“干大事”的“瘦高个儿”，他的连长说他是个“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的青年。

1910年10月—1912年10月，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完成了学业。两年的军校生活，他给人留下了三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戴高乐学习刻苦，他从进校时的第119名，跃居221名毕业生的第13名；第二，戴高乐性格冷淡而显傲慢，刚健而显固执，几乎处处都有他的不同见解；第三，戴高乐由于身材和相貌，他的名字远不如绰号有名，大家常叫他“大夏尔”、“大公鸡”、“芦笋”、“尖头”、“长竿”、“两米”。30年后，不堪忍受德国法西斯奴役的法兰西人，在巴黎街头手持两根长竿，默默无声地以示对戴高乐的支持、对法西斯的抗议，戴高乐和他当年的同学们闻讯后，心情该是多么感慨啊？

名列第13的毕业成绩，使戴高乐有权挑选毕业后服役的兵种。当时，在军人的眼里，骑兵，神气十足；炮兵，威力无边；殖民军，满载荣誉，都是令人钦慕的兵种。可是，戴高乐又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他仍然挑选了那个他并不喜欢的阿拉斯的步兵33团。

戴高乐的这一决定，不仅在当时，就是事隔多年也使许多人迷惑不解。有人说他是挑衅性的，想以圣西尔的名声去显赫一番；也有人说这符合他的志向，因为军人只有在最前线，才是成功的开始。他自己对这个决定却看得很简单，后来他曾轻松地解释道：原因就是“步兵更有军队的味道”。

戴高乐的军人生涯开始了。如果从1909年在步兵33团当兵计算，到1940年6月出任国防部次长踏入政界，戴高乐度过了整整31年的职业军人生活。这几十年，对戴高乐来说，虽然有远大抱负，却是郁郁不得志的几十年。

身经数战的将军

对于一个将军来说，“身经数战”，当然不是什么恭维之词。戴高乐从士兵到将军，几十年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自经历的战斗，的确确是只有那么几次。

应当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正当时，他梦寐以求的为法国创立丰功伟绩的机会就要来临，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残酷、代价最高的一场集团式的武装冲突即将爆发。1911年，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这年4月，摩洛哥首都菲斯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人民起义。5月，法国军队以恢复秩序和保护侨民为借口占领菲斯。7月，德国军舰豹号驶进摩洛哥的阿格的尔港，紧接着柏林号巡洋舰也驶入摩洛哥海面，德法战

“两根长竿”的法文 deuxgaule 与戴高乐的名字 DeGaulle 谐音。

争一触即发。在英国的压力下，德国被迫与法国谈判，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则割让刚果的一部分作为对德国的补偿。法国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的“胜利”，曾在国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狂欢，当时，圣西尔军校戴高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菲斯班”，也正缘于此。也在1911年，爆发了争夺黎波里的意土战争。随后，1912—1913年又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

这时候的欧洲犹如一只火药桶，任何一点火星，都足以引发震撼世界的大爆炸。1914年6月，奥匈军队在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主张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亲临指挥。演习结束后，这位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于28日抵达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一位塞尔维亚爱国青年炸死。于是，德国和奥地利利用这点火星，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参战。英法俄协约国与德奥同盟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全面拉开。

战争爆发时，戴高乐是一个不满24岁的中尉，他负责指挥一个排。8月15日，戴高乐所在的步兵33团在比利时境内迪南一带的马斯河大桥与德军相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战斗一打响，那股从少年时代就在心底不断涌动和积累的激情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为了阻止德军南进，戴高乐冲在最前面，与德军争夺马斯河大桥。但是，只能说戴高乐运气不好，他还没有来得及让更多人看到他的英勇无畏，更不用说施展他的军事才华，在德军机枪的扫射下，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对戴高乐来说，这第一次战斗机会就短暂地结束了。

戴高乐被送往后方治疗，因战局变动，他先后在阿拉斯、里昂和巴黎养伤。过了三个月后，戴高乐回到已调防香巴尼的步兵33团。几经战事，不仅33团已元气大伤，而且整个法国也在面临战争的严峻考验。

大战爆发，对于法国来说，正是雪普法战争之耻，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和重建欧洲大陆霸权的机会。法国从上到下，可谓信心十足，人们普遍认为，不会再有色当之惨败，不会再有巴黎被围之辱。可是，开战不久，在德国军队迅猛的攻势下，法国军队和英国远征军遭到一连串的失败。德军距巴黎仅15公里，巴黎人又能听到1870年曾听到过的普鲁士的大炮声了。9月2日（正巧是色当惨败纪念日），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这时，多亏了霞飞、加利埃尼、福煦，这些大脑清醒、在失败面前毫不气馁的将军，利用德军部署上的失误，成功地在马恩河一线阻挡住了德军的攻势，并反败为胜。

戴高乐伤愈归队时，德军的强大攻势已被遏制，战争成胶着状态。这期间，戴高乐奉命执行了多次侦察任务，因“带回了有价值的情报”，1915年1月20日曾受到师部通令嘉奖。3月，戴高乐在香巴尼前线再次受伤，他再次被迫离开前线直到9月初。回到部队不久戴高乐晋升上尉连长，负责指挥33团第10连。

马恩河战役迫使德军将主力转向东线与俄军作战，1915年底，德军又调头西向。1916年2月，德军集中优势兵力于法国东北部要塞凡尔登。这时凡尔登守军是10万，而德军是27万，法国迅速调集军队增援凡尔登，并任命贝当将军，这位步兵33团的老团长为要塞司令。凡尔登保卫战从2月一直打到7月，德军虽然近乎倾全力而攻之，但终未如愿。凡尔登战役战史有名，

戴高乐第二次负伤的具体日期众说不一，但均在3月份。这里采用的是德雷弗斯的说法，见《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第15页。

贝当也由此成了“凡尔登英雄”。

戴高乐当然不愿放过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开战以来，他已经差不多有一半时间都在治疗养伤了。戴高乐所在部队于3月初来到杜奥蒙阵地。3月2日，德军对戴高乐所在阵地猛烈炮轰之后，以优势兵力发起了冲锋，“第10连的官兵眼看四面楚歌，便在连长戴高乐上尉率领下向密集的敌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他们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壮烈牺牲”。

戴高乐被列入阵亡者名单中，因为有人亲眼见他中弹倒地，又因为阵地随之丢失，无法核实谁是阵亡者谁是失踪者。戴高乐阵亡的消息上报后，凡尔登要塞司令贝当将军授予戴高乐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亲自签发了表彰令。表彰令最后对戴高乐这次参战的评价是：“戴高乐上尉率部勇猛出击，与敌人激烈肉搏，这是与其军人荣誉感相称的唯一抉择。戴高乐上尉在混战中以身殉国，他不愧为出类拔萃之军官。”

戴高乐并没有死，他被枪弹击倒后，成了那个正同他拼刺刀的德国兵的俘虏。于是，他开始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俘生活，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戴高乐该是多么沮丧。1918年9月1日，他在战俘营给母亲的信中，这种忧伤跃然纸上：“假如从现在起到战争结束之前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的话，我还会在部队里干下去吗？况且，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平庸前程呢？我将会三年、四年，甚至可能更长时间不能参加战斗。……对于军人生涯，我不再抱任何幻想了。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幻影’”。11月1日，他又在信中说：“我和您一样对时局表示无比欢欣，然而对我来说，欢欣之中却夹杂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酸楚，对于没能更多地参加战斗，我将抱恨终身。我似乎感到在我今后的一生中，不管我的生命是长是短，这悔恨之情将永远伴随我。”统共历时四年的战争，他参加了不到两年，这其中还有近九个月是在养伤。他虽然作战勇敢，但命运不济。他虽然几次获得嘉奖，但最终却在战俘营里迎来了法国的胜利——这时候的心情，对戴高乐这个早就渴望在战争中成材的青年军官来说，当然是抱憾多于喜悦了。

第一次机会就这样转眼过去了。

第二次机会也是平淡无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和波兰冲突不断。波兰人不断招募法国志愿人员去同俄国红军作战。1919年4月，戴高乐应召来到波兰，参加了俄波战争。但是，在波兰两年的时间里，戴高乐的主要职务是法国军事代表团的顾问，他还在军事学院教授战术学，战事并不多。

当戴高乐再次听到枪炮声时，又过去了20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同盟失败而告终，战争结束直至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这段历史，我们不用赘述，仅引用戴高乐的一段话，即知道它的大概：

事实很清楚，战争的结局没有确保和平。德国随着实力增强又野心勃勃。这时的俄国因为革命而陷于孤立；美国正置身于欧洲之外；英国为了使巴黎有求于它，对柏林宽厚备至；而新兴国家仍处于分崩离析和虚弱之中，

《我的将军》，第25页。

《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第15页。

《书信、札记和杂感》，第1卷，第520页。

《书信、札记和杂感》，第1卷，第520页。

于是，法国就独自承担了遏制德意志帝国的责任。实际上法国是这样做了，只不过没有始终如一。结果就出现了先是普恩加莱领导下的强硬政策，接着又是白里安鼓动下的和解政策，最后又寻求国联的保护。这就使德国的威胁无所约束。希特勒就将夺取政权。1933年1月30日，德国纳粹党魁希特勒终于出任总理。紧接着，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视所有为制约德国而定的条约如一纸空文，先是退出国际裁军会议，继而退出国联。1935年3月，德国宣布恢复征兵制。1936年3月7日，希特勒不顾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军进入莱茵河左岸、罗加诺公约又使这一地区中立化的规定，命令德国军队跨过了莱茵河。实际上，这是希特勒的大赌博，他在试探西方国家对他公开挑衅的反应如何。但英法两国却容忍了这种挑衅。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将坦克开进了维也纳，实现了德奥合并。接着，德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西北苏台德区，9月，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到这时，希特勒已摸清了西方国家对他发动战争的真实反应。1939年3月，德军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随之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给戴高乐提供了新的战斗机会。

战争开始时，戴高乐已是个并不年轻的上校，他已经49岁了。1939年9月2日，戴高乐上校被任命为法军第五军团装甲兵司令，他奉命驻在阿尔萨斯。英法虽然已对德宣战，并庄严表示要履行对波兰的义务，但只是停留在空洞的言词上，军事上的行动只是象征性的。因为英法领导人实际上想的是尽可能不要卷入对德战争，期望着德国人从波兰一直向东。在开战后的前10天里，法军以优势兵力（85个师对34个师）集中在西线。但只动用了9个师，谨慎地从萨尔向前推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除了侦察任务外，没有发生空战，而且英法空军得到命令不得轰炸德军阵地。对德军来说，幸运的是法军始终没有发动过真正的进攻。9月12日，法军虽然在15英里长的战线上推进了5英里，却奉命停止前进。

“西线战事开始于本月3日，至今已有13日，但是不幸得很，尽管只有西线才能解东线波兰之围，直到今日，我们还看不出西线有任何超过于前哨战的战斗。众所周知，这一带战事是在摩泽尔河和萨尔区之间，法军的主攻方向是萨尔布吕肯，可到现在，萨尔布吕肯是否被攻占过，也还是问题，从军事观点上我们可以说，实质上：‘西线尚无战事！’”

戴高乐后来回忆道：“1939年9月间，法国政府追随着英国内阁，同意介入在波兰发生的冲突。这时我毫不怀疑，我们虽然在那种战争状态中采取这一步骤，但我们仍抱有不会打到底的幻想。当时我在阿尔萨斯任第5军团的坦克部队司令。波兰在两个星期之内就被德国的装甲师和空军大队击溃了，而我们动员的军队都在阿尔萨斯停了下来。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不感到奇怪。”

波兰崩溃了，法军奉命退守马其诺防线，以防止德军突破防线侵入法国。希特勒一方面不断提出“和平建议”，一方面下达了关于战争行动的绝密指令。在法兰西逐渐陷入最严重的危机的时候，和平主义、失败主义，以及厌战情绪在法国军政要员中滋长，他们认为，只要德国人不进攻，就用不着打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1卷，第9—10页。

乔冠华：《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25页。

仗，以免让法国人白白流血。很快，巴黎一切恢复“正常”。那末，前方又是如何呢？

200 万军队在战场上待命不动，部队从军官到士兵在消磨时间，打发日子。威廉·夏伊勒写道：“没有战争的迹象，火车乘务员告诉我，在这里的前线没有放过一枪……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地堡，在很多地方巨大的席子后面法国人正在修筑防御工事。在德国一侧也有同样的景象。部队似乎是正在奉命休战。他们在彼此完全看得见的范围内干着他们的事情。所以，一尊法国‘75’毫米口径的大炮的轰击就可以把我们的火车消灭掉。德国人正在把火炮和补给品从铁路线上运来，而法国人并不干扰他们。这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于是，“西线无战事”和“奇怪的战争”从此便载入了史册。由此，我们对戴高乐上校在这场“奇怪的战争”中无所作为，也就同样不会感到奇怪了。

进入 1940 年春季，希特勒在西线大举进攻的日期日益迫近了。4 月 9 日，德军攻占挪威的沿海主要港口城市，而且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首都奥斯陆。这时，丹麦已陷敌手。为了援救挪威，英法派出了远征军，但未能成功。5 月 10 日凌晨，希特勒的西线攻势开始行动，他集中了 136 个师，包括 10 个装甲师和强大的空军，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向法国推进。5 月 15 日，在德军闪电战的进攻下，法军未能在色当阻挡住德军，德军越过马斯河，通往巴黎的通道已拉开缺口。德军占领荷兰、比利时，并突破法军防线，使英国远征军和部分法军共计 33 万余人，被逼退到北线敦刻尔克地区，从 5 月 27 日—6 月 4 日，为保存实力，英国组织了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正是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5 月 11 日，戴高乐接到命令负责指挥新组建的第 4 装甲师。实际上，这个师还只是徒有其名，它要这位新任指挥官根据指令自己去组建它。对这个任命，戴高乐内心是很高兴的，他虽然还只是个上校，但已负责单独指挥一个师了。接到命令后，他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就是战争，一场真正的战争开始了。目前在荷兰和比利时的战斗，我确信会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法德大战。据我看来，它就要来临了，用不了多久。无论如何，我都要第 4 装甲师尽早参加进去”。

溃败使法国陷入一片混乱。戴高乐回忆 5 月 16 日在拉昂驻地的情况：“狼狈不堪的难民一群又一群地把北方的通路都堵塞了。我也看见许多士兵把武器丢了。他们都是前一天被德国装甲部队击溃的部队的士兵。他们逃跑时，被敌人的机械化分遣队追上了，叫他们放下武器赶快往南逃，免得挡住了路。敌人告诉他们说，‘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

“我看到许多慌乱的人民、溃败的士兵，又听到敌人那样轻蔑地侮辱我们，心中不禁燃起了无名怒火。‘唉，真是笨蛋！头一仗真是再坏也没有了。但是必须继续打下去。说打仗，世界宽得很。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战斗；不论叫我打到哪里，不论叫我打多久，不打垮敌人，洗雪国耻，决不罢休。’往后我的一切努力，都在那一天决定了。”

这时，法国原有的三个重坦克师在马斯河沿岸的溃退中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戴高乐受命组建第 4 师，却是一个没有坦克的坦克师长。5 月 17 日，

威廉·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南海出版公司，1990 年，第 695 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 1 卷（上），第 34 页。

戴高乐已收拢了一个 B 型重坦克营，两个 R35 型轻坦克营，加上一些零散部队。在这支凑到一起的部队里，坦克车长许多人从未开过炮，驾驶员只开过四小时车，军官和士兵在战场上是第一次见面，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缺乏军需补给和食物。“然而，在这临时凑成的军队中，已经普遍地出现了士气高昂的景象。没关系！泉源还没有枯竭。”戴高乐决定利用这些部队发动攻势，要向东北推进 20 公里，夺取通往圣康坦、拉昂和兰斯的交叉点——塞尔河上的蒙特康内，切断德军的三条路线。部队很快到达了目的地，但是由于缺少步兵和炮兵支援，黄昏时分，德军坦克已抄到戴高乐的后面，在塞尔河对岸敌军火炮和轰炸机的轰击下，戴高乐感到“我们像一个迷路的孤儿”，必须脱离险境。天黑后，他指挥部队撤退。这一仗，德军死了几百人，戴高乐损失 200 人，抓了

130 名俘虏。

18 日和 19 日，戴高乐决定继续进攻，他要用仅有的这支装甲力量牵制德军向南推进。第 4 装甲师在塞尔河一线阻击了敌军的坦克，为大部队的部署赢得了时间。但是，戴高乐的一支小小的部队的胜利，在整个法德大战场上已微不足道。因为法军统帅部已被失败主义者控制，他们想的是同德国谈判停战。

5 月 20 日，当法军统帅部陷于混乱和崩溃时，戴高乐的第 4 装甲师却在向西挺进。26 日夜，戴高乐接到命令，火速开往阿布维尔夺取城南敌军桥头堡。这是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的战斗。这时，他已经是准将师长了。戴高乐率领部队克服重重困难，在三天之内迫使敌军后退 9 英里，俘敌

400 人。阿布维尔桥头堡虽然没有攻克，“但已缩小了三分之二”。他在信中写道：“我和我的装甲师进行的第二次大的战斗，在阿布维尔以大胜而告结束。你大概从战报上看到了详情（400 名俘虏，

还有许多军用物资……）。”为此，戴高乐受到总司令魏刚将军的通令嘉奖。

到此，戴高乐一生中直接参加战斗的经历，就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6 月 5 日，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部次长，穿着军装进入政界；14 日，巴黎失陷，15 日，凡尔登要塞陷于敌手，17 日，法国政府求和停战。也就是在这一天，戴高乐飞往伦敦，开始了他的“自由法国”之行。那是另一种战场，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身先士卒直接参加战斗了。

从士兵到将军，戴高乐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战斗中他奋勇当先，颇有战绩，但他最大的指挥权只是 150 辆坦克，他无法影响整个战局，甚至无法扭转一个战役的败局。这与他在 15 岁时写的那篇小说中塑造的“戴高乐将军”，差距是多么远啊！一位身经数战的将军，同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当然无法比拟。但是，在现代史上，事实越来越证明，将军的作用和威望，并不完全直接反映在战场上。戴高乐还在追求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戴高乐将军”的道路。

同上书，第 38 页。

戴高乐晋升准将的日期众说不一，有说 5 月 15 日，有说 5 月 23 日，还有说 5 月 28 日。应该是 5 月 23 日，因为戴高乐 5 月 24 日给他夫人的信中说：“昨天我已经是将军了。”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 1 卷，第 315 页。

穿军装的文职军官

戴高乐受他祖辈的影响，从小就对舞文弄墨感兴趣，他喜爱诗歌、戏剧、小说、历史。儿时在他充满幻想的幼小心灵里，经常尽情施展指挥百万大军的才华，但也时时不忘饱览群书，并常常动手，做些文字尝试。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种儿时文武结合的志向和爱好，一直伴他度过了整个人生历程，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将军政治家。如果说，从武的方面看，作为职业军人，戴高乐只不过是个身经数战的将军，平淡无奇；那末，从文的方面看，做为职业军人，戴高乐却由此坚定了志向、显示了才华、磨练了性格、选择了道路。

在戴高乐 30 年的职业军人生涯里，“文”的份量明显重于“武”的份量。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比较。

文

- 1909—1912年 圣西尔军校学习
- 1916—1918年 在战俘营中潜心学习，积累资料，为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收集了素材。
- 1920—1921年 波兰朗贝尔托夫军事学院战术学教官。
- 1921—1922年 任圣西尔军校战争史讲师。
- 1922—1924年 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 1924年 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
- 1925年 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办公室秘书。在“法兰西军事评论”上发表《我国战争原则的方向》和《法国设防城镇的历史作用》。
- 1927年 4月在高等军事学院三次演讲，题目分别为《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领袖人物的性格》，《威望》。
- 1931年 发表《驻地中海东部地区部队的历史》
- 1931—1937年 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任职。
- 1932年 《剑刃》一书出版。
- 1934年 《建立职业军》一书出版。
- 1938年 《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出版。
- 1940年 6月4日出任国防部次长。

武

- 1912—1916年 步兵33团服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 1919年 参加俄波战争。
- 1924年 驻莱茵区法军司令部供职，负责冷藏物资工作。
- 1927年 9月奉调指挥19轻步兵营，驻防特里尔。
- 1929年 在贝鲁特驻地中海东部地区司令部供职。
- 1937年 任驻梅斯坦克507团团团长。
- 1939—1940年 大战爆发，任第5军团装甲兵司令，第4装甲师师长。

可见，在戴高乐的军事生涯中，对他的成长来说，文职工作的影响远远大于战场实战的影响。

探讨这种影响，当然不能离开戴高乐在这些年里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相对集中地反映了人们后来称之为“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

的逐渐形成，反映了戴高乐在成长为军人政治家的过程中的自我规范，反映了戴高乐在思考和观察重大问题时善于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出发的方法，也反映了戴高乐对真理和正义的执拗追求以及不畏权势的顽强性格。

1924年3月，戴高乐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本书的最初素材，积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俘营中。戴高乐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俘生活中，大量阅读书籍和报纸，并作阅读笔记。在波兰军事学院授课，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使他进一步丰富了材料，并有时间深入研究德国问题——这个从小就使他浮想连翩、以后又与他终生不离的国家大事。

戴高乐在书中，详细地从历史的角度对德意志和法兰西这两个民族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德国人是一个具有“超人性格”的可怕的民族，他们“生性好高骛远，狂热扩张个人权力以至不惜任何代价，而且对人类经验、常识和法制的约束根本不屑一顾。”正是这样一个民族，策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试图以战争来实现尼采的“权力意志”。而法兰西，在戴高乐眼中是一个“花园”（Le jardin à la française），这个花园中“井然有序”，“优美和谐”，它没有“分外之想”。它园中的树木相安无事，大树也不想“窒息其他树木”，连塑像也不求“独占人们的赏识”。这是一片多么宁馨安逸的理想乐园。

这样一种比较，人们自然会发问，这两个毗邻的民族会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下呢？

这部书以“敌人内部的倾轧”命名，顾名思义，他是想通过揭露敌人内部的“倾轧”，来探讨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原因。戴高乐重点揭露的，是德意志帝国军事当局以军事独裁的形式蚕食民众权利和政府权力的政策。在他看来，在战争中，除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战略以外，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战略。对于军人，只有在政府之间保持权力平衡，尊重政治制度，除此之外谈不上什么公民意识。因为战略就是政治，而政治首先是政府的事情。他认为，“德国的军事长官们凭恃自己的荣誉，利用君权的懦弱，剥夺了政府的权力和威望。这一切惊人地证实，在德国，国家权力的竞争违背了必要的合乎逻辑的原则”。

如果说，戴高乐对德意志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溃败的原因是切中时弊的话，那末，也就可以说，戴高乐提前警告了法兰西民族。同样的警告，还在1938年发生过一次。那年，戴高乐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是他踏入政界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法国和它的军队》。他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在这本书中，我说明若干世纪以来，国家的灵魂和命运何以一直都反映在军队这一面镜子里面。这便是我在那卑微的地位上，当大难临头的前夕，为我国提出的最后一次警告”。因为，16年后，法兰西的溃败，不正是因为法国军事当局的主要首脑们以失败主义为依据，左右了法国政府的停战求和政策么？

戴高乐为什么念念不忘探讨德国人成败的原因？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法兰西民族生活在一个“花园”式的理想境界中，却因为德意志民族的存在而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124页。

《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第20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25页。

遭到威胁和破坏。这种威胁和破坏，并没有因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而结束，在他眼里，德国不是个死去的老虎。

戴高乐在这部书的前言中，对德意志民族有这样一段看法：……一个骁勇的民族在精神上突然彻底崩溃，这种没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民族一向知道如何显示其克敌制胜的集体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忍受痛苦的能力，而且这一切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使它的敌人惊叹不已，并必将受到历史

的尊敬。

以指导和协调此种势力为己任的德国军事首脑们，表现得勇敢顽强，富有进取精神、必胜意志以及运用人力物力方面的巨大魄力。他们的最后失败并未损害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享有的声誉。这是戴高乐在德国战败之后，对德意志民族发出的无可奈何的赞叹。写在书中的，是我们看到的客观的“尊重”之词，但隐藏在这些词之后的，应当是戴高乐的“余悸”，他时刻都在担心，这个民族在“忍受痛苦”之后，再度闯入他的法兰西“花园”。

在这里，那种从小就在戴高乐心中孕育的法兰西民族自豪感，以及对德国人的憎恶心情，已经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形成了对民族和国家的看法。戴高乐确信，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和特点，这些不同的精神和特点，决定了戴高乐应该怎样去行动。戴高乐说道：“老实说，我心里长期以来就在考虑着行动的哲学、国家对于军队的鼓舞和运用、政府与最高统帅部的关系等等问题。并且在几本出版物，如《敌人内部的倾轧》、《剑刃》，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评论中表达了我的看法。”

《敌人内部的倾轧》不仅奠定了戴高乐从历史学角度研究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方法，而且书中极其鲜明地显示了戴高乐已经成熟的性格。他在书中引证一个事例，那是关于凡尔登战役的。大约是1914年9月，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已觉察到凡尔登战役局势的变化，深为德军的盲目乐观忧虑，决定重新部署兵力，以防万一。但是，他的部将冯·克劳克指挥的第1军，拒绝执行他的命令。结果，法军在他所需要的地方集中了优势兵力，稳住了阵脚，并赢得了反击。对此，戴高乐的看法是：“战争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实际情况和人的个性。”

当然，谈到对“个性”的看法，就不能不谈戴高乐的另一部著作《剑刃》。

《剑刃》一书发表于1932年7月。这本书主要取材于戴高乐1927年在军事学院的三次演讲，后来这三篇演讲稿也曾在《法国军事评论》第81、108、120期上分别发表过，题目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领袖人物的性格》，《威望》。在汇集成书时，戴高乐又添了两章，《主义论》和《政治家与军人》。

《戴高乐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和《戴高乐》的作者让·拉古杜尔，都将《剑刃》一书与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提并论。当然，这并不等于将戴高乐与这两个人物相提并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把自己的天下独尊的野心暴露无遗，并设计了征服世界的雄图大

引自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7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1卷，第13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123页。

略，“戴高乐有别于希特勒，他没有表明他将来要做什么，但他预言了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戴高乐认为，领袖人物都具有超出常人的气质和品格，他们的“威望”。来源于使人有种神秘感，“令人捉摸不透”，手里经常持有“惊人秘密”。戴高乐极赞赏那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典型事例，认为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断而打胜仗，是值得推崇的。但是，他也指出了军人必须履行的职责，对于掌握军事实权的人物的野心应予限制。在他看来，在国难当头之际，军队首脑挺身而出挑起重任，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这就是戴高乐自我刻画的形象，他在《剑刃》一书中预言了自己未来的领袖形象和命运。

其实，相对来说最有影响并引起争论的，应是戴高乐 1934 年 5 月发表的《建立职业军》一书。这是一本论述军事战略理论的书，书虽然在 1934 年发表，但书中体现的消极防御战略和积极主动战略之争，在这之前就有，并在这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定出输赢。不过确定这个输赢的代价是太大了，它是通过法国溃败这个实践得到证实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为了启迪后来人，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场争论作了较详尽的叙述。

所谓“职业军”，是指有高速机动能力的机械化部队。

自从 1917 年英国皇家坦克部队首次投入战斗以来，关于机械化部队和机械化战争理论的争执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这场争论中（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这场竞争中），德国人比谁都领悟得快。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武装力量被严格控制在 10 万人以内，迫使德国努力提高军队的火力和机动性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1924 年，德国国防军组织了一次以摩托化为主题的军事演习，后来成为德军参谋长的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在这次演习中一举成名，成为德军坦克部队的先驱者。1929 年，德国国防军首脑冯·泽克特将军发表《一个士兵的想法》，明确要建立一支真正的职业军，作为德国军队的核心力量。1931 年，古德里安成了德国第一个机械化营的指挥官。尽管受条约限制，他的坦克只能是胶合板制成，配备的是木制大炮。

当然，古德里安的机械化战争理论一开始也受到过怀疑，但最终被那些不甘被剥夺军事力量、试图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战争狂人所接受。希特勒上台后，古德里安备受重用。1935 年，他受命指挥德国第二支机械化部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古德里安成了席卷欧洲的“闪电战大师”，在占绝对优势的飞机和机械化部队的突袭下，欧洲大部分地区陷入希特勒手中。

应当说，法国人利用机械化军队的历史早于德国人。早在 1915 年，在法国被称为“坦克之父”的埃斯蒂安纳将军就研制成功了坦克，并在 1917 年用坦克支援步兵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法两国军队中的坦克使德军大吃苦头，德军将领鲁登道夫承认：“事实证明大量使用坦克的战术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埃斯蒂安纳将军确信，在飞机配合下，坦克是未来陆战中的主要武器。战争结束后，他又是发表演说又是撰文，力主创建独立的机械化部队，兵员 10 万人，配备 4000 辆坦克和 8000 辆卡车，将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对法国最高统帅部那些身经百战，特别是对那些挂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花环的老将们来说，埃斯蒂安纳的想法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们死抱住过去成功的经验不放，极力阻挠推动部队的机械化建设，荒谬地反对“用机械怪物去代替马匹”，认为坦克只能配合步兵使用，绝不能单独作战，更

不能主导战争。埃斯蒂安纳被视为离经叛道。这种谴责也殃及埃斯蒂安纳的追随者，戴高乐就是其中之一。

1933年5月，戴高乐在《政治与议会评论》杂志上发表一篇长文，题为《建立职业军》。这是在希特勒上台几个月以后，戴高乐深感局势严重，又没有人愿意提出任何办法来应付，认为有责任诉诸舆论，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戴高乐指出：“除了经过动员所产生的大规模部队以外，还应紧急地用一批精选人员组成一支机械化、装甲化的机动突击部队。”一年以后，即1934年5月，经过修改和补充，戴高乐将这篇文章出版为一本小册子，仍旧题名《建立职业军》。

在这本书中，一开头，戴高乐就像所有的（不管是法国的还是他国的）军事战略家、指挥家一样，如实地描绘了法国在欧洲所处的地形图：法国的东北部与比利时接壤的边界，是军事上最突出的薄弱地带，面对这个薄弱地带，地处开阔平原之中的巴黎，敞开胸怀面对任何来犯之敌。在国防上，法国不像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也不像英国和美国隔着海洋，它是用自己的心脏直对着对手的尖刀。这幅地形图是令人信服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挡住敌人的尖刀。戴高乐得出的结论，与法国最高统帅部那些高官显贵们完全不一样。

当法国上下都寄希望于凡尔登、梅斯、色当这些要塞和马其诺防线能够阻挡敌人的进攻时，戴高乐疾呼，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要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精悍的职业军。按照戴高乐的计划，这支部队应该组编成“六个第一线师、一个完全摩托化和部分装甲化的轻装备师。”每个第一线师应由三个旅组成：一个装甲旅，编制是重型坦克团、中型坦克团、轻型坦克营各一个；一个步兵旅，编制是两个步兵团，一个轻步兵营，配备装甲运输车；一个炮兵旅，编制是长射程炮兵团、短射程炮兵团、高射炮兵团各一个、装备全射角火炮。此外，还应当配备搜索、工兵、通信、伪装等兵种。最后还应当有强大的空军力量相配合。戴高乐认为，这种职业军的建立，将引起军队的组织方式和战争的政策与技术的极深刻变化。

《建立职业军》，按照戴高乐自己的说法，“这本书最初曾引起注意，但没有给人们很深的印象。”让他感到终身遗憾的是，法国人还不像德国人那样重视他的书，他听说希特勒曾让人将《建立职业军》读给他听，“因为他的参谋人员很重视我的书”。戴高乐听到的这个传闻未经查考，也极难说戴高乐的主张对德国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是，一个极可怕的事实是：1935年前后，德国拥有一批竭力推动军队机械化建设的得力将领，他们不仅有实权，而且深得希特勒赏识。德国已在组建第三个装甲师，而且开始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相反，在法国，戴高乐这样的人物人微言轻，法国由上至下地进行了一场讨伐建立机械化部队主张的运动。

因此，戴高乐给人以启迪的，不是在《建立职业军》这本书本身。因为这本书中的观点和主张并不是戴高乐的新创造，它能否算一本很有价值的军事著作，也还可商讨（1993年第530期《新书周报》上，有人将《建立职业军》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武的《孙子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并列，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之一）。戴高乐真正给人以启迪的，是他不以自己低微的地位而自卑，反比那些居高位的人境界更高，看得更远。他

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向旧传统势力，向保守的权威们挑战。戴高乐的精神贵在于“我绝对不能坐视未来的敌人装备制胜的武器，而法国则始终没有”。

戴高乐无权参与决策，他只能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慷慨陈词，争取支持，扩大影响。他先结识了一批新闻工作者，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局势的严重性，揭露德国军备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在进攻和追击上，也就是说在努力提高德国军队的高速机动能力上。他们利用报刊来宣传建立机械化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能够督促政府采取行动。戴高乐特别赞赏《回声报》和《时代报》的编辑安德列·皮龙诺。此人曾发表40篇重要论文，其中20多次论证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加上空军可以使法国的防线一下子垮台。但是，单单是报纸上的文章不能影响大局，“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识这个问题”。

“国家统治者”们的糊涂认识，其严重性不亚于德国威胁的增长。

1936年10月，以保守著称的魏刚将军在《两大世界评论》上著文，反对建立职业军的主张，认为让机械化部队独立作战，就会产生分裂，形成两个陆军，“两个陆军——说什么也不行！”仅隔一个月，前陆军参谋长德贝涅将军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权威的口气强调，关键在于坚守法国东北方的防线，而不在于什么机械化部队。身为陆军部长的贝当元帅也参加了这场辩论，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认为坦克、飞机不可能改变战争的基本因素，法国的安全还是要依靠以要塞连接的连绵防线。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在他创办的《人民报》上接连发表文章，竟然有一篇以《打倒职业军队》为题。还有人将建立机械化部队讥喻为“用一个风力机运送全部军队”一样可笑。更有人声称：“德国人是天生的侵略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人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需要反摩托化。”

经过努力，戴高乐在政界也找到了知音。其中最突出的是任过财政部长的国会议员保罗·雷诺。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呼吁立即组建特种部队。他以戴高乐计划中的部队建制为方案，要求至迟在1940年4月15日以前实现这个计划。雷诺的雄辩和口才，曾使议会大受震动，也感染了另一些政治家。

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毕竟势力雄厚，雷诺的计划遭到国

民议会中陆军委员会的拒绝，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接替贝当元帅任陆军部长的莫兰将军在国民议会上一锤定音，他说道：“我们已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筑成了一个这样坚固的防线，如果我们竟疯狂到越过这个防线作莫明其妙的冒险，那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他接着说：“我刚才告诉诸位的话是政府的意见。这至少在我个人来说，是完全熟悉战争计划的。”就是这个莫兰，他将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了对戴高乐的愤恨。他说戴高乐找到了一个听话的作家皮龙诺，找到了一个留声机雷诺，扬言要把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任秘书的戴高乐送到科西嘉去。

当然，局势的急速发展和辩论的实际影响，使政府的一些人也不能对机械化装备漠然视之。1936年在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开支计划，其中相当大的一部

分将用于坦克和空军。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首先，从战略时机上说，法国已被德国占了先，因为德国的独立机械化部队已在空军的配合下招摇过市；其次，法国军界的战略思想没有彻底转变。虽然大量投资添

增坦克和飞机，但并不是组建独立机动的机械化部队，仍然是分散到陆军各部去配合作战；最后，机械装备设计上落后、不适时宜。因为立足于被动防御战略，所以飞机多是截击机不是攻击型的，坦克设计笨重、速度慢，火炮射程短。戴高乐的结论是：“我们会按照机械化部队所需要的数量制造出许多机械化武器，花掉许多金钱，但是我们还是得不到那种部队。”

戴高乐虽然不能扭转大局，但他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1937年底，戴高乐晋升上校，被任命为第507坦克团团长。这个在文章和演说中将坦克说得至关重要，在整个军队中闹得沸沸扬扬的戴高乐，面对真正的坦克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吗？他在坦克团里尽可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和计划去操练部队，他希望能用这个不大的坦克部队去证实自己的理论，那怕是局部的也行。由于严格要求和训练有素，他被称为“摩托上校”。1938年3月，希特勒的装甲师开进了维也纳，在坦克的隆隆声中强行合并奥地利。当全世界都在注视和议论装甲部队在为希特勒打通通道时，法国竟然还有人在嘲笑德国坦克在这次行动中有几辆熄火抛锚。1938年底，法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终于决定要组建两个装甲师，但这两个师却计划在1940年1—3月份建成，而且建制和火力、速度，都和戴高乐设计的相距甚远。1939年，他出任第5军团装甲司令。尽管为时已晚，戴高乐还是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那是1940年1月26日，他向政府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紧急要求立即作出成立机械化部队的决定。这时候大战已爆发五个月了。希特勒进攻波兰引爆了二次大战，波兰战役已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军事战略教训，德国运用机械化部队和空军协同作战的闪电战术，很快突破防线击溃并占领了波兰。戴高乐在备忘录中警告，敌人将在地面和空中同时以极强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随时可以被突破。如果没有同样的部队进行还击，“我们就很有被消灭的危险”。戴高乐敏锐地觉察到，机械化部队的产生并投入实战，这不仅是军事战略上的一次革命，其影响还将波及整个社会。他说道：“法国人民无论如何必须打破这样一种幻想，即认为目前军事上静止不动的状态符合这次战争的性质。事实正好相反。内燃机给现代化破坏工具带来的那种威力、速度和射程，使得目前的对峙或迟或早将表现为运动、奇袭、突破、追歼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其规模和速度都将远远超过以往最激烈的战役……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了！已经开始了战争，很可能成为曾蹂躏过全世界的任何战争中规模最大、最复杂、最激烈的战争。这次战争会引起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危机，它将在彻底改变各国人民地位和国家结构的情况下导致灾难性的结局。但是，战争中军事状态与性质相协调的假象下，却给这场变革准备了一个与战争规模相匹配的军事工具——机械化部队。现在已经到了法国作出决策的时候了。”

像以往的疾呼呐喊一样，戴高乐的最后一次努力“并没有引起震动”。直到5月11日，戴高乐受命组建并指挥第4装甲师，尽管他因此感到骄傲而且英勇作战，但整个法国的溃败早已注定。5月18日，德国七个装甲师越过马其诺防线，直逼巴黎和敦刻尔克。戴高乐叹道：“现在整个法国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滚下去了。”

这场争论的意义，势必要在事隔多年之后重新回味才能体会出来。因为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1卷，第30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1卷，第34页。

就争论焦点本身来说，不久胜负已经分明。但在今天通过这场争论来评介戴高乐，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

这场争论前后延续了将近七八年之久，戴高乐的对手，都是些达官显贵、功勋卓著的权势人物，照理说他们应该更加迫切地感到国家面临的危险和民族面临的灾难，他们更有义务、更有责任寻找出为国家和民族摆脱困境的良策，但是不仅没有，反而想方设法扼制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建议和设想。他们将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决策与自己的显贵地位和荣誉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摆脱曾给自己带来过荣誉的旧的经验束缚，在新的形势下拒绝接受新事物。而可悲的是，保守主义在面临危机时必然惊慌失措，导致失败主义，而失败主义的后果又必然是滑向投降主义。这就是后来法国贝当政府产生的必然性。

戴高乐只不过是个不起眼的校级军官，但他却超凡脱俗，以远见卓识看出了危险的结局和大势所趋。显然，这与戴高乐一向以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有关，一向善于以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有关。这场争论对戴高乐最直接最有意义的影响在于：通过这场争论，使戴高乐逐步看清了法国正在权贵们的操纵下走向危险的道路，因此，他在思想上就早有了准备，要同这些葬送法国的人斗争到底。过去，他也常常表现出不畏权势，但那只是通过某些具体的小事体现的。而这场争论，从阵容和内容上来说，都是非同小可的，它就更加培养炼就了戴高乐宁折不弯、勇往直前的品格。此外，戴高乐在争论中与政界人物的接触，特别是得到保罗·雷诺的支持，并在最关键的时刻跨入政界，成为一名政府官员，无疑等于给他在人生的转折点上提供了一个跳板。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戴高乐在法国溃败、贝当政府求和投降之际，敢于挺身而出绝非偶然，与这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争论有着直接的关系。戴高乐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道路。有关戴高乐传记的许多作者们，尽管都叙述了戴高乐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并赞赏了他正确的预见性，但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点明这场争论在戴高乐一生转折关头的重大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戴高乐与贝当的恩恩怨怨

自从戴高乐从军校毕业走向社会，戴高乐一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一半时间里与贝当有着密切的关系，前后长达30多年。因此，不仅每本戴高乐传记都必谈贝当，而且还有人专门以戴高乐与贝当为题写出了专著。

戴高乐与贝当是种什么关系，贝当对戴高乐的一生有什么影响？

简单地可以说，贝当的赏识和提携，使戴高乐小有名气；戴高乐与贝当决裂，使戴高乐名声大振。

戴高乐与贝当的初次相识，是在1912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他选中曾在那儿服过一年役的步兵33团任职，这时，步兵第33团的团长就是菲利普·贝当上校。

戴高乐负责一个教导排，被授予少尉军衔，全团共有51名尉官。照说，戴高乐这个不在团部工作的低级军官，与上校团长之间只能是简单的一般工作关系，但事实上，他们的关系似乎不同一般。贝当这时56岁，正值壮年，而且因为他的军事才能在军界享有声誉。这时候的贝当，在军事战略理论上坚持火力优先的论点，认为只有在占优势地位的炮火支援下，部队才能利用刺刀进攻。这种火力优先的论点，与当时军方占统治地位的刺刀优于枪炮的论点绝然不同。

一天，贝当召集全团军官，向他们讲述战争中火力优势的重要性。当他以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为例，谈到孔代王子的军事演习使拉斐尔德元帅的军队陷于混乱并包抄凡尔塞附近的洛根古尔时，23岁的戴高乐少尉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未经允许就打断了贝当的话头，说道：“可是杜雷纳元帅留守在那里，他用炮火压倒了孔代，阿拉斯被解围了”。戴高乐的举动使同事们感到不高兴，但是却引起了贝当上校的注意和好感。因为贝当从戴高乐的举动发现戴高乐与众不同。戴高乐不仅相貌与众不同，他是大个子大鼻子，一副刚愎自用、任性傲慢的样子，这点与贝当相似；戴高乐是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成绩优良，有干劲，有志向，有才华，这一点也与贝当相似；戴高乐喜欢新事物，他对贝当的火力优先论表示赞同，这点就与贝当相投了。

贝当对戴高乐的评价很高。1913年上半年的评价是：“在221名圣西尔军校毕业生中，他名列第13。初出茅庐便显示出真才实学，是位前途无量的军官。他全心全意地履行他的教官职责。对于巴尔干半岛冲突的起因，他作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演讲。”1913年下半年的评价是：“非常聪明、克尽职守，率领他的排出色地完成了演习任务。一切赞扬均不为过。”这时戴高乐已是中尉。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贝当已调离第33团。1916年3月戴高乐第三次负伤被俘，被误列在阵亡将士名单中，已晋升为将军的贝当曾亲自签署对戴高乐的嘉奖令。经过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贝当以他卓越的战功为阶梯，在军界的地位直线上升。大战末期，贝当于1917年5月接任法军总司令职务，这位法军元帅，在军队内采取整顿军纪与关怀生活相结合的方针，有效地提高了法国军队的士气。但是，这时候贝当的弱点也开始明显暴露。在战局处于不利、形势较危急的时候，贝当变得愈来愈悲观，直至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与当时的霞飞、福煦元帅的临危不惧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可见，到1940年贝当从失败主义滑向投降主义，不是偶然的了。

如果说贝当对戴高乐曾有过知遇之恩的话，莫过于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受到校方惩罚性的考评，贝当元帅为戴高乐大抱不平，不仅进行干预，而且以行政命令为戴高乐提供了返回学院施行报复的机会。

1922年11月，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任教时考入高等军事学院。戴高乐入学不久，就与战术教师穆瓦朗上校的保守的形式的战术观点产生了冲突。穆瓦朗迷信于根据地图制订的作战计划，他不仅要求制订详尽的作战计划，而且认为一经定下的计划，无论如何不能随意更动。他还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迷信于炮火的威力可以阻挡任何进攻。这种陈旧的循规蹈矩的先验论，戴高乐无法学习执行，他喜欢的是，指挥官在战场上要随时根据战局变化决定自己的行动。而且他还认为，今后的战争也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凭借火力强弱反复争夺某一块阵地或据点，在运动中歼敌取胜将是基本战略。

1924年，考试和决定名次的时候到了，6月17日举行称为“战术旅行”的最后一次演习。固执己见的戴高乐不愿低头，他决心用这次战术实地考核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受命指挥一个“军”，率领部队灵活机动地进行了一次闪电式进攻，将“敌军”击溃，也就是将穆瓦朗上校设置的“阵地战”防御系统摧垮了。但是，上校并不认输，在评判时直逼戴高乐，戴高乐整整一

天在解答提出的各类问题。戴高乐同上校顶上牛了。

“你右翼师的左翼团的辎重队应该配置在什么地方？”穆瓦朗上校问。

“更托伟厄，请你回答。”戴高乐说。

“可我问的是你，戴高乐！”

“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下级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夏托伟厄，请回答上校的问题。”

“……好吧，我们知道你很重视自己的职责……我……”

顶牛的结果当然是戴高乐吃亏。考试委员会围绕戴高乐的评分问题意见不一。在“优秀”、“良好”、“尚好”三个档次中，究竟戴高乐应该在哪儿呢？委员们几乎都不否认戴高乐的天赋，他聪明，有才干，记忆力好，指挥果断，头脑清醒。但是他过于固执，自命不凡，独断专横，难于共事。“优秀”是与戴高乐无缘了，令戴高乐脑火的是竟然多数人要给他评“尚好”。

贝当这时虽然身居高位，但没有忘却这位颇有见地的下属。关于给戴高乐划分等级的争议传到了贝当的耳中。他召见了军队高等教育部主任德拉尼里安将军，让他转告副校长、考试委员会主任迪菲厄将军，认为应该给戴高乐评“优秀”，而且认为戴高乐是极有前途的年轻人。迪菲厄将军看戴高乐也不顺眼，但他并不认为戴高乐应评“尚好”，给个“良好”是合适的。结果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既没有按贝当的干预评“优秀”，也没有按多数人的意见评“尚好”，戴高乐得了个“良好”，排名第52。

穆瓦朗上校在戴高乐的成绩单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是一位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又严肃认真的军人，才华出众，精明强干，颇堪造就。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伤了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的品质。”而真正感到遗憾，甚至失望乃至愤怒的，是戴高乐本人。因为只有评上优秀的毕业生，才能进入总参谋部那些最可实现理想和施展才华的部门。他早就期望能进入总参三局（计划局），以便创造实现他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机会，一展宏图大志。可是，这个幻想破灭了，他只能分配到负责运输供给的总参四局任职。几个月后，戴高乐被派往莱茵区供职，负责冷藏工作。临赴任前，戴高乐拜访了贝当，尽管结论已无法更改，但他得到了同情和安慰。也许正是这次拜访，在这两个两代人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总有一天要给军事学院那些人颜色看看。

1925年10月，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三军总监贝当元帅下令，调戴高乐到自己办公室任秘书。一年之后，他凭借权势为戴高乐创造了一个机会，使戴高乐在数日之内成为全军上下刮目相看的人物。

贝当一直记着高等军事学院给戴高乐毕业成绩评分这件事。正好，军事学院新任校长埃兰将军也是一位崇尚新思想的军人，贝当命令埃兰在学院组织一个系列讲座，主讲人是戴高乐，主持人是贝当，共分三次进行。按照这个命令作出的安排，显然带有挑衅性和报复性。戴高乐上尉从军事学院毕业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120页。

同上书，第121页。

时只得了一个“良好”，不到三年竟然要应邀回校讲学，而听他讲学的，不光是在校学员，还包括全体教授和讲师——不管他们想不想听，都要来，因为主持讲座的是法军总监贝当元帅。那些曾主张给戴高乐评“良好”，甚至主张评“尚好”的教授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可是军人的天职只有服从，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去接受这次蓄意的侮辱。

令人奇怪并要发问的是，身居高位的贝当元帅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难道仅仅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戴高乐上尉，就值得去设计这样一场戏剧性的报复吗？

原来，贝当元帅也曾吃过与戴高乐相似的苦头。那是在1900年，贝当在国家射击学校任教，因提倡火力优先论遭到解聘。后来，他到军事学院任步兵战术学助教，还是因为火力优先论得罪了军事学院的正统战术家们。迷信上刺刀冲锋的教授们将他视为异端，层层阻挠他提升为教授。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却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事情虽然过去了25年，但这个宿怨一直没了，这次他决心利用戴高乐来了却心头之恨。何况军事学院的考试委员会还敢不听他的意见，仍然给戴高乐评了个“良好”。

对于戴高乐来说，1927年4月份的前三个礼拜是难忘而又开心的日子。4月7日，戴高乐开始第一讲。那一天，军事学院的师生们聚集在一起，静候贝当元帅——这位当时的大人物和戴高乐——这位将来的大人物的到来。当贝当在埃兰将军陪同下进入会场时，教授和学员们恭敬地让路，贝当却让戴高乐走在前面。全身戎装的戴高乐走上讲台，他慢条斯理、态度从容、不失礼仪地摘下军帽、手套和佩剑。主持会议的贝当元帅没有更多他说话，他只是说：“先生们，戴高乐上尉将向你们阐明他的观点，请你们注意听。”

第一讲的主题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第二讲的主题是“领袖人物的性格”，第三讲是“威望”。这个系列讲座的中心主题，是关于领袖人物的作用，领袖人物的品质，怎样才能成为领袖人物。这样一个高深莫测的主题，由一个被人看成凡夫俗子的上尉来讲授，本来就显得有点滑稽，更何况是在军队的最高学术殿堂里向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们授课。其结果，自然是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有人为之喝彩，有人为之恼火。

喝彩的是因为戴高乐的演讲风度，他的旁证博引，他不用讲稿可以口若悬河，他的手势和脸部表情引人注目，就像是能够赢得观众的演员。恼火的是戴高乐不自量力，选择这样一个显示狂妄自负的主题，跑回军事学院来教训他的师长，而凭借的又是贝当元帅的权势。听众从头到尾都在猜测一个问题：戴高乐让他们煎熬了三个礼拜，究竟他精心描绘的这个领袖人物是谁呢？是在吹捧贝当，还是在暗示自己的未来？

不管是喝彩也好，是恼火也好，反正贝当和戴高乐都解气了。戴高乐的名声也开始流传开了。戴高乐得寸进尺，提出以同样的内容给军事学院以外的非军事人员再讲一次，看看反响和效果，正在兴头上的贝当又欣然应允。在菲斯泰尔·德库朗热俱乐部的安排下，戴高乐又进了最高学府——巴黎大学演讲三次。尽管反响平平，但毕竟场面可观，面对芸芸学者和社会各界名流，畅谈自己的人生哲学，岂是谁都可轻易得到的机会，戴高乐真是够风光的了。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140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142页。

戴高乐离开军事学院不到三年，在贝当的全力（但不能说无私）支持下杀了一个回马枪，利用军事学院的讲坛既阐明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又报复了那些教授先生，并在这三次演讲的基础上，整理出了1932年出版的《剑刃》一书。出书的时候，戴高乐当然忘不了贝当的恩情。因为没有贝当，就没有那三次演讲，没有那三次演讲，也就很难有《剑刃》这本书。所以在书的扉页上，印上了戴高乐特意给贝当的献辞：“献给贝当元帅。本书只能献给元帅阁下，因为你的光荣功绩最能证明，思想光辉所产生的行动，具有无比崇高的美德”。然后，是亲笔题词：“致最崇高最热忱的敬意——夏尔·戴高乐”。

戴高乐后来在他的《战争回忆录》里，对这段大杀回马枪的往事只字未提。他只是说：“我曾在巴黎大学举行过公开演讲，讨论作战问题。”既未说先在军事学院演讲，也未说到贝当，而且内容主要也不是“作战问题”。究竟为什么缄默不语，是因为已成名的戴高乐对于这种有点仗势欺人的做法羞于再提，还是因为贝当元帅已成罪人不愿暴露两人过从的关系？

戴高乐与贝当的最后决裂，当然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原则性冲突，但在1940年之前，两人的关系已出现裂痕。

最初的分歧始于1928年，那是戴高乐离开贝当办公室之后去指挥第19轻步兵营时。戴高乐在贝当办公室工作期间，受命独自进行法国军队历史的研究工作。他埋头写作几个月，贝当对他编写的部分甚感满意。当正要编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为涉及到许多现役的高级将领，特别是涉及到贝当本人，戴高乐就比较慎重起来，暂时搁下了笔，恰逢他晋升少校调任。

戴高乐有意将这段成果整理出版，他与接替他在贝当办公室工作的奥德上校联系。但是贝当自己也有打算，他保留了所有这段研究的笔记和资料，并对戴高乐写的手稿仔细进行了修改——说不定那天会以贝当的名义发表哩！奥德将贝当修改原稿的事情坦率地转告了戴高乐。戴高乐也坦率地回信道：“……一本书就是一个人，直至目前这个人就是我……如果元帅组织你们写另一本书，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它的出版。我将不容争辩地重新修改我的书。我反对在书中破坏我的思想、我的哲学观点和我的风格，我将把情况告诉元帅……”贝当知道后回答道：“你是根据我的指示工作的，这是一项公务”。火冒三丈的贝当不失大人物风度，他没有直接把气撒到戴高乐身上，而迁怒于奥德上校。奥德上校被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工作，这使戴高乐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贝当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赞同他的，岂不知贝当是另有打算。

1938年，戴高乐出版了《法国和它的军队》。这本书，正是前面提到的关于法国军队历史的研究成果。出书之前，戴高乐还是礼貌地给贝当写信，请求同意出版这些研究成果，并说明他不仅修改了原有的文稿，还增写了两章。贝当只好同意他出版，但有个条件：书中应有给贝当的献词，而且这个献词应当由贝当来起草。书出版后，献词写道：“献给贝当元帅。他希望此书问世，他指导了前五章的写作，并由于他的功绩我们才有了本书后两章所描写的胜利历史。”戴高乐的献词本没什么可挑剔的，全是恭维之词，但是

同上书，第174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1卷，第13页。

《书信、札记和杂感》，第2卷，第330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279页。

贝当大为不满，因为戴高乐没有按他的条件去做。

贝当看到书后，写信给出版商达尼埃尔—罗普斯，说戴高乐未经他许可写下了那样的献词，因为原来说好应由贝当亲自写献词。现在的献词有两处出入：第一，他本来不希望出版这本书，只是戴高乐一再要求的结果，而且是有条件的；第二，他与书中第一章毫无关系。因此，戴高乐上校是“滥用信任”。贝当要求出版商删去现有献词，换上他新写的：“献给贝当元帅。承蒙他在 1925—1927 年间指导我写了本书的第二章至第五章——‘旧制度’、‘革命’、‘拿破仑’、‘从灾难走向灾难’，非常感谢。”尽管戴高乐深表遗憾，认为这是个误会，但是决裂已不可避免。因为造成分歧乃至决裂的根本原因不是关于这本书，更不是这本书的献词。

《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出版已是 1938 年夏天，正如戴高乐所说，那是“暴风雨快要来临的时候”，他对法国提出“最后一次警告”的时候。1938 年，是国际关系史上英法等西方国家最不体面的一年。面对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攻势，绥靖政策却是英法的主导国策。《法国和它的军队》发表不久，慕尼黑协定就正式签字。当戴高乐再一次警告国人，警惕希特勒的野心，做好应付突然侵略的准备，建立一支新型的法国军队的时候，作为担负国家国防重任的贝当元帅，却在走另外一条路。

早在 1935 年，贝当就曾与德国纳粹党魁之一戈林有过接触。这年底，法国政府在后来成为大法奸的赖伐尔主持下，决定疏远英法关系，停止援助东欧，对德表示亲近。这一政策，贝当是支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贝当是战胜者中的英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他却变成了法国失败主义者中的支柱。

1940 年春天，英法联军在挪威战役中失败，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主战派保罗·雷诺组成了法国政府。但是，雷诺只是一个被失败主义包围和左右的主战派总理。戴高乐由于他和雷诺在政策上的接近而密切起来的关系，曾在巴黎呆过几天，他亲眼看到并感受到那种窳败气氛，公开要求结束战争的意见到处可听到。他说：“消息灵通方面的人士认为，这是贝当元帅的意见。他是我国驻马德里的大使，据说他从西班牙方面得知德国人极愿出面调停。到处都有人说：‘如果雷诺倒台，赖伐尔将由贝当抬出来执政。这位元帅实际上可以使最高统帅部接受停战条约。’有一种传单成千上万份地传开了，共有三页，上面完全是描绘贝当。第一页把他描写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的领导者，标题是‘昨天是一位伟大的军人！……’，接着又描写他做大使的情况，标题是‘今天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最后把他描绘成一个伟大而模糊的形象，标题是‘明天呢？……’”似乎让人可信的是，戴高乐以他战斗到底的决心和战争必胜的信心，敏锐地感觉到了贝当可能选择的道路，必定是使法国蒙受耻辱和奴役的道路。

果不其然，雷诺不得不接受贝当入阁的压力。在宣布贝当为政府副总理的广播中，雷诺甚至说：“贝当元帅将同我一起战斗，直到取得胜利。”事后，雷诺曾对戴高乐解释这件事，尽管他们都不怀疑贝当的停战主张，但雷诺希望贝当能成为对付停战派的挡箭牌。他说：“把他放在里面比在外面好。”

同上。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 1 卷（上），第 25 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 1 卷（上），第 28—29 页。

戴高乐却忧心忡忡，他警告雷诺，“我只怕你会被迫改变你自己的意见”，“贝当元帅和他的幕后人将使今后的局势按他们的方式发展”。同样，当贝当知道雷诺要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时，也竭力劝阻。

若干年后，当法国从希特勒的奴役下重新获得自由独立时，历史终于对戴高乐和贝当之间的恩恩怨怨作了结论：戴高乐成了新的民族英雄，而贝当这位昔日的民族英雄却成了民族败类。

仕途艰难

在戴高乐的几十年军事生涯中，翻翻他的任职履历表，是足以令人沮丧的。

1912年	少尉
1913年	中尉
1915年	上尉
1927年	少校
1932年	中校
1937年	上校
1940年	准将

从戴高乐的职务晋升年限中，也许可以看出些原因来。他从少尉升到上尉，仅用了三年；从上校升为准将，也只用了不到三年。而上尉升为少校用了足足12年；从少校升中校，从中校升上校，都用了五年。两头晋升快，中间晋升慢，对于职业军人来说，当然与战争有关。

战争是个大熔炉，是个大舞台。战争为军人施展才华、运筹谋略提供了场所。战争造就天才，战争也葬送将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福煦、霞飞、贝当、小毛奇、鲁登道夫，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代名将”艾森豪威尔、“消防队长”朱可夫、“沙漠之狐”隆美尔，还有蒙哥马利、巴顿、山本五十六，这些载入史册的战将，都因为战争树立他们的威名。当然，战争又是一个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不是由一个导演指挥的舞台，因此，最后的胜者虽然具有天才，最后的败者也未必就是无能。因为，决定他们荣辱的许多客观因素是他们自己无法扭转的。

战争既没有将戴高乐造就为赫赫有名的军事天才，战争也没有将他葬送在法国溃败的硝烟之中。严格他说，戴高乐是一位被战争耽搁了的将军、大元帅。

1916年，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驰骋疆场，为法兰西民族建功立业的时候，因重伤在俘虏营中一直到战争结束；1940年，法国如果不是被失败主义者引向崩溃的话，他本来有可能在战场上获得更大的成功和荣誉——尽管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他已经是个50岁的人了。

戴高乐在战场上未能成名成家，实现自己从小就立志追求的理想，那只能说是机缘不济。但是，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艰苦跋涉在军管仕途上，还是远不尽如人意，其中，人为的因素就大大超过客观因素了。

戴高乐自从1915年提升为上尉后，长期不得提拔晋升。就连高等军事学院毕业这张文凭，也因为得罪了教授们沾上了“污点”，未能给他帮上什么忙。1925年到贝当办公室后，终于有了“背靠大树”的希望。1927年升为少校，被任命为驻特里尔第19轻步兵营营长。这一任命也有点破例，因为按照惯例，轻步兵营应由当过轻步兵的人指挥。然而，贝当这棵“大树”也没

有真正给他带来什么希望。1929年底，戴高乐在轻步兵营任职期满，照理说，只要他愿意，还是应该回巴黎，或是还在贝当办公室，或是在总部其他部门，均可安插一个职位。但是，戴高乐被派往了贝鲁特。有人说，是戴高乐自己主动申请去的，因为他这时意志消沉，一心想远走高飞，离开使他心烦而又没有希望的陆军总部。又有人说，戴高乐是被挤走的。因为高等军事学院的教授们对他的那次“回马枪”耿耿于怀，他们扬言，如果戴高乐被任命到高等军事学院，他们就集体辞职。

从贝鲁特回国后，在贝当的关照下，戴高乐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任职。1932年晋升中校。也就是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任职期间，由于关于《建立职业军》的争论，戴高乐得罪了一大批握有实权的军政人员。陆军部长莫兰将军曾严厉地对戴高乐说：“再见吧，戴高乐！有我在的地方，就没有你的地位！”还是这位将军亲自下令，把戴高乐的名字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直到1937年底，尽管遭到总司令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戴高乐被列入晋升名单，随后被任命为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陆军部那些讨厌戴高乐的人，对戴高乐的晋升反应是令人奇怪的“幸灾乐祸”，原来他们早就盼着把戴高乐赶出陆军部了。1940年3月，雷诺组阁，原想任命戴高乐为战争委员会秘书，但遭到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的达拉第的坚决反对，他径直回答道：“如果戴高乐到这里来，那么我就离开这个办公室，跑下楼去告诉雷诺先生，请他让戴高乐来代替我。”

在这种不理解，怀有敌意和抵触情绪的气氛中，戴高乐当然无法获得与他的思想和才华相称的合适地位，也就无法使他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在更大范围内起更大的影响和作用。戴高乐曾经失望过，也曾经动过离开他从小就寄托幻想和希望的军队。他在少年时代就充满激情地为自己策划了指挥百万大军的作战方案，坚信自己肩负了领导他人为法兰西民族效力的历史重任。可是日月如梭，年复一年，他不仅离理想甚远，而且处处受人误解，在压抑中默默无闻。照这样下去，虽不至于碌碌无为，但也是平平平凡。这对于一个素有大志和过人抱负的人来说，竟比碌碌无为还要难受得多。

看起来，戴高乐将业绩看得比功名更重要。1927年9月，当他在当了12年上尉之后晋升少校时，他的好友吕西安·纳香向他表示祝贺，戴高乐给纳香写信说：“升迁固然是好事，但还有更重要的，关键在于有所成就。”虽然如此说，但是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军队里，谁不想着升迁呢？即使为的不是名和禄，就是为了事业，为了得到一个更有利于施展才华的地位，升迁对戴高乐这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如果说在法国溃败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戴高乐没有晋升为将军（尽管是最低衔的将军），如果说戴高乐在那最后的几天里没有进入政府（尽管是个国防部次长），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起码，他就不能在巴黎及时捕捉住政府即将签订停战协定这个时机；起码，他就不可能利用那短暂的日子同丘吉尔接触，同斯皮尔斯结下友谊，为出走伦敦打下基础；起码，他在树起抵抗大旗之后，不可能那么快地就以政府的名义去号召法国人民。也许，那一段法国史就要另

《我的将军》，第36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18页。

同上书，第30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149页。

与。

第三章

法兰西在召唤

法国灾难性的日子终于来临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在“荷兰和比利时完全没有遵守中立原则”的借口下，于拂晓越过荷、比、卢边界，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德国对承诺过的中立国家不受侵犯的保证视如废纸一张。

希特勒利用精心策划、精心准备的闪电战、突袭和狂轰滥炸，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仅仅五天，荷兰停止了抵抗，不到20天，比利时也放下了武器。

在希特勒发动攻击的前一天，法国政府正面临危机。保罗·雷诺不顾众多的人反对，坚持要求撤换对挪威战役负有责任的法军总司令甘默林。他表示，如果内阁反对，他就辞职。结果，内阁中没有人支持雷诺，于是，雷诺在午后结束的内阁会议宣布：“我将不得不认为政府已经辞职”。下午，甘默林知道了内阁会议的结果，为避免危机，他表示将再次递交辞职书。这就是5月9日，离希特勒行动时间只不过还有十几个小时。难怪后来有人说，当希特勒集中了136个师，包括10个装甲师，在令人生畏的空军机群支援下，准备通过比利时、荷兰立即向法国进攻时，法兰西共和国既没有政府，也没有军队总司令。

尽管从多种渠道获得警报——德国人将在第二天进攻，但由于失败主义情绪和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前线部队竟有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官兵回家度假了，他们在5月9日晚被急匆匆地召回。有的离开防线拉出去进行“常规训练”和打靶了。驻守色当要塞的第二军参谋部，那天晚上全体人员出外看戏，凌晨归队，在睡梦中被警报惊醒。

法国从上到下一开始就陷入混乱。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曾详细叙述了德国人怎样利用他曾多次警告过的机械化军队，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决定了法国的命运。

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关键时刻。

两种命运 两条道路

1940年6月5日夜里，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负责国防事务的副国务秘书）。就在这一天，德国军队从色当到阿布维尔一线向法国军队发动进攻；就在这前一天，英法联军30万人溃败在敦刻尔克，在遗弃了所有装备物资和3万俘虏之后渡海脱险。

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在6日早晨听到电台广播后，他叫醒了戴高乐：“电台刚广播，你被政府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他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戴高乐要去政府任职的消息已流传很久，如果不是达拉第·贝当这些人从中作梗，恐怕雷诺早就让戴高乐在政府内工作多时了。在此之前，6月1日戴高乐应总司令魏刚将军之召曾到巴黎，他当然拜会过雷诺。6月3日，他还给雷诺写过信。可能他事先就知道有这个结果。因为他知道，雷诺自从关于建立职业军的辩论以来，同他已经建立了一种信赖关系，而这种关系由于对战争的共同看法更加紧密。现在，雷诺在政府中处于失败主义者包

围之中，他太孤立了，需要戴高乐来帮他一把。

过了半个小时，戴高乐就收到了从巴黎发来的正式电报，立即动身赶赴巴黎报到。雷诺于上午 11 点钟在圣多明尼克路的战时内阁总部等着戴高乐，并在他的旁边给戴高乐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戴高乐新的生活开始了。

戴高乐一见到雷诺，就阐述了自己对战争结局和法国前途的看法。他认为，雷诺看起来虽然仍然是“信心十足、生气勃勃、眼光犀利、虚怀若谷、敏于决断”，但是他也很难挽回目前的局势。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兵力相差太悬殊”，更危险的是“失败主义很容易淹没一切”，最高统帅部已经被吓倒。因此，结论是：“如果 1940 年的战争失败了，我们还可以赢得另外一仗。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不放弃欧洲大陆上的战斗，同时还必须下定决心，作好准备，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继续战斗”。戴高乐的意思是，看来在法国进行的这场战争已经不可能获胜了，甚至法国本土也可能守不住。但这并不等于同德国的这场战争的最后结束，战争还必须进行下去，那怕是离开法国本土，换一个战场，也要战斗到底。

因此，戴高乐建议雷诺要作好换一个战场坚持战斗的准备。戴高乐选中了法属北非为坚持战斗的阵地。他认为应该赶紧往北非调运军需物资，并选派得力人员负责这项行动，与此同时，要努力协调与英国的关系，不要纠缠在这段失利之后的相互指责和宿怨中。戴高乐向雷诺请战，他要求去负责这项工作。

至少在这个时候，雷诺对将战争进行到底还是有信心的。他同意了戴高乐的建议，并当场决定戴高乐立即去伦敦，设法表明法国政府的立场。雷诺后来写道：“我很高兴向英国人派去一位主战的将军”。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戴高乐与雷诺之间细微的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两个人谁能坚持到最后，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

戴高乐将战斗进行到底，去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是建立在整个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力量这个基础上的。法兰西民族千百年来繁衍不息、顽强奋斗的历史始终激励着他，他相信屡遭磨难的法国仍然有光明的前程。它不仅有几千万热爱祖国的儿女，还有广袤千里的海外领地，几十万武装军队。在这个基础上，法国取得盟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最后的战争是可胜的。因此，他的决心不会因为其他干扰而动摇，也不会因为英国在某些政策上的态度变化而丧失信心。这一点，决定了戴高乐后来在“自由法国”时期，处理同英美盟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那种镇定自若、毫不退让的态度。

但是雷诺则不然。他虽然希望战斗到底，也希望法国最后胜利，但是他被法国的溃败和混乱动摇了信心，更被包围着他的坚持失败主义的权贵们（这不仅包括那些掌握军政大权的高官，甚至还包括极受他宠信的情妇德波尔泰夫人）所左右。他把自己的希望最终寄托在英国到底能给法国多大程度的实际援助的保证上。他对戴高乐说：“我想请你尽快到伦敦去一趟。我在 5 月 26 日和 31 日跟英国政府会谈时，可能使他们感到我们并不排除停战的可能性。但现在所需要的正好相反，我们要使英国人相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坚持下去，必要时甚至会到海外去坚持战斗。请你告诉他我已改组内阁，并把你安排在身边，这就表明了我们的决心”。雷诺还指示戴高乐，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 1 卷（上），第 51 页。

保罗·雷诺：《回忆录》，第 2 卷，巴黎弗拉玛里翁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89 页。

要从丘吉尔那儿得到保证，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要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且要了解清楚，从敦刻尔克撤回去的英国军队，何时可以返回欧洲大陆参加战斗。

连日来，随着德国人的步步紧逼，法国人的步步败退，法国同英国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法国战时内阁中以贝当和魏刚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者，不断地谴责英国见死不救，不肯以实力援助法国，向英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他们要求英国立即派 10 个战斗机中队到法国作战，而且要“尽快”再派 10 个。法国自己的飞机还没有全部充分地投入战斗，却去要丘吉尔手中保存的飞机的一半，难怪丘吉尔称之为“完全不近情理的”。当然，英国人的战略考虑是否尽善尽美是一回事，但是法国失败主义者一味强调英国的“责任和错误”，则是另一回事。他们是在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是在为下一步的停战求和找借口——既然英国人无法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和牺牲，法国只有停战求和。

雷诺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这种影响，最终导致他在最后关头退下阵来，让贝当一伙窃取政权，将法国引入了彻底崩溃和被奴役的道路。

戴高乐参加政府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前后同丘吉尔会过四次面，两次在伦敦，两次在法国。

丘吉尔第一次知道戴高乐，是在 1938 年 3 月访问巴黎时，雷诺同丘吉尔谈到机械化军队，好像谈到过戴高乐。丘吉尔回忆说：“当时好像有一位名叫戴高乐的上校曾写过一本受到许多批评的书，书中说明现代装甲车辆的攻击力”。这时候的戴高乐，丘吉尔应该是早有所闻了。因为雷诺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不仅引起了法国舆论界的注意，英国舆论界也非常重视。1940 年 6 月 7 日，伦敦《泰晤士报》写道：“……从军事角度来看，保罗·雷诺先生最令人感兴趣的改组，是任命了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用他自己的著作吸引了军界的注意……他是右翼党人，强有力的理论家，大规模使用坦克的鼓吹者。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目光敏锐，既充满幻想又注重实际行动的人”。

即使丘吉尔没有注意到报界的这些评论，他的案头肯定也会有雷诺改组后的法国内阁的详细名单，不过，这时候的戴高乐可能还未引起丘吉尔过多的注意。

6 月 9 日晨，戴高乐在他的副官热奥弗瓦·德库尔塞尔和总理外事办公室主任罗兰·德马尔热里陪同下飞往伦敦。在伦敦唐宁街十号，丘吉尔会见了戴高乐。在丘吉尔眼里，戴高乐与他以往认识，特别是近几个月来接触过的法国军官毫无共同之处。戴高乐表现出惊人的沉着冷静、镇定自若。他在同丘吉尔的会谈中，根本未提到失败或停战的可能性。他所谈的只是如何尽一切可能在布列塔尼、在中央高原、在马其诺防线，甚至必要时在法国本土之外的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继续战斗。丘吉尔虽然对戴高乐有良好印象，但是他无法完全满足法国关于增援的要求，因为他对法国能否坚持到胜利已失去信心。

戴高乐虽然对会谈结果大失所望，但他对初次见面的丘吉尔却是评价甚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 1 卷，第 58 页。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1 卷第 2 分册，商务印书馆 1974 年中文版，第 418—419 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 1 卷，第 326 页。

高。他的第一印象是：“大不列颠在这样一位斗士的领导之下决不会畏缩”，“我认为作为一个指路人和领袖，他是最理想的”。他的结论是：“总的说，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伟大事业的伟大斗士，也是一个伟大历史中的伟大艺术家”。

6月10日，墨索里尼向英法正式宣战了。意大利军队从法国南部入侵，德国军队已渡过塞纳河，涌向巴黎城下。尽管戴高乐竭力劝阻，但雷诺已控制不住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在总司令魏刚和副总理贝当的一手操纵下，巴黎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政府放弃巴黎，迁往波尔多。戴高乐在回忆录里，曾生动地描述了他与总司令魏刚的唇枪舌战。10日那天，魏刚未经允许“闯”进了总理办公室，他说是被请来的，雷诺和戴高乐部先后表示没有请，并说这是个误会。但是魏刚是有备而来，他说：“但这个误会倒很有用处，因为我很重要的事情要说。”魏刚的结论是：毫不迟延地要求停战。他认为法国本土的战争已经失败了，必须投降。

戴高乐插嘴说：“但是还有其他的出路。”

魏刚用讽刺的口吻说：“你也有意见要提吗？”

戴高乐回答：“政府没有意见可提，它只会下命令。我相信命令是会下来的。”

戴高乐已是政府的一员，他很自豪而又很巧妙地反击了魏刚，可是既无能力又无权力去让政府下这个命令。他曾寄希望于雷诺，但现在正按雷诺的吩咐作撤退的准备。戴高乐失望极了。

6月11日，法国政府在奥尔良附近的布里阿尔与丘吉尔一行会晤，这是戴高乐与丘吉尔的第二次交往。

戴高乐声称，丘吉尔这次飞来法国使他和雷诺都感到意外。吃惊之余断定是魏刚背着政府擅自作的主张，决定要撤换魏刚的总司令职务。但是，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却说是雷诺邀请了他，并告诉他可以在布里阿尔接待他们，还指定了应当降落的飞机场。除非丘吉尔受了魏刚的骗——魏刚假传圣旨，不然这就是个说不清的公案。

丘吉尔一行在午后到达时，是这样说到戴高乐的：“我们在那里见到了雷诺先生、贝当元帅、魏刚将军、空军上将维耶曼，还有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级别较低的戴高乐将军，他刚被任命为国防部

次长”。会谈结束，丘吉尔大感不快，因为他未能消除笼罩法国政府的失败主义情绪；戴高乐也大感失望，因为他没有听到一句在什

么地方（他提议的北非）继续战斗的可能性。在整个会误中，戴高乐没有机会（也许是没有地位）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让他作了一个关

于使用轻装甲武器问题的简短说明。但是，在晚宴时，戴高乐却有

了机会，他被安排在丘吉尔的身边。据当时的英国陆军大臣艾登回

忆：“就座时，一位身材高大稍形瘦削的军人从我这边桌旁走过。这就是国防部次长夏尔·戴高乐将军，我以前只见过一次。魏刚和颜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55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59页。

同上书，第60页。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上）第1分册，第221页。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上）第1分册，第222页。

悦色地请戴高乐坐在他的左边。戴高乐回答说（我觉得他态度唐突），他奉命坐在英国首相邻座。魏刚听了脸泛绯红，但没有说什么……”

对于这个使魏刚难堪的事情，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只字未提。但是他绝对地可以做出来，因为他的个性就是一个孤傲的人，

何况魏刚在他眼中，早已不配当总司令。他已经奉命在先了，无须再听魏刚的，和颜悦色的邀请已是如此，以后的军事命令该当如何？

戴高乐与丘吉尔在晚宴时的谈话，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没有涉及具体内容。但戴高乐相信，自己给丘吉尔留下了极佳印象，他说：“我们的交谈加强了我对他的意志的信心。他本人走的时候无疑也带着这种印象：认为戴高乐条件不足，但仍然非常坚决。”的确，丘吉尔对戴高乐的印象已比第一次在伦敦见面时深刻多了。丘吉尔说：“戴高乐将军……年轻有为、精力充沛，他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第二天回到伦敦后，他曾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谈及会谈内容，电文竟然涉及戴高乐，很可能，这是丘吉尔同罗斯福的交往中第一次提到戴高乐。丘吉尔说：“我在法国最高统帅部度过了昨夜和今天早晨，魏刚将军和乔治将军向我说明了此处形势的严重性。……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法国的防线一旦崩溃，假如巴黎沦陷，假如魏刚将军正式向他的政府提出法国已不能再继续有组织地抵抗了，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年老的贝当元帅……我很担心，他会以他的名义和威望替法国缔结一项和约。另一方面，雷诺是主张继续战斗的，有一位叫戴高乐的年轻将军支持他，这位将军认为还有许多事可做……”丘吉尔的联络官、他派往法国最高统帅部的私人代表斯皮尔斯将军，后来回忆那天的情况时说：“首相好像在寻找在其他法国人脸上找不到的东西。他几次三番研究戴高乐将军的表情使我感到他找到了他正寻找的东西。”

显然，这时候的戴高乐已引起了丘吉尔的注意。丘吉尔的法国之行，目的就是尽可能他说服法国政府继续战斗下去，即使不能战斗到最后胜利，也要尽可能地延长抵抗时间，因为英国同希特勒直接面对面的对抗已不可避免，但英国需要时间缓解敦刻尔克败退引起的混乱。在被失败主义笼罩的法国政府里，丘吉尔看到势单力孤的雷诺身旁有了一位甚至比雷诺还坚定的戴高乐，心里当然感到一丝宽慰。不然，他就不会在致罗斯福的电文中特意提到戴高乐，而且由此得出结论是：“据我看，在法国一定有许多人愿意继续战斗，或者是在法国，或者是在法属殖民地，或者是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

《艾登回忆录·清算》（上），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206 页。

丘吉尔在回忆录的最初版本中，曾说到他们的交谈没有失败主义的痕迹，并说戴高乐个人还主张游击战，但后来经过修订出版的回忆录就删去了交谈的内容，只提到戴高乐坐在他右边。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 1 卷（上），第 63 页。

弗朗索瓦·凯尔索迪：《戴高乐与丘吉尔》，法国普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9 页。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2 卷（上）第 2 分册，第 258 页。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 48 页。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2 卷（上）第 2 分册，第 259 页。

丘吉尔这个结论，如果从广义上来讲是符合实际的，几千万法兰西人当然是“许多人愿意继续战斗”，但如果从法国政府，或是法国执掌军政大权的人这个狭义范围讲，就不符合实际了（也许丘吉尔也知道这一点，这么说给罗斯福听，是为了争取罗斯福对法国的援助）。

在丘吉尔一行返回伦敦的12日那天，法国内阁是边走边吵。魏刚在贝当支持下要求立刻停战，雷诺在戴高乐不断鼓励下则主张到北非继续战斗。看到许多部长们脸上迟疑的表情，雷诺又一次觉得心有余力不足，他再次邀请丘吉尔重返法国，想借助丘吉尔和英国的力量来扭转政府内的停战求和情绪。

6月13日上午11时，丘吉尔一行到达法国政府所在地图尔。这一次是戴高乐与丘吉尔第三次见面。

戴高乐这时对局势已感到“害怕和绝望”了，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但还是要努力按计划实施“北非方案”。他认为只要雷诺不让步，就能操纵全局。

但是，在同丘吉尔的会谈中，雷诺竟然要求英国同意解除法国曾许下的不单方面签订和约的诺言。这个问题，不仅使丘吉尔一行大吃一惊，连戴高乐也大出意外。戴高乐这次参加会谈与上次也不同。这次会谈雷诺没有通知他，而是雷诺的外事办公室主任德马尔热里建议他参加的。会议结束时，他质问雷诺（语气相当强硬）：“你难道能考虑法国求和吗？”尽管雷诺否认，说是为了给英国施加压力争取援助，但是戴高乐已不相信了，他感到“法国正在酝酿停战谈判，因为政府的首脑已在正式考虑这个问题。

戴高乐动了辞去政府职务的念头。这个消息被坚持抗战的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知道了，他严肃地劝阻道：“无论如何，我们只是处在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将军！你还有重大的任务要完成。但你要在我们之中保持没有污点的身份。你不妨想想，我们要为法国做些什么事？请你想想，在某种情况下，你现有的职位将使你得到多大的便利。”

这番话说得多么中肯，多么精彩。特别是最后一句，简直是一语中的。人们可以设想，如果这时候戴高乐辞职，会有再过几天的“六·一八”吗？会有1944年8月的凯旋门盛典吗？会有1958年的东山再起吗？可能还会有，但不过是另一个主角。难怪戴高乐对此感恩不忘，十多年后他感叹道：“我必须承认，这一席话让我延缓了辞职问题。老实说，往后我所做的一切都有赖于这一点”。这的确是大实话。

丘吉尔也对雷诺的动摇感到担心，认为他已向投降求和的主张屈服了。丘吉尔盼望着有一个强有力的对话人物，可是，戴高乐虽然坚持抗战的态度是强有力的，但他在政府中的能力是有限的，照他自己说“出席内阁会议已经渐渐不可能了”。在休会期间，丘吉尔曾询问斯皮尔斯对戴高乐的看法，斯皮尔斯回答这是一个“绝对充满信心”的人。丘吉尔自认为在那时他已经认准了戴高乐，他回忆说：“当我们顺着挤满人群的过道走进庭院的时候，我看见戴高乐将军毫无表情地呆立在门口。我低声向他用法语致意，叫他‘应运而生的’人”，他依然是毫无感觉的样子。”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68页。

同上。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上）第2分册，第265—266页。

可惜，这句话除了丘吉尔说他说过外，没有一个人说听到过。戴高乐后来也断然否认，“不，我没有听到，您知道，丘吉尔是个浪漫主义者”。

6月14日，巴黎沦陷，法国政府迁到了波尔多。

在波尔多，忧心如焚的戴高乐将了雷诺最后一军，警告他如果还是呆在波尔多，势必被失败主义者控制走上停战求和的投降道

路，“你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你到底决定这样做了没有？”雷诺回答的也挺干脆：“决定了。”并同意戴高乐立即去伦敦，找英国人帮助解决运输方面的问题。

6月16日，戴高乐抵达伦敦。一早他就听到了法国政府已正式向英国政府提出，不再对不单独签订和约的协议承担义务的消息。法国政府这种加快速度为投降扫清障碍的做法，使戴高乐不得不违心地接受了让·莫内和科尔班同几个英国官员一起起草的

“英法联盟方案”。方案建议英法联合，将不再是两个国家，法国公民享有大不列颠公民身份，反之亦然；只成立一个战时内阁，行政权合二而一，共同利用资源和承担损失，把两国命运完全连结在一起。其目的，是要迫使雷诺政府只有走坚持战斗这条路，即使不成，也要让法国内阁好好考虑一下，以推迟投降时间。莫内等人认为，最好这个方案由英国政府向法国主动提出，而可能让英国采纳这个方案的最佳人选，就是戴高乐。

就戴高乐本意来说，如果在平时，他决不会考虑这个方案。他心目中光荣伟大的法兰西怎么可能和大不列颠连结为一体呢？但

此时，尽管他觉得这个方案规模太大，不可能马上实现，可法兰西已到了关键时刻，或许这个方案可以给雷诺提供坚持战斗的理由

和信心。他同意尽力劝丘吉尔接受这个计划。这是戴高乐与丘吉尔第四次见面。

丘吉尔果然被说动了，英国政府同意了这个方案。但是法国政府的态度不仅使戴高乐和英国人大吃一惊，而且令主持内阁会议的雷诺也吃惊不已。当他将这个建议在会议上宣读后，竟是一阵冷冰冰的带有敌意的沉默：“没有反应。……没有人站起来支持我……我陷入了完全的孤立”。雷诺那仅剩的一点勇气和信心彻底丧失了，“我的立场削弱了……我让话题又转到停战问题上来。”法国的停战投降已不可避免了，从失败主义到投降主义，最终使法国走上了被奴役的道路。

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戴高乐为了挽救法国，是尽了全力的。他同失败主义者正面对抗，据理力争；他尽一切可能给雷诺鼓励打气，不使他屈服于投降派；他利用一切手段实施北非抵抗计划；他竭力与丘吉尔沟通关系，以取得最大的物质支持和道义保证。他希望将法国引向坚持战斗直到胜利的道路，可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扭转大局势。他面对这一切看起来很镇静，但内心极其痛苦。他对这个第三共和国的最后阶段的政府痛恨之极——这种痛恨从此永不終了，并殃及到后来与它有关的第四共和国政府。戴高乐说：“我国这次毁灭根本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在闪电的光芒下，我国政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56页。

让·莫内，时任英法采购战争物资委员会主席；科尔班，时任法国驻英大使。

方案全文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上）第2分册，第302—303页。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下），第1074、1076页。

府暴露出它可怕的虚弱状态，显示出它跟法国的国防、荣誉与独立根本不相称，而且也风马牛不相及”。

就在离开伦敦之前，戴高乐和莫内就作好了法国投降的最坏准备。戴高乐以国防部次长的身份，命令满载武器从美国驶往波尔多的“巴士德”号轮船直接驶往英国港口；负责采购战争物资的莫内，也在拟定计划，一旦法国单方停战投降，立即将从美国订购的军火合同转给英国。丘吉尔显然对此大加赞赏，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从戴高乐“冷静沉着的举止中，我感觉到，他具有一种惊人的忍

受痛苦的力量。在同这位身材高大、性情冷漠的人的接触中，我始终保持着这个印象：‘这才是法国的元帅’。他当天下午乘我派给他使用的英国飞机回波尔多去了。但是他在那里不会太久。”

丘吉尔最后一句话，是他当时就感觉到的必然结果，还是事后的补充呢？按戴高乐的说法，“我们说好，如果情况需要我回来，这架飞机仍然应由我掌握”。看来戴高乐已经考虑到了即将来临的选择，这一选择将决定他后半生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将决定法国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就这条道路，在6月16日这一天，他同丘吉尔达成了某种默契。

戴高乐当晚回到波尔多时，雷诺已经辞职，并建议由贝当接管政府。这个消息对戴高乐来说，无疑是正式宣布法国将立即停战投降，他当即决定“一到天明马上离开”。6月17日晨，戴高乐在斯皮尔斯陪同下飞往伦敦。

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详细追述他当时的心情，只是几笔带过他到达伦敦时的感觉，他说：“我感到自己是单独一个人，一切都被剥夺了，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片茫茫的大海，准备跳到水里游过去。”

这就像一个被迫离家出走，又身无分文无亲可投的人。他想“游过去”，对岸是什么？他能游得过去吗？

戴高乐虽然早就抱定了打到底的决心，但直到这以前他还一直对雷诺政府抱有希望。他对漂洋过海继续战斗早有准备，但对单枪匹马去闯荡没有准备。因此，当雷诺辞职，贝当上台后，一线希望也荡然无存。此时戴高乐的心情他虽然没说，也是可想而知。因为尽管戴高乐具有过人的毅力和坚强的个性，但他毕竟也是凡人。他在决定飞往伦敦的前夕，心神不定地在波尔多东奔西走。有时沉默不语地在某个办公室，有时又让人惊恐地高喊着奔出去，一会儿在英国大使跟前，一会儿又让人不解地对人说：“德国人打败了这场战争……他们败了，法国必须继续战斗……”，他还向一位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76页。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上）第2分册，第313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74页。

据丘吉尔和斯皮尔斯回忆，戴高乐的出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由于害怕遭到阻拦或扣押，戴高乐装成为斯皮尔斯送行，在飞机开始滑行的时候，戴高乐拉着斯皮尔斯的双手跨进了舱门，附近的法国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飞机腾空而去。可是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及这段过程。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77页。

朋友发无名之火，可见，戴高乐的心情是复杂的。十年以后，当戴高乐向安德列·马尔罗读他的《回忆录》的前几章时，马尔罗对戴高乐说，大家都想知道6月17日那时候他的心情和想法，然而，戴高乐抓住马尔罗的手用他深沉的声音说：“不过，马尔罗，这非常可怕……”。

戴高乐感到可怕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戴高乐并没有被吓倒，他不承认最后失败，他相信最后胜利。虽然这时候他对究竟怎样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面前到底有多少峻岭险滩，还不甚了了。可是他毕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作出了有决定意义的选择。

“六·一八”号召

今天来看，1940年6月18日，在法国现代史上是个多么重要而又值得纪念的日子。它不仅对戴高乐的人生道路，而且对整个法国的前途，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6月17日午后，抵达伦敦的戴高乐在斯皮尔斯陪同下去见丘吉尔，丘吉尔以“热情和友谊”的微笑迎接了戴高乐。戴高乐当即向丘吉尔表示，请求允许他利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向法国发出一份号召书，用以“召唤”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法国人同他并肩战斗。丘吉尔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商定在波尔多政府要求停战以后发出号召书。这天夜里，贝当主持下的波尔多政府举行了第一次内阁会议，没有辩论，甚至没有讨论，内阁一致同意了贝当的提议：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毫不延迟地请求德国政府提出停止敌对行动的条件”。

英国战时内阁的成员还不理解丘吉尔对戴高乐那样“偏爱”的意义。18日早晨，丘吉尔不在场的情况下，英国内阁一致认为：“戴高乐将军是法国现政府不受欢迎的人，只要还存在法国政府采取符合盟国利益举动的可能性，他发表号召书是不适宜的”。但经过斯皮尔斯具有说服力的发言和丘吉尔的支持下，当天下午重新召开的会议改变了决定，同意戴高乐在BBC广播号召书。

6月18日晚18时，戴高乐坐在BBC播音室的话筒前，陪在他身边的有两位播音员。戴高乐用他低沉的音调，坚定而有力地播发了当时谁也没有足够估价的文告：

告法国人民书

1940年6月18日

许多年来担任法国军队领导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断定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同敌人交涉，以便停止战斗。

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空中，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352—353页。

同上书，第354—355页。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第1102页。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67页。

下午6时是戴高乐的说法，但BBC的记录是22时。

迫使我们后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上的突然袭击，使我们的领袖们落入目前这种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应当抛弃希望吗？我们的失败已是最终定局了吗？不！

请相信我，我是根据充分了解的事实在说话，我告诉你们，法国并没有完。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不是孤立的！它不是四处无援！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还可以与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战斗的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它还可以像英国那样，充分地利用美国取之不尽的工业资源。

这场战争不仅限于我们国家遭难的国土上。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战争的结局。这场战争是场世界大战。所有的过错，所有的延误，所有的苦难，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应有的条件依然客观存在。今天我们败于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但是未来，我们可以运用更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夺得胜利。世界的命运正决定于此。

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所有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明天我将再次从伦敦广播。

“六·一八”号召书的广播是无与伦比的行动。它是一个标志，标志法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自由法国”的战斗开始了；它又是一篇檄文，它不仅表明了要与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也显示了对卖国求荣者的鄙视。它贵在于整个法国陷在泥坑里挣扎时，让全世界看到法国还是存在希望，因为导致战争最后胜利的客观条件仍然存在。继续战斗的火焰已被戴高乐点燃，他将用这抵抗之火燃遍法国，照亮法国。

当然，“六·一八”号召书只是一篇两页纸的短短文告，它不可能将所有问题阐述透晰。但是，回过头来看，戴高乐在这篇功不可没，已载入法国史册和世界史册的文告中，仍存有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

在文告中，戴高乐将法国的失败简单地归咎于机械化程度的强弱，而忽视了揭露失败主义者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下滑向投降主义的实质。法国的失败，固然是法国领导人多年固守成规，轻敌，演成敌强我弱的劣势造成的，但这并不等于法国只有束手待毙。如果法国有一个坚强的最高统帅部，如果法国有一个团结一致坚持继续战斗的政府，法国也决不会走到这一步。魏刚、贝当这些人，正是强调了敌强我弱这种态势，以此为借口，认为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不能再打下去了，决定了法国停战投降的命运。戴高乐曾为建立职业军奋斗六七年，结果进展不大，但他并没有陷入失败主义，到最后关头仍然坚持抗战；在此之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那种武器装备的悬殊，又岂是法德战场可比的；尔后，还可从苏德战场看到同样的事实。战争中武器装备是重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法国的领袖们落入停战求和的可悲境地，不应该看成是德国坦克、飞机和闪电战的必然结果。

戴高乐描述自己在宣读了号召书之后的心情，他说：“当不可改变的字句广播出去以后，我内心里感到，我在坚强的法国和统一的军队组织中渡过的生活行将结束了。我已经年近半百，又开始了冒险生涯，就像一个人被命运抛出来，失掉了一切依靠一样。”

在中国，50岁是“知天命”之年。再过几个月，戴高乐就足足50岁了。戴高乐正是在这个知天命之年，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也决定了法兰西的命运。“天命”，是中国古代帝王将相世代相传的唯心的统治论观点，认为“天”决定人类命运，而自己就是“知天命”之人。儒家先哲们又将其演化进人生发展阶段的思维表现中，用以劝人省身，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等等。戴高乐当然是受命于时，而不是受命于天。是客观时势造就了戴高乐采取了“六·一八”这个无与伦比的行动。但是，不管怎样解释，总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法兰西有几千万人口，党政军要员比比皆是，其中也有主张抗战的社会各界名流，为什么向国人发出“召唤”拯救法兰西的责任，却落在了戴高乐这个相貌吸引人，声威却不惊人，个子高大，地位却低微的将军肩上呢？

首先，戴高乐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为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利益毫不犹豫的精神，为法国人树立了一个值得敬仰的爱国典范。戴高乐的爱国主义，从小就孕育在他对法兰西民族的看法上。在他的《战争回忆录》里，开头一句就是“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在他看来，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法兰西民族经历了无数的世代，饱受坎坷和磨难，但它仍然保持了自己的风貌和精神。因此，法兰西民族具有一种不朽的特性。为了保持这种特性，每一代的法国人都负有承上启下的任务。从感情上，就促使他将献身法兰西作为自己崇高的使命。戴高乐认为，如果法国人不具备这个高尚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法兰西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造成这种危险的过失，在于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因为法兰西的风貌和精神是永恒的。永恒的法兰西超脱于法国人之上，是法兰西孕育了法国人，而不是法兰西人孕育了法兰西。

正是这种对于法兰西精神的无限崇敬的感情，使戴高乐相信，目前法国所受的危险只是由于某些法国人的过失造成的，它并不代表法兰西的未来，法国军队的溃败并不代表法兰西的溃败。既然某些法国人的过失给法兰西招致了危险，那末同样，另一些法国人的奋斗就会使法兰西重现光彩，因为法兰西精神是永恒的。法兰西精神是希望的源泉，一种精神怎么能最终被战败或者被俘虏呢？“自由法国”的意义在于法国是自由的，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即使它现在的领袖和人民失去了自由，但法兰西永远是自由的。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基础，戴高乐才能无情地抵制不断滋长的失败主义情绪，不知疲倦地为坚持抗战东奔西走，毫不自卑地挺身而出执掌抗战大旗。

除去戴高乐坚定不移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感情这个最根本的因素之外，戴高乐身上还相对集中了在旁人身上难以兼备的条件。

戴高乐“无债”一身清。法国的许多显赫人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被他们自己身上各式各样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有的人始终陶醉在“荣誉”和“功勋”上，深怕葬送一世英名于旦夕之间；有的人心有愧意，20年里身居高位白吃俸禄，使法兰西落到这种境地；有的人迷恋法统，置民

族利益于不顾，却去盲目信从依据宪法选出来的议会和政府。戴高乐却不然，他没有这些顾虑。他既没有个人“荣誉”也没有值得夸耀的“功勋”，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关键时刻，他用不着瞻前顾后考虑个人得失。他用不着对法国目前的困境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在十多年里曾多次警告政府和国人，提醒应当怎样防范德国的入侵。他在坚持继续战斗的那些人之中，是唯一敢于与魏刚和贝当及其政府相对抗的人，针锋相对斗争 12 天，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贝当政府的投降实质。

戴高乐还具有一个独特的条件，他在短短的 12 天里，与英国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使丘吉尔从他身上看到了法兰西的希望，他也从丘吉尔身上看到了坚持到底的胜利曙光。从此，两个人的友谊和合作，成为法国坚持战斗不可或缺的因素。

当各色各样的人物被各式各样的“包袱”压得无声无息的时候，戴高乐首先发出的呼声也就是最纯洁、最正确、最无私的呼声。1940 年 6 月的法国，只有戴高乐才有资格并敢于不怕讥讽地号召法国人坚持战斗。“六·一八”行动决不是偶然的。

艰难岁月

30 年后，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里，曾对四年的“自由法国”运动作过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他说道：“在法国史上，我是在国家灾难深重的时刻被赋予最高权力的。我的权力首先为不愿放弃战斗的法国人所承认，接着随形势的发展为全体人员所承认，最后冲破了许多艰难险阻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承认。”这短短的几句话里，简明扼要地说出了戴高乐坚持四年抗战的酸甜苦辣。从中既可体会到戴高乐孤军奋战，不被理解，备受歧视的伤感，又可体会到戴高乐百折不挠，从无到有，直至成功的自豪感。

当运载着“六·一八”号召书的无线电波发射之后，戴高乐等待到的反响却是那样令他失望，他真正地感受到了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孤独。“我开始时却两手空空。我的身旁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都没有。在法国我没有人拥护，也没有声誉；在国外我也没有名望和地位。”

亲耳听到“六·一八”号召书广播的法国人似乎寥寥无几。希特勒的军队正在法国的土地上肆意践踏，法国从上到下由于军队的溃败和政府准备投降，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法国人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到处逃难；许多城市停电，在那个电子管时代许多收音机无法启用，能够收听的也都在收听来自波尔多政府关于和平还是战斗的广播；即使有人听到，他们大多数人也搞不清这个戴高乐将军是何许人；在马赛和里昂这两个还未被占领的城市，有几家报纸第二天摘登了号召书，但好像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丘吉尔虽然给予戴高乐极大的支持，但在大多数英国官员听来，“六·一八”号召书只不过是 BBC 成天价不停顿的节目中的一段插曲。结果，由于不受重视，这份今天看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竟然没有被录音——此后谁也没有听到过。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份修改过的手稿和一张英国广播公司的记录：“时间：四分钟。无酬金。播送时间：22 时”。

但是，时刻注意英国对法国停战求和有何反应的波尔多政府却监听到了这份广播。为了避免它可能引起的反响，并压服戴高乐这位胆敢抗拒的将军，

戴高尔：《希望回忆录》，法国普隆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0 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 1 卷（上），第 79 页。

贝当办公室当即向报界发布公告，宣布戴高乐已经没有资格代表谁发表公开讲话，他已不是政府成员，并由陆军部长致电驻英武官，下令通知戴高乐将军立即回国，不得迟延。戴高乐的回国条件是不签订停战协定，他还要求魏刚到帝国领土上去继续战斗。魏刚的答复是先判戴高乐服刑四年，到8月，又以擅离职守（逃兵？）罪缺席改判死刑。

贝当和魏刚主持下的波尔多政府的态度，戴高乐是早有精神准备的。如果仅仅是来自他们可想而知的愤怒，戴高乐还不至于感到那么孤独和伤感。使他难以忍受的，是来自他的广大同胞的冷漠，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

1940年6月22日，波尔多政府与德国政府几经交涉，终于就停战协定达成了协议。选择举行签字仪式的地点这件事，就注定了法国屈辱和投降的结局。希特勒选中了贡比涅森林中间一个展览馆里停放着的卧车作为签字地点。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总司令、法同元帅福煦的卧车。1918年11月25日，就是在这节车厢里，协约国迫使战败国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如今，希特勒复仇的日子到了，他命人将车从展览馆里推到原来地点，作为同波尔多政府签订停战协定的地点。他存心要以战胜者的姿态羞辱法国人。这种羞辱是残忍的。它不仅因为战败者与战胜者交换了位置，也不仅因为选中了同一个地点，更因为两次战争德国人都侵入法国，上一次是被侵略者迫使侵略者停战，而这一次是侵略者迫使被侵略者停战。难怪当听到法国代表团团长亨齐格将军说“我在那辆卧车上”时，就连魏刚也禁不住叫道：“我可怜的朋友！”

可是，对这种羞辱，法国许多人却麻木不仁。他们看不到停战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与希特勒合作，贝当政府的下一步棋，必然是在“保护人民，避免牺牲”的幌子下全面与敌人合作。他们好像如释重负，沉浸在“和平”的喜悦里，他们相信和崇敬贝当这块老字招牌，相信他所说的，停战“至少我们的荣誉算是保住了。……政府有自主权。法国只由法国人来管理。”虽然停战求和使法国蒙受屈辱，却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军队要员在国内抗议签订停战协定。正如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说：“事实上没有一个头面人物出来谴责停战”。就连保罗·雷诺也是如此。

为了使贝当的路线完全实施，在贝当以及他所选中的卖国贼皮埃尔·赖伐尔的积极鼓动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维希召开了最后一次参众两院联席会议。7月10日，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法令，决定授予贝当政府全权，制定新宪法。这等于宣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寿终正寝，法国国土上将出现一个新政权机构——维希政府。

从理论上讲，这次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的法令是合法的。两院议员总共932名（参院314名，众院618名），由于法国当时的形势，实际上的合法议员只有850名，其中将近200名无法参加这次会议，实际投票结果是：569票赞成，80票反对，17票公开弃权。

可见，对贝当的支持在政界和政府里是一边倒的（尽管若干年后那80名投反对票的议员都成了英雄）。众议院议长爱德华·埃里奥曾是个主战派，但这时他说：“现在，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都聚集到人人尊敬的贝当元帅周围来了。我们千万不要去破坏在他的威望下新建立起来的全国大团结。”参议院议长让纳内也曾是个主战派，他在主持联席会议时也没有提出

反对意见。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授权的合法性，加上对贝当这个当年凡尔登老英雄的崇敬，人们纷纷表示效忠贝当政府。既然贝当在维希的政府算是合法，那戴高乐在伦敦创建的“自由法国”运动，当然就是非法了。

在文化艺术界的名流中，像大名鼎鼎的克洛代尔，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保罗·瓦莱里，安德烈·纪德等人，都曾以他们感染过多少人的笔墨，尽情地颂扬过贝当的停战求和政策。

法国所有的海外领地官员和驻外使节，几乎都选择了贝当，或者是既不支持贝当政府也不相信戴高乐。

6月19日，也就是在“六·一八”号召书广播的第二天，戴高乐就曾致电法国驻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将军，表示如果诺盖斯拒绝停战，他就听从诺盖斯指挥。接着，戴高乐还致电东地中海军区的总司令米特尔蒙塞将军和高级专员皮奥将军，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突尼斯总督贝鲁东先生，向他们表示要组织一个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协调所有坚持抵抗的力量，并请这些有身份的人参加委员会。但是，除去卡特鲁将军后来投奔戴高乐之外，其他人都服从了贝当政府和魏刚将军的命令。这些高级人物由于等级观念和法统思想，尽管不少人希望继续战斗，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和服从。

在驻外使节中，驻华盛顿大使圣·坎坦表示，拒绝背叛贝当元帅，“不能采取叛乱分子的立场而归顺在伦敦的一小撮人”。驻伦敦大使科尔班，在戴高乐半月前来往于巴黎和伦敦之间时，曾与戴高乐有多次接触，他不同意停战求和，辞去了政府职务，但也不愿跟随戴高乐。他对戴高乐说：“我是一个老公务员……违法的事，我可吃不消”。

在英国的难民、侨民，以及败退到英国的法国军人，其中至少包括五名军衔比戴高乐高的将军，要求返回已经屈服的法国。在他们看来，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应该回国在贝当元帅的领导下过正常的生活。戴高乐另起炉灶的做法，他们难以理解。在美国，有法国侨民大约20万人，还有将近2万难民，其中大多数是在法国停战前后逃往美国的各界名流。有人作过民意测验，大多数人是拥护贝当政府的，85%的侨民和难民不赞成戴高乐。这种情绪延续了很长时间。一年以后，当勒内·普利文到美国，想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组成一个驻美代表团时，仍然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普利文想请前驻美大使、任过外交部秘书长的阿历克塞·莱吉尔担任代表团团长，被一口回绝。莱吉尔反对停战，反对贝当政府，更反对同德国侵略者合作，但是他不同意由一位将军（一个级别最低的将军）来代表法国。他认为，不管这位将军是多么勇敢值得崇敬，但他毕竟没有“正式受到人民的委托”。他解释道，只有由共和国总统，或是参众两院的议长领导的救国委员会的承认，他才能接受抵抗运动的职务。普利文又去找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雅克·马里坦，同样遭到拒绝。马里坦尽管严厉批评贝当政府，但认为还是应当尊重这个合法政府；他虽然赞赏戴高乐继续战斗，但认为他没有组成一个法律承认和法国人民接受的政府，“是毫无意义的”。让·莫内给戴

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拉乌尔·阿格隆：《戴高乐与罗斯福》，法国普隆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高乐写信，反对在伦敦组织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认为那是在英国“卵翼”下产生的，表示赞成戴高乐坚持战斗，“但不能把伦敦当成复兴的发源地”。就连那位曾给戴高乐许多方便，任过雷诺外事办公室主任的德马尔热里，也对戴高乐说：“我受命作上海的总领事。我是经过伦敦，不是到你这里参加工作，是到中国去。我到那里将和你在这里一样，为法国的利益服务”。在这位外交官看来，他接受贝当的任命与戴高乐坚持抗战一样，都是在为法国服务。

戴高乐曾希望有充分代表性的人物出面支持“自由法国”运动，但他看到“到我的旗帜下来的‘经得起考验的人’，毕竟是很少的”。

戴高乐的孤独和伤感，还来自那些他曾寄予希望的国家。法国停战求和，法国沦陷希特勒之手，曾使许多国家感到震惊和同情，“但各国很快就承认了既成的事实”。

在英国，除去丘吉尔和少数几个官员之外，英国战时内阁和军队中的高级官员们，多数对戴高乐持怀疑态度。他们想方设法阻挠戴高乐继续使用 BBC 电台向法国广播，逐字逐句审查修改他的广播稿。英国陆军部对戴高乐在英国为“自由法国”招募士兵、飞行员和海员的计划设置障碍，竟然派员到因溃败而在伦敦的法国兵营中，提醒他们说：“你们完全有自由在戴高乐手下当兵。但我们有责任以个人的身份告诉你们，一旦作出这个决定就是背叛你们的政府……”。法国驻英海军使团秘密进行反对英国和戴高乐的活动，而英国海军部和战时内阁却不愿意对这个使团采取措施。英国的情报机构还在投奔戴高乐的法国人中招募情报员。在伦敦的法国使馆中，仍然驻着一位领事负责两国来往事务。

此外，在维希政府里仍然驻留着许多重要国家的外交官员——这表明这些国家仍然在同法国这个“合法”政府打交道。他们有加拿大总领事德布依斯，教皇大使瓦勒利阿·瓦勒利，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美国大使李海上将，还有南非联邦的代表。这些人在维希，无疑给贝当政权壮了威，给那些本来想投奔戴高乐的人，增添了疑虑。

美国，是戴高乐继英国之后寄以厚望的国家。但是，在戴高乐四年抗战中，美国给予的同情和支持是与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最不相称的国家。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罗斯福总统没有会见过一位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他始终对戴高乐表示怀疑和敌视，迟迟不肯承认戴高乐的抵抗政权，美国与维希政府的关系是盟国中持续最长的。

这些来自各个方面的观望、怀疑、不理解甚至敌视的态度，除去因为对戴高乐的为人和作为有保留以外，最集中地反映出一点，人们的思想被束缚在合法程序的传统观念中，他们分不清谁是谁非，他们不知道如何来界定“合法”与“非法”。就连许多同情支持戴高乐坚持战斗的主张的人，也不愿同情支持戴高乐坚持战斗的行动。因为在他们看来，贝当政府的行动虽然“背理”，但是“合法”；戴高乐的行动虽然“合理”，但是“违法”。当然，要使大多数人弄清这个问题有待于维希政府的卖国嘴脸进一步暴露，也有待于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在艰难中逐步发展壮大。但是，在戴高乐开创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93页。

同上。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85页。

他的事业的最初阶段，这无疑是个极端严峻的问题。

表面上看起来，贝当政府签订停战协定是合法的，向贝当政府授权、结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是合法的。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即议会通过的。如果仅仅从法律程序上来看，它是无懈可击的，是合法的。但是，那些断定贝当政府合法和戴高乐非法的人，他们在作出判断的时候，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和一个根本的原则。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它末日来临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的议会和政府，已经丧失了正确行使国家权力的能力。先是无能，他们制定了一条有助于侵略者加速走向侵略道路的绥靖政策；接着是惊慌失措，他们在侵略者的攻势面前斗志无存，致使法国一败涂地；最后是屈辱求和，将国家和民族利益奉送给了侵略者。法国全国已陷于崩溃，首都和大片国土沦陷，军队溃败，围绕停战和战斗的争论已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处于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议会和政府，在一小撮人的操纵下，绝不可能作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正确决定来。实际情况是，在欧洲已沦陷的国家，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屈服于侵略者，更谈不上与敌人合作。它们既使无力抵抗，也要设法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名誉。像挪威、荷兰、卢森堡、波兰、比利时等等，都先后在英国公开了自己的“流亡政府”。唯独法国的贝当政府例外。

一个根本的原则是：国家法律制定的原则是什么，当然是要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这一点，在任何一部独立国家宪法中都是不能回避的。国家宪法的宗旨，就是要捍卫和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依据宪法规定产生的国家权力机构，应当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国家权力机构的合法性，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由这一点决定的。一个国家权力机构，如果在危急关头不能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尽管它是依据法定程序产生的，它用什么证明，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合法的呢？难道广大人民应该接受这样的权力机构吗？

因此，根据这个基本事实和根本原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后一届议会授权的贝当政府，并不具有合法性。反之亦然，戴高乐的抵抗运动，就具有合法性。

戴高乐从来就是将合法与不合法放在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个原则上来检验的。他坚信“六·一八”行动是一个合法行动，他随之创建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是一个合法的抵抗政权。因为它体现了法兰西的永恒的精神和灵魂，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通过广播公开宣布：“1940年6月17日那天，法国最后一个合法政府在波尔多已不复存在了。一小撮失败主义者和卖国贼发表了一篇诚惶诚恐的宣言以后篡夺了政权。一帮形迹可疑、名誉扫地的政客，野心勃勃的官僚和昏庸无度的将军都纷纷钻营，争权夺利；而同时，又要俯首贴耳，任凭别人奴役。于是，一个84岁的老头子，一个过去曾显赫一时的可怜躯壳，利用法国的失败，被抬出来掌了大权，向敌人俯首称臣，蒙骗这个被打昏了的国家。第二天，自由法国便诞生了。”

戴高乐认为有三条理由证明他有权代表法兰西行使权力。首先是法国已不存在别的合法权力机构，而国家和民族利益要求有一个权力机构。其次，戴高乐本人是共和国最后一届政府的唯一坚持战斗的成员，他是自由的，决

不接受投降和篡权。最后，广大法国人民越来越同情和支持自由法国，这就是一个永久性的选举团，证明自由法国的权力是合法的。1944年8月，当戴高乐回到解放后的巴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主席皮杜尔请他宣布共和国成立，他回答：“共和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都与它形成一体。维希政权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和非法的。我本人就是共和国政府的主席。我为什么还要宣布共和国成立呢？”

戴高乐认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政府，就要承担责任，它应当继承这个民族以往的遗产，捍卫现实的利益，并带来希望。可是贝当的维希政府却恰恰相反。

30多年以后，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里对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确了。他指出：“对一个政权来说，它的合法性来自它所激发的民族感情，而当祖国存亡之际，合法的政权就体现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继存。”

正因为戴高乐具有这种超出自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之心，他才能在孤独的包围中保持旺盛的斗志，在伤感之余保持不懈的毅力。在这段最黑暗的历史时期里，他愈加明白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具有的份量。他从逆境中感受到，只有勇往直前毫不动摇地承担起光复祖国的历史使命，才能真正获得权力和权威。只有成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屈战士，才能得到广大法国人民的承认和拥护，得到其他国家的尊敬和重视。”只要自己稍一动摇，就会导致毁灭”。

戴高乐历来是不会想毁灭的，他只有前进，冲破艰难险阻，去争取胜利。

去争取胜利

面对诸多困难和阻力，要首先找到一个能够决定成败的突破口。就是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对于这个突破口，戴高乐是心中有数。这不仅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是要继续战斗，要通过战斗来证明法兰西的存在，用战斗来复兴法兰西的尊严和荣誉，要战斗，就必须有武装。而且还因为他从小就对军队培养出了一种特殊感情，从少年时代开始就逐渐认定了一个看法：即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评论自己的《法国和它的军队》这本书时说的那句话，就是他关于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的看法。在他看来，法国军队的溃败，导致了国家的沦亡，同样，法国的复兴，还要靠自由法国的武装。

戴高乐明确指出：“没有武装就没有法国。建立一支战斗部队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他认为，要使自由法国运动成为一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就不仅仅是少数人坚持战斗，而是要使整个法国回到战争中去。要让自由法国的军队重新在战场上出现，要让法国本土恢复战争状态，要让全国支持战斗者的行动，要让世界各国承认法国已继续参加战斗。这样，才有可能去争取最后胜利。从“六·一八”号召书播出开始，戴高乐和他仅有的几位同伴四处奔走，只要驻有撤退过来的法国军队的地方，他们都要亲自去说服动员，为自由法国招募军官、士兵和技术人员。据当时估计，撤退到英国的法国官兵，

参见《戴高乐与罗斯福》，第32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2卷（上），第323页。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9页。

见本书第32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1卷，第93页。

主要有一个阿尔卑斯轻步兵师，这个师曾在挪威作战，后随英军在敦刻尔克撤退。还有外籍军团的半个旅。在英国的一些医院里，还有数千名伤员。在港口，约有 10 万吨位的法国舰船，除去船员外，还有许多海军官兵，差不多有 1 万人。

过了一个星期，戴高乐的工作成效甚微，应召来的志愿官兵，只有五六百人。而与此同时，仍然在英国保留着的“法国军事代表团”，专门组织了一个机构，负责动员和组织遣返这些在英国的法国人，要他们回国效忠贝当和维希政府。戴高乐不得不加紧活动。

6月29日，戴高乐去伦敦的特兰腾公园，阿尔卑斯轻步兵师驻扎在这里。指挥这支部队的贝杜阿尔将军，是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的同学。贝杜阿尔已经打定主意回国，但他同情戴高乐，并表示有一天还会回到他的部队中来。因此他给了戴高乐方便。在贝杜阿尔安排下，戴高乐同附近的兵营都进行了接触，并争取到了外籍军团中的大约两个营，包括他们的指挥官，轻步兵师的 200 名士兵，还有一个坦克连的大部，以及一部分炮手、工兵、通信兵等。随来的军官中，有的后来在自由法国运动中成了非常重要的人物，像柯尼格上尉和后来的德瓦弗兰上尉。德瓦弗兰上尉后来以巴黎地铁站名“帕西”为化名，组织并领导了自由法国的情报机关。

几天以后，戴高乐又前往哈罗公园，在那里他得到一批海军官兵的支持，有两艘潜水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参加自由法国军队。在圣阿塔姆兵营，戴高乐还争取到几十名空军飞行员。他召集在英国养伤的士兵们开会，争取到 200 人，还来了一个渔船队。

7月14日法国国庆那天，戴高乐在白厅前面，在深受感动的英国人面前，公开检阅了他的第一支部队，并率领他的全军将士在福煦元帅像前敬献了红、白、蓝三色花圈。就在前一天，戴高乐通过广播向国内宣布：“法国同胞们！请认清这一点，你们还有一个战斗的队伍存在”。一周后，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对鲁尔的轰炸。

到7月底，聚集在自由法国洛林十字旗下的官兵，大约有 7000 余人。虽然人数不多，装备不足，士气也有待提高，但它构成了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基本队伍，而且海陆空俱全。

如果拿自由法国初期的武装力量，同几年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临时政府）拥有的武装力量相比，它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

1944年初，为迎接全国解放，戴高乐以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规定在法国本土作战的地面部队应达到：1个军部，3个军团司令部，6个步兵师，4个装甲师，以及各种辅助部队，此外还有3个摩洛哥骑兵队，2个伞兵团和一些突击队。海军方面，投入战斗的将有2艘主力舰，9艘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3艘辅助巡洋舰，2艘航空母舰，潜水艇18艘，鱼雷艇14艘，等等。空军可编成30个大队，约500架作战飞机。

总之，戴高乐已拥有 23 万野战军，15 万驻防军，32 万吨位的舰队和 5 万水兵，3 万空军。这些，还不包括在国内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力量。接近解放时，游击队员已超过 20 万人。

这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戴高乐重建了法国的军队，就为恢复法

参见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392—393页；《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83—86页。

国的尊严和荣誉提供了保证。

要恢复法国的尊严和荣誉，要代表法兰西，仅有武装这个基本保证还是不够的。从自由法国运动一开始，戴高乐就想着在可能的范围内组织一个机构，用以指挥作战，用以同盟国发生正常关系，用以收拢所有愿意参加抵抗法西斯的法兰西人，到适当的时机，它将无可争辩地取代贝当那个维希政府，成为代表法兰西的唯一合法国家政权。

当然，戴高乐也知道，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的艰难环境下，如果把他身边形成的那个初级的组织机构称为“政府”，那简直是很可笑的。他想的是尽快组织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由于“法国的著名人物几乎普遍地敬鬼神而远之”，一时之间戴高乐难以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他只好推迟这个计划。

但是，不管这个委员会什么时候成立，戴高乐实际上是在按权力机构的需要在安排工作。在他身边，有人负责对内对外关系，有人负责内政的行政事宜，有人专门负责同英国外交部及欧洲各国“流亡政府”的联系，有人负责法国海外侨民事务，有人负责财政，有人负责自由法国广播电台和报刊宣传，再加上一批直接负责军事工作的军官，这完全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架子。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认为时机已经到了，仅仅拒绝承认维希政府的合法性已不足以打击投降派了，他应该公开亮明自己是法兰西民族利益保护人的身份，在已经归属自由法国的帝国领土内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这一天，他在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篇著名宣言。在宣言中，他在否定了维希政府的合法性之后说道：“必须有一个新的政权负起指挥法国作战的重任。时势将这个神圣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决不辜负它。”他宣布，从即日起“组织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

同一天，戴高乐还发布了两个法令。第一号法令规定了帝国防务委员会“行使国家大权”的性质，它的宗旨和任务。规定最高行政权由“自由法国领袖”行使，日常行政权由自由法国领袖任命的“司长”行使。在第二号法令中，戴高乐公布了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其中有4名将军，2名上校，2名总督，1名教授。

1941年9月24日，戴高乐又发布命令，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一些原本没有名气的人现在有了名气。戴高乐认为，可以提出一个像样的委员会成员名单来组成这个民族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普利文、卡森、德让、瓦兰、勒让蒂约姆、迪特尔姆、卡特鲁和达让吕等。这个委员会虽然没有政府的名义，但具有政府的职能和机构，实质上就是政府。

戴高乐认为，他在坚持抗战的年头里，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政权。这个民族委员会，经过1942—1943年在北非同达尔朗和吉罗的较量，于1943年6月3日在阿尔及尔终于改组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宣布，这个民族委员会“就是法国的中央政权机关”，它将行使一切国家职能，直到全国解放将全部职权移交那时组成的临时政府。1943年9月17日，颁布了成立临时咨询议会的法令。11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临时咨询议会在阿尔及尔召开。随即，改组了委员会。1944年6月3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阿尔及尔成立。8月，巴黎解放。9月9日，戴高乐改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吸收了部分国内抵抗运动领袖。一个月以后，世界各强国陆续

承认了法国临时政府。

有了武装，有了政权，当然得有自己的地盘。戴高乐早就想利用北非作为法国继续战斗的根据地。但由于法属海外领地的官员们政治上的错误选择，加上自由法国运动开创阶段无法脱离英国的直接帮助，戴高乐不可能一开始就将他的大本营设到“帝国领土”上去。让·莫内就是认为他甘愿受英国“庇护”，所以才不投奔自由法国运动。

其实，戴高乐从来也没有，往后也不会有在别人卵翼下过日子的想法。在他踏上英国开始自由法国运动那天起，就没有放弃去非洲的打算。因为他很清楚，他只是借用英国的力量来开创工作，而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功，最终还是要在法国的土地上获得。

从建立了一支新军队，组织了一个新政权的雏型开始，戴高乐就在计划着尽快投入实战。非洲，是他选中的最理想的战场。他可以利用法国这块广阔的领地抗击德国人，动摇维希政权的基础，也可以利用这块基地来作为同英国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有了这块根据地，他就可以结束自由法国的流亡生涯，在法国的属地上行使独立自主的权力。

当然，从地理位置和政治上考虑，戴高乐最理想的地方是北非。可是，那位诺盖斯将军最终没有听从戴高乐的规劝，他宣布服从魏刚和贝当。而赤道非洲的形势要对戴高乐有利得多。他决定加紧在乍得、喀麦隆和刚果等地的工作。8月底，戴高乐派出的代表团成功地使乍得、喀麦隆、刚果和乌班吉公开支持戴高乐。

在争取到赤道非洲的同时，戴高乐就在设计如何拿下法属西非的方案。西非这一片，特别是它濒临大西洋漫长的海岸线上的重要战略基地，不仅戴高乐，连丘吉尔也时常记挂在心。达喀尔是个重要而巨大的海军基地，它对战争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达喀尔落入德国人手中，英国通往中东、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海上运输线将在德军舰队的控制之下。如果英国人控制了达喀尔，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当戴高乐拟定了远征塞内加尔，夺取达喀尔的计划后，丘吉尔积极赞同。英法远征军8月31日从利物浦出发，戴高乐在丘吉尔的联络官斯皮尔斯将军陪同下，亲自出马。但是，由于维希政府得悉了消息，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从土伦港驶出，先于英法远征军到达达喀尔。戴高乐虽然想强行攻占，但未能成功。

达喀尔的失败给自由法国和戴高乐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维希政府乘机挑拨离间，谴责戴高乐“向同胞开火”，英国和美国那些早就对戴高乐持怀疑态度的人更是火上加油，认为是“狂热”、“不现实”、“愚蠢”。但是，在丘吉尔的坚决支持下，戴高乐从苦闷中迅速摆脱出来，他不能就此以一个失败将军的身份返回伦敦，他仍然要以自由法国的领袖身份视察归他管理的领地。

戴高乐视察了喀麦隆、乍得、刚果。戴高乐在杜阿拉港受到热情欢迎，他委派的使者勒克莱尔少校甚至为他准备了阅兵仪式。在乍得，戴高乐最感欣慰的是卡特鲁上将从伦敦来到拉密堡同他见面。传说中英国人曾暗示这位上将可取代戴高乐的地位，但卡特鲁似他上将的军衔表示服从戴高乐的领导。卡特鲁被派往开罗，负责东地中海地区的工作。在布拉柴维尔，戴高乐宣布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一个临时权力机构。随后，他又视察了乌班吉、黑角和利奥波德维尔。最后，剩下还在维希军队控制之下的加蓬。从10月底开始，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用了半个月时间用武力拿下了加蓬。

总的说来，戴高乐在非洲的事业纵使没有达到他预想的全部目的，但毕竟在撒哈拉沙漠与刚果之间，在大西洋与尼罗河盆地之间，建立了一个巩固的作战基地。正是有了这块巩固的作战基地，自由法国军队才能配合英军打击意大利军队，才能为开辟中东战场提供支援。也正是有了这块巩固的作战基地，才使戴高乐于盟军在北非登陆后，有了将自由法国总部从伦敦迁往阿尔及尔、确立自己所有法国抵抗力量领袖地位的资本。1943年5月底，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总部从伦敦迁往阿尔及尔。

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但这一切都不在法国本土之内，它总给人以“流亡”的感觉。戴高乐的目的，是要最终解放法兰西，恢复法兰西的尊严和荣誉，维护法兰西民族的自由和统一。因此，他最终要得到法国国内所有与他有共同志向的同胞的承认，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这就完全有必要将在国内逐渐兴起的抵抗运动汇集到自由法国的旗帜下。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强抵抗运动的力量，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而且直接关系到战争胜利后，法国将以一个什么样的新形象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当戴高乐在伦敦发出“六·一八”号召时，法国本土内几乎还没有有组织的公开响应。但这并不等于法兰西人甘愿忍受屈辱和奴役，随着对维希政府的失望逐渐转化为愤怒，愤怒又转化成对敌人的反抗，早已零零星星开始的抵抗行动，凝聚成了几股较有实力的抵抗力量。开始阶段，戴高乐将与国内地下抵抗活动联系的工作交给了他的首任情报局长帕西，即那位最初投奔他的德瓦弗兰上尉。帕西与戴高乐初次见面就留下了深刻印象：戴高乐用他那“清晰、有力、粗犷的声音”提了一连串问题，得知帕西得过法学学位并在圣西尔军校任过教，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之后，当即任命他为自己参谋部第二局和第三局局长。帕西明白，戴高乐为了事业的成功，不能放弃代表法兰西和领导所有法国人的权利，必须包括国内所有抵抗力量。帕西通过情报局竭力与国内抵抗运动建立联系。

法国国内最有名气的几个抵抗运动组织是“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等。“解放”由新闻记者埃马纽埃·达斯蒂埃创建，“战斗”是由亨利·弗雷内和乔治·皮杜尔分别领导的两个组织合并而成，“狙击兵”的领导人是让·皮埃尔·莱维和克洛迪斯·珀蒂，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阵线”分布较广、组织严密。

帕西的工作并不好做。其中不仅因为和英国情报机构的争夺和冲突，而且一些较大的抵抗组织并不急于承认戴高乐对自己的领导。1941年秋，一个重要人物来到伦敦投奔戴高乐，他对国内抵抗运动统一归属自由法国运动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个人就是让·穆兰。让·穆兰原是埃尔—卢瓦尔省省长，因不愿在维希政府中屈辱做官，潜逃到法国南方同抵抗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于1941年9月9日翻越比利牛斯山，准备取道西班牙前往伦敦，投奔戴高乐。年轻有为、精明强干的穆兰，还未到达伦敦，就被英国驻里斯本的情报当局看中了，动员他返回法国为英国服务，穆兰拒绝了，他要为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服务。

穆兰到伦敦后一个月，戴高乐同他进行了多次长谈。穆兰不仅持有国内主要抵抗组织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他还有关于今后如何发展、组织、领导国

内抵抗运动的详细打算。特别是穆兰“相信‘戴高乐派’不仅是一个对敌斗争的手段，同时也是革新法国的动力”，可谓正合戴高乐的深谋远虑。因为戴高乐想的是，国内抵抗力量不可忽视，要使他们成为一个整体的部分参加自由法国运动，但“决不能让他们占上风”，越过或夺取戴高乐的领导权。戴高乐已经意识到，国内不同党派基础上组成的抵抗运动，如果不统一到自由法国旗帜下，将来到胜利那一天，势必影响到法国的政治前途。他已经在考虑，未来的法国再不能由党派政治来操纵了。

戴高乐决定派让·穆兰回国，任务很明确，就是要设法将各个抵抗运动组织统一到自由法国领导之下，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武装力量，组织“内地军”，配合将来的大反攻。戴高乐委任让·穆兰作为他在国内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唯一代表。12月24日，戴高乐签署了委任书：“我委派让·穆兰先生，行政长官，为我的代表和法兰西全国委员会驻法国南方本土未被占领地区的代表。让·穆兰先生的使命是，负责领导该地区所有抵抗敌人及其合作者的组织的统一行动。”

1942年元旦凌晨2点，让·穆兰和两名助手被空投回国。他先以“雷克斯”后以“马克斯”的化名，活跃在各个抵抗运动组织之间。他建立许多秘密军事小组，组织接受空投武器，发放经费，设立秘密电台。穆兰最成功的是扩大了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在国内的影响。在穆兰回到法国工作几个月后，几个较大的抵抗运动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都先后设法前往伦敦会见了戴高乐。

但是这些组织的领导者都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对让·穆兰的“代表”身份不服气，这实质上就是对戴高乐的领导地位有保留。1942年9月17日，亨利·弗雷内和埃马纽埃·达斯蒂埃在伦敦会见戴高乐，他们要求解除让·穆兰的职务，称他是“教师爷”。他们认为，从军事角度来讲，为了胜利，抵抗运动组织毫无疑问要服从戴高乐的民族委员会，但在政治上，抵抗运动组织同委员会的关系就同政党对政府的关系一样。弗雷内曾对戴高乐表示，他们回国后可能很难就这个问题同穆兰达成协议，戴高乐就请他再来伦敦商谈。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弗雷内试探性地问道：“……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服从，也可能不服从”。戴高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噢，真是那样地话，法国势必在你我之间作出选择”。

但是，整个战局的发展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各抵抗运动组织都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力量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拒绝戴高乐的领导。

德国占领下的法国，不仅成了德国侵略战争的后勤供应地，德国占领军还对抵抗运动的战士实行“人质报复”。他们针对每一个抵抗行动，有计划地处决在押“政治犯”。这种丧心病狂的兽行，是在贝当、赖伐尔等人的默许下进行的，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长”甚至亲自组织“退伍军人团”，甘当纳粹打手。维希政府还成立“强迫劳动局”，逼迫几十万法国人去德国服苦役当劳工。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的一年里，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纳粹警察在法奸配合下已无视未被占领区的存在，到处追捕抵抗运动战士。1942年11月，德国人正式进驻“未占领区”。到此时，国内一些主要的抵抗运动组织，不管他们是受社会党影响，还是受共产党影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582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590页。

响，还是宣布独立于党派之外的，都纷纷表示了要统一抵抗运动的愿望。

1943年2月，让·穆兰回到伦敦，同戴高乐商议组织“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戴高乐任命穆兰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并授予解放十字勋章。到5月，穆兰终于完成了统一抵抗运动组织的使命。正当戴高乐在同罗斯福支持下的吉罗将军争夺谁代表法兰西的时候，以让·穆兰为主席的“法兰西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发出通电，服从戴高乐领导，建议迅速在阿尔及尔组成以戴高乐为主席的法国临时政府。这一胜利，对戴高乐确立领导地位无疑是最大的支持。可惜的是，让·穆兰仅在几周之后，就因有人告密被捕。但他宁死不屈，最后死于酷刑之下。戴高乐为此悲痛不已。

武装、政权、根据地、统一各派力量，戴高乐已经为未来法兰西大厦打下了基础。但是，他也清楚，他心目中的这个大厦的许多骨干材料，在整个战争期间是要依靠旁人提供的。美国会支持重建他理想中的法国吗？英国会慷慨解囊吗？戴高乐前面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但又是一条走向胜利的路，是一条最能体现戴高乐的思想、性格的路。

法兰西的独立、完整和伟大

戴高乐在伦敦艰苦创业的时期，正是希特勒德国在整个欧洲大陆肆行无忌的时候。继1940年春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沦陷之后，从夏季开始，在希特勒的全面封锁下，英国承受着物资匮乏和狂轰滥炸的双重威胁。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后来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先后入盟。1941年4月，希腊又陷入希特勒之手。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鉴于这种形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一个较困难的时期。在这个总形势下，决定了离乡背井、孤军奋战的戴高乐所从事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际有力的支持，戴高乐不可能成功。这一点，戴高乐在“六·一八”号召书中说得很明白，他把同英国的同盟，把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看成是成功的依靠。

但是，戴高乐的依赖性是有原则的。他到英国来不是为了帮助英国作战，而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并为之服务，他要通过战争来实现法兰西的独立、完整和伟大。任何外来的支援，毫无例外，都应符合这个原则。

回顾历史，并客观地回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去看问题，今天可以作出判断：如果没有丘吉尔的英国给予的坚强有力的支持，戴高乐的事业不可能成功，正因为这种支持，才使戴高乐与丘吉尔之间建立了战斗的友谊。尽管这种支持与矛盾甚至冲突并存，尽管这种友谊与猜疑甚至戒心并存，但对戴高乐来说是不可缺的，对丘吉尔来说也是需要的。

戴高乐在回忆初到伦敦丘吉尔的帮助时，曾坦率地说：“我那时就如同在英国海边上翻船遇难，没有他的帮助我又能做什么呢？”在丘吉尔的坚持下，戴高乐在BBC广播了“六·一八”号召书，在伦敦开始招兵买马。当他向丘吉尔提出打算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后，丘吉尔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全力为之辩护，声称“戴高乐将军是一位名声好、个性强的优秀战士，除他之外可能没有人能组建这样一个委员会”。紧接着，英国政府发表公报，表示将承认这个委员会。1940年6月27日晚，丘吉尔力排众议，将戴高乐请到唐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1卷，第89页。

引自《戴高乐与丘吉尔》，第71页。

宁街对他说：“您只有一个人——那好，我就只承认您一个人！”第二天早晨，英国政府宣布：“英王陛下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是所有为捍卫盟国事业而归附他的自由法国人——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的领袖。”

这种最初的承认，而且是在戴高乐极端孤立的情况下的承认，其意义当然不可低估。历史也已经证明，丘吉尔的英国政府作出的这个决定是明智的，是正确的。

丘吉尔坚信战争的最后胜利，他要坚持到底，他要把这种信念变成全体英国人的信念，要利用一切可能去鼓励面临严重威胁的英国人的斗志。法国溃败投降，英法联盟结束，英国人的斗志受到打击。丘吉尔要告诉英国人，甚至还要告诉美国人，连法国也要反败为胜——戴高乐将军就是胜利的希望，何况英国！因此，在战与降，在胜利与失败这个问题上，戴高乐与丘吉尔是一致的。这就是他们战时关系和友谊的基础。但是，戴高乐“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他从擎起抗战大旗那天开始，想的就不仅仅是通过战争取得胜利，而且想到胜利后的法兰西的独立、完整和伟大。他在战争期间，乃至战后执政期间的每一个设想，每一个行动，都与此紧密相关。丘吉尔，还有罗斯福，要末就是没有戴高乐想得那么深、那么远；要末，他们就是另有打算。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戴高乐之间有差异。这个差异，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

1940年7月3日，为了防备属于维希政府的法国舰队落入德军之手，英国海军突袭了停泊在英国港口的法国舰艇和麦尔斯——埃尔——凯比尔海军基地，过了数日，又袭击了亚历山大港。除去几艘巡洋舰之外，法国舰队被摧毁了，它包括“布列塔尼号”、“普罗旺斯号”、“黎塞留号”，还有戴高乐称之为“那艘漂亮、心爱、雄伟的‘敦刻尔克号’。”英国人的行动，使戴高乐感到“悲愤”。第一，它没有事先征求戴高乐的意见；第二，被摧毁的毕竟是法国的军舰，戴高乐个人自尊心和民族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何况，由于维希政府大做文章，给自由法国在法国人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戴高乐就这件事心中已产生了疑问，他认为英国的行动反映了“旧时海上竞争的气息”。但是，处于草创事业阶段的戴高乐，“悲愤”是谨慎的。他虽然感到受到伤害，但也只能以整个事业的大局为重。他说道：“麦尔斯——埃尔——凯比尔的悲剧、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大吹大擂，虽然使我和同伴们感到痛苦和愤怒，但我还是认为拯救法兰西的事业高过一切，当然也高过我们舰队的命运，我们的责任就是坚持战斗。”他不得不向法国人解释，与其将舰队留给德国人用来打击英国和法国，不如将它们毁掉。

也许是戴高乐在这件事上的“光明磊落”感动了丘吉尔，更可能是这个“令人憎恶的”、“最违背天性、最使人感到痛苦的”决策，使丘吉尔感到欠下了什么，他指示英国战时内阁和皇家军队三军总部，要尽力支持和帮助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但是，丘吉尔绝没有料到，他不可能满足戴高乐为了法兰西的需要。

1940年7月12日，丘吉尔指示各兵种参谋长，政府的政策是要组建强大的法国陆海空作战部队，“各参谋长有责任有效地执行这一政策”。8月初，他还指示新闻大臣，要继续不间断地让戴高乐将军在电台进行广播。8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1卷，第98页。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上），第2分册，第342页。

月5日，他在战时内阁会上表示支持戴高乐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组织一个抵抗德国的法国政府机构。也就在这个时候，拖了近一个月的法英谈判有了结果。戴高乐的法律顾问卡森作为代表，同英国政府谈妥了关于自由法国招募武装人员的条款。8月7日，“戴高乐——丘吉尔协议”在唐宁街签字。戴高乐同意在军事上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一般指示，但仍拥有“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自由法国军队的经费由英国开支，但所有费用都是“借款而单独入帐”。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戴高乐势单力薄，只能表示服从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但“保留”了对自己武装的指挥权；戴高乐只有靠英国的财政支持，但他不愿靠施舍度日，他是“借”，他的国家和政府要还这笔帐。

在这些微妙的讨价还价中，戴高乐出于担心“英国也许有可能会染指”法国殖民地，所以特别指示卡森，协议中必须坚持写上英国保证重新恢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但是英国人不愿作出这种保证，他们只同意“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而不愿就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允诺。显然，这就加重了戴高乐的戒心。他十分重视法国海外殖民地在自由法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急迫地要扩大自己在海外殖民地的力量。但是，由于力量所限，任何一个行动他都无法离开英国的参与，他只好在高度警惕中与英国一起去从维希政府手中争夺海外殖民地。

1941年初，德国军舰，特别是潜艇，对英国海上运输线造成极大威胁。随着大西洋战争开始，英国船队被迫从地中海绕道开普敦。在非洲，“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同盟军交上火。而且巴尔于战事趋紧，英军被迫从中东调遣部队参加希腊保卫战。与此同时，自由法国军队参与了盟军在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厄里特里的战斗。戴高乐还希望在英军的协助下，迫使吉布提和法属索马里归顺自由法国。他还希望由维希政府控制的两个托管地：叙利亚和黎巴嫩，能够归顺自由法国。因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非洲与中东的大批战略物资，仍可通过维希这个渠道输往德国。

但是，英国政府部门，特别是驻中东地区军政当局，拒绝协助戴高乐。他们在中东兵力空虚之际不愿大动干戈，宁可与维希政府保持过得去的关系。英国甚至与维希政府在中东的高级专员当茨将军签订贸易协定，以确保维希政府在地中海东岸的物资供应。5月，伊拉克爆发了反英叛乱。在德国人的命令下，当茨在叙利亚贮存的绝大部分战略物资都提供给了叛乱者。尽管如此，英国驻中东地区总司令韦弗尔将军仍不同意戴高乐夺取叙利亚的军事计划。

直到丘吉尔亲自过问。他认为伊拉克叛乱可能致使德国以少量兵力在叙利亚站住脚，然后以此为基地夺得伊拉克和波斯的控制权，这样，阿拉伯的油田和苏伊士运河都处在威胁之下，因此必须全力支持自由法国的中东行动。丘吉尔给韦弗尔的电文很明确：你不同意就辞职。

英国政府与维希政权藕断丝连的关系，以及对占领叙利亚、黎巴嫩持冷淡和拖延的态度，使戴高乐疑心倍增。他觉得自由法国如果不在叙利亚、黎巴嫩站住脚，到最后，不管战争胜负如何，法国将失去中东。伊拉克发生反英叛乱后，英国虽然同意了夺取中东的联合行动计划，但戴高乐却认为他同英国“彼此之间的政治冲突就在幕后酝酿起来了”，从各种媒介他获悉“某种特殊人物在蠢蠢欲动”，他认为英国人在玩弄把戏，想在中东建立自己的领导权，“英国的政策是时而明争，时而暗斗，企图取代法国在大马士革和

贝鲁特的地位”。

艾登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断定戴高乐的猜疑是受到性格的影响。艾登说：“但戴高乐也吃亏在他的性格，因为他的热诚、信念，使他有时易于怀疑别人的意图。”他说，说英国及其领导人在使诡计起贪心，那是“莫须有的事”，“我们不想要马达加斯加，也不想要叙利亚和吉布提，也不想继承法国在那里或其他地方的地位。就从我们最利己的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法国强大起来，法兰西帝国存在下去（如可能，保持完整），这也是符合我们利益的”。

艾登谈到戴高乐的性格，还有他的“热忱”和“信念”。艾登没有解释戴高乐的“热忱”和“信念”指的是什么，但是把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并敢于实践的人的“热忱”和“信念”，归为性格，恐怕是不妥的。戴高乐的“热忱”是对法兰西的感情，戴高乐的“信念”是法兰西的独立、完整和伟大，从这个立场出发，戴高乐不能容忍任何损害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事情。

英国人在“八·七协议”中已经拒绝了保证法兰西帝国的“完整”，艾登后来的回忆又加上一句注：“如可能，保持完整”。那末，不可能，怎么办？这起码证实，英国在一开始就对未来法国是否应完整包括它的殖民地，持保留态度。如果再加上后来罗斯福对法属殖民地的看法，戴高乐不可能不怀疑他这两个最大的盟国的真实动机。

在准备进军叙利亚的同时，戴高乐就在考虑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后，立即宣布这两个国家结束托管独立，以便自由法国与这两个国家建立一种单独可靠的联系，使它们仍然在自由法国的控制之下。他让卡特鲁将军起草声明。英国人表示，这个声明应由英国和自由法国共同签署发出。戴高乐坚决拒绝，他认为这是法国自己的事情。此后，丘吉尔亲自打电报给戴高乐，建议声明中加进由英国保证的话，仍遭拒绝。戴高乐认为用不着别人来担保。后来，各自发表了一个声明，戴高乐更是对英国产生了不信任感。

6月21日，英法联军开进大马士革。正当戴高乐委派卡特鲁将军为全权代表，准备订立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并与法国结盟的条约时，英国却在准备与维希政府签订违背戴高乐意愿的停战协定。

还是在19日，戴高乐在开罗就已同英国驻开罗大使迈尔斯·兰普森商定了维希政府要求停战的条件。其主要内容包括：自由法国和英国允诺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自由法国当局为法国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代表；对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维希军队，应创造一切条件争取他们参加自由法国军队；戴高乐的代表应参加谈判，正式答复还应以他的名义和三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

但是，经过英国外交部发出的答复却只提谈判将在代表三军总司令的威尔逊将军和叙利亚的维希当局之间进行，没有提自由法国的代表是否参加谈判，也没有提到自由法国在地中海东岸代表法国。至于如何争取维希军队，也没有在文本中提及。于是，戴高乐向艾登提出正式抗议，他只承认6月19日的条件，其他概不承认。

陪同戴高乐前往中东的斯皮尔斯将军记得当时戴高乐“勃然大怒”，他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171、172页。

《艾登回忆录·清算》（上），第440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174—175页。

和戴高乐有一段对话，颇能说明问题：

戴高乐：“我认为我将永远不可能与英国人和谐相处。你们都差不多，只想着你们自己的利益，从不考虑别人的需要……您怎么看？我会祝愿英国的胜利吗？啊不！我关心的是法兰西的胜利！”

斯皮尔斯：“但……这是一回事。”

戴高乐：“完全不是。这根本不是我的看法”。

7月10日，谈判在圣让-达克正式开始，自由法国代表卡特鲁将军虽然参加了谈判，但他只是个不起眼的角色。7月14日停战协定公布，英国的利益受到最大的保护，维希官员受到最大的宽待，自由法国的地位受到冷遇。不仅戴高乐原来坚持的几条没有得到保证，而且英国代表还私下同维希签了一个秘密协定书，规定自由法国的人不得与维希方面的人有任何接触。

戴高乐的愤怒可想而知，他在布拉柴维尔冷眼看着英国同维希作交易牺牲自由法国的利益。他认为，根据协定，等于把叙利亚和黎巴嫩无条件转让给了英国，是不可能接受的，英国暴露了想在中东替代法国的明显意图。戴高乐以外交途径交给英国派驻中东地区的国务大臣利特尔顿一份正式照会，声称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将从7月24日起不再接受英军统帅部的指挥，而且命令卡特鲁将军接管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全部权力。

戴高乐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迫使英国人重新考虑问题，于是，在戴高乐限定的7月24号前，英国和自由法国代表又签了个“解释性协定”。其中规定自由法国人可与维希军队接触以争取他们，战争物资归自由法国，原定编入英军的维希部队改编进自由法国军队。还商定，维希当局如有违犯条款事宜，英法联军将采取联合行动。

戴高乐的强硬态度使他如愿以偿，他用显得粗暴的态度和做法迫使英国人尊重自由法国，也就是尊重法国的主权。他对利特尔顿显得傲慢无礼，他曾当面提醒利特尔顿，“八·七”协议只承认英军最高统帅部对自由法国军队的指挥权，决不可将这项特权扩大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他质问道：“有一天当我们在法国本土登陆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会提出最高统帅部的权力来要求统治法国呢？”就对个人来说，戴高乐的态度恶劣，可能伤害了某些英国人。丘吉尔对此大为不快，过去竭尽全力支持戴高乐的斯皮尔斯将军从此改变态度，成了戴高乐的对头。可这能全怨戴高乐的态度吗？

对圣让-达克停战协定，连英国人自己也觉得是伤害了戴高乐。斯皮尔斯承认，协定条款“绝对荒谬”，据他所知，国务大臣利特尔顿也对这个协定不满。利特尔顿后来回忆说：“当我仔细考虑这个停战协定的条款时，我承认，我们本应该给自由法国人应有的地位，但现在这种地位被剥夺了。”丘吉尔在8月7日给外交部的文件里说：“戴高乐无疑有理由愤怒……但是他当着利特尔顿先生和私下里说的那些放肆而仇视英国的话，实际上把一切都搞糟了。”这等于承认自己有错。事实是，戴高乐与利特尔顿的“解释性协定”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英国驻地地中海沿岸的军事当局借口不知道“解释性协定”，仍按原协定精神办事，结果，维希人员不管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18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482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179—180页。

引自《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19页。

同上书，第126页。

愿意不愿意，有 25000 人被送回法国本土，自由法国只招募到不足 7000 人。而且还发生了一些明显带有侮辱和蔑视性的事件，例如：英军指挥部征用自由法国代表团的办公楼，英国旗替换了三色旗；卡特鲁将军回他的总部时受到英军阻拦，总部的旗帜也被调换；英军司令威尔逊将军要掌握控制权，竟然威胁要单方面宣布戒严。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这些做法，都使戴高乐感到愤怒和疑心大增。他斥责这个地区所有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勾结起来侮辱法国，想取代法国。他认为英国有个“狂热的亲阿拉伯团体”，也在乘机排挤法国。他的愤怒使他的部属也感到担心，他们害怕与英国的关系会影响到自由法国的生存。但戴高乐不顾这些，在主权和生存问题上他认为是一致的，有必要迫使英国人尊重法国的主权。如果法兰西的主权不能维护，领土不能完整，就谈不上伟大，那他戴高乐单枪匹马干起来的事业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成为一个受人控制，被人宰割，跟在别人后头跑的附庸吗？但是，英国人对此表现出不理解，或者是他们故意表现出不理解。这种态度，使戴高乐更加难以容忍。还是从英国人针对他打的“小报告”里看看他的表现吧。1941 年 8 月 4 日，英国外交部收到驻布拉柴维尔使团的报告：

“戴高乐将军最近在这里表现出的反英情绪比平常更强烈

……他毫不掩饰地发表如下看法：

1. 对一位自由法国军官说：‘不要相信英国人……’

2. ‘英国军队中的多数官兵对自由法国事业不感兴趣，他们不可能估计到它的重要性。’

3. ‘其他的官员和政治家只不过是利用自由法国人，因而自由法国人应当十分注意他们自己的利益。’

4. 对叙利亚战役中的行动表示令人难堪的意见，说‘如果他（戴高乐）指挥作战，两个星期内就能全部解决战斗。’

5. ‘毕竟还存在希望。他，戴高乐的威望正在增大。也许正由于他的态度，而不是别的原因决定了韦弗尔将军调离。’

6. ‘美国人不久就会参战，自由法国人应该首先从他们那里期望得到援助。’

这最后一点似乎说明，在同英国人的关系处于紧张阶段时，戴高乐曾试图“改换门庭”，希望美国能替代英国，成为自由法国的主要依靠。1941 年 8 月 27 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登了该报记者乔治·韦勒月初对戴高乐的采访内容。尽管戴高乐一再声辩谈话内容被歪曲扩大了，但没有否定基本事实。他在谈话中，谴责英国同德国一样都在利用维希政府，这是一种互惠交易，只要这两个敌对大国还能从利用维希政府中得到好处，维希政府就将存在下去。他还公开表示，愿意向美国海军提供非洲的港口作为作战基地——

据艾登回忆：“虽然在我们这方面一致认为自由法国应当接管这个国家的政治控制权，但首相和我坚持认为，不应使阿拉伯人感到他们只是从这帮法国主子换到了另一帮法国主子手里”。见《艾登回忆录·清算》（上），第 439 页。

引自《戴高乐与丘吉尔》，第 127 页。

这从另一个渠道表明，戴高乐确实在试探发展同美国关系的可能。

戴高乐相信，战事的发展一定会把美国卷进来，最终他不可能不同美国打交道。他这时认为，加强同美国的关系能够牵制英国，使它起一种平衡作用。1941年5月，他将最早投奔他的勒内·普利文派往美国，试图在美国为自由法国打开局面。但是，戴高乐估计错了。美国不仅对戴高乐本人有看法，而且更糟糕的是，远隔重洋的美国政府要员一直对维希政府抱有幻想，他们一直打算从维希政府中物色一位比戴高乐更有“影响”的人物，以便争取说服维希政府倒向盟国。这一点，罗斯福与丘吉尔认识上是有差距的，因为英国早就放弃了对维希政府的幻想，丘吉尔已经相信，只有戴高乐才能团结所有法国人战斗到胜利。因此，他们与戴高乐的矛盾和冲突，是在与戴高乐并肩战斗到底这个前提下发生的。这种差别，使丘吉尔在后来戴高乐与美国的关系中，经常处于一种微妙地位。

普利文在美国费尽心机，终于组成了自由法国代表团，并在意大利同美国断交后留下的使馆里租下了办公用房。自由法国代表团虽然有了落脚之地，但在美国政府眼中它没有正式外交地位，普利文不能以自由法国全权代表身份与美国谈判问题。直到7月份，美国才同意自由法国通过英国实施租借法案的有关条款，但这限于秘密进行，因为美国怕维希政府抗议。9、10月份，美国决定派一个代表团赴自由法国属下的非洲地区，考察未来战争可以提供的各种可能条件。代表团在非洲各地受到自由法国人的热情接待。代表团负责人坎宁安中校经过实地考察，深受鼓舞，多次动情地建议国务院最大限度地支持戴高乐，但反遭国务卿赫尔的多次训斥，后被勒令回国。11月，罗斯福宣布“保卫自由法国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对保卫美国至关重要”。后来，由于维希政府加紧了与希特勒的合作，并从非洲召回了美国曾想争取的魏刚，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下与自由法国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驻伦敦各流亡政府大使德雷塞尔·比德尔，奉命同自由法国建立正常关系，但不属于外交承认。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但是，美国仍没有将与自己的敌人作战的自由法国当成盟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西半球上的两个法属岛屿，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罗斯福的美国爆发了公开争吵，几乎酿成武装冲突。

还是在1940年7月17日，拉美国家在哈瓦那开会，发表哈瓦那声明。这次会议是在美国压力下召集的。声明宣称，为避免德国或由它控制的政府侵占美洲拥有的岛屿和领地，与会国一致反对以武力转让主权，即反对和不承认主权的任何改变。这项声明涉及到法属圭亚那、瓜德罗普、马提尼克以及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英属牙买加和加勒比，还有荷兰和丹麦的一些属地。戴高乐对哈瓦那声明非常敏感，因为他认为这意味着保证法属美洲领地中立化，等于剥夺了自由法国在这些属地的控制权。10月27日，他曾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提醒美国不得以任何借口单方面以武力强占这些殖民地，那将是对法国的侮辱，除非与自由法国合作。美国当然对此不屑一顾。

1941年3月和5月，戴高乐曾两次征询远征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的意见。12月初，海军中将穆兹利埃奉戴高乐之命，率领一支不大的舰队赶赴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24—125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1卷，第227—228页。

加拿大，说是视察自由法国的海军基地，实则主要任务是伺机夺取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这项行动是经过丘吉尔征求了英国三军参谋长意见之后同意的。罗斯福从英国那里知道消息后坚决反对，他主张改由加拿大人在这两个岛上采取行动。（但是加拿大政府不想代替自由法国，因为在加拿大的所有法国人几乎全部支持戴高乐，反对维希政府。）戴高乐知道这一消息立即表示抗议，他认为“这是一个外国干涉法国领土的问题”，所以立即命令穆兹利埃中将采取行动，在圣诞节不放一枪夺取了这两个岛，由于90%以上居民支持自由法国，很快就实行了选举。

美国对此大为光火。国务卿赫尔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要丘吉尔和罗斯福签字，逼迫自由法国撤出这两个岛，但是丘吉尔拒绝签字。赫尔以辞职相威胁，罗斯福向丘吉尔施加压力。美国人认为英国私下同意这项行动，对美国耍两面手法。丘吉尔处于两难境地，他只好劝戴高乐接受美国的最后方案：在美、英、加三国共管下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实行中立化和非军事化。丘吉尔通过艾登告诉戴高乐：如果不听，造成不幸后果，概不过问。艾登对戴高乐说，美国打算派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前往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他问戴高乐：“到那时，您怎么办？”戴高乐回答：“盟国舰只将停泊在法国领海范围之外，美国海军将领将与穆兹利埃共进午餐，他一定会感到荣幸。”“假若军舰越过了领海呢？”“我们的人会按照惯例要求他们停止前进。”“假如他们还是往前开呢？”“这就会产生极大不幸，因为到那时，我们的人就会不得不开火。”艾登惊讶得举起了双手。当然，谁也没有开火。既成事实，谁也不能因为这两个岛而冒内讧的危险，因为戴高乐还是相信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奇怪的是，被戴高乐一直视为“极权国家”的苏联，同自由法国的关系发展得却比美国快一些。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戴高乐同丘吉尔一样，很快就作出了反应。他指示立即同苏驻英大使伊凡·麦斯基接触，表示自由法国全力支持苏联，希望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如同一年前希望英国做的那样，戴高乐询问麦斯基，莫斯科是否愿意公开声明承认自由法国，声明愿意恢复法兰西的独立、伟大和完整。9月26日，麦斯基致函戴高乐，声明苏联政府承认戴高乐的领导地位，愿意同法兰西国防务委员会建立关系，保证在战后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但同英国一样没有提到“领土完整”）。不久，苏联同维希政府绝交，驻维希大使鲍格莫洛夫改任驻英各流亡政府大使，也就成了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打交道的正式代表。戴高乐还将自由法国战斗机中队派往苏联作战，并多次表示要将步兵师调往苏德

战场。戴高乐希望，他与苏联的接近有助于牵制美英对他的冷淡，有朝一日可作为同美英讨价还价的筹码。1942年5月24日，戴高乐同赴伦敦访问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长谈，两人就敦促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和支持法兰西的统一达成协议。看来，尽管戴高乐从困境中的苏联难以获得物质支持，但从苏联获得的道义支持却比从英美获得的更令他满意。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莫洛托夫对他说的话：“我的政府是伦敦和华盛顿的盟友。为了战争，我们和它们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50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1卷，第232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508页。

紧密合作，是完全必要的。但俄国愿意和法国结成一个独立的联盟。”这个“独立的联盟”，从此就印在戴高乐的脑海里。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里，每当他同自己的西方盟友关系紧张时，这个“独立的联盟”就成了他手中一张平衡关系的王牌。

1941年底和1942年春，是盟国军队在整个战争中最艰苦的阶段。苏德战场上，苏联军队经过顽强抗击几个月，取得了莫斯科会战的胜利。但是，德军很快在南方组织了夏季攻势，由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失陷，使苏联的农产品供应成为严重问题。在非洲战场，因德军兵力抽调苏德战场，盟军压力减轻，英军曾攻入利比亚。但当隆美尔援军到后，又向盟军发动了强大攻势，一直挺进到距亚历山大仅70英里的阿拉曼。在亚洲战场，仅在半年内，日军就占领了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屿。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经历了最艰苦的阶段。这种严峻的战争形势，客观上要求反法西斯战争的参加国相互支持，紧密合作，克服困难，去争取共同胜利。英国军队在这一段时间里受挫严重。1941年12月，英海军最大的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巡洋舰“击退号”遭日军飞机袭击沉没；1942年2月，7万多名英军在新加坡投降日军；6月，隆美尔突破英军防线进逼亚历山大，驻防多布鲁克的3万多名英军投降德军。因此，从本意来说英国也不愿同戴高乐的关系搞僵，丘吉尔还需要自由法国在非洲、中东和亚洲的合作。但是，美国已直接卷入战争，英国对美国的期望当然远甚于自由法国。在这种情况下，除去丘吉尔同戴高乐之间因利益问题引起的冲突外，每当罗斯福同戴高乐之间关系紧张时，丘吉尔只有支持罗斯福。戴高乐认为，虽然丘吉尔“内心里不承认自由法国的独立”，但最主要的是，“这位首相给自己订了一条规则，那就是不取得罗斯福的同意，不能办任何重要的事情”，“因为罗斯福对戴高乐将军表示不信任，所以丘吉尔也就有所保留”。

1942年5月5日凌晨，戴高乐得到消息，英国军队未经他同意采取了攻占马达加斯加的“装甲舰”行动。从维希军队手中夺取马达加斯加，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心理上对戴高乐都有重要意义，他曾两次建议英国政府协助行动。现在，英国人却在“自由法国参与行动可能激起维希军队更顽强的抵抗”这个借口下，背着戴高乐单独行动。戴高乐警告艾登：“你们仅仅部分地支持我们，美国人则尽其所能损害我们，你们都在阻止我们发展壮大。如果目前的情况再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散伙。”他还对丘吉尔说：“目前的战争不是殖民战争。这是一场道德的战争，一场世界大战。对大不列颠来说，没有一块殖民地——尽管它无限美好——是能与法国友谊相比的。”

7月份，戴高乐将“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此时，经过让·穆兰等人的努力，他已经获得了国内主要抵抗运动组织的支持。当马达加斯加问题还未结束的时候，关于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举行选举和军队指挥权问题，使戴高乐同丘吉尔的紧张关系火上加油。英国人为了加强自己在中东的地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211页。请注意：引文中的“俄国”（Russie）不会出自莫洛托夫之口，他应该说“苏联”（Unionsoviétique），“俄国”是戴高乐通常对“苏联”的称呼。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上），第214页。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57—159页。

位，竭力主张叙利亚和黎巴嫩仿效埃及立即进行选举，并不放弃英军在该地的指挥权。戴高乐早已指示卡特鲁将军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成立了政府，任命了总统，他认为现在没有举行选举的必要，英国不能强加干涉。他还指出，“我不能明白，如果法国的部队已占多数，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在叙利亚担当军事指挥。”丘吉尔明确表示：“英国不能把指挥权转交给法国人……”。

当然，围绕着法属殖民地的争夺远没有完结，它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之后。在这场争夺中，戴高乐谴责英美“殖民主义的野心”，并以维护法兰西的独立、完整和伟大“据理力争”。实质上，争夺的几方在战争环境下，除去因战略上需要占据这些地方以外，都在考虑战后这些殖民地的归属和自己的利益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来说，就是重新划定边界与势力范围的手段。戴高乐谴责英美的“殖民主义的野心”，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在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呢？在戴高乐的思想中，法属殖民地是法国“光荣历史”的一部分，是法兰西独立、完整和伟大的标志之一。童年开始，他就不断地因这些光荣标志深受感动。他因在殖民地的胜利而欢欣，也因在殖民地的受挫而悲痛。今天，他认为自己在担负着拯救法兰西的重任时，如果有朝一日不能恢复一个独立、完整和伟大的法兰西，他将无法“向全法国交代”。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直到差不多20年后才发生变化。到那时，这种独立、完整和伟大的标志，成了戴高乐非卸下不可的重负。

谁代表法兰西？

1942年9月30日，戴高乐在普利文陪同下，与丘吉尔和艾登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这次会晤，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争吵。其中，有一段话是值得引证的。当戴高乐指责英国“使得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合作成为问题”时，丘吉尔指出：“是戴高乐将军和英国之间。”接着丘吉尔叫喊道：“您说您就是法兰西，您不是法兰西！我不承认您就是法兰西！”

戴高乐：“如果我不是法兰西，您为什么和我讨论这些问题？”

丘吉尔：“这一切都有书面记载。您不是法兰西。您是战斗法国！”

戴高乐：“那么您为什么和我讨论有关法国的问题？”

丘吉尔：“我们讨论的是当前战斗法国的作用以及各个战场的情况。”

戴高乐：“我以法国的名义行动。我和英国并肩作战，但不是为英国利益作战。我以法国的名义说话，我为法国负责。……法国人民确信我在为法国说话，只要他们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会长期支持我。”

丘吉尔：“我们的问题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代表法兰西的。我总是试图使自己有一个法国的概念。法国还存在其他部分和其他方面，它们可能更加重要。……”

根据这个记录，丘吉尔最后一句话说得比较含混，无法断定法国更加重要的“其他部分和其他方面”究竟指的什么。是指还有比戴高乐更加重要的人物呢，还是指还有比戴高乐更加重要的事情呢？从丘吉尔所说“我不承认您就是法兰西”来看，显然他还在动谁比戴高乐更合适的念头。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73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567页。《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75页。原文引自英国外交部谈话记录。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记载的丘吉尔这句话，却是比英国外交部的记录明确得多。戴高乐写道：丘吉尔激动地说：“法兰西！它在哪里？当然我承认戴高乐将军及其部属是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重要而又值得尊重的部分。但是毫无疑问，人们仍然可以在他们之外找到另一个政权，它也有它的价值。”戴高乐明白无误地用了“政权”（une autre autorité）这个字眼。

丘吉尔这时有这种念头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在法国投降初期，他虽然很钦佩戴高乐的勇气和胆识，但并不认为戴高乐就是代表法国的最佳人选。他一直在等待有一位身份比戴高乐高，影响比戴高乐大的人物来代表法国。卡特鲁将军初到伦敦，英国政府就作过这种试探。不过这种打算一直未能如愿。现在，戴高乐丝毫不肯让步的态度使丘吉尔怒火中烧，再加上美国对戴高乐的态度给丘吉尔的压力和影响，丘吉尔完全有可能重新萌动那当初的念头。但是，丘吉尔与戴高乐毕竟有了一段患难中产生的战斗友谊，何况今天的戴高乐与战斗法国，既不是当初孑然一身的戴高乐，也不是当初寄人篱下的自由法国了。利益和信义，理想和现实，使丘吉尔无法像罗斯福那样生硬地对待戴高乐。

随着战斗法国的声势越来越大，戴高乐在法国本土也赢得了抵抗运动的承认，为了配合下一步的大规模战略行动，美国对战斗法国的政策也不得作些调整。1942年5月21日，美国派驻伦敦的新大使约翰·怀南特拜会了戴高乐。随后，传出了美国可能要考虑对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态度的消息。7月9日，美国政府发表公报，只是承认自由法国是法国抗战力量的象征，而法国的政治前途将在自由和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决定。这就是说，在美国看来，戴高乐只是一位军事领袖，并不具有代表法国的政治地位。

为了争取旅居美国的法国人，为了消除美国驻维希大使李海和驻北非代表罗伯特·墨菲对自由法国和戴高乐造成的不良影响，戴高乐曾向美国派去过好几位“密使”。先到的阿德里安·蒂克西尔和埃马纽埃·达斯蒂埃，成效都不大，后来的安德列·菲利普也受到冷遇。

正当戴高乐竭力在捍卫自己的代表性的时候，一个更加无视戴高乐和战斗法国地位的英美联合战略行动已经逼进。

戴高乐早就在敦促英美尽快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前结束法国的苦难，二方面法国的抵抗力量势必就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立即投身解放国土的战斗，这对于巩固和提高戴高乐的地位是有益的。戴高乐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想法，与苏联的想法是一致的，为了减轻面临的压力和负担，苏联也在力促英美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但是英美的想法不一样。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它在亚洲战场已受到很大牵制，让它调集大军渡海跨洋到欧洲作战，确实有很多疑虑。而且权衡再三，一种先从北非登陆，然后再向欧洲大陆扩展的战略逐渐占了上风。至于英国，由于美国和苏联参战，它的压力已经减轻多了，它本能地希望拖延一段时间开辟第二战场，以争取时间恢复自己的力量，消耗德军的力量。

量。

从1942年4月起，戴高乐就在设计盟军在法国的布列塔尼或者诺曼底登陆的方案。7月27日，他在伦敦又会晤了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海军上将金，向他们陈述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的重要性。但此时美国人同英国人

已在准备确定北非登陆计划，他们对戴高乐所说“保持沉默”，“显得为难”。

7月底，英美终于作出决定，放弃在欧洲大陆登陆的设想，首先在北非登陆，制定了“火炬”行动计划。在罗斯福的主张下，这个行动计划必须对戴高乐和战斗法国严格保密。罗斯福一方面是因为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都认为戴高乐是个不可信赖的人；二方面他认为“火炬”计划需要维希政府的谅解和配合，保持同维希的关系，北非登陆可能就比较顺利。由于这次行动的主角是罗斯福，主力是美国军队，丘吉尔尽管对罗斯福寄希望于维希有点担心，但还是下令绝不许战斗法国获悉这个计划。

但是，戴高乐从各种迹象中已经断定，英美已经决定瞒着他实施北非行动计划。他感到十分悲愤。他谴责英美的自私自利，特别是美国借口法国人有选择政府的自由，极力同戴高乐保持距离，与维希保持关系，并寄希望于维希分子能同盟军合作。所有这些，戴高乐认为使人无法相信美国人的诚意。

在罗斯福的手里，他拿着好几位可供选择的法国重要人物的名单，其中有亨利·吉罗上将，还有魏刚，甚至还有在维希任职的达尔朗，而戴高乐是排不上号的。

吉罗将军曾是戴高乐的上级，但他没有能及早地站出来坚持抗战，而是一度追随贝当。他曾遭德国人逮捕，1942年4月越狱逃到瑞士，后回到法国与贝当有过接触。美国人最初是希望魏刚将军能够出山，罗斯福的特使罗伯特·墨菲在达喀尔与魏刚进行过会晤，后来又通过吉罗与魏刚接触，期望魏刚能出面领导法国人反对德国人。但是魏刚对墨菲说：“我已过了当叛逆者的年龄了”。达尔朗上将现在是维希政府的“外交部长”，名声太臭，非到特别时刻不能考虑。于是，吉罗就成了罗斯福的最佳人选。吉罗同墨菲谈定，同意参加“火炬”行动，条件是戴高乐与英国人应该排除在外，而且他要有指挥权。美国人同意了他的要求（实际上除了排斥戴高乐之外，别的允诺均是含糊其辞）。罗斯福相信，吉罗能为“火炬”行动打开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大门，使在北非的所有法国人（包括维希当局）能同盟军合作。

“火炬”行动定在11月8日。按照丘吉尔的想法，应该在登陆前一天通知戴高乐，但遭到罗斯福的断然拒绝。7日晚，在苏联大使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晚会上，勒内·普利文得悉了即将行动的消息。这样，戴高乐知道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马上就要在法国的北非属地登陆。刚过半夜，丘吉尔的私人参谋长伊斯梅将军通知戴高乐的私人参谋长比约特上校：“再过三个钟头，登陆开始，……”。8日早晨6点钟，比约特将这正式通知告诉戴高乐，戴高乐穿着睡衣脸色苍白地吼道：“我希望维希方面的人把他们赶到海里去！他们总不能打洞破墙进法国吧！”当然，这种气话不会出现在他的回忆录中。

罗斯福没有预料到，在贝当的命令下，维希守军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且此时执掌军政大权的达尔朗上将恰好探望儿子也在阿尔及尔，吉罗将军却因为没当成指挥官而拖延到达时间。美国认准了达尔朗的份量，一桩交易成功：美国同意达尔朗以贝当元帅的“名义”在北非执政，条件是达尔朗命令维希驻北非军队全面停火。达尔朗成了代表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82页。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83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607页。

贝当元帅的“北非高级专员”。北非的维希官员，另外还包括被授予法军总司令职的吉罗将军，都承认了达尔朗的地位。

达尔朗在北非执政的消息，不仅使戴高乐，而且令丘吉尔也难以忍受。

达尔朗在维希政府中任外交部长，他同德国人公开勾结合作，他允许德国人利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他允许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突尼斯收集给养，他将印度支那丢给了日本人，他公开认为德国人比英国人大方得多。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通敌分子、卖国贼。所以，连丘吉尔也大声喊道：“达尔朗应该枪毙！”英国舆论界到处是抗议声，议会是一片哗然，好几位内阁大臣公开反对罗斯福的北非政策，艾登就是其中之一，在伦敦的欧洲各国流亡政府严厉谴责，在敌占区，这个消息在抵抗运动中的反响如同是扔了一枚炸弹。在美国也激起了公愤。

罗斯福只好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这是为了战争而采取的“权宜之计”。11月23日，罗斯福在华盛顿接见了戴高乐的代表安德列·菲利普。罗斯福在谈话中表示：欢迎戴高乐到华盛顿来讨论世界形势，他理解戴高乐拒绝派代表团去阿尔及尔同吉罗商谈——因为吉罗是达尔朗任命的总司令。罗斯福明确指出，任命达尔朗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他的政策是“到整个法国解放时，只有美国政府能决定哪一位法国人能够掌管被解放的领土”。法国人当即表示抗议，声明法国所有抵抗运动只承认戴高乐将军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外国占领它的一寸领土”。罗斯福回答：“而我，我不是威尔逊那样的理想主义者，首先我想到的是效率，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凡是愿意帮助我的人都将受到欢迎。今天达尔朗交给我阿尔及尔，我高呼：达尔朗万岁！要是吉斯林交给我奥斯陆，我就高呼：吉斯林万岁！……如果明天赖伐尔交给我巴黎，我就高呼：赖伐尔万岁！”

丘吉尔不能失去罗斯福的支持与合作，因此，他也只能不顾所有反对者的意见，赞同罗斯福为了军事目的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不过他总觉得对戴高乐欠了点什么，为了减轻对戴高乐的“侮辱”，丘吉尔决定将马达加斯加岛交给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管理，并坚持应当邀请戴高乐赴阿尔及尔共同议事。

圣诞节前夕，达尔朗遭暗杀。几乎所有人，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吉罗，等等，都公开谴责这次暗杀行动，但又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中为达尔朗死去感到欣慰。罗斯福和丘吉尔很快摆脱了“权宜之计”招引的尴尬境地，戴高乐和吉罗都庆幸少了个竞争对手。

戴高乐很清楚，在美国人那里他还是排不上号的，吉罗肯定要继达尔朗之后在北非上台。因为美国人最早看中的就是吉罗，只是因为达尔朗恰好出现在北非，才使吉罗屈居其后。吉罗不像达尔朗与德国人有勾结，他是一位职业军人，而且是一位不大过问、或者说不大懂政治的将军，他同戴高乐的战斗法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些，都适合美国人的口味。特别是不过问政治，这就更有利于美国施加影响。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88页。

《戴高乐与罗斯福》，第166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545页。在《战争回忆录》中戴高乐说的有区别。见中文本第2卷（上），第50页。

戴高乐估计到完全绕过吉罗在当前形势下有困难，因此，他主动向吉罗提出会谈，商议在一个临时中央政权下如何统一法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但条件是会谈必须是在“法国领土上”。戴高乐在达尔朗被暗杀的第二天就给吉罗发出电报。但是，吉罗先是以因暗杀事件局势不稳推托，继而又以“紧急任务”和“已定好的约会”为由“不能有空闲时间”拖延。

戴高乐应邀原定12月26日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只因天气不好未能启程，但第二天就收到希望推迟这次访问的通知。同一天，丘吉尔还对戴高乐说：即使华盛顿把整个北非交给吉罗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要反对美国的政策。

戴高乐感觉到美国、英国和吉罗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意在将战斗法国从北非排挤出去。戴高乐对美、英和吉罗都已不抱幻想，他求助于舆论。他在伦敦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发表公报，表明急于同吉罗商谈的紧迫性，暗示吉罗有意拖延会晤，是罗斯福与丘吉尔从中作梗。

戴高乐的舆论攻势收到了效果，在大西洋两岸激起了一股浪潮，表示了对戴高乐及其战斗法国的同情以及对罗斯福北非政策给法国人带来的混乱的谴责。事实上，1943年1月份的北非，的确如戴高乐所说“混乱局势日趋严重”。在北非，几乎所有维希政府的官员都官复原职，维希的法律继续生效，仍然保持着与维希政府的所有通信联系，通敌分子耀武扬威，戴高乐派却被投入监狱。英国舆论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报界公开抗议，批评英国政府容忍这种现状并袒护美国的北非政策。

丘吉尔考虑到舆论压力以及他对戴高乐的友情和承诺，决定劝说罗斯福，促成戴高乐与吉罗的会晤。1月8日，艾登召见美国代办说道：“我们在法国的所有事务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可能使法国人联合起来，以便让他们参加反轴心国的斗争。并不是我们对戴高乐有特别的好感，我们更不会坚持，法国各派联合后一定要由他领导。无论是由自由法国人还是北非法国人来指定领袖，我们都会乐于接受。除此之外，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让报界不要过分宣扬这件事……但这不是容易办到的。英国人民既不喜欢达尔朗，也不喜欢维希，政府对这种思想状态无能为力。处理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既定政策取得一致意见，以便彻底解决无章可循的法国问题。”

盟军北非登陆之后，整个战争局势已出现了转机。不管怎样，美国军队踏上非洲以后，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它的另一只脚即将踏上欧洲。1942年11月，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国第8军突破了隆美尔的防线，打通了进逼的黎波里的道路。1943年1月，第8军攻占的黎波里，并追击敌军进入突尼斯。在苏德战场，历时半年之久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已进入反攻阶段。1943年1月，解除了列宁格勒历时17个月的围困。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33万德军只剩下了8万之众。欧洲战场的局势已到了转折关头，德国军队总溃败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罗斯福和丘吉尔感到，英美联军在欧洲大陆的行动不能再拖下去了。决定商讨下一步的战略行动。

1943年1月17-27日，英美首脑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会晤。在会前，由于丘吉尔一再陈述非洲局势对未来战略行动的重要性，需要采取行动稳定

见《戴高乐与罗斯福》，第179页；《戴高乐与丘吉尔》，第199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2卷（下），第439页。

引自《戴高乐与丘吉尔》，第200-201页。

局势，罗斯福同意，将吉罗和戴高乐一起邀到卡萨布兰卡他的驻地安法会晤。

戴高乐起先拒绝了这种邀请。使他不快的是，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出面邀请吉罗和他在法国的属地上讨论法国的事情，而且他和吉罗都会被看成是不能代表法兰西、不能决定法国事务的两匹“小马”，所有的事情都将听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安排。但是，在丘吉尔带有威胁性的再次电邀后，戴高乐感到“大战的形势和法国目前的处境，不容许我拒绝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王陛下的首相举行会谈”，他接受了邀请。

1943年1月22日，戴高乐来到卡萨布兰卡。一切都由罗斯福安排好了。在这块属于法国的领地上，戴高乐和吉罗的住地由美国兵守卫，四周已被弄成开阔地，铁丝网围成一圈，任何人不得自由出入，连日常生活也由美国人料理。戴高乐认为这是“软禁”，感到受到了侮辱。他一见到吉罗就讥讽道：“哎，怎么回事！我四次向您建议进行会谈，您怎么叫我在铁丝网里，在外国人中间与您会谈？从国家观念上考虑，您不感到这很令人难堪吗？”

罗斯福尽管对戴高乐心怀芥蒂，但由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于战斗法国与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实质上已连成一体，也由于戴高乐丝毫不肯退让的顽强态度，不得不将戴高乐的战斗法国当成一股实力来认真对待。他将吉罗比喻成“新郎”，将戴高乐比喻成“新娘”，与丘吉尔商定，要演出一场“强迫婚姻”的政治剧。

罗斯福和丘吉尔策划，法国人成立一个委员会，由吉罗和戴高乐分别担任主席，当然，由于吉罗应该掌握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毫无疑问是第一主席，戴高乐屈居第二。为了使戴高乐减少疑虑乐于接受，丘吉尔还提出“我的朋友乔治将军可以第三主席的名义来辅助”戴高乐，他还现身说法，说自己组阁后曾把那些著名的慕尼黑分子请进内阁。

戴高乐到达的当晚，罗斯福接待了戴高乐。罗斯福对戴高乐说，他不能承认戴高乐的组织，因为它不是“选举产生的”。罗斯福称“任何被选中执政的人都没有权利称自己代表法兰西的主权。……目前，是在法国领土上作战的盟国为了解放法国在行使这个主权，也可以说是为了法国人民的利益在行使政治托管权”。

戴高乐不仅没有把吉罗放在眼里，也没有将罗斯福和丘吉尔放在眼里。他可以因罗斯福的请求，同吉罗一起与罗斯福、丘吉尔合影，供罗斯福缓解新闻舆论给他带来的压力，但决不承认他们有任何资格可以决定“法兰西帝国的权力问题”。他表示战斗法国不能容忍盟国对它的排挤和“溺死”它的图谋，“如果战斗法国必须灭亡的话，它也愿意光荣地牺牲”。在戴高乐看来，法国将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站起来，这与罗斯福的意旨不相符，但是罗斯福的意旨不可能代替法兰西民族的选择。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强迫婚姻”失败了。

1943年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支持戴高乐关于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主张该执委会由戴高乐一人任主席，吉罗为总司令，法国军队归属委员会领导。戴高乐将以执委会主席身份前往阿尔及尔。5月15日，让·穆兰成功地成立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宣布各抵抗运动一致拥护戴高乐，“法兰西人民永远也不同意戴高乐将军隶属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2卷，第94页。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212页。

于吉罗将军之下”，支持尽快在阿尔及尔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这份由让·穆兰从巴黎发来的电报，“传到了阿尔及尔，并且由美国、英国、自由法国的无线电台加以广播，这就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

吉罗不得不承认现实，他邀请戴高乐前往阿尔及尔“一起组织一个法国的中央权力机构”。戴高乐要结束“流亡”生活了，他将要把自己一直视为政权的战斗法国总部迁往阿尔及尔，在法国的属地上行使自己的权力。

5月30日，戴高乐到达阿尔及尔。6月3日，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吉罗不得不让步，同意撤去布瓦松、佩鲁东和诺盖斯三个与维希有关的总督职务，组成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七人组成，戴高乐与吉罗共同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被认为就是法国的中央政权，它执行最高权力，并在全世界保证管理和维护法国的利益，所有法国的军事力量都由它领导。

戴高乐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为了取得最后胜利，他必须忍耐这种“双头领导”的现实，他相信最后结局会按他的意志实现的。因为只要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得到承认，那不管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就说明戴高乐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实际上也就等于那些说他不代表法兰西的人只好默认他现在代表法兰西。虽然目前是同吉罗一起。

看到吉罗的地位摇摇欲坠，美国赶紧出面。艾森豪威尔以盟军驻北非总司令的身份，要求戴高乐从军事利益角度出发，维护吉罗的地位和权力，提出“特别是吉罗将军，必须保持现有的权力和职位，并仍由他保留处理军队、交通、港口和飞机场的全权。应该由他一个人来同我商讨北非的一切军事问题”。艾森豪威尔还以美英两国政府的名义威胁戴高乐，如果不答应，将停止一切军火供应。

戴高乐胸有成竹。他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美英的威胁已不像以前那样对他影响重大了。英美的舆论已大大有利于戴高乐，法国的抵抗运动已宣布服从戴高乐，战斗法国的兵力已达8万人，他们在赤道非洲，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已扎下根，而且他属下还有一支力量不大但颇有影响的海军和空军，在北非，吉罗的军队甚至成团成团地归属戴高乐。美英两国政府已经不可能完全摆脱战斗法国了，戴高乐更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拿民族利益去做交易。

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你刚才提到你对美英政府承担着自己的义务。难道你不知道我对法国也负有自己的责任吗？因此，我不能允许任何外国来干涉法国执行自己的权力。”他还问道：“你是个军人，你认为一个领袖依靠某个外国的恩赐，就能维持他的权威吗？”

7月份，感到势单力孤的吉罗动身前往美国、加拿大，试图得到支持。但是，吉罗已给公众留下了不宜作为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印象，他只是一位军人。当他月底回到阿尔及尔时，戴高乐充分地发挥了他和吉罗各自的“长处”：吉罗还担任总司令，但是这个总司令要从属于一个戴高乐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双头领导”实际上已是“单头领导”。

8月26日，美、英、苏三国以不同的措辞宣布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美国只承认它对归属的海外领地有管理权，英国还承认它指挥法国军事力量的权力，苏联承认它是唯一的领导机构和代表。9月17日，戴高乐决定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2卷（上），第106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2卷（上），第120 - 121页。

召开协商（咨询）会议，使它成为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临时议会。会议代表中40名来自国内抵抗运动，加上各地支持戴高乐的力量，吉罗已明显居于下风。在戴高乐提议下，10月3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共同签署命令，规定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职权，今后，委员会只有一名主席。

11月3日，阿尔及尔协商会议开幕。随后，戴高乐改组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完全排斥了吉罗。

吉罗完全失败了。吉罗的失败，对吉罗本人来说，只不过证明他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代表法兰西。吉罗从始至终考虑的只不过是当他的总司令，如何能够指挥法国的武装力量，他既没有代表法兰西民族的思想，也没有代表法兰西民族的胸怀，更没有代表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能力，这后一点，是连罗斯福也不否认的。罗斯福极力扶植这样一个政治上有欠缺的人物，其用心当然是可以提出疑问的。罗斯福的失算在于，他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希望能由吉罗这样的人物来治理法国。因此他本能地对戴高乐那种处处以法兰西化身自居、不肯俯首屈就的态度反感，反而抹杀了戴高乐身上那些本已存在，业已发光的民族气节。一个受苦受难的民族，一个备受奴役的国家，决不可能无声无息地甘受苦难和奴役，它必定要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反抗力量，也势必要涌现出自己民族的代表人物。戴高乐从法国溃败之日起就已经树立了自己的形象，他通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在千百万法兰西人中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形象。但是，罗斯福不愿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实质上，这等于他不愿承认三年来千百万法兰西人坚持抗战的成果。他想的是，法国的最终解放有待于美国的最后帮助，法国的复兴与治理也有待于美国的帮助。他不能接受这个自称代表法兰西，又想将来治理法兰西的戴高乐。但是，民族解放和国家权力的行使，毕竟是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任何外来力量可以施加影响，但终不可取而代之。罗斯福的做法，从根本上来说，违背了法兰西民族的意志。尽管他还要继续怀疑戴高乐的地位，但终不能改变历史的承认。

第四章

胜利与法国

进入 1944 年，胜利的曙光已冲破阴霾透入了欧洲大陆。越是接近胜利，戴高乐为争取战后法国地位的斗争就越加艰难激烈。这场斗争的对手，在戴高乐眼中已不是希特勒，也不是维希政府，更不是那些临近胜利也在窥伺他手中权力的某些法国同胞，而是他在战争中结盟的罗斯福和丘吉尔。

自 1942 年 11 月北非登陆的“火炬”行动开始，英美盟国有关战争的重大战略决策，多数情况下都将戴高乐及战斗法国排斥在外。1943 年 7 月 10 日，英美联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登陆，没有邀请战斗法国的军队参加战斗。罗斯福和丘吉尔更不愿意戴高乐参与解决战后意大利问题。墨索里尼下台后，戴高乐随即发表声明，指出处理意大利问题，“没有法国参加是不能生效的”，他肯定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承担的义务和应享有的权利。”9 月 27 日，戴高乐收到了意大利停战协议文本，紧接着，在莫斯科召开了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外长会议，战斗法国仍然没有受到邀请。戴高乐向美国人表示，如果要将德国人从意大利赶出去，盟国离不开法国的帮助，他乐意提供方便，但在意大利问题上战斗法国应有平等的发言权。

11 月中旬，在戴高乐的坚持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被邀请参加就意大利问题组成的盟国协商委员会。盟国的这种让步，并不标志他们改变了对戴高乐的看法，而是为了下一步更大的排斥先缓和一下紧张关系。

在决策会议之外

1943 年 5 月底，去阿尔及尔之前戴高乐向艾登告别时，艾登曾说：“您知道，您给我们带来的困难比所有欧洲盟国给我们带来的困难都大吗？”戴高乐笑着答道：“这我相信。法国是个大国嘛。”

“法国是个大国”，这是戴高乐心目中的法兰西。他也知道，这时的法兰西已远不及他儿时无限崇敬和无限热爱的法兰西了。这些年来，在一些缺乏远见、不负责任甚至苟且偷安的政客们的把持下，法兰西逐渐失去了它大国的风貌。先是面对强敌委屈求全，接着是兵败停战投降，继而是法奸、通敌分子与敌勾结共同蹂躏法兰西。在世人眼里，法国已不是个大国了。但是，相信法兰西精神永恒的戴高乐，坚持认为，既然有人可以使法兰西失去光彩，他也必定能使法兰西恢复光彩。他要不遗余力地为争取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斗争。不过，戴高乐无法历史地、唯物地看待因战争屡遭削弱的法国，他对法国的期望，已超出了新的历史条件给法国划定的大框框。因此，尽管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而客观现实往往不能给他满意的答复。

1943 年 11 月 22 - 26 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前往德黑兰途中，先与蒋介石在开罗会晤，并于 12 月 1 日发表开罗宣言，会议主要商讨了联合对日作战的计划。由于开罗宣言涉及“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从它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戴高乐当然认为这次会议与法国有关，因为法兰西帝国隶属的大部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 1 卷，法国普隆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331 - 332 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 2 卷，第 123 页。

分海外领地已归顺战斗法国，服从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而只有印度支那这一片较大的领地，仍然在日本人占领之下。可是，盟国却无视这一点，并没有邀请戴高乐去商讨从印度支那驱逐日本占领军的问题。不过，比起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来，对戴高乐自尊的这点伤害算不了什么。

11月27日，罗斯福同丘吉尔直赴德黑兰，同斯大林一起举行美、英、苏三大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排斥戴高乐，显然，是有意将法国拒在大国之外。德黑兰会议从11月28日开到12月1日，三巨头不仅讨论了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包括开辟第二战场等重大战略计划，而且就战后和平与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斯大林谈到戴高乐的政治行动，认为它同实体的法国没有联系，而实体的法国因为在战争中的态度应该受到惩罚，他觉得戴高乐看起来像个大国首脑，实际上没有真正掌握什么权力。他主张将来法国不应当再回到印度支那去。罗斯福“百分之百”地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当然，戴高乐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只能是对没被邀请表示不满，他说道：“我们却完全被排斥在这次会议之外，丘吉尔从法属北非的天空，罗斯福通过我们的海峡到开罗和德黑兰去，都避免同我们接触。”

1945年2月4-11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克里米亚）举行了被称为战时最重要的一次三国首脑会议。这时，德黑兰会议过后已一年，法西斯德国崩溃在即，戴高乐已回到解放后的国土半年之久，盟国也相继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戴高乐访问了莫斯科并签署了一项法苏条约。戴高乐在法国的地位看来已确定无疑，但是，法国在大国范围内仍然没有份。

法国不仅没有被邀参加雅尔塔会议，而且没有获得过外交方面的任何通知，戴高乐只是从英美报纸透露的消息上知道会议即将举行。

雅尔塔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关于对战后德国实行占领和管制，以及成立联合国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由于英国考虑到今后在欧洲需要法国的支持和合作，竭力坚持考虑法国的利益问题。于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法国为占领国之一并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但这并不能平息戴高乐未能参加会议的愤怒。因为事实摆在他的面前，在决定未来的问题时，盟国已经不可能撇开他了，他们必须在法国人参加的情况下才能执行决定。正因为这种明知离不开他，却又不让他参与决策，只是当个执行者的做法，使戴高乐大为光火。戴高乐认为，在三大国中只有一个人反对他参加，既不是丘吉尔，也不是斯大林，只有罗斯福才会坚决拒绝他出席。戴高乐要求在胜利来临之后，法国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参与决定战后重大国际事务，特别是参与决定处置德国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1943年11月3日，在阿尔及尔协商会议的开幕式上，他说道：“法国深刻地感到无视它的权利和地位，首先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然后是一个重大错误。”他重申了法国要从战争血泊中做一个大国的决心，表示法国必须重新承担自己的重大国际责任。他明确指出：“法兰西认为，处理欧洲一切事务和所有的世界大事，没有法国参加就不会有圆满结果。”1944年9月12日，在刚解放不久的巴黎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他再次表示：“我们愿意相信，法国参加结束大战和处理战后问题的权利终将得到承认，法国在对外事务中遭到的那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2卷，第239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1卷，第359页。

种公然排斥，也将以恢复我国几世纪以来和其他大国一向保持着的正常来往而告结束……我们相信，在安排德国命运的时候，如果没有法国参加，那就不能就任何条款和规定进行讨论或通过……在决定任何有关欧洲的问题时，如果没有法国参加，那都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对于战后与全世界人民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就作出决定，那都是冒险行为，因为无论怎么说，还有1亿人口生活在我们的旗帜下……人类的任何重大事业，如果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都将是非法的，因而也是不稳固的。”

戴高乐的口气很大，心劲很足，但毕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大国首脑不仅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决定了世界大事，而且还决定了与法国未来有密切关系的德国问题。戴高乐除了表示不满和提出抗议之外，他只好接受现实，因为盟国毕竟同意法国参加占领德国，并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战斗中恢复政权

戴高乐有个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法国的武装力量，必须参加解放法国领土的战斗。因为他认为：“无论法兰西联邦的国家和人民，或者盟国，都不会容许我们在世界大战中根本未经参战的地区恢复政权。”因此，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直接参战的机会。

进入1944年，戴高乐已拥有近40万人的军队，加上国内游击队改编的“内地军”差不多20万人，这已是一股可观的武装力量。在过去的一年，在意大利战役中，法国投入了三个师的兵力，法国在没有盟军参战的情况下，独自解放了科西嘉岛，这还不包括在北非和中东的军事行动。不过，戴高乐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武装力量投入到解放国土，特别是解放巴黎的战斗中去。

1943年9月18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备忘录的形式通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指出法国陆海空军的主力应该直接参与法国的解放事业，它要提供部队参加法国南方和北方的战役，特别是“至少必须有一个法国装甲师及时地运往英国，以便保证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而且在欧战结束后，要派出远征军去远东，解放印度支那。年底，戴高乐向盟军重申了以上要求，并以此为条件满足增援在意大利作战的盟军，否则就要收回军队的使用权。

以“霸王”为代号的诺曼底登陆，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重要标志，登陆点是在法国国土上，因此也是法国战役的开始。它将意味着法国的解放要先于其他大陆国家一步，能否在这次战役中充分显示出法国自身的力量，对戴高乐来说，这不仅是个荣誉感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战后法国地位和前途的问题。因此，戴高乐极度关注这次行动。

但是，如同北非登陆的“火炬”行动一样，“霸王”行动的详情戴高乐也是一无所知。丘吉尔曾致电罗斯福，表示“我同意不应该让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得知‘霸王’计划的进行方式。”有关登陆的准备工作 and 行动日期，对戴高乐都将保密。不过，这毕竟是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大战役，没有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国内抵抗运动的配合，有可能严重加大盟军的损失。因

同上书，第473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2卷（上），第300页。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276页。

此，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经过精心策划，于登陆行动前一天，将戴高乐从阿尔及尔请到伦敦。尽管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详尽地介绍了登陆计划，后者还诚恳地就确定行动时间征求戴高乐的意见，但戴高乐认为一切已为时过晚，对于这种不让他事先参与策划的做法，他耿耿于怀一辈子。从此，他拒绝参加每年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纪念仪式。

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成功。在法国国内抵抗运动改编成的“内地军”配合下，解放法国的战斗进展很快。8月1日，勒克莱尔指挥的法国第二师从诺曼底登陆，按照预定计划，该师将首先进入巴黎。这是戴高乐力争后达成的协议，8月15日，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盟军又发动了代号为“铁砧”的登陆，法国第一军参加了登陆并向土伦和马塞运动。

巴黎人民也行动起来了，从8月12日起，工人、警察、居民、抵抗战士，纷纷起义。但是，艾森豪威尔却迟迟不下达进军巴黎的命令，理由是进攻会造成巨大损失和破坏。戴高乐却认为，既然巴黎人民已经行动，就应该立即进攻，否则损失会更大。他表示，如果艾森豪威尔不立即下令向巴黎进军，他就要自己命令法国第二装甲师向巴黎进军。

8月24日，勒克莱尔指挥部队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巴黎。

8月25日，戴高乐在沿途的欢呼声中从奥尔良门入城。

8月26日，巴黎举行仪式庆祝胜利，戴高乐在他的战友们陪同下，从凯旋门沿爱丽舍田园大街徐徐而下，步行走向圣母院大教堂。戴高乐以凯旋者的身份同200万巴黎人共庆胜利，他感叹道：“今天，是一个曾经沦为亡国奴、受尽压迫和摧残的民族，在欢欣鼓舞的景象和自由的气氛中重见天日”。

巴黎解放了，德国军队也正在法国其他地方被赶出去，在激动欢腾之中，戴高乐考虑得更多更远，他“深深感到应该完成一个远远超过自己能力的任务，充当决定国家命运的舵手”。

不过，戴高乐要真正在解放后的国土上行使自己的权力，还有待于克服来自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来自盟国的，另一方面是来自国内抵抗运动的不同政治势力。

胜利在望，但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盟国对戴高乐的地位还没有充分的估价。

1943年9月，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曾向华盛顿和伦敦建议，能否达成一个协议，在即将进行的法国战役中如何协调法国行政机构和盟军的合作。这个法国行政机构自然是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派出机构。但直到1944年春天，戴高乐也没有得到答复。

在罗斯福心中，盟军进行的法国战役，其真正含义不是解放法国，而是“纯粹的军事占领”。既然是军事占领，那就谈不上“法国的行政机构”，成立一个占领区盟国军政府就是很自然的了。

事实上，罗斯福不顾一切反对意见，已经作好了成立法国占领区盟国军政府托管的准备。他搜罗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专家、工商业者、宣传家和一些新近归化美国的法国人”，在弗吉尼亚集中训练，以便让他们尽可能在两个月内掌握法语的用处和管理技能。英国政府，包括在欧洲作战的艾森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2卷（上），第326页。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272页。

豪威尔，从军事利益出发也感觉到不与戴高乐合作的难处。1944年4月，罗斯福命令艾森豪威尔，规定盟军总司令在法国拥有最高权力，总司令“可以征求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意见”，同时也可以同除去“作为政府机构的维希政府”之外的其他事实上的法国权力机构谈判。当艾森豪威尔后来提醒他，“目前在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维希‘帮’集团和对戴高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另一个集团”时，他勃然大怒，表示不同意说法国有两大集团。罗斯福还为盟国军政府印制了军事法郎，以便在法国流通，而且罗斯福还坚决反对钞票上印有“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和国旗。

考虑到实际需要，丘吉尔想缓解罗斯福与戴高乐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正像戴高乐指出的那样：“因为美国的势力大和声望高，所以首相的努力主要是对我施加压力，叫我去满足罗斯福的要求。”丘吉尔建议戴高乐主动提出访问华盛顿的请求，遭到拒绝。戴高乐决不愿意这样低三下四地去求人，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请求罗斯福的事，承认不承认从形式上来说对他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到法兰西民族的承认。而且这种承认，他认为已经得到了。他指出：“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要到华盛顿去，但必须在纠纷真正解决的时候；在法国解放的第一块土地上无可争辩地建立起我的政府权威的时候；在美国人表现出在军事行动以外不干涉法国的其他事务的时候；在承认法国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时候。”他警告道：“关于在被解放的法国领土上分配和行使行政权力也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我们就是法国的行政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再要求什么。不是我们执政，就会出现混乱。如果西方盟国在法国挑起混乱，他们就必须承担责任，我们深信，他们必定要失败。……而且当我们行使权力时，我们绝不允许受到任何监督和侵犯。尤其是华盛顿坚持让外国司令部在法国发行货币的企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宁可不签订任何协议，也不会对此表示同意。”

1944年5月26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决定改称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6月3日正式宣告临时政府成立。在诺曼底登陆前夕，艾森豪威尔准备了一份致法国人民的声明，整个声明以解放者——占领者自居，要求法国人服从他的命令，而根本没有提及法国临时政府和戴高乐。戴高乐感到受到了侮辱。在登陆后的第二天早晨，艾森豪威尔和英国政府又安排了一个广播声明，各国驻伦敦流亡政府首脑向各自国家的人民发表号召书。其顺序是挪威国王、荷兰王后、卢森堡大公、比利时首相，然后是艾森豪威尔以盟军总司令身份发表声明，最后是戴高乐向法国人民致词。显然，这一安排是有意将戴高乐的身份与各国流亡政府首脑区别开来，换句话说，给人的印象就是戴高乐还不具备政府首脑的资格。戴高乐断然拒绝了这种安排，他要求另外安排单独发表声明。

从6月8日至20日之间，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挪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政府总是屈从于美国的戴高乐政策感到不安。英国的主要舆论工具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要求立即承认法国临时政府，指责盟国军事货币进入法国，抗议美国政策和英国政府的唯命是从，在英国议会下院，丘吉尔也面对一片

《戴高乐与罗斯福》，第198-199页。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272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2卷（上），第230页。

质询声。在美国，舆论也比较激动，许多知名人士特别是军人纷纷向罗斯福提出意见，美国报纸对戴高乐视察刚刚解放的法国领土给予充分热情的报导，在这种压力下，罗斯福对戴高乐的看法虽然不改初衷，但他也不得不正视现实，何况美国大选迫近，他不能因为戴高乐而失去选民。

1944年5月和6月，罗斯福连着两次给戴高乐转递信件，表示欢迎戴高乐访问华盛顿。戴高乐虽然表示了接受这种邀请，但他认为罗斯福的“邀请”是种“极不确切和带倾向性的方式”，表现了“应当称之为霸权主义的思想。这是恩赐予我的访问，他想让人们相信是我自己要求的。有人已经打算提我作候选人，但必须经美国总统审查资格才能得到他颁发的管理法国的证书。”

7月6日，戴高乐抵达华盛顿访问。美国政府用17响礼炮，而不是迎接国家元首的21响礼炮欢迎他，在欢迎的人中美国高级军官取代了政府高官。显然，美国政府视他为军事领导人来接待。

罗斯福在欢迎宴会上说：“在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或者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可实际上，两天半的会谈正如戴高乐原先预料的那样，在法国的前途问题上仍然各执己见。罗斯福在戴高乐走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立场依旧，“戴高乐的委员会不被看作是法国的临时政府”，他只同意在法国人民选出政府之前同意它为“事实上的民政当局”，而盟军总司令拥有一切必要权力。而戴高乐在自己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否认同罗斯福讨论过在法国举行公民投票确定“委员会”是否为法国政府的问题，他说：“这是法国的内政问题，只同法国人民有关……”。

罗斯福的立场很快就动摇了，眼看11月7日大选即到，他不能再拖下去了。10月21日，美国政府通知英国和苏联政府，说是根据艾森豪威尔总司令的看法，现在可以“把他在法国领土上的权力移交给戴高乐政府了”。23日，美、英、苏三国政府同时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来自国内抵抗运动中不同政治势力的阻力，戴高乐处理得就比较自如了。因为整个法国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因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戴高乐的功绩，戴高乐的作用，暂时还无人可以顶替。因此，戴高乐在8月25日进入巴黎后，有意端起架子，没有直接到市政厅去会见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成员。他认为，现在应该是轮到他们来拜访他了。在经劝说后，戴高乐去见了他们，但却没有只顾赞扬和感谢他们，而是意味深长地号召增强团结，警告道：“在当前形势下，国家不容许这种团结遭到破坏”。

对国内抵抗运动的实力，戴高乐是有顾虑的。当时，游击队已经完全控制了阿尔卑斯山一带省份，巴黎解放也主要是抵抗运动组织起义促成的。其中，共产党掌握的势力最大。戴高乐认为，只有先下手为强，在全国上下都还没有怀疑他的当然领袖地位时，必须使抵抗运动的各派势力认识到，除了他的权力之外，不能以任何名目任何形式存在另一个权力中心。因为他听说有人正准备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权力机构，而且还起草了立法草案，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见《戴高乐与丘吉尔》，第301-302页。

见《戴高乐与罗斯福》，第202、204页。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曾列举了一系列英美新闻工作者的名字，见中文本第2卷（上），第239页。

《书信、札记和杂感》，第5卷，第242页。

8月28日，戴高乐召集了在巴黎的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告诉他们游击队要编入正规军。然后，他又召见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成员，宣布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已结束历史使命，应该解散并入临时议会，所有其他管理权限全部归临时政府。内地军改编进正规军，由陆军部负责，任何非正规军武装都必须解散。所有这些决定不容置辩，立即执行。改编非正规军的工作由柯尼格将军负责。

戴高乐深知军队对于政权的作用，他不能容许其他党派在胜利后仍旧掌握武装力量，特别是不能容许法国共产党掌握武装，何况国内抵抗运动百分之九十的武装已控制在共产党手中。他果断而坚决地采取了措施。

9月初，戴高乐任命他的私人参谋长比约特担任新编步兵第10师师长。这个师战斗力强，士气高昂，几乎全部是由巴黎的抵抗战士组成，又几乎全是法国共产党员或同情分子，又被称为“巴黎师”。戴高乐想调这个师前往阿尔萨斯前线。比约特临行前，柯尼格将军警告他：如果事先不得到抵抗运动参谋部，也就是共产党控制的行动委员会的同意，不会有人服从命令。比约特来到行动委员会对主持委员会的皮埃尔·维荣说：“我来通知你们，我负责指挥步兵第10师。”维荣问：“是谁任命你的？”“政府首脑戴高乐将军。”“我们不认识他……”维荣拒不接受这项任命，身兼装甲第2师副师长的比约特只好以调进装甲团相威胁，迫使对方交出军权。

当然，来自各方面的情况都提醒戴高乐，在完成武装力量的集中统一之后，“应该把留在内地的、献身于抵抗运动的其他人士吸收到政府里来”。当所有的在阿尔及尔的临时政府部长们都到了巴黎后，9月9日，戴高乐改组了临时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兼顾了各派政治势力，其中，绝大部分成员是在国外追随戴高乐左右的著名人物。戴高乐吸收了八名国内抵抗运动领导人担任部长。抵抗运动委员会主席皮杜尔担任了外交部长。共产党人夏尔·狄戎代替了他的同志费尔南·格勒尼埃出任空军部长，后者因为“他的党玩弄阴谋，使他在阿尔及尔公开采取与政府对立的态度”，被戴高乐解职。这样，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从抵抗运动中产生的人民共和运动都参加了临时政府。不管怎样，海内外坚持了四年抗敌斗争的法国人，终于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在解放了的国土上重新聚集在一个政府领导之下，这已是谁也無法否认、无法更改的事实。

“戴高乐将军回来了！”四年前，他是单枪匹马离开法兰西，从“六·一八”开始他的自由法国运动。他凭借着对民族和国家坚贞不渝的热爱，他凭借着千千万万法兰西人不甘当亡国奴的反抗精神，他凭借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逆转的历来动力，也凭借着他自己在千锤百炼中养就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性格，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凯旋归来。他已不再是一个人了，他统率了几十万大军；没有人怀疑他的合法性了，他领导着一个受法国人拥护、被世界强国承认的共和国临时政府；他已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低级将军了，人们将他看成祖国的救星、民族的英雄。

戴高乐终于实现了自己从小就立下的宿愿，他终于亲手惩治了一个世纪以来屡次给法兰西带来屈辱的可怕的邻国，他终于在民族危亡之际为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法兰西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民族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38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3卷（上），第5页。

精神是永恒不变的。他通过战斗，使分裂的法兰西实现了民族团结和统一。他深深地感到，法兰西“往日的光荣同今天的光荣已经融合在一起”。但是，法兰西的明天如何？法兰西明天的光荣会同过去和现在一样吗？戴高乐的志向不只是解放，整个法兰西所想的也不只是解放，还有更繁重的任务摆在面前，这就是国家的复兴，国家要重新站立起来。

戴高乐的高兴夹杂着许多忧愁。他不是在忧愁自己有无能力担当起复兴法兰西的重任——他从来不怀疑这一点，他忧愁的是那些“热诚的拥护中”夹杂着的“种种野心”，是那些“在人民信赖的浪潮下”暴露出来的“政治暗礁”。

第五章

被遗忘的民族英雄

戴高乐成功地延续了他的政权，这个经历了四年风雨吹打，从自由法国运动开始到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戴高乐政权，终于得到了法国人的拥戴和国际承认。

巴黎解放后的十个星期里，戴高乐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视察了法国大部分地区 and 军认，受到了 1000 万法国人的热烈欢迎，他由衷地感到“救亡图存的合法权利，是人民授予的”，并得到了无条件的公认。1944 年 11 月 7 日，从阿尔及尔迁回的临时协商议会，经过扩大成员以后，在卢森堡宫召开了会议。“人民同领袖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国家正在执行它的权力。

11 月 9 日，戴高乐在协商议会发表演说。他指出：“我国战士的英勇奋斗和牺牲，全国人民通过斗争恢复国家的独立、自由和 大国地位的坚强意志，盟军和法军的辉煌战绩，已经使我们摆脱了深渊，但是，我们也非常清醒地正视我们恢复内外工作面临的严重困难”。他号召，要在与 各大国合作中重新起到法国应起的作用，尽力恢复经济生活，实现全国人民所期望的重大改革，以便使法兰西人民真正成为法兰西自己事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很显然，戴高乐的重大任务，一是与 大国一起使法国起到应起的大国作用；二是迅速恢复经济，实行重大改革，建设一个新法国。

但是，戴高乐能否按自己的宏图大志将法国引向复兴之路呢？

地位 似是而非的大国

1944 年 10 月 23 日，美、英、苏三大国都公开承认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但是，这并不等于三大国要将法国接纳进 大国行列。

1944 年 11 月 11 日，丘吉尔一行应戴高乐的正式邀请访问了巴黎。这可以说，是戴高乐以政府首脑的名义从外交途径发出的第一份正式邀请。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向罗斯福发出邀请，尽管他知道这份邀请不会被接受。戴高乐希望，他能从丘吉尔那里得到关于战后法国地位的明确保证。他还希望，英国同法国像过去并肩作战一样，携起手来，采取一致行动，以应付美国和苏联的“为所欲为”。因为他已经感觉到“目前我们两个古老的国家都已衰落下来，难以应付一个崭新的世界了”。

丘吉尔的态度是“谨慎而又有礼貌的”。他表示确信法国一定会恢复其 大国地位，同意法国在德国应有一个占领区，并带来了请法国参加伦敦“欧洲委员会”的正式邀请书。但是丘吉尔没有给戴高乐任何实质性的允诺。他拒绝谈法国重建武装的问题，对法国在地中海东岸和印度支那的未来地位问题态度暧昧，强调了英国同美国的亲密特殊关系。戴高乐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人只是为了保持均势，顾及传统和安全，才同意帮助法国。

未能从丘吉尔那里得到满意答复的戴高乐，决定去苏联看看能否从斯大林那里弥补不足。

1944 年 12 月 2 日，戴高乐访问莫斯科。戴高乐莫斯科之行最大的成功，是签订了法苏互助同盟条约。戴高乐在谈到这个条约的意义时说：“它不仅是为了把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而且是要使德国失败后，永远不再产生危害。

最后，这项条约是俄国和法国希望在为建立未来欧洲秩序采取措施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的标志。”他认为这种特殊的联合，是胜利大厦的基础，“也是未来安全大厦的基础”。因此，它既是针对德国的，又是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称霸世界的野心”的。

有趣的是，正当戴高乐同斯大林在莫斯科讨论双边条约时，丘吉尔给斯大林一封电报，建议英、苏、法签订三边条约，但遭到戴高乐拒绝。理由是法苏条约有对德国的共同利害关系，而且他同英国还有许多重大问题要解决，在此之前他不想同英国签约。

莫斯科之行尽管也没有得到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对法国的具体承诺，但戴高乐多少已有满足感。在英美仍然拒绝接纳法国进大国行列的情况下，同三大国之一的苏联单独签约，已表明了法国的地位和份量，说明战后法国可以同大国合作并起到“应有的”作用。戴高乐说道：“人们对于法俄条约的签订十分满意，群众认为这是我国重新跻身于大国之林的标志。”

但实际上，问题远没有那样简单。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法国没有受到邀请。对于三番五次声明有权参加讨论处置德国问题的戴高乐来说，无疑是等于明白告诉他：法国还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大国会议。戴高乐将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到罗斯福的过错上。戴高乐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美国是否认为法国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大国，美国是否真正肯帮助法国重新成为一个大国，“从法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决定我们和他们之间现在和将来的关系的关键”。

这个结论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真正地道出了战后法美关系的焦点所在，而且在于戴高乐执政时期认真地按这条原则处理法美关系，给整个战后国际关系带来了重要影响。

雅尔塔会议将法国排斥在大国决策之外，但又考虑到重大问题与法国的特殊关系，所以同意法国参加对德占领，并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员国，表示同意法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并特别提到三大国希望“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同它们协作，来执行它们所建议的程序。”对于这种“准大国”的待遇，戴高乐感到特别地难以理解。他心里虽然无法拒绝这些决定，但那股怨气总要想办法发泄出来。

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国经过争议同意给法国几项“准大国”的待遇，罗斯福以为这就可以平息戴高乐的怒气了。他于会议结束后，转交给戴高乐一封私人信件，希望从雅尔塔返回时，在阿尔及尔同戴高乐会晤。戴高乐果断地拒绝了这一“邀请”。罗斯福没想到的是，本以为可以借机缓和一下关系，反而更激怒了戴高乐。

戴高乐生气的是，这次会晤不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而是在三大国作出了决定之后。这时候去见罗斯福，不是明摆着一副去聆听教诲的架势吗？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罗斯福的“邀请”竟安排在阿尔及尔这个法国属地上进行。难道这不应该是掉过来，由他戴高乐邀请罗斯福吗？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1卷，第516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3卷（上），第56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91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3卷（上），第84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3卷（上），第87页。

戴高乐的拒绝使罗斯福感到丢了脸，他在向国会的报告中讥讽戴高乐，说有位女主角大耍明星脾气，错过了一次有益的会晤。罗斯福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戴高乐错过了同罗斯福修补关系的机会。4月12日，罗斯福因脑溢血去世。两位政治家的关系在不和中终结了，它肯定影响着后来的法美关系。4月23日，法国内政部竟不批准巴黎市政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悼念去世的罗斯福。

再往后，法国出席了4月25日开始的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法语也被定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但7月17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三大国又将法国排斥在外。杜鲁门总统执行的仍然是罗斯福的政策。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法国在德国分到一块占领区，并同三大国一起享有对柏林和维也纳的管理权。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法国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法国代表也参加了签字仪式。

至此，法国在战后的“准大国”地位终于明确了。戴高乐凭他的坚强意志和不妥协精神，为法国争得这一地位确实不易，虽然他还不满足。因为现实中的法兰西与他理想中的法兰西相去太远。历史上的法兰西曾以它充满魅力的文化艺术熏陶过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法兰西也曾以它的枪炮威力称霸过欧洲和征服过世界上许多地区，但那毕竟是历史。世界大国记忆犹新的不是戴高乐常提及的那些令他骄傲的过去，而是溃败的法国、虚弱了的法国，也就是说现实中的法国。

但是，任何一个小国、弱国，也有它不可侵犯的独立和主权。戴高乐恢复法兰西一流大国地位的理想，虽然因历史条件限制与现实有距离，但他争取恢复法兰西大国地位的斗争，是与维护法兰西的独立和主权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构成了战后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对外关系的宗旨。

重整家园

在战争摧残和法西斯德国的掠夺后，解放后的法国等于要一切从头开始。

法国的国民经济已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据统计，194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1939年的50.85%（按1938年价格计算）。全国毁于战火之中的农田有250万英亩，还有将近3700多万英亩农田撂荒。遭到彻底破坏和严重破坏的建筑物有200万座，工厂更不计其数。巴黎和各省市的通信已中断，机场不能启用，没有一条完整的铁路，机车只剩下2800台，汽车只有30万辆，公路桥梁3000多座被炸。战争中死亡人数达80多万，还有几十万人致残。由于生产停顿、交通中断，日常供应异常紧张，特别是燃料和食品，在1945-1946年那个“可怕的死亡的冬天”，巴黎儿童的死亡率比1943年占领时期竟增加了40%。

戴高乐充分地估计到了形势的严峻。他认为，全国的解放并不会首先给这个支离破碎、被洗劫一空的法国带来任何物质上的方便。因此，他在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并力争法国的国际地位的同时，采取了种种有力措施，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

首先是交通问题。它居首位有三个原因。第一，战争还没有结束，随着战事向欧洲腹地进展，后勤供应突出起来，因此盟军也积极提供帮助尽快恢

复交通运输。第二，是经济上的原因，这是比较清楚的。第三，是政治上的考虑，交通中断很难保证中央权力在全国普遍实施，戴高乐还特别担心西南部地区受法共游击队影响的地方。

接着，戴高乐在所有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将一些大企业集中到国家手里管起来，以便在最困难的时刻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资本。

煤炭、电力、煤气、石油等能源大企业实行国有化。1944年成立了诺尔加来海峡国家煤炭管理局，接着又成立卢瓦尔国家煤炭管理局，来自萨尔经济联盟区和鲁尔地区的煤炭，主要用于法国工业建设。1945年，又成立了石油制品管理局和原子能最高委员会。法兰西银行和各大信贷机构也实行了国有化，把各航空公司集中起来成立了国家管理的法兰西航空公司。对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雷诺公司，则因为它在占领时期与德国人合作，被强行国有化。国有化从1944年底到1946年，将能源、交通运输、金融方面的重要企业收归国有，增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

与此同时，戴高乐于1945年底创设了一个计划专员公署，秘密着手制定“重新装备和现代化计划”。这项计划，由战争期间负责战争物资筹集工作的让·莫内提议并负责，旨在确定投资重点以及发展基础部门的种种措施。

面对通货膨胀，戴高乐权衡再三，拒绝了经济部长孟戴斯·弗朗斯的严厉紧缩政策，采纳了财政部长普利文渐进的膨胀政策，发行公债，更换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实行定量配给和物价管制，以抑制通货膨胀，并严格控制进出口贸易。

在实行国有化的同时，戴高乐还实行了配套的社会改革措施。为了缓和劳资关系，启发劳动者共度难关，创建了吸收工人参加的“企业委员会”，扩大了社会福利制度，给工薪者提供自动保险、家庭补贴，保证农村佃农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国有化、享受社会化”。它为缓和战后初期的社会经济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

“经济破产避免了；国库相当充裕，币制也暂时稳定下来。”为了进一步稳固政权、加强管理，1945年8月，戴高乐创立了国立行政学院，成为培养国家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要基地。戴高乐还妥善处理了法兰西学院的问题，这个有300年历史的法国学术殿堂，因占领时期不少院士与德国人关系暧昧而名誉受损，戴高乐使它重新开始工作。

但是，使戴高乐感到难办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逐渐入轨，各个政党、各种政治势力的政治生活也在逐渐“入轨”。而这个“轨”，并不是按戴高乐的设想重新铺设的。在戴高乐看来，那个给法兰西带来劫难，葬送了共和国的“政党政治”阴魂不散，又要卷土重来了。

大失所望

1944年秋天巴黎解放后，由于战争还在继续，国内社会经济面临的困难也比较突出，再加上各种政治力量也有个重新确定方针、组织机构的问题，而且战前一些比较有名望和影响的政界人物，像莱昂·勃鲁姆、爱德华·埃里奥、保罗·雷诺等人还关在德国集中营里，暂时看来政治斗争还不尖锐。但是，这个时间很短。很快，各种政治势力就争先恐后地拥向政治舞台了。

首先是那些战前就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过角色的政党。1944年11月，法国社会党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12月，激进社会党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两个党在大会上采取了一项有影响的措施：开除了那些曾在1940年投

票赞同授予贝当元帅全权的议员的党籍。至于法国共产党，由于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时已成为法国最有实力的政党。11月，戴高乐批准了对多列士的特赦令，认为让他这时候从莫斯科回来领导法国共产党，是“利大于弊”。因为多列士公开号召党员和劳动者拥护政府、加紧生产。

另外，从抵抗运动中产生的一些新的政治力量，也开始从组织上健全起来，为挤入政党政治作各种准备。1944年11月，以天主教为背景的一些抵抗运动组织，在巴黎召开了人民共和运动大会（人民共和党）。此外，像“民族解放运动”、“民族阵线”、“共和联盟”等组织，都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

戴高乐坚持抗战四年，在他身边已聚集了一大批忠诚的追随者、崇拜者、钦慕者。但是，戴高乐并没有想到要组织一个有实力的政党作为依靠。因为他厌恶政党政治，他一直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法兰西的利益，而那些口里喊着为了法兰西，实质上都是为了各自政党利益的政党领袖们，在争权夺利中葬送了法兰西。因此，在解放后的巴黎，戴高乐警惕地注视着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他说道：“这些政党改组以后，有一点最使我注意，那就是它们一有机会就想夺取共和国的全部收权。”

这种现象，在协商议会里已充分显露出来。1945年3月19日，议会中各党派组成联合代表团，向戴高乐正式提出对政府的不满，认为政府应受协商议会的约束，不能再作出与议会通过的主张相抵触的决议。这项要求遭到戴高乐的当面拒绝，他明确回答，法国的局势不允许这种分散权力的做法。当代表们表示应当由抵抗运动表达人民的意志时，戴高乐答道：

法国的抵抗运动要比大家所代表的团体广泛得多，而法国又比抵抗运动更为广泛。所以，我是以全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而不是以一个党派的名义来执行我的使命的，尽管这个党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在将来举行普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戴高乐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分歧在于：各政党仍然怀念战前第三共和国时期的议会政党体制，它们千方百计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发言权。戴高乐却坚定地认为过去那种政党体制不能重演，必须进行改革；各政党领袖认为，国家政权应当是由各党派支配的有机混合体，国家首脑由议会任命并对议会负责，所谓选举只是选举议员而已。戴高乐却认为，国家首脑和政府应当掌有实权，国家的命运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应交由公民去决定，而不是在议会中无休止的争辩中被操纵者决定。

戴高乐感到非常担心，他说：“随着国土的解放，我痛心地看着，各个政治力量都在从事分裂我国的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企图使全国同胞远离我。”他感到自己的设想与各党派的利益要求是针锋相对的，分歧不可避免。只要自己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就有可能不能继续领导法国，因为任何党派都不会愿意把国家大事长期交给一个显然与他们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不相容的人物。

1945年4、5月份的市镇选举结果，加重了戴高乐的忧虑。他认为，社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3卷（上），第107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3卷，第130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3卷（上），第254—255页。

会舆论已非常明显地依据各种特殊要求而趋向分裂，看不出为了国家利益而团结的前景。而且在各派政治力量的竞争中，左翼力量占居优势，特别是法国共产党的力量。根据对 35000 个市镇作的不完全统计，主张恢复 1875 年宪法的激进派和温和派控制的市镇，从战前占大多数的 32000 个市镇，减为 22000 个，取代他们位置的，主要是主张建立一个唯一的并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

1945 年 6 月 2 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政治体制问题，指出有三种可能的选择：恢复第三共和国、建立最高制宪会议和在新宪法的基础上举行公民投票。7 月，戴高乐决定由临时政府制定宪法草案，也就是将制宪会议的权力限制在重要法律的表决和审议宪法上，然后提交公民投票表决。戴高乐的决定引起各政党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显示个人权力的一种强制做法，公民投票是无视议会权力。

戴高乐面对各种当面的颂扬奉承和暗中的争权夺势，多次表示他决不会实行个人专权，决不会做独裁者，而且多次暗示，如果政见不一，他可能退隐。

1945 年 7 月，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提前回国了，英国大选的结果，使他失去了首相的位置。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抵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西方国家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和影响要高于罗斯福和斯大林，更不用说戴高乐了。可是，“英国人民突然抛弃了这位曾经光荣地使英国得救和取得胜利的伟大人物”。丘吉尔下台，是因为他所在的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失败，作为党领袖，他只有让出首相位置。戴高乐看到丘吉尔这样的人物，竟然在战争还未完全结束时就被人遗忘，更加觉得政党政治的偏见和无情。随着战争的结束，它必然要用私利、偏见和对立来代替团结、热情和牺牲。戴高乐从丘吉尔的结局想到了自己。

丘吉尔在最危急的关头，坚守在与法西斯德国抗衡的西方阵地上。那时，法国已经投降，欧洲大部已经沦陷，美国还没有参战，丘吉尔在险境中领导着英国人民同希特勒对抗。尽管丘吉尔处境艰难、任务艰巨，但与戴高乐相比还是强多了。因为丘吉尔是受国家正式任命掌握大权的领袖，他后面有团结一致的全国人民和统一完整的大英帝国，而戴高乐是独自一人，还面临着法国人的怀疑和不理解，在丘吉尔的帮助下开创了事业。如今，连丘吉尔这样的人都被抛弃了，他戴高乐不是更没有什么被人留恋的了吗？

戴高乐感慨万千，他想到同丘吉尔并肩战斗，朝着一个方向“航行”了五年，“现在丘吉尔驾驶的大船已经系缆，由我掌舵的船眼看也要进港了。当我听到英国人把他们在风暴中请来的船长请下船去的时候，我预料到我离开法国舵手的岗位也为时不远了。”

用全民表决方式进行的选举于 1945 年 10 月 21 日举行，结果 96% 的人不同意恢复第三共和国，66% 的人同意成立限制权力的制宪议会。

新成立的制宪议会共有 586 名议员，其中法国共产党 160 个席位，社会党 142 个，人民共和运动 152 个，激进党仅有 29 个。左派占居了绝对多数。但是，就是这个由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占绝对多数的制宪议会，11 月 13 日一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 1 卷，第 607 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 3 卷（上），第 219—220 页。

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参加投票的议员 555 名，赞成票也是 555 票。这种前例，只有当年的“老虎”总理克雷蒙梭才有过。

戴高乐当选那天，丘吉尔正好路过巴黎，当他知道消息后给戴高乐写了一封贺信。信中这位下台首相说到，想到自己夏天下野时，就联想到普鲁塔克的一句话：“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特点。”他最近曾以这句话给一本新著作题词，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可看到戴高乐当选了，他对戴高乐说：“普鲁塔克说错了！”

但是，戴高乐自己很清楚。各党派选举他出任总理，一是因为出于对他以前的功绩的敬意，并不等于赞同他的政治主张让他长期执政；二是因为各个党派一时之间还难以找到一个更合适的领袖来顶替戴高乐。

果然，新当选的戴高乐碰到的难题接踵而来。首先是在政府成员组成问题上，共产党要求分管国防部、内政部、外交部三个部中的一个，被他严辞拒绝。1945 年 12 月 30 日，议会又在国防预算问题上陷入危机，社会党人虽然参加了政府，但却未先说明任何情况就在议会提出削减 20% 军费的提案，这显然是针对戴高乐的。已经开始工作的立宪委员会，一致同意取消未来总统的实有权力并主张政府服从议会。这个与戴高乐主张水火不容的立宪原则，竟然被拒绝通知给戴高乐。

戴高乐已无法与这些政党政客们共事下去了。1946 年新年，他在议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再补充一句话。这句话不是针对现在说的，而是对将来说的。这句话是：我和你们之间的分歧点，在于双方对于政府以及政府与人民代表机构的关系的整个看法不一致。我们已经开始了共和国的复兴工作。我离开以后，你们也要继续这项工作。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会议室里最后一次讲话了。我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做这项工作时不理解我们最近 50 年的政治史，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责任是绝对必要的，那末，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

当他在波旁宫说完这段话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打定了辞职的主意，而且他要自己确定日期，不能由别人来确定。

1 月 20 日，戴高乐在应邀前来的政府部长面前宣布辞职。

戴高乐对他们说：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卷土重来了。我是不赞成这个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个我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无法制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必须告退

……

戴高乐在这里只谈到了一个原因，即他与咄咄逼人的政党制度难以共进。但应当注意的是，戴高乐的对外政策也由于形势的变化，引起了各政党的非议和社会舆论的疑虑。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 2 卷，第 216 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 3 卷，第 326 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 1 卷，第 704—705 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 3 卷，第 339—340 页。

随着战争的结束，西方大国同苏联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戴高乐在战后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仍然与美国和英国矛盾重重。在联合国问题上，法国只同意参加旧金山会议，拒绝作发起邀请国；在德国问题上，法国的态度远比美英强硬得多；在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英法之间险些动武。议会里和新闻界都传来了对戴高乐的指责，指责他毫不放松地坚持对美英不和的顽固态度。他们担心的是，新生的法国要重建，不可能在与美英处于一种僵化关系下进行。可是，要戴高乐放弃自己的主张，去迎合美英的口味，这又是一桩他不可能赞成的事情。

但是，不论是来自内政还是外交方面的压力，按照戴高乐的一贯作为和秉性来说，他不至于主动退缩，让出政权。他从小立下的志向，刚刚迈完了一步，现在正是他凭借四年抗战的光辉业绩和声誉，去复兴法国，去圆他那个幼时就缠系在心中的梦的最好时刻，他怎么会告退呢？

因此，许多人认为，戴高乐的这种告退，实质上是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他在等待，他相信现在台上的人物“痛感后悔”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有人说，戴高乐的引退只是一段小插曲，不会很长时间。有人说，戴高乐自己私下说“不超过六个月”，法国会变得一团糟而重新指望他。还有人传言，戴高乐正策划一次政变。

戴高乐即使有过这种很快就能重掌政权的想法，也决不会在思想中存留多久。因为冷酷的现实是，对戴高乐的辞职，社会反应平平，“在人民群众和政界中的反应，没有引起过一个小时的罢工，既没有游行示威，也没有集会仪式。没有不安的现象，也没有出现骚动和混乱。当然，这件事本身轰动一时，可有些地方仍是不可理解。事实上，社会舆论更感兴趣的是接替戴高乐的那些人”。

戴高乐大失所望了。这位一年前载誉而归受到夹道欢迎的民族英雄，很快就被遗忘了。命运又一次冷落了他，他好像注定要在重大的危机时刻才能显出作用。他期待着。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另一次机会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他足足等了12年之久，届时他已年近古稀。

退隐十二年

戴高乐辞职以后，先在巴黎附近的马尔里租了一处住房，一方面是因为科隆贝双教堂的私人住房需要修缮，二方面是因为从政治上讲，巴黎总比别处敏感些，他刚离职，还过不惯过于清静的生活。1946年4月7日，戴高乐全家人聚在马尔里，为他和他的夫人伊冯娜·戴高乐举行了“银婚”纪念。戴高乐一家在马尔里一直住到5月底。随着戴高乐和夫人，以及他们那个智残的女儿安娜一起迁回科隆贝双教堂，戴高乐在心底压抑了几个月的不满和热情重新炽热起来。他又开始公开过问政治了。

戴高乐辞职后，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古安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围绕新宪法草案，各党派展开了激烈的角斗。5月5日，公民投票否决了第一届制宪议会提出的宪法草案。6月2日选举第二届制宪议会，人民共和党获最多席位，皮杜尔组成了新一届临时政府。9月28日，第二届制宪议会通过了宪法草案，并于10月13日获公民投票通过。11月10日，依据新宪法举行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尽管法国共产党获得最多席位，却由莱昂·勃鲁姆组成了清一色的社会党政府。

看着各个党派为争夺权力勾心斗角，戴高乐再也不甘沉默。为了反对那部他不合意的宪法，1946年6月16日，他拒绝了政府请他于18日前往星形广场参加纪念“六·一八”活动的邀请，来到了法国解放时他首先抵达并在那组成政府的贝叶城，发表了著名的“贝叶演说”，阐述了他心目中的新的共和国的结构、权力和形象。此后，他又在巴勒杜克、埃皮纳尔和勃吕纳瓦尔相继发表演说。9月28日制宪议会通过宪法草案后，戴高乐在埃皮纳尔演说中严厉谴责新宪法，认为它是各党派混战后“一个折衷的产物”。

但是，戴高乐深深感到，只靠他自己像过去那样仅凭威望和荣誉去号召人民，已经不适应新的政治生活的需要了。在他的周围，虽然有一大批拥戴者和追随者，但他们力量分散，在与组织严密、经验丰富的政党较量中，显示不出自己的实力。他从丘吉尔身上也受到了一定启发。丘吉尔虽然同他一样下野，但是丘吉尔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而且继续在发挥重要的国际影响。丘吉尔1946年3月在美国发表了划时代的“富尔敦演说”，引起了轰动。9月，丘吉尔又在瑞士苏黎世发表建立欧洲联邦的演说，影响极大。当然，戴高乐与丘吉尔的个人影响不能比拟，但戴高乐已经意识到，丘吉尔之所以能继续发挥作用，肯定与他后面有一个具有既定政治目标的英国保守党有关。

可是，戴高乐是公开反对政党政治的，他不能公开号召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但是他又需要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来同其他政党较量。于是，法兰西人民联盟成立了。

1947年4月7日，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就国际形势和法国内外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戴高乐认为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指责美苏这两个庞然大物，由于互怀敌意已走上了扩张的道路，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坚持独立，对于法兰西来说，是最紧迫的问题”。在强烈抨击第四共和国宪法之后，他指出法国的政党比过去更加顽固和具有排他性。他号召成立新的政治组织：

现在，建立和组织法国人民的大联盟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个联盟将在法律范围内，不受各种不同意见的影响，以促进国民努力拯救国家以及深化改革，并使之走向胜利。这样，到明天，通过协调行动和意志，法兰西共和国将成为新的法国。

4月14日，法兰西人民联盟正式成立。戴高乐自任领袖，并亲自选定11人组成指导机构，由雅克·苏斯戴尔（总书记）、安德烈·马尔罗（情报宣传）、加斯东·巴莱夫斯基（联络）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从宣布正式成立起24小时内，就有12700名巴黎人报名参加。半个月后，申请加入人数达80万。联盟总部于是从拉普广场6号迁到索尔费里诺街5号。

法兰西人民联盟有过几年兴盛时期。1948年4月会员估计可达100万之众。1947年10月的市镇选举，联盟在万人以上城市获40%的选票。这当然与戴高乐的个人威望有关，也与苏斯戴尔、马尔罗等人的鼓动宣传、能言巧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戴高乐利用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抓住了民众中普遍存在的、迷茫中寻找依靠的心理。

战争结束后，美苏对抗的态势逐渐形成，而其直接对峙的焦点，仍在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1946年3月5日，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宣称“一幅横贯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2卷，第53—55页。

现在为“戴高乐研究所”所址。

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宣传“共产主义危险”，拉开了西方“冷战”的序幕。一年后，美国又以反极权主义为名推出了杜鲁门主义。在这种形势下，西方与苏联加紧了在欧洲扩展势力范围的斗争，随着德国的分裂，欧洲也随之分裂。一个时期内，“共产主义威胁”，成了笼罩在西方国家群众头顶上的“战争阴云”。

戴高乐已有过了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业绩，他也一直相信，个人的政治命运与国家的危亡有直接的关系，国家的危难将是他再次出山的机会。因此，一方面出于他的反共立场，他与丘吉尔有共同的想法，认为会发生灾难性的国际事件；另一方面，出于重新执政的欲念，他又期望出现这样的国际事件，那样，法国人又会重新想到他。他认为，美苏两国的扩张通常总是用什么主义掩盖着，“但最终是要走上武力的较量”，因此，历史的教训应该注意，现存的法国政权是难以对付这种局势的，“在一个正义的和坚强的法国政府领导下，我们才能解决当前和将来的繁重问题”。

1947年11月12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美苏两个阵营时，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最受威胁的或许就是法国”。他认为威胁来自欧洲出现了一个比历史上任何强国更可怕的强国，而且这个强国还在法国内部安排了“一种内应力量。基于这一事实，法国不仅在国防力量上遭到威胁，而且在体制和精神上也遭到了威胁”。

戴高乐敏感的政治神经又开始被触动，他要重新掌权的欲念与要再次拯救法兰西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他对美国的不满与对苏联的担心交织在一起，他对法国政党的厌恶与建立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希望交织在一起。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感情下，他放手纵容苏斯戴尔、马尔罗等人那些近乎法西斯式的过激言行。一时之间，还没有完全从战争的余悸之中摆脱出来的法兰西人，对法兰西人民联盟趋之若鹜，他们希望还像1940年6月那样，从戴高乐那儿再次找到方向。

但是，白热化的热情稳定下来以后，戴高乐又一次感到了失望。

首先，那些在台上的政党领袖们对戴高乐重新成为政治领袖感到不安。还是在风传要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时候，已接替勃鲁姆的社会党人总理拉马迪埃曾秘密拜会过戴高乐。1947年4月1日夜里，他当面请求戴高乐协助第四共和国。戴高乐回答他只为法国服务，他将继续担当民族的引路人，决不放弃立场。拉马迪埃取消了原来给予戴高乐的进行活动的种种方便，今后戴高乐出席非官方的任何活动，不得再使用国家提供的警卫、仪仗和警察，国家电台也不得广播这种场合下的演说。

戴高乐对于这些政客惯用的小动作并不在意。但他对于法兰西人民联盟内部的一些问题也同样不在意，结果使联盟失去了影响力和战斗力。

由于戴高乐一再强调法兰西人民联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民众运动，因此，除了少部分创始人和骨干把它看成继承戴高乐未竟事业的一个工具外，绝大多数普通成员并没有这种志向。他们多半是对现状不满，或是对于可怕的前景的恐惧，到戴高乐这里寻找希望来了。而且联盟的鼓动者对成员也没有严格的要求，致使联盟成员十分复杂，过激分子，具有法西斯倾向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2卷，第15、32—33页。

同上书，第150—151页。

《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第478页。

的人，甚至过去投靠维希和贝当的人，也充斥其中。在多次集合上，联盟的非法武装人员同其他党派成员发生冲突。因此，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这个组织是否有法西斯主义倾向总值得怀疑。

法兰西人民联盟成立的背景，是为了对抗第四共和国的内外政策。但是，戴高乐反对所有政党，自己又成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他不承认是政党），结果，把联盟推到了所有政治势力，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甚至包括中间势力的对立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冷战愈演愈烈，两大军事集团成立，柏林危机、捷克危机，后来又有朝鲜战争，但都局限在冷战范畴和局部热战范围内，并没有出现那种丘吉尔、杜鲁门、戴高乐等人描绘预测的可怕国际前景，拉马迪埃也已经将法共部长赶出了政府，人们也就淡化了希望戴高乐再次挽救危亡的迫切心情。而且，几年来法国的经济生活逐渐走向正轨，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尽管是有条件的），恐怕普通人的生活会更加困难。由此，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内外政策两个方面都逐渐失去了与第四共和国对抗的基础。

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中已经取得了一定席位，在联盟的议会党团中，一些议员放弃了为了戴高乐重新执政的尖锐斗争，他们迷恋自己的既得地位，不愿响应戴高乐“不和一个软弱的政府合作”的号召。1952年3月6日，有27名联盟议员投票赞同比内内阁。5月20日，有40多名联盟成员表示，其中有18名议员直接写信给戴高乐，不愿在“体制之外改变体制”。而戴高乐历来是反对从体制内改善制度，他视这种行为是“叛逆”，并从联盟里开除了20多名议员。

法兰西人民联盟来得急去得也快。在市镇选举中，联盟得票率逐年下降，1947年10月是40%，1949年3月是31%，1951年6月是22%。戴高乐对它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但他不愿意以个人声望去解散联盟，他怕伤别人的心，他像退出政治舞台一样，于1953年5月6日退出了法兰西人民联盟。

《战争回忆录》

戴高乐曾说道：“从1952年到1958年之间，我利用六年时间写我的《战争回忆录》，没有过问政事”。

戴高乐从小就喜欢写作，他少年时代那部自我画像的短篇小说，曾生动地展现了他的理想和抱负。后来在军队服役期间出版的几本书，也将戴高乐成长过程中的坦荡胸怀、带有个性的思想，以及他丰富的知识和创作才华告诉了世人。战争结束后，他的演说、书信、电文等也要陆续整理成集。但是，这些都不如写一部具有戴高乐特色的回忆录对他更有吸引力。

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动笔或找人动笔撰写回忆录，这是起过历史作用和影响的政治家们评价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最好形式。戴高乐退出法兰西人民联盟之后，重新掌权的欲念冷淡了，而且健康状况也不太好，他做了白内障手术，感到了疲倦。他觉得有必要抓紧时间，将计划中的《战争回忆录》赶紧付梓出版。他一个已经在台下的人，要向那些在台上的人，以及广大的法国人说明，历史的经验何等重要，历史的规律何其相似，他对法国的一贯看法，决定了他在1940年6月18日的行动，而且依据这个看法——法兰西民族永恒的精神，他将终生为法兰西服务。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373页。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法国普隆出版社1970年版，第23页。

战争结束已经有好几年，许多有关的著作已经问世。戴高乐对涉及法国这一段历史，也就是涉及到他本人的书，都很留意，他阅读了有关战争、法国抵抗运动、维希政府和贝当，以及战时盟国关系等著作后，更觉得有必要尽快出版《战争回忆录》，这不仅是为了说明他为什么能单独挑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而且有许多问题还要“以正视听”。他在撰写回忆录时，曾对他女婿说：“你应该写回忆录，提供你的见证，菲利普也应该写。我在回忆录中不可能什么都写，有些是我不得不避开不写的，因为涉及一些人还在世或担负着国家领导职务，这些还要由你们两人补上。”

戴高乐的写作比较费劲。他既不用打字机，也不是口授，而是用笔一字一句地写。这一点，他比不上丘吉尔。丘吉尔写作基本上是口授，丘吉尔堪称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在战前，他就有了好几本宏篇巨著。1945年下野之后就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

录》，当戴高乐动手写回忆录时，丘吉尔的六卷本回忆录已经快出齐了。戴高乐只有两个助手，一个是政府提供的外交部工作人员，负责核对资料，另一个是他女儿，负责将草稿打印出来。

出版社纷纷来接洽出版事宜，戴高乐选中了专以出版名人名著而享有盛名的普隆出版社。1938年，这家出版社曾出过他那本导致同贝当决裂的《法国和它的军队》。所有出版工作，戴高乐交给了他的得力助手，这时已主持他的秘书处工作的乔治·蓬皮杜。

《战争回忆录》共分三卷。第一卷《召唤》1954年10月出版，第二卷《统一》1956年5月出版，第三卷《拯救》出版时，已是戴高乐重新执政之后的1959年9月了。

《战争回忆录》真正成为畅销书并引起国内外重视，还是在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时开始的事情。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只听说，或是只了解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坚持抗战的故事，他们还不了解是什么原因驱动了戴高乐这一历史行动，而且这一直接动因，指导了戴高乐对于未来法国的构想，决定了他为实现法兰西的理想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因此，当戴高乐重新执政时，人们期望从《战争回忆录》中了解戴高乐的过去，对照他的现在，预测他的将来。

当然，从1952年到1958年，戴高乐的主要精力用于撰写《战争回忆录》，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没有过问政事”。他还是过问政事，只不过社会各界对他的过问只是听听而已。政界领袖已不对他的过问感到有“争夺权力”之虑，普通群众已不将他的过问看成是不可或缺的治国良策，戴高乐的现实作用已被淡忘了，人们只是想到他对国家的历史功绩。1953年，他作了两次演说，发表了五次声明，举行了两次记者招待会。1954年，他作过一次演讲，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发表过四次简短声明。1955年，只举行过一次宣布不再干预公众事务的记者招待会。1956年，有过两次不长的演讲。1957年，仅发表了一个公报。

在这些有数的公开言论中，戴高乐几乎对这些年国内外所有的大事都谈

阿兰·德布瓦西厄：《跟随戴高乐将军》，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作者为戴高乐女婿，菲利普是戴高乐的儿子。

参见《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第513—515页、520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413页。

了自己的看法。他表达了对北大西洋公约既赞同又要警惕的态度，他阐述了自己对于欧洲建设的观点，人们还能看出他对德政策的变化，他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他谈过对联合国作用的想法，对印度支那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苏伊士危机，他都有一定之见，他没有放松对第四共和国政策的抨击。所有这些年里发表过的言论，如果同他的《战争回忆录》里所阐发思想放到一起来研究分析的话，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正是在这些年，戴高乐通过著书立说，已经最终形成了对法国和世界的一定看法。他将战前就在脑海中孕育，战争期间萌芽并加以实践的看法，经过总结、归纳、提高，给后人展示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戴高乐主义”的政策纲领，并成了他第二次执政时期所有政策的指导思想。

正像后人在戴高乐研究中忽视他这段经历和成就一样，当时的人们更没有注意戴高乐这 12 年中思想飞跃的事实。法国人不注意他了，但他却随时注意着法兰西，他在等待法兰西……

第六章

法兰西再次召唤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历史在漫长的法国史中仅占了短短的 12 年。在戴高乐看来，这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共和国。从它酝酿产生开始，一直到它寿终正寝，可能极难找到戴高乐对它的一句赞赏的话。1947 年 3 月，戴高乐抨击刚成立不久的第四共和国，“国家结构弊端百出，法兰西民族误入歧途，国家威信扫地，改造国家的日子就要到了。”但事实上，这个共和国存在了 12 年。既然它能存在 12 年，自然也就有它能够存在的理由。

第四共和国最大的成就，在于迅速恢复了因战争遭到破坏的法国国民经济（当然，这也有戴高乐不可不提的功劳），而且使法国经济进入了初步发展时期，完成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初步工业化，为法国经济高速发展实现现代化准备了物质基础。在 1950—1959 年间，法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6.1%，农业也开始实现机械化。对外出口贸易也从最初的以初级产品为主，变为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品为主。到戴高乐执政时，整个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 4.8%。戴高乐有时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在回忆录中，他讲了一通法国面临的经济危机状况之后说：“毫无疑问，有时多亏像安托

万·比内和埃德加·富尔这些部长的不懈努力，才使形势缓和。他们一离开，又开始混乱了。”

至于法国的国际地位，正如戴高乐所嘲讽的那样，它基本上是顺从于美英两个国家的一个小兄弟。但是，从战后形成的特定国际环境和欧洲现实来说，法国在国际关系中也只能起到那种作用。法国当时的实力地位，决定了它的国际地位，在美苏对峙的严重局势下，法国不大可能脱离美国制定的轨道去走自己想走的路。正因为这样，戴高乐当初才让开路，让别人去走这条轨道。假设说，戴高乐当初不让开路，继续执政，他就完全能按自己的设想，特别是像 1958 年以后那样去处理国际事务吗？这是一个无法实现但确是值得怀疑的假设。

不过，戴高乐对第四共和国的抨击有一条是无法辩解的。就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12 年的政治生活，的确是乱糟糟。

第四共和国由于实行一套权力分散的政党政治，政府的成立建立在各个政党争夺之后妥协的基础之上，刚一成立就处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或是因反对党势力过大而下台，或是因联合执政的各政党内部倾轧而倒台。11 年里，就像供小孩玩乐的走马灯一样，出现过 17 位总理，21 届政府。最长的一年多，最短的只有两天。结果，法国政府很难制定和实行一套行之有效、持续稳定的政策，特别是在重大危机出现之时，它显得束手无策，软弱无力。而且，第四共和国时期的历届政府，都死抱住老殖民主义的旧框框不放，长期进行维护旧殖民利益的不义战争，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影响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 15—16 页。安托万·比内 1952 年任总理九个多月，制止了通货膨胀，使经济走上发展道路。埃德加·富尔 1953—1955 年曾任财政部长和总理，他提出“稳定中求扩展”的经济政策，卓有成效。

较深的是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些战争，严重地阻碍了法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进入 50 年代后期，法国国家垄断资本和新兴工业大垄断财团有了很大发展。经济上更高度的集中，要求政治上也相应集中权力，建立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政权来更有效地制定和推行各项政策。1958 年，已历时三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在导致多届政府倒台之后，终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将相应集中政治权力的政治要求推向了一个更紧迫的阶段。显然，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它又难以维持。结果，法国的危机，又成了戴高乐的机会。就像是 1940 年一样，戴高乐的机会又来了，他又面临着法兰西的“召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处理过去的殖民地问题，是历届法国政府最感头疼的问题：第四共和国的当权者们采取了一条强硬的镇压政策，这种违背殖民地人民意愿和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政策，使法国政府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殖民战争。1954 年 6 月，孟戴斯—弗朗斯就任总理时，曾向公众许愿，要在 7 月 20 日以前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实现和平，否则他就下台。果然，在那一天夜里，签署了关于印度支那停战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历时八年半的殖民战争。但是，当法国人还沉浸在实现和平的喜悦中时，11 月 1 日，相类似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又全面爆发了。

战后，1947 年法国曾通过一个阿尔及利亚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组成了一个议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能通过这个议会，逐步过渡到自己管理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但是，当地的殖民者阻挠这个法案实施，规定组成两个选举团，每个选举团选出一半议席。占当地居民只有十分之一的法国人组成一个选举团，阿尔及利亚人组成另一个选举团，而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的当地政府却要干预当地人的选举团，激起了阿尔及利亚人的愤怒。在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大潮的推动下，他们感到失望，和平解放的愿望不能实现，只有拿起武器。

法国殖民者在政府的主使支持下，残酷镇压阿尔及利亚人的起义。他们不仅重兵围剿起义军，而且对被俘人员施以酷刑。1958 年 2 月 8 日，法国殖民军出动飞机，借口来自突尼斯边境的起义军打死了 16 名法国士兵，对阿—突边境的一个村庄狂轰滥炸，炸死 78 名普通突尼斯人，包括 21 名儿童，还有近百人受伤。法国政府和殖民主义者的行径遭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也引起了法国国内舆论的分裂和法国政界的分歧。

出于国内外的层层压力，也出于对武力解决问题失去信心，一些政治家在暗中准备通过谈判来实现停火。1956 年，居伊·摩勒政府曾同本·贝拉的民族解放阵线有过接触。1958 年 5 月，皮埃尔·弗林姆兰任总理后也透露过谈判的可能性。但是，顽固坚持殖民利益的势力在法国仍很有市场。在法国还有一个十分危险的动向是军队的倾向。军队由于在印度支那战争中遭到失败，感到脸上无光。一些人担心在阿尔及利亚历史重演，于是不惜一切手段妄图取得战争胜利。这种维护军队虚假荣誉的好胜心理，使他们与那些

据德布瓦西厄回忆，是因为法国军用飞机多次遭到地面炮火射击，这次行动是为了摧毁地面高射炮阵地。见《跟随戴高乐将军》，第 94—95 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 2 卷，第 439—440 页。

顽固坚持殖民立场的既得利益者结合到一起，对政界任何试图谈判停战的举动都很敏感。因为他们看到第四共和国已是走头无路了，决不能指望由政党控制的政府将阿尔及利亚战争打到底。由于这种心态，在军人中间滋长了有权利和责任干预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再不过问法国的政治大局，目前台上的政客还会将他们引向失败。

1958年4月26日，由退伍军人协会组织，阿尔及尔发生了示威游行。其政治目的很明确，公开要求成立救国政府——公共安全委员会，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国内政治危机。5月9日，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萨朗、空军司令儒奥、阿尔及尔兵团司令阿拉尔、第10伞兵师师长马絮，四位将军以军队领导人的身份，联名致电共和国总统科蒂。信中说：

由于对正在战斗的人……对内地的法国居民的责任感，阿尔及利亚的军队正处于混乱之中……法国军队一致认为抛弃这份民族遗产简直是一种耻辱。军队的失望反应是无法估计的……我们请求共和国总统注意我们的不安情绪，只有一个坚决捍卫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旗帜的政府能够消除这种情绪。

这封电报是请总参谋长埃利将军转交给科蒂总统的，而不是转交给政府的。与其说他们不知道弗林姆兰已经要组阁，还不如说他们有意不理睬现在不可信的政府。当晚，埃利将军通知阿尔及尔，说科蒂总统已收到电报并表示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是，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处决三名法国士兵的新闻报导，使刚刚稳定下来的情绪又激动起来。10日，退伍军人协会决定，5月13日在阿尔及尔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5月13日的示威游行引起了骚乱，总督府被占领。骚乱很快波及到奥兰和君士坦丁等地。当晚，已被授权负责治安的马絮将军宣布成立由他任主席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救国委员会）。骚乱也波及巴黎。14日，巴黎发生了左右翼分别组织的敌对游行，一派高呼“绞死马絮！”另一派却高呼“让马絮掌权！”5月15日，萨朗将军在阿尔及尔总督府的阳台上，面对成千上万人的发表讲话，在高呼“法国万岁”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之后，他又喊了一句“戴高乐万岁！”

当晚，戴高乐在巴黎发表声明：

国家的衰落不可避免地使得同法国结合在一起的各族人民疏远起来，使得战斗中的军队发生动乱，使得全国分崩离析，并且导致丧失独立。法国12年来纠缠于党派政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中，它已经陷进这个灾难性的过程。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法国再度面临考验时，但愿全国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戴高乐在沉静了多年之后，终于为重返政治舞台公开活动了。

拉古社尔：《戴高乐》，第2卷，第460—461页。

拉古社尔：《戴高乐》，第2卷，第468页。

5月16日，弗林姆兰新政府决定对骚乱采取高压政策，矛头直接指向那些与骚乱有关的军队领导人，埃利将军的助手遭到监禁，埃利辞去了总参谋长职务。17日，政府又实行新闻检查法。局势日益紧张，军队高层领导人开始策划在国内进行干预的可能，准备“复兴作战计划”。19日，戴高乐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是几年来他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谈国家大事。在这个时刻，以招待会的规模、所提问题的尖锐，已足以证明，法国正面临一场大转折。

5月24日，由萨朗将军派往科西嘉的伞兵部队接管了当地政权，政府调派警察去恢复当地合法政权，治安警察却和叛乱者一起行动了。在巴黎，谣言四起，盛传伞兵将空降巴黎夺取政权。政府已经瘫痪了。部长们都不敢在家过夜，弗林姆兰的住所挨炸，“国防部长手里几乎没有军队，内政部长手里几乎没有警察，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甚至无法到阿尔及尔去一趟”。

5月28日，弗林姆兰政府被迫辞职。29日，科蒂总统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行动，他向议会宣读了一份咨文。在咨文中，他强调议会必须正视法国面临的内战危险。认为他有义务吁请戴高乐担任政府总理，如果议会拒绝，那他自认为没有正确地表达全国人民的愿望，就要提出辞职。

6月1日，国民议会以329票对250票通过，授权戴高乐组织新政府。6月2日，议会又通过三项议案：重新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权；授予新政府六个月的特权；授予新政府制定新宪法并提交公民投票表决的权力。

戴高乐又重新执政了，他以他67岁的高龄重新登上了法国政治舞台，并毫不客气地还要迈向国际舞台。

戴高乐重返政坛的背景，从总体上来说，与1940年一样，是国家处于危急之中，法兰西民族又面临新的分裂危险。但是，1940年的危难，主要是希特勒的侵略和法国投降主义造成的后果。那时候的戴高乐，完全以清白之身，毅然举起了抵抗义旗，完成了救国大业。而1958年的危难，是法国人自己造成的内乱。那末，是什么原因诱发、激化了这种内乱，是否有人故意制造、助长了这种内乱，在内乱中重新执政的戴高乐，在内乱中是一种什么态度，起了什么作用？简言之，有人怀疑戴高乐为内乱推波助澜，乘机窃取了政权。历史是多么惊人地相像，如同18年前一样，现在仍有人怀疑戴高乐政权的合法性。

1958年5月，在法国被一些人称为“阴谋的5月”，还有人撰写了题为《5月13日的十三个阴谋》、《5月13日，一场革命的秘史》等专著。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戴高乐的追随者们不仅断然否认戴高乐参与了所谓的阴谋，而且认为戴高乐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促使他重新执政的种种计划和策略。但是，说戴高乐没有参与所谓的阴谋，可能说得过去，说他对那些计划和策略一无所知，则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由于戴高乐一直在期待法兰西的再次召唤，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政治局势的关注，他谨慎而果敢、稳妥而坚定地一步一步地跨上了政治舞台。

4月16日，一批戴派人士公开呼吁戴高乐出山挽救祖国，巴黎大街上也出现了许多大标语。5月5日，科蒂总统派了他的卫队长加内瓦尔将军去见戴高乐最亲近的两个人：雅克·福卡尔和奥利维埃·吉夏尔，探听戴高乐的看法。5月9日，戴高乐还指示吉

夏尔，让加内瓦尔转达科蒂总统，他愿意保持联系。5月12日，在吉夏尔家中，召开了一次戴派骨干分子会议。在整个5月事件中，戴派成员德尔贝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是抵抗战士，是国

务部长沙邦—戴尔马派往阿尔及尔的特派员，4月下旬，戴高乐曾接见过他两次。他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5月，往返于巴黎和阿尔及尔27次之多，对萨朗影响极大。就是他，5月15日在阿尔及尔总督府阳台上，站在萨朗身后，及时提醒萨朗又回到麦克风前喊了一句“戴高乐万岁！”

不过，戴高乐还是很清醒的。他不愿过早地表明自己重新掌权的希望，他直到5月15日才正式表态。他不愿谴责那些在阿尔及尔制造混乱的军队领导人，但他又不愿那些拥护他上台的人走得太远。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制止了有可能向巴黎空投伞兵的“复兴作战计划”。

连吉夏尔都承认：“福卡尔和我负责将军的一切对外联系，因此，我们熟悉所有发生的情况。将军对此一清二楚，但他不一定非要了解细节问题。”可见，5月13日前后所有涉及戴高乐重新执政的大小事件，戴高乐不可能不知道。不过，他既没有主使他们，也没有谴责过他们，他抱着一种听任他们自由行动，密切注视局势发展的态度。当然，需要点破的是，戴高乐内心希望局势进一步恶化——恶化到政府求助于他，但又不能恶化到不可收拾——那样他也可能成为罪人。德拉戈斯在他的著作中，曾谈到5月13日危机对戴高乐的影响：“无法预料的和仿佛经过周密策划的5月13日危机，使戴高乐得以表现他的经验主义、他的高瞻远瞩、他的深思熟虑和谨慎以及他当机立断的魄力。”

不管戴高乐参与还是没有参与，知道还是不知道5月13日那些促使他重新执政的大小事件，并不能说明戴高乐1958年该不该上台。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面临1958年局势的法兰西，需不需要戴高乐这样一个人物上台。

戴高乐自己在《希望回忆录》中，在叙述了1958年5月法国面临的局势如何危急之后，他坦率地谈到自己上台的必然性。他说：

要避免这一切，除非有一个全国公认的权威，这个权威既与现存政治体制无关，也与试图推翻这个体制的冒险势力无关，而是超越在它们之上。这个权威立即集中舆论的力量，取得政权，振兴国家。这样的权威，除我以外，谁也不可能具有。从一开始，这个责任就落在我这个退休的人身上了。我感到我是被选定的拯救国家的工具。1940年6月18日，几乎是默默无闻的戴高乐，响应了当时孤立无援的永恒的祖国的召唤，匹马单枪承担起拯救法兰西的荣誉和灵魂的重任。1958年5月，民族濒于灾难性的分裂和自认为是国家负责政权的体制即将崩溃的前夕，戴高乐——虽有名望但除去合法地位别无他物——不得不负责掌握国家的命运了。——

《我的将军》，第307页。

以上参见《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第531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467页。

《我的将军》，第310页。

《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第574页。

戴高乐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在当时的法国，需要一个权威，而这个权威，非戴高乐莫属，所以他敢说“除我以外，谁也不可能具有”。这是历史的选择。之所以别无选择，是因为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无力应付危急局势，是因为现有的政治家们无能解决重大问题。尽管像孟戴斯—弗朗斯、弗朗索瓦·密特朗这些政界领袖反对戴高乐上台，但是他们自己又不能，又选不出别的合适的人，只有眼看着戴高乐上台。

当然，戴高乐有他的特殊条件。他曾经在法国最黑暗的年代领导法国人重新争得光明，赢得自由，实现了民族统一。因此，他的威望是无人可替代的。而且，戴高乐在抨击现存政治体制的斗争中主动辞去了政府总理职务，现在，12年过去了，现存体制已被证实无能为力，戴高乐的抨击是正确的。难道不应当让他来试一试吗？

阿尔及利亚危机导致了法国政治生活的动乱，动乱为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曾多次被危机所困扰，这是它的一大特征。但是，第四共和国的政府多次更换，都是换汤不换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这一次就显然不同了。因为掌握国家政权而且被授予特权制定新宪法的，是早就对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抱敌视态度的戴高乐。因此，戴高乐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政府的总理，但毫无疑问，实质上已等于宣布第四共和国即要寿终正寝，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正在孕育中。戴高乐是在法国面临分裂和内战危险的特殊时刻重新执政的，也只有像戴高乐这样在军界、政界和广大民众中有较高威望的人才能稳定局势。正是在这个特殊时刻，戴高乐得到了议会授予的特权，也正是利用这些特权，戴高乐将它扩大运用到了法国整个政治生活中，完成了对法国政治体制的重大革新，创建并巩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使法兰西在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国际事务中，都换了一副新面孔。

第七章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由戴高乐主持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政府，很快就同戴高乐指定任命了部长。戴高乐上任，他的首要任务是先稳定局势，因此，可以说这一届政府是多少带有照顾性的、过渡性的。他要尽可能在人事安排上给人以广泛、民主的感觉。他既要照顾到跟随他左右多年含辛茹苦为他重新执政付出努力的戴派骨干，又要设法使那些担心失去阿尔及利亚的人放心，还要堵住那些断言他要搞个人独裁的人的嘴。在他的 24 名政府成员中，有社会党人，有人民共和党人，有独立党人、激进党人。当然，戴派人物执掌着那些重要部门，像外交部、内政部、武装部、海外领地部，不仅由戴派人物主管，而且直接归戴高乐管辖。这几个部门后来被称之为“保留领域”，一直由戴高乐亲自决策。

由于法国的政局变动是因为阿尔及利亚事件引起的，因此，在一般法国人看来，迅速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政府的第一项工作。而且在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戴高乐就乘飞机来到了阿尔及尔，人们都以为，这个使多少人下台伤脑筋的问题，肯定被戴高乐当作首项工作来办了。

6 月 27 日，戴高乐在电视广播演说中，向全体法国人谈道：“有三件事左右了我们的局势。这三件事是：阿尔及利亚问题、财政和经济平衡问题以及国家体制的改革问题”。这三件事，应当说都是关键性问题，哪一件处理不当，都难以挽回局势，但总要有个突破点才行。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国家体制改革问题是两个基本问题，财政和经济平衡问题是由这两个问题引起的。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看来戴高乐是要狠下功夫了。因为国家政治体制不改革，戴高乐的任何政策主张都难以顺利推行；而不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就不可能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戴高乐将围绕这些问题，开创一个新的共和国。

第五共和国宪法

法国人都以为戴高乐会首先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因为他们是为了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要戴高乐上台的，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面对戴高乐来说就不一样了，这两件事就完全颠倒过来了，他认为应该先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然后才能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早在 1940 年 6 月开始，法国人就围绕着戴高乐的抵抗运动政权合法，还是贝当的维希政权合法争论不休。这场争论，直至战争结束，也远远没有结束，总有一些顽固坚持旧法统观念、拘泥于法律程序的人对此耿耿于怀。尽管戴高乐对此不屑一顾，但毕竟在国内外舆论上给他的事业造成过许多麻烦，致使许多人迟迟不肯投奔自由法国运动，盟国迟迟不肯承认他的合法政权。现在，事隔整整 18 年，戴高乐又在相同的大背景下上台，尽管他的权力经过了法律程序——是由议会辩论后授予的，但是还是有人提出疑问，在国家危急关头，向国家索要特权，这种“乘人之危”要来的特权，是否合法？

戴高乐知道，议会授予他六个月的政府特权，这是临时性的。依靠这个

临时性的特权，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能解决长远问题，不能作为他实现宏伟大志的法律依据。所以，当他重新上台，要实现自己藏在心底多年的远大抱负时，他必须为自己今后的具体决策和行动先订下法律依据，这不仅使自己具有长远的、巩固的合法地位——堵住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口，而且还要所有的人依据法律跟着他，遵循他的决策去办事。因此，制定新宪法，就成了戴高乐政治体制改革中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也是一个新的共和国诞生的主要标志。

6月3日，国民议会已授权新政府制定新宪法并交由公民投票通过。戴高乐亲自领导过问了这项工作。他将具体制定草案的工作交给了他的新任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负责。

德勃雷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新政治体制的建立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德勃雷是戴派中堪称国家问题和法律问题的理论家，戴高乐在首届政府中任命他为首任司法部长，当然是考虑到了制定宪法草案的重任。德勃雷从最高行政法院抽调了一批年轻骨干，组成了一个18个人的起草小组。

戴高乐给新宪法产生规定的程序是：德勃雷负责起草文本，这是一个专家性的技术委员会；然后，由戴高乐直接参与，由雷蒙·雅诺担任秘书长的部际委员会进行审查，成员还有政府办公厅主任乔治·蓬皮杜，戴派元老、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法学教授勒内·卡森，德勃雷也参加，第四共和国时期的一些老部长们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如居伊·摩勒，皮埃尔·弗林姆兰等；经过部长们审查后，将草案提交宪法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共39名成员，由保罗·雷诺任主席，其中16名来自国民议会，10名来自参议院，还有13名由戴高乐指定；再将宪法草案送最高行政法院讨论，最后，政府通过宪法草案，并提交公民投票表决。

究竟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戴高乐说道：“关于这个决定一切的问题，我在12年前就已经公开阐明了它的主要内容。总的说来，我们要制定的宪法，要与人们称为‘贝叶宪法’的精神相符。

1946年6月16日，我曾在贝叶提出了法国所必要的那种宪法。”因此，新宪法的精神不能脱离“贝叶演说”的精神，德勃雷的起草小组，只能在这个骨架上增肌添肉、输血，使它活起来，不能另起炉灶。

先来看看1946年6月16日“贝叶演说”的主要内容。因为，今天普遍认为，如果要了解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首先必须要读一读“贝叶演说”。在这个演说里，戴高乐已经向公众描绘了他心中的共和国，虽然这个共和国12年后才成为现实。

首先，戴高乐谴责了政党政治，认为它应对“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法国遭到七次侵略，改变过13次政体”负责任。

“简而言之，我们的党派之争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怀疑一切，因而往往忽视了国家的最高利益。”

“我们的制度要注意和保证法律的威信、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凝聚力、行政管理的效力、国家的声望和权威。”

参见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553—554页；皮埃尔·维昂松—蓬特：《戴高乐共和国史》，第1卷，法亚尔出版社1970年版，第62—67页。

《希望回忆录》，第37页。

他认为，党派之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会给国家带来混乱，混乱之际，就容易出现独裁。由于政党制度无能，民主就受到独裁威胁。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以及意大利的民主制、魏玛共和国和西班牙共和国都被独裁制度取代，都是缘于此。于是，戴高乐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方案：

一切原则和一切经验都要求公共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之间明确分立并相互制衡，还应建立一个处理意外政治事件的国家决策机构，以保证在发生混乱时政权的持续稳定。

法律和预算应由一个直接普选产生的议会最后通过，这是显而易见的，合乎道理的。但是，这个议会的初步动议，未必就完全有远见和正确，所以必须通过另一种选举方式再组成一个议会，以对第一个议会的议案进行审查、修改或提出建议。

因此，一切都要求我们成立第二个议会，它的主要成员应由省市两级议会选举产生。这个议会能补第一个议会之不足，它可以有权让第一个议会重新审查自己的议案或其他提案，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它起到那种纯政治性议会必然忽略的行政性作用。

行政权当然不能由包括两院并行使立法权的议会中产生，否则政府将无法行使行政权，陷入混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府将成为一个由代表团组成的大杂烩……如果行政权是从另一个权力中产生的，而行政权又必须同这个权力保持平等，如果对人民代表机构负责的政府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只是某个政党的代理人，那末，政府的统一、团结和纪律又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

因此，行政权应该由超越各党派的国家元首授予政府。这个国家元首由包括全体议员在内的更广泛的选举团选出，他既是法兰西联邦的总统，又是共和国的总统。国家元首根据议会的规定和协调各方面利益的原则，有权任免人员。他可以任

命各部部长，当然首先是任命负责政府领导工作的总理。国家元首有权颁布法令和公布法令……国家元首有权主持政府会议……国家元首有权裁决意外政治事件：他或者通过政府来正常行使这项职权，或者在特殊情况下由全民投票表决作出决定。在国家处于危急时刻，国家元首有权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履行法国签订的条约。

德勃雷的起草班子，于7月中旬以前，按照“贝叶演说”的主要精神，拿出了草案文本。按戴高乐的说法，对宪法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没有提出过任何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事实上不完全是那么回事。

宪法草案中最重要、最使戴高乐满意，因而又最容易引起争执的，是关于共和国总统权力的那些条文。草案条文规定：共和国总统将由一个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任期七年，这个选举团将由国会议员、省议员以及其他知名人士组成。总统有权挑选自己的总理并任命部长，有权主持内阁会议，因而政府实质上就是总统的办事机构，它必须，也只能听命于总统。同时，总统还享有宪法赋予的无须

“贝叶演说”全文见《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2卷，第7页；《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3卷，第524—531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270—271页。

内阁联署即可超越议会的三项权力：（1）总统或政府同议会在重大决策上意见不一致，总统有权解散议会（宪法第12条）；（2）总统有权就某项政策措施直接提交公民投票决定（宪法第11条）；（3）总统有权在非常时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行使“非常权力”，采取总统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宪法第16条）。

当宪法草案7月底交给宪法咨询委员会讨论时，委员们提出了疑问：政府由总统直接委任，议会怎样监督政府，议员还能不能推翻政府？宪法授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行使“非常权力”，这有没有必要，有什么根据？当草案提交到最高法院讨论时，还有不少人反对政府成员不得兼任议员这一条。另外，还对法兰西共同体中是实行邦联制还是联邦制提出了质询。

8月14日，宪法咨询委员会通过了宪法草案，仅对一些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并未触及基本内容。9月3日，政府最后批准了宪法草案。4日，戴高乐在共和国广场发表演讲，宣布新宪法草案已获政府通过，在宣讲了宪法草案的精神和内容之后，他呼吁全体法国人投赞成票，说道：“如果你们否定了它，我们将立即重新回到你们所了解的歧途上去。如果你们赞成它，结果将使共和国更强大而有效率。”

选择9月4日这个日期和共和广场这个地点，都是对历史和文化有高度素养和敏感的马尔罗的杰作。9月4日，是1870年第二帝国崩溃的日子，也就是共和人士的节日，共和广场正是共和人士活动的场所。当然，这次集会是经过周密组织并由警察保护的。

由此，迎接9月28日全民公决的宣传准备工作，就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在任何一个国家，每当面临对重大问题由人民去表示赞同还是反对时，谁都明白，宣传舆论的鼓动工作是何等重要。而这些工作，对于戴派骨干苏斯戴尔和马尔罗来说，正是拿手好戏，何况他们已分别就任新闻部长和文化部长，有权调用宣传机器和人力。

虽然一些政党对能否平等使用电视和电台广播事先表示了担心，但掌权与不掌权毕竟还是有区别。在苏斯戴尔的主持下，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了，其中电视广播台成了主阵地。苏斯戴尔一个月里调换了10名高级常务编辑，代之以戴派人员。飞机也参加了宣传活动，散发敦促人民参加投票的传单和广告，提出“投赞成票也好，投反对票也好，但得投票”的口号，到处都是“赞成法兰西”的海报，反对弃权主义。这实际上是鼓动人民投赞成票。宣传影片也以颂扬戴高乐，诋毁第四共和国为主。印发了无数份选举刊物《法国全民公决》免费赠送，戴高乐9月4日的演说词也随同选票一起分发。在这种攻势下，所有反对党的声音都难以听到了，

讨论时为第14条。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1卷，第65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559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559—562页。

同上。

只有法国共产党的宣传还有一定影响。

戴高乐也亲自出马，他继9月4日共和广场的演说之后，20日去了雷恩和波尔多，21日去了斯特拉斯堡和里尔，26日又发表电视广播演说，他感到“群众中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拥护他的浪潮。

9月28日关于新宪法的公民投票，果真是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潮。连戴高乐派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功。

公民投票的结果，赞成票占了79.25%，1750万张赞成票对450万张反对票。只有15%的选民弃权，这个百分比是法国选举史上仅有的第二次，第一次是1936年的人民阵线选举。投赞成票的人如此之多，里面包括各个派别，甚至包括共产党人。

新宪法以压倒优势被大部分法国人所接受，这等于就是接受了戴高乐政权，接受了戴高乐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显然，这种选择也就预示了宪法中规定的享有大权的共和国总统，非戴高乐莫属。

10月5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正式公布。下一步，就是依据宪法来分配权力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制定了一部强有力的宪法，这部宪法又赋予他强有力的权力。法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开始转移了，它从波旁宫移往总统府——爱丽舍宫。

议会、总统与政府

议会大选定在11月23日。关于宪法的公民投票刚刚结束，戴高乐就已经开始策划如何将大选纳入他制定的轨道了。

按戴高乐的体制框架，议会在国家政治权力范围内，其地位已从中心被排到外围边缘了。即使如此，他还是要使这个权力大受限制的议会有助于他的决策。他根据以往的经验，预感到在立法选举中难免出现分散对立的现象。因为在议会这个场所，有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习惯性对抗倾向，有各个政党和派别、不同阶层的利益，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差异，再加上社会活动家的鼓惑宣传和候选人的各种手腕，都会起到很大影响。在议会里，戴高乐必须组成一个人数众多的议会党团，才能有效地支持他的复兴事业。

10月1日，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成立了，这就是宣称代表戴高乐主义的保卫新共和联盟。

保卫新共和联盟还是由苏斯戴尔这个能量极大的戴派活动家鼓动起来的。早在夏天，苏斯戴尔、沙邦—戴尔马、弗雷、吉夏尔等人就为创建这个联盟开会，当戴高乐得知他们为选举创建一个组织时，赞道“很好”。此后，吉夏尔经常向他汇报进展情况。公民投票之后，苏斯戴尔将几个戴派组织的领导人请到家中，决定合并成一个组织。其中有社会共和党、法国复兴联盟，还有共和协会，多数是原来抵抗运动和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成员。保卫新共和联盟在戴高乐的干预下，只成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不设主席，由苏斯戴尔任秘书长，像沙邦—戴尔马、德勃雷、德尔贝克，这些著名人物都是指导委员会成员。

要在议会中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各党派的竞选、实力，固然起到很大作用，但选举制的确定也关系重大。戴高乐深知这一点。他决定采用“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的选举办法，抛弃了1945年由他自己采用的比例代表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1卷，第67—73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648页。

制选举法。

比例代表制最主要的是候选人基本上是政党的代言人，他们与政党关系密切。而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规定各个党派在选区内提名一个候选人，这个候选人只有达到半数以上赞成票，并且占整个登记选民人数四分之一以上时，他才能当选。如果没有当选，只要获得百分之五的有效票，他还可以参加第二轮选举。戴高乐的用意是：尽可能使各党派的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旗鼓相当，分散选民的投票率，结果必然有许多党派候选人达不到规定票数，只好退出选举。这样，在第二轮选举中，大多数选民就有可能转而投戴高乐派的票。

戴高乐在 10 月 23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不偏不倚的态度要求不要让我的名字，即使是作为形容词的形式，都不要出现在任何一个集团或候选人的竞选宣言中”，他还说道，他自己在选举过程中避免参加选举运动。但是，实际上这类事情是用不着戴高乐亲自出马的，总会找出各种各样巧妙的替代办法。

第一轮选举原来估计可以产生 80—100 名议员，实际当选的只有 39 人，只占 465 名议席的 9%。果然不出戴高乐所料，选票在政党中分散了，特别是左翼政党难分上下。共产党获得选票占登记选民的 14.3%，社会党获 12%。因此，在第二轮选举中很多选民就要改变方向了。

第二轮选举仅隔一星期，结果，保卫新共和联盟获 26% 的有效票，温和派获 24%，共产党获 21%。但是，他们所获得的议员席位，却不能按有效票的比例来分配。结果，在法国本土 465 个席位中，共产党议员 10 名（如按第一轮结果实行比例代表制可达 87

名）；社会党议员 44 名（比例代表制可达 72 名）；激进党议员 23 名（比例代表制可达 62 名）；人民共和党议员 57 名（比例代表制 53 名）；保卫新共和联盟议员 198 名（比例代表制只有 82 名）；温和派议员 133 名（比例代表制只有 94 名）。这样，议会席位的分配，使支持戴高乐的力量占了稳定多数，

“组成了一个相当扎实和坚定的核心，”有利于戴高乐的政策主张依照法律程序得以施行。

按照戴高乐的想法，原来是打算由保罗·雷诺，这位德高望重，曾在 1940 年 6 月之前给过他许多支持，现任宪法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政治家出任国民议会议长。但是，沙邦—戴尔马宣布他要竞选议长。尽管沙邦—戴尔马获悉了戴高乐的意见，仍然坚持己见。在第一轮选举中就击败了保罗·雷诺，雷诺退出了第二轮竞选。沙邦—戴尔马当选为国民议会新议长。戴高乐并没有因此而恼怒沙邦—戴尔马，在《希望回忆录》中，他没有提到这件事，反而把沙邦—戴尔马当选，视为他政治体制改革的“显著标志”，并给沙邦—戴尔马写了一封亲笔贺信。

紧接着议会选举的，是总统竞选。说是竞选，实质上是有“选”于“竞”。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 1 卷，第 79 页。另见拉古杜尔：《戴高乐》，第 2 卷，第 657—658 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 2 卷，第 660 页；《我的将军》，第 325—326 页；《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 41 页。

戴高乐早就打定主意要当爱丽舍宫的主人，可是事到临头他也有“为难”之处。因为现任总统虽说是第四共和国的总统，但毕竟还有两年任期才满。1958年11月底，戴高乐拜访科蒂，询问对自

己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意见。科蒂本来有意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任至期满，但现在新宪法已经实施，旧的共和国已经结束，再任两年已属不可能，面对戴高乐这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他也不可能再去争夺新总统的职位。因此，科蒂不失身份地告诉戴高乐，既然新宪法已经颁布实行，戴高乐和他继续担任现职都不合适。

戴高乐去询问科蒂的意见，纯属是出于礼貌，他决不可能像科蒂说的那样：在此之前，戴高乐还没有作出决定是否当总统候选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眼前现实，也不符合戴高乐的一贯思想。如果新宪法中规定的总统地位还与以前一样，那完全可能戴高乐不去争这个位置，可未来总统将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国家元首，戴高乐如果不当，那他的前途只有一个：再次退出政治舞台。因为总不能设想戴高乐会在一个有实权的国家元首之下当总理吧？因此，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戴高乐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他只不过是想要由科蒂嘴里说出来。这样，两个人都保全了面子，免得后来尴尬。

12月2日，政府公报宣布科蒂总统不参加新总统竞选。这样，戴高乐就成了候选人之一。另两位候选人是共产党的乔治·马拉内，他是塞纳省参议员，还有民主力量联盟的阿尔贝·夏特莱。

按照宪法规定，总统选举采用间接选举法，由参议员、国民议会议员、省市参议员、市长等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选举团，选举国家元首。这个选举团实际上就是参议员选举团。12月21日，戴高乐获得了8万张选票中的62000多张，占78.5%；马拉内得1万张，占13.1%；夏特莱得7000张，占8.4%。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1959年1月8日，戴高乐举行了总统就职仪式。在爱丽舍宫前，科蒂热情地迎接了他，戴高乐称科蒂“以庄严的举止和感人的言辞”迎接他。科蒂说：“法国人中的第一人现在变成了法国第一人。”午饭后两位总统并肩乘坐专车，途经爱丽舍大街前往凯旋门前的无名英雄墓致敬。沿途群众欢声雷动，高喊“谢谢科蒂”和

“戴高乐万岁！”陪同戴高乐前往凯旋门的，还有参议院议长加斯东·莫内维尔，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尔马，有希望当总理的米歇尔·德勃雷等人。人们都在猜测，在凯旋门的仪式结束后，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中，谁将有幸被召陪同戴高乐乘车返回爱丽舍宫呢？戴高乐没有将宠幸加在这三人头上，却冲跟了他将近14年、当了半年内阁办公厅主任的乔治·蓬皮杜打手势，招呼他一同返回爱丽舍宫。这个举动曾使在场的人均感吃惊，过后也是无法理解。因为很快，蓬皮杜就辞去了公职，料理洛希尔银行的业务去了。直到1962年和1969年，蓬皮杜出任总理和总统，人们才回味出其

中的奥妙。

戴高乐当选总统，根据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1卷，第83页。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41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687页。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1卷，第84—85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688页。

的提议，任命其他部长”（第8条），他就有权选择总理，组织政府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任命总理，是由总统根据需要对人选作出决定，而不是根据外界的影响，也不是根据议会的表决或多数少数来决定的。

1月8日下午，回到爱丽舍宫后的戴高乐立即召见了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同他讨论了组织政府的问题。并要求德勃雷就组织政府的具体方案（机构和人选）拿出建议。第二天下午5时半，德勃雷再次被召往爱丽舍宫，就总的政策设想以及政府机构和人选提请戴高乐批准。戴高乐任命德勃雷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届政府总理，并批准了首届政府的其他成员。

德勃雷政府从机构上来说基本上是上届戴高乐政府的延续。共有27名政府成员，其中有18名是议会多数派成员，即属戴派或亲戴派。这中间，保卫新共和联盟8名，温和派的独立党5名，人民共和党4名，激进党1名。他们代表了多数派的所有较大的政党。由于经济和财政政策上的分歧，社会党人没有参加政府，因此，像居伊·摩勒，皮埃尔·弗林姆兰这样的著名人物就不在政府之中。27名政府成员中，有17名是当选议员，他们立即辞去了议员职务。还有10名不是议员出身，大部分是从高级公务员中选拔出来的“技术专家”。这种成分的变化，显示了新政府在脱离过去那种对议会的依附关系。

德勃雷就任总理40个月，戴高乐称他为“站在最前列的新制度的建筑师之一”。40个月里，这个最初由27人组成的政府班子，成员发生了很多变化。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里，曾对此作过详尽的介绍。

议会选出来了，总统选出来了，政府也组成了。根据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原则所确立的戴高乐政治体制，已经初具规模了。但是，它还不是巩固的。戴高乐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完善，是与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连结在一起的。

阿尔及利亚问题

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将改革政治体制放在首位。他认为，在一个新的政治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不可能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个看法颇有道理，不然，为什么在此之前那么些政治家、那么些政府都无能为力呢？1962年6月8日在电视广播演说中，戴高乐在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明确说道：“1958年，当我们直接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共和国的政权陷入瘫痪状态，……但是，一旦国家政权重新建立起来，避免了灾难，接着由全国80%的大多数票通过了必要的政治制度，从而肯定了国家的复兴之后，我们就能够逐步地使这一问题得出一个结果。”1958年的半年里，戴高乐制定了新宪法，成为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并组成了一个听命于自己的政府，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戴高乐才敢于逐步地提出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具体方案，同时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视为巩固和检验新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1958年6月4日，也就是议会刚授权给戴高乐的第二天，戴高乐在法国空军战斗机的护送下，乘坐“快帆”式飞机来到阿尔及尔。整个阿尔及尔又一次沸腾起来，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法国居民，都来到大街上，欢迎戴高乐。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295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3卷，第421页。

戴高乐来到总督府阳台上（这儿曾经是5月13日动乱的“检阅台”），对着楼前成千上万的人发表了讲话，一句“我了解你们！”博得了全场热烈欢呼。不管是主张不能放弃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还是要求独立和解放的阿尔及利亚人，似乎都从戴高乐这一句话中得到了精神安慰。这是多么奇怪的现象，两种持对立情绪的人，两种持对抗观点的人，竟然因为戴高乐的同一句话齐声喝彩。

其实，“我了解你们！”这只不过是一句模棱两可、空洞无物，解决不了任何具体问题的话。但是，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说，这不是有感而发的即兴讲话，实际上是经过仔细斟酌的，为的是让他们感到高兴，取得感情联络，但又不能超过限度的话。于是，不管是法国人还是阿尔及利亚人，都以为戴高乐了解他们。

但是，那些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人，对戴高乐还是存有戒心，因为他的讲话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是希望戴高乐挽救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才拥戴他上台的，现在从他嘴里听不到一句明确表态的话。据德布瓦西厄回忆，戴高乐告诉他是有意不表态的。就在戴高乐走向阳台讲话的时候，他随行而来的两位部长雅基诺和勒热纳被人关在一个办公室里了。

在瓦赫兰演说时，“戴高乐万岁”的喊声被“军队执政”和“苏斯戴尔万岁”的喊声淹没，在阿尔及尔，也到处是“萨朗万岁”、“马絮万岁”、“苏斯戴尔万岁”的喊声。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几个成员，还当面以暴动来威胁戴高乐，要他宣布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合并。

戴高乐是又气又恼，他用拳头捶桌子，他用脏话骂人，他警告以暴动相威胁的人要坐牢。但是，他的态度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6月7日，他在莫斯塔加内姆讲话时高呼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这是他第一次喊这个口号，也是他最后一次喊这个口号。有人说他是因为被疯了似的人群搞昏了头，有人说他因为太累了。后来戴高乐自己也感到喊这句口号很奇怪，他解释为“脱口”而出，认为“在平常谈话中，人们总可以说‘法国的加拿大、瑞士的加拿大’吧。”两年后，当他审查自己的演讲稿时，还要问“我真的喊过吗？”

6月9日，戴高乐任命萨朗为驻阿法军总司令和派驻阿尔及利亚的“总代表”，之后又任命阿拉尔和马絮为阿尔及尔行政长官。他给人的印象是同意这些将军们继续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

仅过几天，他又拒绝了阿尔及尔公共安全委员会通过的阿尔及利亚同法国合并的决议。

7月1日，戴高乐重返阿尔及尔，他有意冷落公共安全委员会，并宣布将允许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妇女参加下届选举。8月29日，戴高乐在视察家属

《跟随戴高乐将军》，第105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518页。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1卷，第91页。

同上书。但是德布瓦西厄回忆，戴高乐先喊“阿尔及利亚万岁”，停顿一下又加上“法国的”，（在法文中只有时间停顿问题，没有语句问题）后来是有人在录音中做了手脚，将中间的时间差抹去了。

非洲之后，又来到阿尔及尔，他对马絮在公共安全委员会中的过份作用表示不满。

10月2日，戴高乐带着一个经济发展计划来到阿尔及利亚。他在君士坦丁公布了这个五年计划，他希望在实现和平之后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来实现这项“消灭贫困”的计划。讲话结束时，戴高乐的口号是“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万岁！”

10月23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呼吁和平，并表示这种和平可以通过停火或者通过民族解放阵线的“对外组织”与法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来实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已更名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戴高乐避免使用这个称谓。“谈判”这个字眼一经出现，自然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中引起了反感。

12月12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回到巴黎（这已是重新执政后的第四次了），立即颁布法令，对驻阿尔及利亚的官员大换班，设立了文职总代表，莫里斯·夏尔代替了萨朗任总司令。萨朗被解职，使那些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人有些垂头丧气，他们感到戴高乐越来越明显地要抛弃他们。但是，戴高乐支持的“夏尔计划”，使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受到重大损失，在重点清剿下，民族解放军的根据地受到很大限制。这一现实又使他们感到还有一线希望，或许戴高乐还是想保住阿尔及利亚。

戴高乐到底是什么打算呢？

应当说，在戴高乐重新执政的最初半年里，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不是很明朗的。他可以在集会上喊“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之后，又喊“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万岁”，他可以在表示“希望同阿尔及利亚人一起确定有关阿尔及利亚前途的条件”之后，又推行以重点清剿为主的“夏尔计划”，以武力手段摧毁起义者的基地。戴高乐的这种态度，给人留下了一个至今也争论不休的难题。因为对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抱不同主张的人，都说从戴高乐那儿得到过支持。有人说他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弃阿尔及利亚，只不过是装出维护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样子；有人说他定了具体目标，但对于如何实现目标却没有把握；还有人说他首先希望实现军事胜利，然后再设法找到最典型的法国式的解决办法。一些人说，将军同他们谈话渴望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一旦需要，甚至打算让革命者得到完全独立；另一些人说，戴高乐鼓励他们对“叛乱分子”执行镇压政策。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说明戴高乐无论如何要将法国从阿尔及利亚问题中解脱出来。只不过他还不能太明确地表态。因为戴高乐式的体制还不健全，他对自己的权力和威望能否足以控制可能引起的新的动乱，心里还没有底。

经过新宪法的公民投票，经过总统选举和新政府成立，戴高乐心里有底了，他觉得可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态度也就越来越明朗了。

1959年1月8日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戴高乐谈到，一个同法国保持密切联系的阿尔及利亚，在法兰西共同体内，将有它自己的选择余地。

1月13日，法国政府在戴高乐主持下决定采取一些缓和对抗的政策。决定陆续释放关在阿尔及利亚俘虏营的民族解放军战士，估计有7000人可以获释。180多名已被判处死刑的人将暂不执行，据戴高乐称这是“全部被叛处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69—71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3卷，第72页。

死刑”的数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本·贝拉及另四名领袖，也从巴黎最令人生畏的桑泰监狱转移到埃克斯岛。他们在桑泰监狱已关押两年多，戴高乐说“他们今后将得到款待居留在埃克斯岛”。与此同时，政府还释放了另一名不同派别的民族独立老战士迈萨利·哈杰。

3月25日，戴高乐举行了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回答了阿尔及利亚是否还会留在法兰西共和国内的问题，表示在加强绥靖工作的同时，以新的个性改造阿尔及利亚。

4月29日，他同《瓦赫兰回声报》社长皮埃尔·拉丰有一次谈话，谈话内容《瓦赫兰回声报》第二天就发表了。戴高乐比较明确的观点见报了。他说“这些活动分子和追随者们坚持要保留‘父辈们的阿尔及利亚’，但‘父辈们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死了，谁不懂得这一点一样也要活不下去。”但在同一次谈话中，他还表示不了解民族解放阵线，“当然，它代表一股重要的军事力量，但在我看来，它不代表阿尔及利亚，甚至也不代表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只提到前面那句话，没提后面这句话，也许是事隔十来年，他已不愿再提已被历史证明他说得不对的话。

5月1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费尔哈特·拉巴斯在贝鲁特发表声明：“我们准备在中立国境内同戴高乐将军会晤，不提什么先决条件……我们准备同法国政府谈判……也不排除民族解放阵线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的可能。”民族解放阵线首次发出了愿意谈判的信号。

8月底，戴高乐视察了驻阿尔及利亚军队的防区，他想仔细看看军事镇压的实际效果以及前景。军事行动虽然卓有成效，但是，当地阿尔及利亚人的情绪使他感觉到，事情永远也不会有尽头。这种无休止的军事行动，还可能诱发新的动乱，加剧民族分裂。戴高乐对这一次视察的感受，在他的《希望回忆录》中有过非常生动而具体的描述。戴高乐在视察中召见了军官们，他告诉他们，单靠军事行动已不可能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只有双方达成一定协议，才有可能解决问题。为了法国的利益，只有同阿尔及利亚人一同达成协议。然后，他对军队提出了警告：“至于你们，请你们记住！你们不单纯是军队，你们是法兰西的军队。你们只有依靠法兰西、为了法兰西，并为它效劳才能存在。按照职务和责任来说，部队必须服从我，法兰西才能生存。我坚信你们是服从我的，我以法兰西的名义感谢你们。”

9月16日，戴高乐发表了一次关于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重要电视广播讲话，正式提出了他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具体方案：首先是停火实现和平，然后在四年之内由阿尔及利亚人实现自决。选择的方案有三个：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而独立；与法国一体化；与法国保持紧密联系的阿尔及利亚人自治的阿尔及利亚。

11月10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愿就自决权的问题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谈判，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88—94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59—60页。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78—79页。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81—82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70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3卷，第117—122页。

到这时，戴高乐的态度已经比较明朗了，他要把阿尔及利亚的前途交给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去选择，承认“自决权”，实质上就等于允许阿尔及利亚人选择独立，而且事情的结果，必然是选择独立。戴高乐要放弃阿尔及利亚是断定无疑的了，这一决策，便使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和动乱不可避免了。

戴高乐关于自决权的决定，在社会政治舆论中引起了各种倾向的根本分歧。

在法国本土，赞成的舆论占大多数，政府内部也大体上赞同。10月16日，国民议会为此进行辩论，表决结果是441票赞成，23票反对，28票弃权。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除去在参加谈判的代表名单上有分歧之外（他们要求由在押的本·贝拉等五人为谈判代表遭拒绝），对戴高乐的态度也表示欢迎。

但是，从总体上人数不占多数的反对者，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力，能量很大。反对戴高乐主张的势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种是在法国社会政治生活上层有影响或有实权的人物，像任过总理和部长的乔治·皮杜尔，任内阁部长的戴派骨干人物苏斯戴尔，现任部长科尔尼—让蒂尔，就连内阁总理德勃雷，也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抱同情态度。二是来自法国军队，特别是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高级将领，像法国当时唯一的元帅朱安，像马絮、夏尔、萨朗、儒奥、泽勒等，正是他们策动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暴乱。三是来自80万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称为“黑脚”），他们唯恐失去一百多年来在阿尔及利亚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在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有组织的活动已经越来越激烈，示威游行不断，而且在集会发言和散发的传单中，已出现了鼓动武装暴动的煽动性口号。当地报纸已开始转向，攻击戴高乐。政府官员和部队军官也开始一些非正常的组织活动，他们在寻找迫使戴高乐改变主意的办法。

在法国本土，乔治·皮杜尔组织了一个“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联盟”，他于12月前往阿尔及利亚访问，发表了一系列煽动性演说。朱安元帅也发表了许多谈话和文章，那位对当初法国战败负有责任的魏刚将军，也乘机加入了抨击戴高乐的队伍，在军队中施加影响。

1960年1月19日，德国《南德意志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康普斯基在阿尔及尔采访马絮将军的谈话。马絮在谈话中表示不理解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并说军队不会离开阿尔及利亚。戴高乐称他放肆地痛斥了自己的政策，立即作出了反应，让德勃雷打电话询问实情。马絮对公开发表的东西持否认态度，并表示对戴高乐的忠诚，阿尔及尔军方也表示“那位记者没有弄清楚马絮将军谈话的意思”。但是，西德总理阿登纳提醒戴高乐，不要同那位记者弄僵了，“他口袋里可能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

戴高乐怒火中烧，他不能容忍一个高级军官如此公开蔑视他的权威。1月22日，他通知在巴黎参加内阁会议的总司令夏尔，立即让马絮返回巴黎，解除军队和政府中的一切职务，并不得再回阿尔及尔。夏尔对这个决定持反对态度。他对戴高乐说，没有马絮，我就失去了确保阿尔及尔秩序的手段。戴高乐回答得很干脆：“然而，你有军队，有警察，有我的支持……我给你一个克雷潘代替马絮。为了维护国家威望，马絮不得再回阿尔及尔。为了维护国家威望，你必须回到那里去。我授予你一切权力。如果有必要使用武力，

你就使用。你就是你的手段的主人。”

戴高乐撤换马絮和对付由此可能引起过激反应的决心，招致了政府内部一些人的不同意见。德勃雷和武装部长吉约马感到对前景失望，他们忠于戴高乐，但又怀疑他这样做的后果。邮电部长科尔尼—让蒂尔反对戴高乐的武力政策，并为阿尔及尔的法国人的动机辩护。至于苏斯戴尔，他已经成了阿尔及尔法国人的“精神领袖”，早已公开了他同戴高乐的分歧。朱安元帅对戴高乐说，如果你下命令开火，我就公开反对你。

“马絮事件”在阿尔及尔的反应是激烈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在23日发动了示威，示威者强占了许多建筑物，在路上设置路障，扒开铺路石，高呼“绞死戴高乐！”24日，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行动酿成了流血事件。军队内部也开始混乱了，他们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或者是不愿意向这些曾在战争中支持过他们的当地法国人采取行动。

1月25日，身穿军服的戴高乐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提醒公众注意，20年来他一直代表国家正统，他警告说，必须用武力恢复公共秩序。他将履行他的职责。他认为暴动者就是想让他放弃自决权的决定，他决定不作任何让步，要求军队服从命令。由于总司令夏尔的妥协态度，使阿尔及尔的秩序难以恢复。29日，戴高乐重新穿上军服在电视台发表演讲。他再次肯定了坚持自决权的决心，要求全国给以支持，他表示“那些梦想篡位的叛乱分子拿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决定作为借口，但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明白一点，我是决不会改变决定的！”

戴高乐的强硬态度起到了镇静作用。增援部队到达后，暴乱分子被迫撤出据点，他们的头头或是被捕，或是逃亡，阿尔及尔暂时恢复了平静。

1960年2月2日，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予政府为期一年的特别权力。紧接着，戴高乐改组了德勃雷政府。苏斯戴尔和科尔尼—让蒂尔被清出内阁，吉约马调换了岗位，由皮埃尔·伊斯梅尔接任武装部长。

戴高乐小胜了一场。经过这一次较量，他相信了自己的威望和政权的力量，但是，他也看到还会有麻烦，特别是军队的状况令人担忧。于是，他一方面不辞辛苦去阿尔及利亚视察基层军营，一方面加紧恢复同民族解放阵线因暴乱而中断的接触和谈判。

受戴高乐之托，乔治·蓬皮杜好几个月来一直以他洛西尔银行的职务为掩护，来往于阿尔及利亚和巴黎，秘密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各方代表接触，商谈停火条件和最终解决办法。后因

阿尔及尔动乱而中断。直到1960年6月10日，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才到爱丽舍宫同戴高乐会谈。25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派出代表又同法国政府谈判。但是双方一直僵持了几个月：戴高乐坚持先停火后谈判，民族解放阵线坚持先给以自决保证才停火。

11月4日，戴高乐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向全国发表了一次重要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92页。

同上书，第97页。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88—89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101—102页。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1卷，第275页；《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第648—649页。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96页。

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第一次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这个词。虽然不是承认它的存在，而是否定它的存在，但在结构严谨、词意不易混淆的法语里头出现，则预示着戴高乐考虑到了它的将来。

这个提法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使暗中涌动着的不安和骚动，又逐渐公开化了，就连一直在忍受痛苦的煎熬，沉默地服从的德勃雷，也忍不住“一下子爆发了”。戴高乐在演说中还表示要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同意阿尔及利亚自决。公民投票决定在1961年1月8日举行。

为了确保自己的决心得以实施，戴高乐于11月22日任命若克斯为负责阿尔及利亚事务的国务部长。这意味着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总理德勃雷已被绕过去了。

在举行公民投票前的两个月里，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异常紧张，示威游行不断，抢劫大楼，爆炸事件常有发生。一些上次暴乱中受审获释的人又开始密谋活动，一个“秘密军队组织”已制定了包括暗杀戴高乐在内的一系列恐怖活动计划。在巴黎，朱安元帅以断绝同戴高乐“50年的友谊”为代价，抗议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已宣布辞职被召回巴黎的萨朗将军，跑到西班牙鼓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

1961年1月8日，公民投票结果表明，法国人的绝大多数赞同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即取得76%的多数，在阿尔及利亚，赞成票占70%。

既然法国的绝大多数人都赞同，还有什么可退缩的呢？历来相信法兰西和法国人赋予的权力是最高权力的戴高乐，对这一结果的反应是：“大功告成！”

正当从2月份开始，戴高乐派出具有半官方身份的蓬皮杜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在埃维昂谈判时，一场更大的危机已经在策划中了。

1月25日，总司令夏尔宣布退休，原因是不能接受政府的政策。4月20日晚，夏尔同曾任过陆军总参谋长的安德烈·泽勒同机秘密飞到阿尔及尔，儒奥已在那里。过几天，萨朗从西班牙也来到阿尔及尔。夏尔一到阿尔及尔，几个受到控制的伞兵团立即出动，占领了所有要害部门，逮捕了戴高乐派去的总代表、总司令、警察局长以及一名正在视察的政府部长。22日，四位将军署名的公告发表：宣布戒严。宣布成立军事法庭。宣布将逮捕和审判直接参与放弃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行动的人。宣布任何反抗，不管反抗来自何方，都将予以粉碎。

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军事政变。

戴高乐的反应异常镇静而迅速。他的第一个决定，是派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若克斯和总参谋长奥利埃立即前往阿尔及尔，到那里代表政府发布命令。与此同时，德勃雷总理通过电台广播，呼吁恢复秩序，并宣布阿尔及利亚的军事领导人必须服从戴高乐将军。断绝了同阿尔及利亚的所有交通往来，逮捕或监视了巴黎军队中的嫌疑分子。内阁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戴高乐开始援引宪法第16条，行使特殊权力了。

4月23日，阿尔及尔参加军事政变的军队进一步扩大，秘密军队组织成员也身着制服在街头公开露面，为所欲为。若克斯和奥利埃几乎没有收获好

不容易才返回巴黎。当晚，戴高乐再次身穿军服发表电视广播讲话。

在阿尔及利亚，通过一次军事哗变，成立了一个叛乱政权……

这个政权表面上是由混血儿的退役将军组成，实际上政权掌握在一帮抱党派偏见、野心勃勃和头脑发热的军官手里。这一帮人行动诡秘处事果断。他们的疯狂性使他们从被歪曲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国家和世界。他们的行径正将国家直接引向灾难……这样，国家受到愚弄，民族遭到蔑视，我们的政权不稳，我们的国际威望下降，我们在非洲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损害。这是谁造成的呢？唉！唉！是那些本来应以服务和服从为自己职责和荣誉的人。

我以法兰西的名义命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我说的是一切手段，布下天罗地网，直至把他们一网打尽。我禁止所有法国人，首先是所有士兵，执行他们的任何命令……这些篡夺政权的人的下场只能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在祖国面临的灾难面前，在威胁共和国的危亡面前，我征求了宪法委员会、总理、参议院议长和国民议会议长的意见，我决定行使宪法第 16 条。从今天开始，如果必要，我将直接采取我认为形势要求的措施。因此，为了现在，为了将来，我将维护民族授予我的法国的共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权力，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将保持这种合法性，直到我的任期届满，或者直到我丧失能力或生命终结的时候，而且我要采取一切措施来确保它在我身后继续存在下去……

法国男女公民们，请你们帮助我！

戴高乐的形象和讲话显示了神秘的作用。仅隔一天，叛乱的势头就减弱了。25 日，中下层军官开始动摇，他们觉得搞错了。从巴黎传来的消息使他们感到震惊：23 日夜里成千上万的巴黎人拥向街头巷尾，说是从阿尔及尔来了空降部队，已经组织了“爱国民兵”部队，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在谴责这次政变。既然戴高乐和整个国家都说这是错的，他们为什么还要干呢？

25 日晚，泽勒换上便服逃跑了，几天后投降。夏尔第二天早上也投降了，立即被宪兵押送到巴黎，关进了那个可怕的桑泰监狱。可是萨朗和儒奥却坐着卡车跑了，他们转入了地下活动，与“秘密军队组织”不断策划新的阴谋。

由于案情重大，案犯地位较高，戴高乐估计一般军事法庭将无能为力，他下令组织了一个最高军事法庭，仅用三天就作出判决：考虑到主动投降等因素，对夏尔和泽勒酌情从宽，每人 15 年徒刑，被褫夺军衔和勋章；萨朗和儒奥缺席判处死刑。儒奥于 1962 年 3 月被捕，仅过一个月萨朗也被捕归案，戴高乐免了他们的死罪。

叛乱既然平息，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就照常进行了。

1961 年 5 月 20 日，在埃维昂市举行了正式谈判。该市市长卡米勒·布朗就是因为同意该市为谈判地点而被炸弹炸死。谈判因撒哈拉归属问题中断了半年之久。经过两次秘密接触，特别是戴高乐 9 月 5 日宣布承认撒哈拉属

于阿尔及利亚之后，1962年3月7日，在埃维昂市恢复了正式谈判。18日，双方达成协议：停火，公民投票通过自决权，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合作。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法国殖民主义者中的顽固派并没有停止过他们的破坏活动。特别是“秘密军队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恐怖破坏活动，试图引起混乱，激化矛盾，给戴高乐制造各种社会难题，阻挠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实施。秘密军队组织的暗杀目标头一号就是戴高乐本人。有文字记载的对戴高乐的谋杀就有四次，其中两次险些得手。即使如此，戴高乐也不屑一顾，他说道：“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自决权的公民投票，登记选民的90%参加了投票，赞成独立的票达99%以上。7月3日，戴高乐正式宣布“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当然是阿尔及利亚人民长期坚持浴血斗争的胜利成果，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对于法国来说，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戴高乐凭借着新建立的政治体制赋予他的总统权力，凭借着大多数法国人渴求和平安定的愿望，以他个人的勇气和胆略，成功地制止了军事叛乱，既检验了新政治体制，也巩固了新生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有人认为这“必将为法国政治开辟一个新的方向”，有人则称之为“第五共和国真正的开端”，也有人认为这标志着“第五共和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不管怎样，它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其主要的一点，是通过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整个法属非洲问题的逐步解决，有力地向全体法国人证明：“正是因为新的制度使国家能够采取行动，并不是像旧制度那样只能阻碍国家采取行动，所以政府才能作出决定，而不是一贯地搪塞推诿，所以它才能站得稳，而不是不断地动荡和倒台。”多年来党派政治操纵下的权力机构无力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戴高乐领导之下的新体制中才得以解决。新体制的确认和巩固，为戴高乐进一步完善它并促使法国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条件。

戴高乐体制的再完善

阿尔及利亚事件的解决已充分说明了新体制能使法国政治生活逐渐走向稳定。但是，这个稳定能否持久下去，仍然还有疑问。旧政党体制下议会的权限虽然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在许多人的思想中旧观念还没有失去影响。

1962年4月15日，蓬皮杜出任总理代替了德勃雷。德勃雷辞职，当然是戴高乐授意的，宪法规定了总统这项权力。尽管戴高乐对德勃雷赞赏有加，但毕竟反映了两入之间的政见分歧和政策分歧。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是德勃雷主持起草的，他忠于戴高乐，忠于戴高乐的“贝叶精神”，起草了一个符合戴高乐意愿的宪法。但是，他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或者是明白了不想那么干：戴高乐1958年认可的宪法，有些想法只是暂时的，为的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条件成熟还是要变动的。比如，1958年宪法中虽然限制了议会权限，但德勃雷认为，随着新议会的成立和形势的正常化，1958年宪法由于有议会制的一面，就能在更好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他早就表示过“给法国以议会制”。可是，戴高乐想的不一樣，他根本就不想要那种政党操纵下的议会制，他想的是进一步加强总统权力，向总统制过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141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3卷，第422页。

渡。两人之间这种政见分歧，再加上在阿尔及利亚政策上的不同主张，终于导致了政府改组。

阿尔及利亚危机渐渐平息，法国政治生活中原有的积怨又开始冒出来。那些希望分揽权力的政党希望在阿尔及利亚事件后，国家元首，也就是戴高乐的权力要逐渐缩小，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权力不能在正常生活中使用，他们所谓正常的政治生活，实际上就是过去那种政党主持议会的制度。戴高乐根本就没想到要缩小自己的权力，他想的反而是要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而且使这种权力得到最可靠的确认，任何个人，任何政党都无力蔑视或推翻。

早在“贝叶演说”中，以及在1958年宪法中，都是确定国家元首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还没有提出由广大选民直接选举国家元首的条文。也许，这是戴高乐上台伊始，对选民是否充分支持他没有把握，不敢把自己直接交给广大选民决定取舍，于是采用了选举团选举法。由选举团选举总统，比起过去仅仅由两院议员选举总统来说，已经大大减少了议员在总统选举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提高了总统免受议会节制的权力。但是，选举团仍然容易被不同政党或利益集团影响和控制，这与戴高乐的一贯主张还是有很大差距。为了使政党和议会像政府一样，能够按照戴高乐的原则来治理法国，戴高乐决定借用“法兰西”和“全体法国人”的力量，这是1940年以来，他一直坚持用的一个办法，因为他认为自己代表法兰西，代表法国人民。具体做法，就是将选举团选举总统变成由选民直接选举。

总统由普选产生，就意味着要修改宪法。宪法第89条规定，修改宪法须经参议院和国民议会进行审查和同意。议会各政党议员团早就担心自己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现在把本来应由他们选举的总统交由全体选民去选，当然地引起了各反对党的强烈反应。1962年2月，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就指示参议院，如果修改宪法，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办理，即要征得议会同意才行。

但戴高乐偏想绕过议会来达到目的。因为他分析了议会中各党团的力量和倾向，估计到修改宪法的提案在议会通过有一定困难，胜负难测，于是他决定提交公民投票去表决。

1962年9月12日，政府通过决定，宣布就普选总统举行公民投票。但就是否应由公民投票来决定修改宪法，也引起了激烈争议。许多党派议员为了反对修改宪法，提出公民投票这个程序不是修改宪法的正常程序，因为修改宪法已有明文规定。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认为这是“预谋策划、为所欲为、居心叵测和肆无忌惮地违反宪法”，曾任宪法咨询委员会主席的保罗·雷诺，反应也极其强烈，他在议会中说：“对我们共和派来说，法兰西就在这里（指议会），而不是在别处。”

但是，戴高乐毫不动摇。特别是8月22日发生他险遭不测的谋杀案，他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合乎情理的理由，即他自己是在特殊情况下成为总统的，他今后的继任者们很难说会像他那样在1958年受到那么大的信任。如果不是依赖全体选民的明确支持，就很难有一个能够驾驭局势的人，也很难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共和国。戴高乐“以牙还牙”，他也引用宪法条款来证明公民投票决定修宪不违法。他引用宪法第3条：“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140—141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276页；《跟随戴高乐将军》，第175—183页。

通过自己的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来行使国家主权”。而且第 11 条规定公民投票的内容可以是有关公共权力机构的组织，而戴高乐认为，选举共和国总统首先就是一件有关公共权力机构组织的问题。戴高乐还多次发表演说和讲话，要求全体选民支持他，并明确指出，如果不能达到他的愿望，他的“任务很快就会结束”，而且不可挽回。由于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戴高乐根据权力宣布解散议

公民投票按期于 10 月 28 日举行。结果，在有效票中赞成票占 62%，反对票占 38%，大多数选民同意修改宪法，同意总统选举由普选产生。这样，戴高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就基本完成

戴高乐体制的特征

戴高乐创建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从总体上说，是对法国近 200 年共和史进行重大改革之后的一种延续。说它是一种延续，是因为这种体制的基础没有变，它仍然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它的性质没有变，仍然是资产阶级执政的共和体制，只不过是易分散于不同政治派别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相对集中到更能够代表整体利益的派别手中。但是，它毕竟有别于过去的体制，翻开了法国政治生活新的一页。

一、大权独揽与议会民主。

戴高乐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对延续多年的法国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戴高乐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宪法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为国家元首，大大加强了总统职权，削弱了议会的权力，降低了总理和内阁的作用。

依据宪法，戴高乐成了掌握实权的国家元首，他决不愿意当那种挂名总统或礼仪元首。这一点，与以往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就有了实质性的区别。宪法规定，戴高乐成了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人”、“公共权力机构正常行使”的“仲裁”。再加上直接任命总理和决定内阁成员，并赋予解散议会、决定公民投票和行使非常权力三项特权，使得戴高乐成了法国唯一说了算的人。

戴高乐所拥有的总统权力，其中有一大部分是通过改革从议会中“夺”来的。改革后的政治权力体制，使法国传统的议会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总统权力的扩大，议会的权力大大削弱了，法国成了戴高乐称之为“既是总统制又是议会制”的国家。

正是针对这一主要特征，议会中的反对党群起而攻之。新宪法被斥责为独裁宪法，法西斯专政，戴高乐被称为独裁者，法西斯分子，波拿巴分子。

戴高乐的主张是：不做独裁者，但要有实权。他多次以战争胜利后不久自动引退这一事实，来说明自己根本不愿、也从来没想到要实行独裁统治，如果要做独裁者的话，他那个时候不必辞职，他完全有可能实行独裁。但是，他把权力还给了共和国。结果，在政党操纵下的议会，却无视或滥用这些权力，将国家引向了灾难。他认为，加强总统权力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他说：“第五共和国宪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使国家有一个领袖。在一切事务都如此重要、艰难和紧迫的现时代，世界上大多数大国：像美国、俄国、英国、德国都是这样做的，尽管方式各有不同。我们也按我们的方式这样做。我们的方式一方面是民主的，另

一方面是适合我国长时期的历史教训和传统的。”他认为，法国的新制度既不同于过去的议会制，也不同于北美的总统制，是一种既符合均衡需要，又具有法国特点的“既是议会制又是总统制”的制度。在他看来，称呼它什么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和实际情况；“主要的是，对法国必需的是，……国家政权要有个头……”。

戴高乐比任何一位身居权位之颠的政治家都更有魄力和胆量。他很清楚，宪法虽然规定给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毕竟带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再加上反对派以此为口实，攻击他实行独裁，只有使自己的权力真正成为法国的需要，成为全体法国公民认可的需要，那才是真正的权威。因此，他特别注意采用人民直接授权的方式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比如说对公民投票，哪一位法国总统也没有像戴高乐那样频繁使用。在他看来，公民投票既反映了广大选民对提案本身的看法，更反映广大选民对共和国总统本人的信任程度。于是，公民投票便成为用来对付反对派增强自己地位的有力武器。凡属戴高乐看来具有重大决策意义，并与反对派有明显分歧的问题，戴高乐就利用宪法授权付之于公民投票。戴高乐执政时期共进行了五次公民投票，前四次都是在1962年之前，最后一次导致他下台的是在1969年。这清楚地说明，他举行公民投票主要是在他的威望高峰时期，这样做，有利于他加强地位和巩固权力。同样，改选举团选举总统为普选总统，也是出于同一目的。

这样通过法律和人民一起确认的权力，就使议会和任何政党都在戴高乐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了，就像戴高乐自己说的那样：“选举总统的人民已经把国家不可分割的权力完全赋予总统。除了由总统授予并维护的权力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权力，包括内阁的权力、民政的权力、军事的权力和司法的权力。”

宪法虽然规定，议会有权监督政府，包括质询、财政监督、政治监督，并且议会有权弹劾政府，如拒绝对政府投信任票，要求政府下台。由于政府是根据总统的指示任命和组成的，对政府的任何不满或反对措施，自然也就是针对总统来的。按照规定，一旦弹劾成功或者政府没有获得信任投票的绝对多数，总理必须向总统提出辞职，另行组织政府。但是，由于总统有权解散议会，他看到已无法继续通过政府有效地行使统治国家的权力，便可以立即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大选。这样一来，原来任期未届满的议员都要回到各自选区重新竞选。新一轮大选无疑又是各党派之间一场新的争斗，在财力和精力上对各党派及其所属议员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特别是对那些已经取得一定实力地位的党派来说，更是忐忑不安，因为前途难卜。因此，各党派议员在议会中一般都谨慎从事，决不轻率地弹劾政府或投不信任票。结果，宪法规定的一些议会权力，实际操作起来有很多条文限制和心理限制，当然就削弱了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力，但客观上又起到了稳定政府，维护政策连续性的作用。

法国是西方典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它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发源地，“人权宣言”诞生于法国，“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品。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4卷，第22页。

同上书，第3卷，第301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4卷，第168页。

物，是历代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口号，法国长期以来以“议会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均与此有关。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议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一种形式，资产阶级有意渲染美化宫的作用，是为了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掩盖它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冲突的实质，这种宣传的欺骗性往往超过于其实用价值。多少年来，尽管议会制这块遮羞布历经风雨已破烂不堪，但不管怎么说，它终究是资产阶级长期标榜的。可是在戴高乐看来，法国的议会长期以来只不过是各党派争斗的场所，它给法国带来的“灾难”，“导致法国人民要彻底改革议会制度”。戴高乐给议会规定的任务是“保证使共和制度的国家机构具有效能、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且警告：“假如不幸，议会在分裂性的鼓惑面前让步而不是同国家的共同利益溶合在一起，制度的危机将重新成为威胁”。

在法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戴高乐作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如此蔑视历代资产阶级素以标榜的议会民主，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嘲弄。

但是，并不能简单地断言戴高乐就是反对议会制。

资产阶级议会制维系统治历来有赖于三权分立的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三项权力之间相互独立、平衡、制约。按照惯例，三权分立的原则，出发点主要是维护立法权免受行政权的控制和干预，以确保资产阶级通过议会立法而控制国家权力，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这一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从王权统治中争来的权力。可是戴高乐认为，历史发展到今天，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法国的议会制度中已经不平衡了。立法权过度膨胀，包揽了行政权，必须限制立法权，加强行政权。因此，从根本上来讲，戴高乐不是要取消或反对议会制，他是要重新分配权力。可见，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也不是绝对的，三权之间的地位如何平衡，完全可以依照资产阶级的实际需要适度调整。

二、议会多数派与政党政治。

戴高乐是在否定旧政党政治的基础上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他把法国旧的政党政治贬得一无是处。

早在 1946 年的“贝叶演说”中，戴高乐就将法国遭到七次侵略，变过 13 次政体的罪过归之于政党操纵下的政治制度。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由于很难有一个或两个政党构成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坚，结果政治派别随着政局动荡越来越多，仅以 1956 年不完全统计，各种政党可达近百个。这种政党林立的局面，使政治见解难以统一，政策难以制定，或是制定了难以实施，构成了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局面。所以戴高乐坚决地表示“政府决不可从议会产生出来，换句话说，不是从各政党产生出来”。否则，政府就会成为党派玩弄“政治把戏”的牺牲品。他认为，政府“应由全国人民直接委任的一个超党派的元首遴选出来”，这个超党派的元首，自然就是戴高乐本人。

戴高乐历来以超党派自居，公开宣布自己同任何党派或组织都没有联系，“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人，而是属于大家的”，他只代表法兰西，代表法兰西人民。

但是，戴高乐决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尽管他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 3 卷，第 74 页。

《希望回忆录》，法文本，第 12 页。

把政党政治贬得一无是处，但终究还得靠政党来进行政治统治。只不过他所依靠的政党政治，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区别。

1947年，在戴高乐的直接发动下曾组织起一个法兰西人民联盟。据戴高乐自己说，他不是要组织一个政党，而是要发起一个民众运动。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直接组织者之一，长期跟随戴高乐左右的奥利维埃·吉夏尔也说：“‘法兰西人民联盟不是政党’，……在我战斗的一生中，这句话我不知重复过多少遍，我甚至问自己是否最终相信这句话。无论如何，我深信法兰西人民联盟同其他政党不一样。的确，我经历过的联盟似乎不是一个政党，我让没有经历过的人去说它是一个政党吧！”事实上，法兰西人民联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它有以戴高乐为主席的各级组织机构，它以党团名目参加议会竞选并在议会中组成了议会党团，它是后来几易其名的戴派组织的最初形式。不管戴高乐原意如何，法兰西人民联盟终究是一个和其他政党一样的政党，这已为后来的法国政治生活所证实。

在法国这样一个社会复杂，政治派别林立，具有多年政党争权夺利历史的国家中，戴高乐想以一个超党派身份的总统来推行他的实力统治，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不仅无法阻挡其他政党继续参与政治，而且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稳定和巩固，还要依靠政党，团结更多的政党来支持他的政策。

1958年10月组成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实质上就是以戴高乐派的骨干分子组成的戴派政党。这个组织在1958年宪法的公民投票和总统选举中，为戴高乐的新政治体制和当选国家元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新体制下，比较有实力的政党得以保存下来，一些比较小的政党逐渐失去了政治地位。由于总统权力过大，客观上迫使政党之间不断寻求联合合作的道路。这样，在竞争中保存下来的大党之间，围绕维护还是反对戴高乐的权力体制，逐渐形成了两大派，众多的党派斗争，演变成了两大派的较量。胜者，在议会中形成多数派，并在此基础上组织政府。败者，成为议会中的反对党。当然，两大派的胜负如何，往往取决于处于中间力量的那些党派的归附。

可见，戴高乐并没有取消法国的政党制度，而是通过他规定的新政治体制，迫使政党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政治生活中，议会、政府、总统之间同属一个多数派，这个多数派的实际领袖，自然是非戴高乐本人莫属。他怎么可能不属于任何党派呢？

三、改革先行与稳定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极其重要而又影响极大的政治战略决策。戴高乐改革政治体制的决心是坚定的，他的计划也是经过长时期深思熟虑的，他的具体步骤也是稳妥可靠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戴高乐就呼吁改革法国政治制度，他指出“法国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今天怎样重新建立我们的制度”。尽管他当时未能如愿，但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打算。到1961年，他讲的更加明确：“首先必须进行变革、革新和进步，因为这是法国强大和扩大影响的必需条件”。正因为他有这个一贯的不动摇的决心，所以不管是来自哪方面、任何一种形式的干扰，他都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坚定地走下去。

戴高乐是在阿尔及利亚事件引起内乱的局势下重新执政的。因此，面对

《我的将军》，第187页。

戴高乐在波尔多的演说，《世界报》，1961年4月18日。

混乱不堪并有内战危险的局势，戴高乐竟然先进行足以火上浇油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说他在战略决策上是胆大而英明的。这里，戴高乐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稳定发展的关系。

戴高乐认为，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在于旧体制，只有改革旧体制，才能消除不稳定因素。他认为，1958年宪法以及后来的各项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政权具有坚定性和稳定性”，“国家活动的持续性，政权的稳定、效率和均衡”像变魔术似的代替了长期的混乱和持久的危机。这种政治体制，在它创建初期，曾被所有反对党咒为“独裁制”，他们不断地在议会发动攻势，试图修改宪法，缩小总统权力，增强议会权力，均未奏效。其原因，除去戴高乐的决心之外，重要的是事实证明，法国确实迎来了稳定的政治生活。第五共和国自创建以来，这种政治体制经历了阿尔及利亚危机、1968年“五月风暴”、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安然度过了1986年的左右翼在政治上的共处，并正在接受第二轮共处的考验，赢得了35年的相对稳定局面，这不能不说是戴高乐对法国现代历史的又一贡献。这对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有趣的是，1958年宪法时至今日已30多年，不管是当初的支持者还是激烈反对者，除了争执那些总统任期是七年还是五年好之类的问题之外，都在争当执行1958年宪法的模范，再也听不到“独裁制”之说，参与国家政权的人都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宪法依据。

改革才能实现稳定，但是，稳定也是改革的保证。戴高乐对于他的政治体制赖以发生作用的原则，作过非常明确的说明：“这些原则是：国家的持续性，政权机关的稳定性，政府行动的有效性，以及新共和国为保证上述原则所拥有的手段：即全国人民委任的国家元首的职权，议会和政府分别有各自的职能，但同时又进行合作，以及直接要求全国作出裁决的可能性。”戴高乐执政期间，国家体制的“持续性”、“稳定性”、“有效性”基本上得到了验证，特别是有第四共和国的混乱局面作为参照，人们自然要对第五共和国刮目相看。

当然，持续稳定主要是体制本身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这与戴高乐本人的声望是分不开的。戴高乐在创建和巩固新政治体制的斗争中，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个人威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非常时期采用强有力的手段的客观效果。

不过，在某个特定时期根据某个特定人物的条件而制定的法规，并不见得完全适用于后来者。对此，戴高乐不是没有考虑到。他指出：“很显然，我们的制度的实行方式带有人和时代的特点。我不否认，例如我本人存在的事实是有着一些影响的”，“那些考虑公共利益和国家持续性的人关心一旦我去世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合情理的”。法国在戴高乐之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继戴高乐之后的三位法国总统，在个人声望的影响上，谁也无法与戴高乐相比，因此，虽然宪法依旧，但他们不可能像戴高乐当年那样不折不扣地行使自己的职权，更不用说特权。以公民投票为例，戴高乐使用了五次，蓬皮杜只使用一次，而且投票率远低于弃权率，吉斯卡尔·德斯坦没有使用过，1984年密特朗曾想就教育改革法案进行公民投票，终因反对党异议没有举行。再以左右翼共处为例，密特朗1986、1993年两次被迫与右翼政府共处，这种总统与政府、议会不属同一个多数派的现象，在戴高乐时期是难

以容忍的，戴高乐绝对不会容许一个反对派占多数的议会存在，更不能由他任命一个与议会多数派相一致的反对派当总理。可是密特朗就无可奈何，他既没有戴高乐那样的魄力解散议会，也没有戴高乐那样的大度辞去职务，他只好选择希拉克和巴拉迪尔出任总理，被迫接受这种明显的“侵权和分权”。

但是，即使出现这种政治局面，法国的政治生活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左翼总统与右翼总理共同治理国家，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从另一面证明了戴高乐创建的政治体制对于稳定政治局势，保持连续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四、军队与政治生活。

戴高乐系军人出身，儿时就崇拜军人，钦慕战功，少年时立志投考圣西尔军校，从19岁起，在军队直接服役30多年。从政以后，仍不解甲。戴高乐喜欢说：“我，戴高乐将军”，他也喜欢别人称他为“将军”，即使在就任共和国总统之后，除了在必要的礼仪场合，几乎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以称呼他将军而感到更加亲切。尽管他从始到终都不过是个最低军衔的将军。“夏尔·戴高乐的信仰始终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军事思想培育了这颗伟大的心灵，造就了这位巨人”，戴高乐的崇拜者如是说。戴高乐的一生，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戴高乐心目中，军队的业绩历来是与国家荣辱相关的，它与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军人的职业是一种荣耀。他在1938年出版《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他认为书中表明了自己对军队的看法，即“国家的灵魂和命运是怎样世代代通过它的军队这面镜子经常得到反映的”。他还作过“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的军事讲演，撰写过“政治家与军人”的论文，收编进《剑刃》一书。他还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思想，在法国军政界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

即使在军队最困难的时候，戴高乐也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盘没有灌上麦子的磨”，始终相信“它是即将来临的伟大行动中的一个工具”。作为工具，当然应该掌握在能够决定国家前途的人手中，不然，它也就不能如实反映“国家的灵魂和命运”。戴高乐出身军人，但他直到去世也只是个最低衔的将军，更谈不上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从战役战斗来讲，他至多只指挥过一个装甲师，而且为时不长。就军事指挥能力，戴高乐并没有显示出过人之处。但是，戴高乐过人之处在于，他深知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军队与国家政治的关系，而且能将这种想法演化成行动，牢牢掌握武装，依靠军队，巧妙地利用军队。也就是说，戴高乐与军队的关系，主要不体现在如何指挥军队的作战行动，而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将军队的作用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简言之，从军人立场出发，他懂得军队应怎样为国家服务；从政治家立场出发，他懂得国家应怎样依靠军队。

因此，当1940年贝当政府求和投降时，他发誓决不停止战斗，要使整个法国回到战争中来，“没有武装就没有法国”。他以法兰西的名义，在英国组建自由法国军队，但不是为英国提供“附庸兵”。他以法国政府的名义，想方设法参与盟军的重大军事行动，并坚持法国军队首先进军巴黎，坚决反对盟军要从刚解放的斯特拉斯堡暂时撤退。他要以此向全世界证实，法国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重建法兰西。戴高乐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争当一名战功显

赫的将军，而是为了重振自由、独立和主权的法兰西。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奋斗目标，不是一个将军的奋斗目标。

战争期间，罗斯福在戴高乐与吉罗之间失算，就是因为罗斯福没有看到两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在吉罗眼里，只有军事方面的问题，只要有一支足够的军事力量就行了，其他都是次要问题。他认为只要掌握住最大兵力的指挥权，就能掌握政权。戴高乐认为“他对军事和政治的看法可以说有些头脑太简单了”。罗斯福明知道吉罗是一个“会打仗，却不太关心政治问题的人”，结果败在戴高乐手下。可见，戴高乐的将军和政治家的双重形象在战争期间就已铸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胜利，法国战后的强国地位，戴高乐战胜吉罗，是戴高乐这个将军政治家的胜利。

戴高乐关于军队要为国家服务，国家要依靠军队的肯定看法，并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环境所迫，而是他的一贯思想。这种思想在 1958 年重新执政之后，继续得到验证。

1958 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元首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在法国军队中，握有军权的重要人物许多是战争时期追随过戴高乐的人，在内阁中，执掌国防大权的虽属文职人员，多半也是戴高乐派的重要人物。而且，国防领域属总统直接管辖的决策领域。军队服务于国家，在戴高乐心中是不能动摇的。

军队与政治之间不能划等号，军队不介入政治，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的一条公认原则。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往往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任何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无法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危急状态下忽视军队的作用。他们不是处处提防军队介入，就是直接依赖军队干预。戴高乐好像干得都不错。

首先，戴高乐的将军—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已把军队和政治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他之所以不愿失去将军的头衔，他之所以不愿脱去军服，固然有对他过去军人生涯的留念，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醒广大民众，特别是反对派和军人的注意：戴高乐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戴高乐是一个军人政治家。

在处理阿尔及利亚危机中，戴高乐的军人政治家形象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60 年至 1961 年由军队高级将领挑起的骚动和军事叛乱，最明显地体现了军队介入政治，并要以武力干预国家政治的动向。戴高乐镇定自若，因为他自信，作为政治家，他已有法可依，有权可使；作为军人，他有足够的威望足以服众，足以从心理上动摇所有暴乱的基础。在紧急关头，戴高乐身穿准将军服，佩带洛林十字勋章，多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的开场白是：“我今天所以穿着军服在电视台讲话，这是为了表示我是作为戴高乐将军和国家元首来讲的”。还有比这更明确的军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表白吗？

戴高乐在电视上提醒人们注意记住军事权威和服从的传统，他命令全体法国士兵必须服从他的命令——恢复秩序。他断然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必须用武力恢复公共秩序，要求对叛乱分子采取一切手段，一网打尽。他改组内阁，撤换怀有二心的部长。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大规模的一场政治动乱和军事暴乱，竟然在没有发生直接交火流血的情况下平息了。暴乱的首犯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 2 卷，第 18 页。

《戴高乐与丘吉尔》，第 206 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 3 卷，第 162 页。

受到严惩，阿尔及利亚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拉古杜尔在他的《戴高乐》一书中，曾以《两颗星对二十颗星》为标题，专篇描述过这场斗争，说的是戴高乐军服肩章上只有两颗星，可是他的对手，那几位主谋阿尔及利亚军事叛乱的高级将领肩章上的星，加到一起足有 20 颗。结果，两颗星战胜了 20 颗星。

如果仅仅作为将军，戴高乐恐怕难以取胜；仅仅作为政治家，戴高乐也难以获得这个结局。因为他是个掌握国家实权的军人政治家，所以他成功了。

后来，到 1968 年“五月风暴”时期，面对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抗活动，戴高乐感到个人威望已不足以服众，他已无法像以前那样在电视上故伎重演，为了挽救已经动摇的政权，戴高乐悄悄地离开巴黎，神秘地失踪了好几天。原来，他谁也没有通知就去了德国的巴登巴登，求助于法国驻德军队司令马絮将军，在得到马絮支持政府的肯定答复后，戴高乐回到巴黎，出奇不意地对反对派进行反击，终于暂时扭转了局势。

第八章

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

在谈戴高乐主义之前，有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到底存在不存在戴高乐主义，或者说，戴高乐的思想活动和政策实践能否称之为戴高乐主义？如果能，它又主要指什么而言？

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在西方，有人称之为戴高乐主义。在戴高乐之后，还有什么新戴高乐主义、半戴高乐主义甚至假戴高乐主义之说。也有人持谨慎态度，只是称之为“思想”（Pensée）、“哲学”（Philosophie）、“学说”（doctrine），或者干脆叫“与一种精神状态相联系的经验行动”（Comportement empirique）。在国内，戴高乐研究实属初始阶段。有人认为，戴高乐的思想与实践，并未完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体系，称之为戴高乐主义未免牵强。也有人持相反看法。

凡可称为主义者，即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作为实践行动总规范的指导思想。人类政治思想史发展到今天，主义之说也很难说

有一个客观公认的界定标准。康德主义当然主旨是哲学范畴，凯恩斯主义当然主旨是经济学范畴、马基雅弗里主义当然主旨政治学范畴，可是，马克思主义却包含了三种科学成分。可见，主义与主义之间，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历史上人们称之为主义的，已经是举不胜举，新的主义还在不断出现。综观戴高乐一生的政治实践活动，有着一个既定的总目标，并为此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和政策，冠之以“主义”亦无不可。

那末，戴高乐主义的主旨又是什么呢？

弗朗索瓦·德雷菲斯说道：“‘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战争回忆录》一开头这句著名的话，概括了整个戴高乐主义”。戴高乐对自己的“看法”作了如下解释：

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出来的。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个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假如在这种情形下，它竟在行为和事业上仍然表现为一个庸才，那我就认为是一种可笑的变态，其过失在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绩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以当前的我国与当前的其他国家相处，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否成其为法国。

从这段冗长的话中可以看到，戴高乐的心灵中已经奠定了一个崇高的毕生信念，他的高尚目标是：要实现法国的伟大，站在最前列，法国必须以强

《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第 311 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 1 卷（上），第 1 页。

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他的正直胸怀是：要有朝一日为法国立下丰功伟绩。他的高尚目标，是一种理想；他的正直胸怀，是为实现理想的实践。由此可见，他这种对法国的看法，从思想和实践上充分体现了戴高乐主义的主旨。

戴高乐要以他的正直胸怀实现他的高尚目标，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德雷弗斯认为：“谁都知道，1940年6月18日，当戴高乐在暮色中走出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室时，戴高乐主义诞生了”。从1940年开始的戴高乐主义，是在法国投降和大部分海外领地陷于敌手，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已无从论起，更谈不上强国或大国地位的情况下起步的。他自己被人瞧不起，他的政权也迟迟不被盟国承认，大国决策他无缘置喙，战争结束时只争到一个“准大国”地位。战后，戴高乐继续为实现高尚目标而努力奋斗。但是，战后的国际局势已进入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阶段。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主宰世界的格局下，戴高乐要实现他的高尚目标，除去要努力将法国本身治理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超级大国控制下的国际舞台上，争当一个重要角色。为此而进行的一切斗争，构成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戴高乐主义，也就是戴高乐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既然门罗、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哈尔斯坦等，均因其对外政策思想与实践的全部或部分而得名为“主义”，戴高乐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完全也可以称为戴高乐主义。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戴高乐主义，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力争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思想与实践。

东西方关系中的戴高乐

从1940年开始，围绕着法国的独立、完整和伟大，戴高乐就在按照自己的原则处理同大国的关系。战争结束后，他看到自己的主张还无望实现，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对重大国际事务的评说并没有停歇下来。他对北大西洋公约，对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对欧洲防务共同体，还有罗马条约，苏伊士战争等等的评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原则。因此，当1958年戴高乐因国内问题重新出山的时候，在法国的盟国面前，自然就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疑问：在美苏对峙之下的东西方关系中，戴高乐还会重操旧券吗？他会走多远呢？

盟国的领导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主动拜访了戴高乐。

第一个来访的是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戴高乐对麦克米伦总还有些感恩之情，他称麦克米伦为老朋友。因为他记得，战争年代他在阿尔及尔，当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遇到困难的时候，麦克米伦作为丘吉尔内阁的成员，曾不止一次地排除众议为他解难。但是，在戴高乐看来，这种感激之情只能以私人感情来回报，关系到法兰西独立、完整和伟大这个高尚目标时，那是没有妥协余地的。

1958年6月29—30日，戴高乐同麦克米伦在马提翁大厦谈了两天。尽管麦克米伦认为会谈气氛很协调，“进行了伙伴式的讨论”，但是戴高乐谈的主要精神，他是难以接受的。第一，戴高乐谈到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看

《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第67页。

《希望回忆录》，第233页；《戴高乐与丘吉尔》，第248页。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1卷，第103页。

法，认为北约组织已不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应扩大职责范围，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共同指挥的机构；第二，原子武器的控制权应由西方主要国家共同分享，为了这一点，法国无论如何要设法拥有核武器。当然，戴高乐还谈到欧洲共同市场、中东问题，但这时还不像前两个问题使麦克米伦印象深刻。

7月5日，麦克米伦刚走没几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到了巴黎。在同戴高乐会谈中，除了谈到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对苏联的看法，中心问题，仍然是核武器和北大西洋公约问题。在杜勒斯看来，面对一个日益强大而又富有侵略性的苏联帝国，西方国家应当紧密地团结起来，由美国带头抵抗。他认为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杜勒斯由于担心而激动地对戴高乐大谈美国对法国的友谊，希望法国积极参加由美国领导的欧洲安全体系。他对戴高乐说：“我们知道，你们很快就要拥有原子武器。但是，与其你们花费巨大去制造和试验，倒不如我们供给你们，这不是更好吗？”

戴高乐将他几天前对麦克米伦谈话的主要点又重复了一遍。他对杜勒斯说：“法国在作最坏的准备的同时，打算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法国都不会放弃同你们的联盟，同时法国也要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特别是在法国人看来，法国如果不承担世界责任，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职责仅限欧洲，法国又无权参与决策，所以我们对它不满。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希望拥有原子武器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防和政治才能获得独立——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同意卖给我们原子弹，我们愿意买，但必须完全由我们支配，不加任何限制。”

戴高乐6月1日才接管法国政府，他同麦克米伦和杜勒斯的谈话，无疑是对盟国的一篇对外政策宣言。美国和英国肯定感觉到，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可是他们不能理解戴高乐为什么会这样想，特别是美国，或许是理解了但又不能按戴高乐的主张去做。

戴高乐认为，1958年的世界局势与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已大不相同了。第一，战后初期由于欧洲大陆自身力量的不均衡，欧洲的西方国家害怕苏联进一步扩张势力，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阻挡苏联可能的进攻。于是，美国的存在和帮助就成为必要的依靠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是这种局势的必然产物。十年以后的今天，在戴高乐看来，苏联进攻西方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强大起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在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已没有什么吸引力，更何况在它已控制的地区麻烦已不少。与其说苏联担心欧洲，不如说它更注意亚洲的中国。第二，保证国家安全的手段也大不一样了。战后初期，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所以欧洲觉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个保障。可现在，苏联同样拥有摧毁对方的手段。不能设想美苏之间会互相摧毁对方，但是完全有可能在他们各自控制的地区使用核武器，“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第三，如果说战后初期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是有益的话，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有权支配盟国，控制盟国的防务、政治甚至领土的结果，使欧洲国家屈服于它。可是，现在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国际作用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它要求独立自主，要求掌握威慑敌人的现代化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安全。

《希望回忆录》，第225页；《戴高乐共和国史》，第1卷，第104页。

《希望回忆录》，第225页。

正是对这种客观局势的分析，戴高乐拟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他说道：因此我计划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当然不是脱离仍可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同东方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建立旨在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关系；一旦时机成熟，同中国也是如此；最后，要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不受回击的情况下进攻我们。但是，这条道路我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每个阶段都要与总的发展趋势相适应，还要注意不要伤及法国传统的友谊。

戴高乐首先冲击的目标，是以美国为盟主的北大西洋公约联盟。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按他自己的计划行动了，他自己说是“升起了我的战斗旗帜”。向谁战斗呢？向美国的盟主地位战斗，向美苏的霸权战斗，为法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法国的大国地位战斗。

17日这一天，戴高乐以法国政府首脑的身份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写了一份备忘录，正式以外交途径向美英两国阐述了法国的立场。

戴高乐在备忘录中明确提出了法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不适应安全的需要，它过去规定的行动范围、程序与现实的政治和战略已不相称。事实上，在中东和非洲发生的事与欧洲都有关，同美英一样，法国在非洲、印度洋和太平洋也承担责任，一个真正的联合防御组织其职责应扩展到世界所有地区，而不应局限在北大西洋地区。现代化武器已使过去的设想变得没有实际意义，美国也无法保持它的核垄断了，法国要求与自己的责任相应的权力。因此，戴高乐在备忘录的第二点中提出：

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和战略问题，应当委托给包括美英法三国在内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应负责对影响世界安全的所有政治问题作出一致决定，应负责拟订战略计划，特别是那些关系到核武器的战略计划，并在必要时执行这些计划。它还应尽可能地对那些从属于一般防务组织的地区（诸如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负责，如果有必要，这些地区还可划小些。

这就是说，戴高乐要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改建成一个能够管理全世界的军事组织，在这个扩大了机构里，法国同美英应该平起平坐。他还指出，法国政府认为这个安全机构是不可缺的，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或者将依照这个公约的第12条，保留要求修改公约或者退出该组织的权利。

美国当然不能接受戴高乐这个带有通牒性的备忘录，简直不可想象让美国把独自占有的决策权分让给戴高乐。杜勒斯原打

算拒绝为此举行三国会谈的建议，因为他觉得是不容谈判的。他也不相信戴高乐会走那么远：苏联在柏林问题上正扬言同东德单独

《希望回忆录》，第218页。

全文见拉古杜尔：《戴高乐》，第2卷，第639—640页；《希望》杂志，法国戴高乐研究所，1976年第15期第2页。备忘录正式发出时间为1958年9月24日。

备忘录，法文 *mé morandum*，也有通牒、照会的意思。

签订和约，紧张局势如何发展还不明朗，戴高乐会冒这个险吗？更何况法国国内因阿尔及利亚问题一团糟，戴高乐刚上台四个月，谁知道他能不能干下去？但是麦克米伦希望不要直通通地拒绝，因为英国正在同欧洲国家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他不想在这个时候惹怒了戴高乐。

10月21日，像是商量好的一样，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分别给戴高乐写了一封“支支吾吾”的信。12月初，三国大使在华盛顿进行了两次不涉及任何实质问题的讨论。

12月16日，正在巴黎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会议的杜勒斯再次拜访戴高乐。再过五天就要成为“法国第一人”的戴高乐，不知道是因为备忘录的原因，还是因为预感到要当总统的原因，他降低了对杜勒斯的接待规格，没有像上次那样去门口迎接，而且整个谈话过程中尽是不满和牢骚。杜勒斯对戴高乐明确表示，磋商是可以的，但要正式建立戴高乐提议的三国机构是不可能的。

应当说，戴高乐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本来就没有抱多少成功的希望，他只不过是“先礼后兵”。既然答复已经明确了，正如戴高乐所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事已至此，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采取行动了。”

1959年2月，杜勒斯最后一次会见了戴高乐。为了使法国留在军事一体化机构内，杜勒斯曾提出允许法国参与决定美国在欧洲部署核武器问题。但是戴高乐未予理会，因为他的胃口比这点让步要大，他要参与的是全球决策。3月6日，戴高乐开始行动，宣布法国地中海舰队不再受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指挥。6月，法国拒绝在国土上储存美国核武器，美国被迫将驻法核轰炸机撤往英国和西德。

当然，正如戴高乐自己设计的那样，他的行动不是一步到位的，“要和总的趋势合拍”：阿尔及利亚事件还没有结束，法国的原子弹还没有成功，同苏联的关系还比较紧张。他不仅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而且还要在“照顾到传统友谊”的情况下走下去。

1959年9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巴黎。戴高乐同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战友、老对手（他曾多次因如何发挥法国军队的作用同这位盟军司令发生争吵），在回味友情中开始了新一轮争论。

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气氛是热烈的。当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欢迎他的群众至少100万人时，艾森豪威尔感动地说：“就连一半我也没有指望过啊！”

戴高乐向艾森豪威尔重申了对杜勒斯说过的以及备忘录中的主要看法。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最关心的是美苏关系，因而全世界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此有关，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涉及西方利益的所有问题，“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主要取决于美国”，别的国家仅仅是跟着美国走。而戴高乐认为，现在观察东西方关系，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从这个观点出发，就有可能使东西方接近，“因此法国应当而且能够为世界各国作出榜样”，他明确了要同苏联加强往来、签订合作条约的想法。

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在新的形势下，法国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不能起保护作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法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艾森豪威尔将戴高乐这些话与盛大的欢迎场面对照起来不免有些伤感了，难道法国

人热情地欢迎他不是因为当年他这位盟军司令曾经率领军队保护他们、解放他们吗？他问戴高乐：“为什么您不相信美国和欧洲共命运呢？”

戴高乐的回答应当说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是合情合理的。他承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是法国的盟友，法国不会忘记美国的帮助。他提醒艾森豪威尔，对总统的热情欢迎就说明法国人民是记得这一点的。但是，法国人民也同样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是在受了三年漫长的痛苦考验几乎濒于毁灭的时候，美国才开始帮助，而整个战争只有四年。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更不用提了，在美国参战之前，法国早崩溃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国家总有它独特的地理、利益、制度、舆论、感情、畏惧甚至错误，它能够帮助另一个国家，但因为这些不同因素，它不可能同另一个国家化为一体。”正因为如此，法国不能依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

1959年11月3日，戴高乐到法国军事学院作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将战争期间的心得体会同新形势下的看法融合在一起，要求学员们把他的观点作为思想和工作的基础。他认为，法

兰西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国家的防务应当是自己的事情。如果有战争，应当是自己进行战争。当然，会有盟友，会有帮助，但首先是法国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作战。如果政府和军队不能担负起这个责任，那末这个政权肯定不能存在下去。因此，军事一体化的想法已经过时。在今天的形势下，法国要自己担负起国防的重担，就必须拥有适应今天形势需要的国防力量——核武器。

此后，美英法三国之间围绕北约组织机构问题，还进行过多次磋商，1960年4月在戴高乐访问美国和英国后，仍然未就三国决策机构达成协议。

1960年法国原子弹试爆成功，1962年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戴高乐对北约军事一体化采取的行动速度加快了。1960年5月，法国拒绝将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1963年1月，法国不同意将驻阿尔及利亚军队转归北约指挥，同年6月，法国政府宣布法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1964年，法国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1965年5月，法国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10月，法国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北约理事会及其机构和设施，在法国不肯更改的期限内，由巴黎迁往布鲁塞尔。1967年法国官方甚至提出了将原来单向防务战略（主要防备来自东方的威胁）改为全方位防务战略（防备来自任何方向——自然也包括美国——的威胁）的主张。

戴高乐的法国不愿再呆在这个被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下的国际机构里由人摆布了。法国不能再充当“所谓大西洋团结的霸权主义统治下的配角”。

要使这种独立性更有力量，并真正地站住脚，打破美国核垄

断，是戴高乐冲击的另一个目标。

1958年在同杜勒斯的会谈中，明确提出了美国提供核武器也要提供使用权的问题。杜勒斯没有答复。1959年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制造核武器的

《希望回忆录》，第226—231页；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351—353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3卷，第126—128页。

问题仍是重要议题。

美国一直拒绝向法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英法两国在这种问题上都需要美国的帮助。但是，因为美英特殊关系，因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立法借口“只向已有实质性进展的盟国”提供技术资料，把英国和法国明显区别对待，逼迫法国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制核武器。应当说，美国的这一政策，正符合戴高乐的性格。当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提出，研制费用浩大，很难赶上苏联的水平，起不到威慑作用，得不偿失时，戴高乐谈了自己的核战略理论观点。戴高乐对核武器的看法，首先是有与没有不一样，拥有独立的核武装（当然不是部署在国土上由别人来操纵的核武器），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和强大的标志。其次，核力量的威力，不在于拥有的数量，实质在于是否拥有摧毁敌人的手段，就好比杀死十次与杀死一次，从量上看有区别，但实质上有一次就够了。

1960年2月13日，法国在雷冈试验场原子弹试爆成功，打破了美英苏三国的核垄断。按道理说，垄断已经打破，再对法国实现核封锁和限制已失去了意义。但因为核武器的政治意义上美国与戴高乐的看法源出一穴，因此，美国只要不愿放弃它在西方国家的领导地位，就不可能改变它在核武器上对法国的政策。

1961年5月，肯尼迪总统访问法国，他给戴高乐的印象，仍然是最关心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但与过去有点区别的是，美国已不能无视法国的独立自主，肯尼迪在言谈中不想“显出触犯法国的独立”。美国态度上的这种细微变化，戴高乐是很敏感的，但也是很清醒的。他相信美国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它要放弃自己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于肯尼迪的任何一个计划，他的原则就是法国“必须出于自愿”才能合作。

肯尼迪提出把装有“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调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抵消戴高乐对美国保卫欧洲的决心的怀疑，进而法国可以考虑不要再发展核武器。戴高乐把这种做法看成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只不过是换了个“美国司令”，导弹的使用操纵权仍在美国人手中，法国并没有发言权。

1962年12月18—21日，肯尼迪与麦克米伦就核武器问题在拿骚会谈，最后达成协议，决定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多边核力量”。这一协议的用意，是继续维护美国的垄断地位，迫使法国交出它的核武器，纳入统一指挥。在1963年1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表示，法国是绝对不会参加的，把法国的军事手段并入受外国人指挥的多边核力量，是与法国的防务和政策原则背道而驰的。

紧接着，借着裁军和缓和军备竞赛的谈判，美英苏于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遭到法国、中国的谴责。戴高乐拒绝参加这个旨在阻止法国、中国发展核武器，维持美苏核垄断的条约。他指出，美苏这两个敌对国家已进行了数百次核试验，建立了能够摧毁全世界的军备，现在却要其他国家承诺永远不再进行试验，他讥讽为“这有点像是要求别人承诺不要游过英吉利海峡一样”可笑。他明确指出：“如果同意世界上这两个特权国家永远垄断这种核力量，将使世界上又建立起新的霸权，而像我们

《希望回忆录》，第226—232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359—362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4卷，第71—76页。

这样的国家对此是决不同意的。”

戴高乐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核垄断发起的冲击，显而易见，主要是对着美国的盟主地位来的。因为他重新执政后已感受到，在西方阵营中，由于美国的存在，法国有一种压抑感。法国要争取大国地位，在美国的现有地位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盟主地位，美国的霸道，已成了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的主要障碍。他只有冲破这种束缚，才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高尚目标”。

同样，戴高乐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也从另一面反映出他要独立于美国的愿望。

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将美国和苏联同样看成是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他认为，而且从来没有改变，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因此，法国只能归属于西方阵营，它始终是这个联盟的一员。不过，他认为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变化。从结构上来讲，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来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问题在于，这种寻求和平、避免战争的办法，不能靠美苏两个大国来实现，如果仅由他们来主宰世界，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德拉戈斯认为：“戴高乐将军在1946年1月以前领导政府时，就曾坚决维护其对超级大国的独立性。一直到1947年他仍主张，法国应当在超级大国之间起‘纽带，而不是骰子’的作用”。显然，“骰子”是带有赌性的一边倒，“纽带”才能周旋于美苏之间。

1958—1969年，戴高乐重新执政期间，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对立，也由于超级大国地位与一般国家的区别，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也曾多次与苏联发生对抗。最重要的有两次，即柏林地位问题和古巴导弹危机。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是，首先，戴高乐在这些冲突中，决不让它成为只是美苏之间的问题。他既要证明法国是西方联盟中的一员，又要显示出法国不是依附于美国的一个西方联盟的成员，而是“纽带”，它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接着，戴高乐又不因这些冲突而同苏联僵待对立，他毫不犹豫地越过这些分歧，单独地，而不是跟在美国后面，推行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即“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这一政策在当时情况下，是开创性的，它为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后来西德的“新东方政策”打开了缺口。

1958年11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关于柏林地位问题向西方国家提出带通牒性的建议：苏联在六个月后将把“柏林通道”交给东德管理，西柏林将成为自由市，各占领国同德国签订和约。这个“德国”当然指的是西方不予承认的民主德国，因为柏林市位于东德境内。而且建议还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拒绝签订对德和约，苏联将单独同民主德国签约。这一建议，使东西方关系立时紧张起来。

1959年5月举行了四国外长会议，9月美苏首脑“戴维营会谈”，决定柏林地位问题留待1960年5月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再谈。

“戴维营会谈”之后，一股“缓和”之风吹起来。12月19日，戴高乐

戴高乐 1963年9月25日在奥郎日的演说，《世界报》，1963年9月26日。

保罗—玛丽·德拉戈斯：《法国在美苏之间》，1988年6月中法双边学术讨论会论文。

邀请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阿登纳到巴黎，就首脑会议可能讨论的问题进行磋商。

关于柏林问题，戴高乐的态度与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有区别。戴高乐认为美英两国倾向妥协，害怕问题恶化，与苏联发生冲突。特别是麦克米伦，激动地表示决不能因为一个德国城市的归属问题把英国引向毁灭。美英两国的态度，在戴高乐看来更是证实了他的担心，美英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为捍卫欧洲国家利益而甘冒风险呢？戴高乐的态度很明确：认为苏联同样也怕冒险，如果退让妥协，苏联的胃口会更大，那势必逼使“德国变节，到东方寻求前途，因为它不能指望西方保证它的前途”。

在柏林地位上，美英的妥协态度曾使阿登纳非常不安，戴高乐的态度自然更合阿登纳的心意，这也是法德关系开始热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也意味着法国的独立性开始了在欧洲的影响。

1960年3月23日，赫鲁晓夫应邀访问巴黎。赫鲁晓夫对戴高乐又谈到了他关于柏林地位的建议，敦促西方迅速决定，否则，苏联就要单方面采取行动了。戴高乐对赫鲁晓夫的威胁作了冷静的回答：单方面签约，德国问题依然存在，西方三大国也不会让他们的军队受到耻辱，“如果你不要战争，就不要走这条路！”戴高乐在柏林问题、核武器问题上，对赫鲁晓夫寸步不让，态度是严厉的。但是，整个访问是成功的，赫鲁晓夫答应了5月份到巴黎开四国首脑会议，邀请戴高乐访苏，两国政府领导人还签署了许多具体合作协议。

定于5月16日召开的巴黎四国首脑会议，尽管四国首脑都坐到了会议桌前，却由于5月1日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境内作间谍飞行被击落而流产。在美苏两国毫不让步的紧张气氛中，麦克米伦失望而担心“他的国家受到战后最可怕的考验”最紧张的。还是阿登纳，他担心苏联抓住这件事不放、美国会妥协退让，拿柏林地位作交易。

戴高乐以东道主和会议主席身份镇住了局势。他一方面称U2飞机事件是件值得遗憾的事，另一方面说这类事美苏两家都在干。到巴黎来是为探讨和平，如果愿意，那就开始讨论。如果不愿意，那就无限期休会好了。四国首脑会议开了一个碰头会就流产了，赫鲁晓夫看来得不到实质性的东西，表示不能参加会议。说实话，戴高乐不大可能看重这种会议的实质内容，因为任何内容和决定起重要作用的仍然是美国和苏联，并不能使法国增光多少。但是对于这种戏剧性的结局，对戴高乐来说或许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位东道主，实际上已经充当了一次调解人，而且是美苏之间的调解人。更何况阿登纳在柏林问题上又过了一关，他对戴高乐感激不尽。戴高乐说，阿登纳告诉他：“由戴高乐将军主持巴黎会议，我太幸运了。多亏他性格坚强有魄力，西方国家才避免了一次首先要德国付出代价的重大让步。”在阿登纳回忆录中没有见到这种话，阿登纳在15日那天同戴高乐、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会晤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总的感受是令人沮丧的，这更使我下定决心，如昨天戴高乐向我建议的那样，要更加密切和法国的联系。”1961年6月肯尼迪同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谈”之后，使人觉得在东西方关系中，缓和又有了

《希望回忆录》，第239—241页；《阿登纳回忆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0页。

《希望回忆录》，第271页。

《阿登纳回忆录》（四），第49页。

一线希望。8 月份，“柏林墙”事件虽然又沸沸扬扬了一阵，但没有引起过度紧张，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围绕德国问题总会有事的，但不见得闹出什么大事。1962 年 10 月，因发现古巴布有苏联导弹，美国决定对古巴实行封锁，并要苏联必须在联合国监督下撤走全部导弹。苏联立即表示拒绝美国的威胁，声明要给予反击。一场导弹危机使全世界惶惶不可终日整一周，但是，剑拔弩张的架势很快就表现为虚惊一场。苏联在监督下撤走了导弹，美国“保证”不对古巴武装入侵。说到底，超级大国谁也不敢打，谁也不愿打。戴高乐又一次得到证实自己观点的实证，他虽然坚决表示支持美国的立场，但又下放过宣传拥有独立核力量的必要性。他说：“既然美国不能为离它 150 公里的古巴而战，那它一定不会为离它 5000 公里的欧洲而战。我由此得出结论，法国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和防务。”

1959 年戴高乐就向艾森豪威尔表示过，大国竞争和交易不能实现和平，应当从实际出发，使对立的国家互相接近，“开始时只从经济、文化、技术、游览方面着手，一点一点地打开铁幕”。这个“一点一点”，是与戴高乐的“总趋势”相合拍的，即法国对美国闹独立性最凶的时候，戴高乐的对苏政策就要推进一点。

1966 年前后，是戴高乐同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联盟关系最僵的时候。1966 年 4—5 月，戴高乐先派外长顾夫·德姆维尔出访东欧国家，为戴高乐推行“缓和、谅解和合作”政策的先行官。6 月 21 日，戴高乐正式访问苏联。这次访问气氛热烈，戴高乐在苏联的足迹远到西伯利亚。他在莫斯科苏维埃的讲台和苏联电视台成了名星人物，他运用这些工具，就像在国内经常使用那样娴熟。戴高乐在苏联大谈友谊，从历史上的法俄友谊讲到二次大战中的法苏友谊。他多次强调法苏之间只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而没有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他在莫斯科大学关于“俄国与法国新的同盟”的讲话，曾使记者们大吃一惊。这次访问，两国签署了多项合作协定，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和经济协定，和平利用空间探索和研究合作协定，最后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一个法苏联合委员会，以促进两国经济的长期合作。声明还特别提到：必须由欧洲的组织来解决欧洲问题。显然，法国是欧洲共同体的成员，苏联是经互会的成员，而北约不能算欧洲组织，美英自然不在欧洲组织之内，无权干预欧洲事务。

戴高乐这次访苏，开始了法苏两国领导人的经常性的会晤和磋商，形成了一种所谓“政治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当时的东西方关系中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因为历来由美苏之间商定的国际事务，戴高乐居然也有了一个说话的机会。当然，起多大作用是另一回事，反正形象已经摆在那儿了。这种关系，既是戴高乐一贯思想的反映，也是法国内外政策的需要。

戴高乐的“高尚目标”，也就是说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要实现这个理想，戴高乐认为，起码有两个条件是与苏联有关的。一是要起世界大国作用，法国首先要在欧洲站住脚跟，要在西欧起领导作用，有必要在欧洲问题上先同苏联打交道，寻求共同语言和合作可能。如果不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欧洲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国也不可能在欧洲谋求自己的地位。二是戴高乐认为，实现“高尚目标”的障碍主要是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局面，而对法国来说，

更直接的阻力来自美国。因此，同东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打破了这种一统局面，显示了法国的世界作用，而且有可能从苏联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增强同美国闹独立的筹码。

当然，苏联人对戴高乐和法国的估价不会像戴高乐的自我估价。法国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苏联今后的主要对手仍然是美国。不过，既然对手一边出现了混乱，而且向自己表示“友好和求助”的时候，机会是不会错过的；但这并不等于苏联要对戴高乐放弃自己的一贯立场和看法。1968年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军事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无疑给戴高乐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提醒他对苏合作是有限度的，在美苏对峙之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仍然影响着国际关系。戴高乐自己也可能有点心灰意懒，他声明谴责这种入侵，认为对欧洲的缓和前景来说这种入侵是“荒谬”之极。

戴高乐与欧洲建设

今天，已经有很多人承认戴高乐有一个“欧洲观”。戴高乐的“欧洲观”，是戴高乐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紧紧围绕的主题，仍然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

一、欧洲观中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早在1944年3月，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协商议会上就谈过战后欧洲建设问题。他认为，在战后的欧洲大陆实现均衡，有必要组织一些集团，“但不应当损害每个成员国的主权”，而且这个集团应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上。如果法国参加这样一个集团，他认为一定能够作出巨大贡献。不过，他那时想象中的欧洲集团，范围太广大了，竟然想延伸到非洲，延伸到近东阿拉伯国家，“英吉利海峡、莱茵河和地中海”成了这个集团的动脉。战争结束以后，欧洲建设在空前未有过的声势推动下，逐渐成了欧洲各国政治家讨论的实质问题。在这场大讨论中，围绕欧洲建设的道路问题，出现了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大主张。联邦主义者认为，欧洲的不和与冲突，源出于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引发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逐渐放弃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体化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以实现和平与发展。凡是参加这种组织的欧洲国家，都要逐步地出让主权。邦联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客观存在，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这些情况和利益不可能因出让主权就不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欧洲建设的道路不是成立欧洲联邦，而是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邦联式的联合。

在上面引的“不应当损害每个成员国的主权”这句话中，已明显可以看到戴高乐的态度，足以说明戴高乐是个邦联主义者。

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反对一体化和超国家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邦联式的“各国的欧洲”。

戴高乐的立场，在50年代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

战后，围绕欧洲建设问题，几乎所有的欧洲政治家都认为，法德关系问题是决定欧洲前途的关键问题，如果能够找到一种办法，使法德这两个宿敌凝结到一起，化解前怨，欧洲的和平就有可能得到保证。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采用了让·莫内的计划，公布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

建议在法德之间首先建立一种事实上休戚相关的关系，将法国的钢和德国的煤的生产和销售，置于一个共同的高级权力机构的管理之下。这样，就从观念上和物质上（煤钢是最重要的战争物资）限制了法德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备忘录还建议欢迎欧洲其他国家参加这个计划。这就是历史上的“舒曼计划”。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六国正式签署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英国由于不愿受制于大陆联盟，以拒绝放弃国家主权为由没有参加。

几乎与此同时，由于美苏军事对峙加剧和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于1950年9月向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提出了重新武装德国的草案，遭到法国的否决。10月24日，法国根据丘吉尔关于建立一支“欧洲军”的建议，提出了普利文计划。计划规定德国不得拥有独立支配的军队，但可以在“欧洲军”中拥有有限制的军队。“欧洲军”将由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和指挥。这就是“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雏形。这个条约远比煤钢共同体条约敏感，特别是在法国，它引起了不亚于当年“德雷菲斯案件”的大辩论。1954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终于以拒绝讨论的形式否决了这个条约。

戴高乐是这种“超国家一体化机构”的强烈反对者。

1950年5月19日，戴高乐得悉“舒曼计划”的主要内容后，他立即表示了对这个计划的不满。他在梅斯发表演说，指责“他们是想给我们一堆碎煤烂钢！祈求于一种不管什么样的联合企业，不知道他们要走向哪里去！”1951年12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煤钢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骗局”，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军的计划都是令人恼火的方案，肯定会损害欧洲建设。他承认，共同开发煤和钢对双方可能都会受益。但是舒曼计划制定的管理办法只是“一种混合统治”的机构，应该由一个邦联性的权力机构来管理。

1952年3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称煤钢共同体为“假象”。10月8日，他在声明中指出：“全世界对欧洲抱有巨大希望，我们不要让它变成一堆紊乱的‘联营机构’，而要让它成为由若干国家组成的一个邦联。”一个月之后，他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代表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建设欧洲要以现实为基础，“而现实是有民族性的”。他认为目前由一些技术专家们关起门造出来的联合方案，“是一个走钢丝的方案”，冒险性太大。

1953年11月12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无国籍者是不能算作欧洲人的”，称超国家机构为“怪物”、“机器人”，提出了邦联式的管理机构，并解释为“这是由各国政府首脑组成的一个定期会议，有共同管理机构，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领域内作好决策准备；在各个国家内组织协商会议，举行公民投票，使广大人民都了解情况，将欧洲联盟时基础建立在欧洲广大群众的正确决定上”。

从1961年冬以后，戴高乐在谈到欧洲建设问题时，都是在邦联这个形式下去设想未来的欧洲。因为他认为，只有邦联，才适合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需要。1952年，他公开表示建立“一

个由人民选举的邦联，每个参加的国家都保持它原来的面貌，保持

引自让·莫内《回忆录》，法国法亚尔出版社1976年版，第428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2卷，第480页。

罗歇·马希普：《戴高乐与欧洲》，法国弗拉玛里翁出版社1963年版，第32—34页。

它的个性”。1954年，他说建立欧洲邦联“这是一种正确和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并说“自从1943年以来，我认为是第30次了”。在戴高乐看来，凡属超国家的一体化机构，都是要法国放弃自己民族的特性，放弃国家的主权，并溶化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这是与他的一贯思想和做法绝对不相容的。

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就不再是以一个在野的政治家身份站在一旁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评头论足了，而是以一个执政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开始推行他的主张了。1958年他开始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提出批评，并最终使法国退出这一机构。他在1959年11月3日军事学院的讲话，谴责了军事一体化，认为将法国的防务混合和溶化在这个机构中，就不可能维持自己的国家。1960年5月31日，戴高乐在电视广播演说中指出：法国愿意促进欧洲建设，但是“所有参加国家都应该仍然保持它们原来的面貌，所遵循的道路应该是国家之间有组织的合作道路，然后也许才会变成一个伟大的邦联”。1960年9月5日，他说：“设想可以在各个国家之外或超越各国之上建立某种行之有效而又为各国人民赞成的机构无非是一种幻想。”1962年2月5日说：“一个国家一旦被一体化，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的消亡。”

1962年5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更全面有力地阐述了关于欧洲建设的观点。他说道：

尽管有人总认为我说过“各国的欧洲”，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声明中说过，可能你们会感到奇怪。当然，我可以肯定他说，我决不否认自己的看法。相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欧洲不包括法国人的法国，德国人的德国以及意大利人的意大利，我不相信这个欧洲还能有什么存在的现实性。

但丁、歌德和夏多布里昂是欧洲人，也正因为他们是杰出的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如果他们是无国籍者，如果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写作，是用的某种统一的“世界语”，那他们对欧洲就不会有多大贡献。

所以说，祖国是一个有情感的名词，而建设欧洲是要以能行动、有权力、负责任的因素为基础的。具有这种因素的基础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在这方面才是有效的，合法的，而且有能力去实施欧洲建设。我已经说过，我还要重复，在当前，除了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洲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欧洲。除此之外都是些神话、空想和空谈。

戴高乐这一席话言词犀利辛辣，等于将那些坚持超国家一体化主张的人

·吉利·戈扎尔：《面对欧洲的戴高乐》，法国普隆出版社1976年版，第26页；《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2卷，第604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3卷，第221页。

同上书，第245页。

同上书，第384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3卷，第401页。

都讥讽为“无国籍者”，是在用世界语进行思维和写作，断定他们不会对欧洲建设有多大贡献。结果，导致在他的政府工作还不到一个月的五位人民共和国的部长全部辞职，因为他们正是超国家欧洲的拥护者，感到受到了侮辱。

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他所关心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积极的作用，是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不甘心让法国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戴高乐认为，所谓“超国家机构”在欧洲的现实中也不可能超越国家，它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在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时，它“没有政治上的权力和效能，只有国家才有这样的权力”，“只有国家才是有权命令并有权要求服从的实体”。

而且，戴高乐还始终担心，如果放弃主权，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欧洲中，“像现在这样的法国将会消失”，由于这样一个欧洲没有具体的现实的基础和解决问题的权力，“因此，面对着苏联集团，它注定只能成为政治上、经济上和防务上自有一套的西方大国——美国的附庸。”他担心，由于在超国家的欧洲中，不可能将一种政策强加给任何一国，实际上就不会产生什么一致的政策，“但是也许这个集团会追随外部的某个国家，而这个国家是有政策的”，“可能会出现一个联邦的组织者，但这个人不会是欧洲人”。毫无疑问，戴高乐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在他的欧洲观中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

美国在欧洲建设问题上，历来是持支持态度。当然，前提是欧洲建设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应该纳入以美国为领导的“大西洋体系”中。随着欧洲建设的深化和扩大，在欧洲内部之间，在欧美之间，建立一个与美国保持什么关系的欧洲，成了长期争论的问题。

早在1943年，戴高乐就曾表示过对战后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欧洲的担心。战后，由于美国在欧洲已起到一种实际上的控制作用，他一再强调欧洲的事务应该由欧洲自己来解决。1951年12月21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人的政策有时表现得令人恼火，这些表现，有时候会使人想到美国的压力可能是建设欧洲的重要因素。而实际上是，或者欧洲由自己建成，或者就根本建不成。……美国并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这在地图上是可以看到的。”在戴高乐心目中，美国历来是欧洲嫁出去的一个“女儿”，女儿怎能倒过来爬到母亲头上。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法国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大西洋政策”，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同美国的霸权进行抗争，“欧洲人的欧洲”这个主张，就被纳入了戴高乐反对美国控制的整个斗争中。

在“欧洲人的欧洲”这个主张下，戴高乐加紧发展同联邦德国的关系。由于西德对美国的依赖性较强，他以法德合作关系为契机，竭力鼓动西德疏远美国，共同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他从地图上看“欧洲人的欧洲”，而不从政治上看“欧洲人的欧洲”。结果，苏联乌拉尔山以西都在他的“欧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4卷，第121页。

《戴高乐与欧洲》，第188页；《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2卷，第490页。

洲人的欧洲”这个视角之内。

将苏联划归未来的欧洲之内，决不是戴高乐思想中轻易得出的一个幻影。1944年11月22日，他在法国临时协商议会上就说过：“我们深信……我们向往的欧洲统一是可以建立的，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联结三极：莫斯科、伦敦、巴黎的重要标志。”1949年3月2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又说：“……人们应该尝试一下，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体欧洲，那怕要改变制度。这才是真正欧洲人的纲领。这也是我的纲领。”从1950年3月16日记者招待会开始，戴高乐使用“从大西洋到乌拉尔”这个提法，从此，“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这句话，就不时地出现在戴高乐关于欧洲建设的谈话中。据有人统计，经过从1550份文件资料中查找，出现不下21处。尽管“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究竟是个什么打算，连苏联人也搞不清楚；尽管“斯大林和戴高乐之间的对话只是熊和羊羔的对话”，但是“在这个欧洲内，他要摆脱美国 and 英国这两个比法国更发达和富裕的国家……”

这就是说，在戴高乐“欧洲人的欧洲”主张中，不仅排斥美国，而且也排斥本该属欧洲地理、政治范畴的英国。

戴高乐对英美关系，早在战争期间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一直认为，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对美国是俯首听命的，“甘心追随美国人的政策”。他不会忘记丘吉尔对他说过：“您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您还要知道，如果我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

的。”战后，他“看到英国仍旧被大西洋彼岸的大陆吸引着越走越远”。在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政策下，戴高乐更加坚信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他的欧洲观是一种潜在威胁。

英国凭借同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关系，长期奉行一种不直接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观望政策。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英国都借故没有参加签约。1957年罗马条约签字，英国仍然如此办理。英国不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却又组织了一个与欧共体相竞争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但很快它就不得不重新考虑

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问题了。

1961年7月31日，麦克米伦宣布将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8月9日，英国政府正式提出了申请。

戴高乐称英国的申请是“重新发动进攻，由于他们从外部不能阻止共同体的产生，现在打算钻到内部来使这个组织陷于瘫痪”。

为了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麦克米伦曾多次同戴高乐会谈。戴高乐也不否认，麦克米伦有些话使他很受感动。例如，麦克米伦曾对他说：“我们应当重新建立平衡。不错，目前美国的存在给我们的安全提供了保证。但是，能否长久这样下去呢？实在值得怀疑。此外，这样下去的结果，使欧洲人处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1卷，第512页。

同上书，第2卷，第276页。

埃德蒙·儒弗：《戴高乐将军和欧洲建设》，第1卷，巴黎法学与法律出版社1967年版，第147页。

保罗·雷诺：《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法国茹里亚尔出版社1964年版，第16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2卷，第266页。

《希望回忆录》，第204页。

于一种从属的困难地位。这种地位，你们法国人打算摆脱它，我们英国人痛苦地忍受它。让我们使欧洲团结起来吧，亲爱的朋友！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干：您、我和阿登纳。如果在我们三个人还活着和执政期间放弃了这个历史机会，天知道这个机会还会在什么时候为谁再出现！”

但是，感动归感动，并没有感化戴高乐对英国立场的怀疑。他认为单靠善良愿望是不够的，英国“现在是否准备接受必要的限制，来参加一个和它过去的历史特点以及与今天的生存条件相违背的联盟呢？”他觉得麦克米伦是希望欧洲独立，但是一点也没有表示出决心承担对美关系的后果。

英国同共同体的谈判持续了一年多。1962年底英美拿骚会议证实了戴高乐的怀疑是有道理的。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终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拒绝了英国的申请。他认为，如果让英国加入共同体，那么自由贸易联盟的其他国家也会相继加入。这样扩大的共同体就会面临同其他国家，“首先是同美国的经济关系问题”。他预料，“这样复杂的一个集团，它的内部团结是不会长久的。而且最终会出现一个依附美国并受美国领导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它很快就会把欧洲共同体吞并掉。”1963年1月29日，顾夫·德姆维尔在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上宣布终止参加谈判。

1967年5月11日，英国第二次提出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同年11月27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批评英国的经济政策与共同体的规定不相容，认为英国只有把它自己内部的经济政策，包括同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关系调整好之后才有可能谈判。他建议，在此之前共同体六国同英国先建立有利于贸易交往的协作关系。戴高乐再次否决了英国的申请。

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他将英国排斥在欧洲之外，是为了防止与英国有特殊关系的美国乘机插足。在欧洲共同体中，有一个对美国有较大依赖性的德国已经够麻烦的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共同体再接纳一个美国的代言人。如果那样的话，法国的独立地位和大国作用都要受到威胁。

二、欧洲观中的法国地位。

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反对美国控制欧洲，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这种欧洲观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当然要落实到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这个目标上来。在戴高乐的思想中，置身于欧洲建设，是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首先在欧洲站住脚跟，树立起法国的领导形象，才能谈及大国地位。试想，法国如果在欧洲都不能站在前列，它还能站在世界前列吗？

要想在欧洲起领导作用，既不能让美国插进来，也不能让英国插进来，还要牢牢地制约住德国，剩下的一些国家就好办了。

戴高乐制约德国的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

战争期间，从1941年底丘吉尔第一次访问美国，到1945年雅尔塔会议，美英苏三大国曾多次就战后如何处置德国进行协商，尽管没有达成正式协议，但基本态度是一致的：战后德国应当肢解成几个国家。戴高乐被排除在三大国协商之外，但他的态度既坚定又明确：“不许可再次建立中央集权的

《希望回忆录》，第235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4卷，第69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5卷，第241—245页。

德意志帝国”。后来，到波茨坦

会议前后，美苏两国考虑到战后自己在欧洲扩展势力的需要，不再坚持肢解德国。波茨坦协议关于德国问题的主要条款变成了占领和管制德国。

但是，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并没有放弃肢解德国的主张。

1945年8月7日，法国政府通知美英苏三国，它接受波茨坦协定的主要规定，但又补充说“不会一开始就接受重建一个德国中央政府的主张”。这一点上，戴高乐与美英苏之间有明显分歧。

戴高乐肢解德国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采用一切手段和措施，彻底摧毁或削弱德国，使它永远不再可能构成对法国的威胁。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说明了他的肢解德国计划。他写道：

“不许再次建立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帝国！按照我的意见，这是防止德国危险势力再起的首要条件。每当一个有统治欲望和野心的中央政府无视德国各州的特点而控制它们的时候，帝国主义就会出现。这一点我们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时代看得太清楚了。相反地，假使德意志民族的每一个州可以独立存在，各州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处理自己的利益，就很可能避免德意志联邦走上奴役邻国的道路。如果把作为战略物资来源的鲁尔区置于国际管制的特殊制度之下，就更容易防止这个联邦走向奴役邻国的道路。”

1944年12月8日，戴高乐在莫斯科对斯大林也谈到过德国问题，他坚持“莱茵河左岸不准再有德国的中央集权，分离出来的地区保持德国的特点，实行自治，在经济上属于西方；鲁尔要置于国际管制之下……”波茨坦会议之后，戴高乐在访美期间向杜鲁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我个人和我的政府为法国着想，必须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永远防止德国威胁再出现。”紧接着，法国提出了对德政策要点。第一，由于波茨坦协议规定德国东部分割出一块领土，那末，“在西部应该有一个同东部保持均衡的解决办法”，坚持肢解德国。第二，坚决反对成立德国中央政权。第三，制定严厉的赔偿计划并严格执行，要求管制德国的煤钢生产并摧毁它的军工生产，将德国的工业生产限制在最低水平。最后，还须将萨尔划归法国。

戴高乐坚持对德强硬政策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历史上德国曾多次蹂躏法国，鉴于150年来，德国曾七次侵入法国，“对法国来说，德国问题首先是个安全和政治问题”。因此，战后任何复兴德国、恢复德国主权的计划和意见，在法国舆论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和不安。正如阿登纳所说：“对于德国重新崛起的一种担心，显然是已经完全支配了法国国内的政治思想”。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在

问尔弗雷德·格罗赛：《第四共和国和它的对外政策》，法国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1年版，第197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3卷，第46页。

《战争回忆录》，法文本，第3卷，第68页。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3卷（上），第226页；第3卷（下），第557页。

《阿登纳回忆录》（一），第95页。

对德国重新崛起担心之余，法国的对德政策如此强硬，也含

有一定的报复成分。“在 1944、1945 年，甚至在稍后一段时期内，戴高乐将军也和很多法国人一样，认为经过 60 年内的三次战争之后，我们的人民有权利对一个派军队几次践踏我国国土的民族不抱宽厚的感情。”

但是，历史的原因既不是促成戴高乐对德强硬政策的唯一因素，也不是根本因素。其主要原因，是战后法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失去了多少世纪以来所享有的大国地位。法国被拒于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之外，已经饱受冷落，如果再不在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德国问题上充分发表意见，一味跟在别人后面唯唯诺诺，将有永远被人置于次等国之列的危险。而且在经济上，战争结束时，法国工业产值只占战前的 40%（英国约占 80%），1946 年物价上涨 80%，1947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及 1910 年的水平。这个西欧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在战后头两年中，城市居民的面包配给额甚至比德国占领时的任何时期都要低。这种政治经济状况，显然与戴高乐争取大国地位的雄心相距甚远。因此，戴高乐要彻底摧毁德国东山再起的条件，借机从德国获得赔偿以利恢复和发展，迅速复兴法国，在欧洲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1946 年戴高乐下野之后，法国的对德政策由于大势所趋，尽管与英美还有时争吵，毕竟软化了，逐渐接受了适应美国整体战略需要的扶植德国的政策。但戴高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坚持过去的主张。

1947 年 11 月 12 日，他对记者们说：“我们所考虑的德国的前途，决非原来的帝国，而是由好几个德意志国家重建的德国。”

1948 年 4 月 17 日，他在马赛法兰西人民联盟代表大会上谈德国参加西欧组织的问题，指出德国只能作为有主权的联邦国家参加，而不是以帝国的形式。

1948 年 11 月 17 日，他回答记者问题时又指出，德国应采取传统的联邦国家的形式，“让它不使人们感到惊慌地进入法国也参加的欧洲统一体中去”。

但是，历史却走了一条与戴高乐的主张不同的路。在美苏操纵下，德国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国家。1949 年 9 月 7 日，联邦德国（西德）宣告成立。

到这时，戴高乐已充分意识到托管或肢解德国的计划已成过去，只有面对现实。

由于通过强硬政策来达到防范德国，并利用其丰富资源来恢复发展经济的做法已无法实现，有必要通过另一种形式来达到目的。因此，法国的政治家们以让·莫内和舒曼为代表就提出了“舒曼计划”，试图以联合的形式，将德国限制在一个机构之内。戴高乐对在舒曼计划基础上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持否定态度，那是因为他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机构，担心在这种联合中丧失主权的法国反而会受控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并不反对以联合的形式来达到控制德国的目的。

1949 年 9 月 25 日，戴高乐在波尔多发表演说，指出：“欧洲的统一，假如可能，而且无论如何都非包括德国人不可”，“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欧洲，

就要看在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之间会不会直接达成一个协议”。1950年6月25日，他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代表大会上说：“欧洲的统一要求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相互之间签订一个行之有效的统一行动的协议”。1952年2月25日在演说中，又指出“在法国人和德国直接协议的基础上产生欧洲的统一，它将为和平带来最大的希望”。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德之间已基本上实现上和解，但是两国关系还不稳固。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他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从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战略目标出发，已充分认识到欧洲问题的重要性，法德关系又被他看成是其中的基础和核心。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变化，德国的罪恶过去在法国已经淡忘了，对未来的恐惧也已经被美苏对抗所取代了。著名法德问题专家阿尔弗雷德·格罗赛曾有过一个比喻，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如果父母是德国人，孩子想同法国人结婚，简直不可思议。二战时法国人对此会感到失望，战后一段时期便认为那是人之常情，到60年代以后，就基本没有问题了。”戴高乐自然也会适应这种变化。

1958年9月14—15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法国。戴高乐以特殊的方式接待了他。会见安排在科隆贝双教堂戴高乐的私人住宅，戴高乐认为他们以两个民族的名义作历史性的会谈，“一个家庭的环境比之装饰华丽的宫殿更有意义”。

这是德国政府首脑战后以来首次会见戴高乐，鉴于戴高乐过去对德国的强硬政策，阿登纳抱着“极难谅解”和“深感不安”的心情去见戴高乐。但是，会谈结果使阿登纳非常满意，他认为自己很幸运，“遇上了并非使自己担心的那种人”，确信将能同戴高乐进行良好而又充分信任的合作。

在科隆贝会晤中，两国总理确认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即德国和法国必须结成紧密的友谊，只有法德之间的友谊才能拯救西欧。这种看法，最终被确定在会见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公报称：“我们确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是欧洲一切组织建设的基础。”

从此，戴高乐同阿登纳频繁接触。据戴高乐回忆，直到1962年年中，他与阿登纳通信40余次，会晤15次，进行了100多个小时的会谈。1963年1月22日，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开始了人们所说的“巴黎——波恩轴心”。

戴高乐积极推动法德合作，并以此为欧洲建设的基础，其目的，是想通过合法的形式，凭借法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控制西德。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德国重新崛起称霸，二方面是想拉住西德和充分利用它的经济优势来与美国抗争，并在德国问题上——当时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以提高法国的地位和作用。今天，人们都习惯以“法德联姻”来比喻60年代的法德关系，如果真可以称为一种婚姻关系的话，那在戴高乐时期，这个姻亲家庭中的“家长”，自然是戴高乐莫属。

以上引语散见于《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2卷；《戴高乐与欧洲》，第49—56页。

1986年5月22日格罗赛教授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阿登纳回忆录》（三），第514页。

同上书，第515页。

《希望回忆录》，第195页。

阿登纳的德国之所以接受这种姻亲式的法德关系，是因为德国的地位需要法国的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阿登纳也不掩饰他对美国保护的可靠性有怀疑。特别是在柏林地位问题上，英美的犹豫和戴高乐的坚定曾给他根深刻的印象。当然，德国对美国的看法与戴高乐相比还是差距太大。因为说到底，德国需要法国的支持，但更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所以，尽管德国也对美国的政策有看法，还是不能接受戴高乐的对美政策。在批准法德合作条约时，德国联邦议会在条约前边加了一个巩固德美关系的序言，以示与戴高乐的对美政策相区别，避免法德联合抗美之嫌。到 1963 年 10 月艾哈德接替阿登纳后，德国与戴高乐在对美政策上的分歧更加明显，使刚刚确立的法德合作关系进展维艰。直到 1966 年底，联邦德国组成“大联合政府”，由于看到美国在欧洲已采取一种收缩的姿态，才认为有必要加紧改善法德关系。1967 年 1 月，德国总理基辛格和外长勃兰特访问巴黎。在戴高乐的“缓和、谅解与合作”政策的影响下，勃兰特开始试行“新东方政策”，戴高乐表示支持德国同苏联缓和，他说：“如果德国愿意的话，法国将在缓和的道路上帮助它。”勃兰特也明确他说：“欧洲的东西方政策，其成败取决于德法是否一致。”

戴高乐通过推进法德合作关系，使“巴黎——波恩轴心”成了欧洲共同体真正的决定力量，又由于在这个“轴心”中重心偏向巴黎，所以法国在欧洲共同体中一直起着“带头”作用。

1958 年戴高乐重新执政时，许多人怀疑他是否会执行罗马条约接受六国共同体。因为戴高乐反对超国家一体化一贯是很明确的，而且人们还记得 1957 年 3 月 25 日罗马条约签订时，米歇尔·德勃雷，这位未来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政府总理，曾在法国参议院宣告“罗马条约非法”，并认为即使国会批准这个条约，它也不可能长久执行，总有一天会被破坏。

但是，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戴高乐已经感到不能忽视欧洲共同体对法国的影响。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我们在几个西欧国家间组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并且已经产生效果，我相信，这对法国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这样做。”这个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与法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有关。

戴高乐心中的法国在欧洲是个什么角色呢？

1948 年 3 月 7 日，他在演说中说：“……在一个以北海、莱茵河、地中海为主要通道的集团中，应该成为中心和首脑的，正是法国。”仅隔一个多月，他又说道：“应该建立起一个西欧来……然而这一集团自然的和道德的中心，正是法国。”1950 年 2 月 11 日，他说：“只要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我所说的是一个站起来的、不受牵制的法国。”同年 8 月 17 日在给报界的声明中，戴高乐说：“欧洲应该有一个共同的防御体系，必须由法国来为这个体系规定计划和指定指挥官。正像在太平洋上领导权应该在美国手里，在东方应该由英国领导一样。”1958 年他同阿登纳会晤时说：

《同床异梦》，第 84 页。

《戴高乐与欧洲》，第 26 页。

1962 年 5 月 20 日在里摩日的演说，《世界报》1962 年 5 月 22 日。

以上引语散见于《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 2 卷；《戴高乐与欧洲》，第 150—151 页；《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第 37—38 页。

“多少世纪以来，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

很显然，戴高乐是将法国看作欧洲的领导来进行欧洲建设的。

戴高乐认为，面对美苏两国在欧洲的争夺，西欧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在他看来，依靠六国共同体，法国就有可能利用它以欧洲的名义来说话，法国可以充当六国欧洲的领导。因为在六国共同体中，比、荷、卢都是小国，谈不上领导作用，意大利的实力和影响也不足以担当这一责任，西德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是战败国地位使它在政治军事上备受限制，不可能出面领导六国共同体，更何况西德已“自愧不如”，通过法德合作关系投入了法国的政治怀抱，法国不领导欧洲共同体，还有谁能领导？

正是从这个战略利益出发，尽管戴高乐对罗马条约规定的管理机构有意见，对有关农业条款表示不满，还是表示接受罗马条约。1958年10月29日，法国政府发表公报，正式表达了戴高乐建设六国欧洲的愿望。

法国在欧洲共同体中的活动，无疑是围绕着法国为中心来进行的。

戴高乐在共同体中，仍然反对任何试图扩大一体化作用的建议，他指责共同体委员会滥用职权，要求限制它的权力。他强调部长理事会的作用，不肯改变一致通过的原则，使法国在共同体中

保持“否决权”。他利用这个权力，两次否决了英国参加共同体的申请。从1961年底到1965年，法国以“不再参加欧共体”的最后通牒方式和拒绝出席共同体会议的“空椅子事件”，强迫其他成员国与其达成共同农业政策的有关协议。

最能体现戴高乐试图领导欧洲这个意图的，莫过于他关于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建议。1960年9月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欧洲组织的新阶段应以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防务等方面有组织的合作形式开始。既然欧洲共同体主要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内容，那就有必要着手在政治方面实行类似的合作。

1961年2月10—11日，六国首脑聚会巴黎，在戴高乐主持下讨论戴高乐关于政治联盟的建议。在会议上，戴高乐明显感觉到他的欧洲伙伴们对法国这个欧洲大陆上的“大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他们对于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参加的体系，“总觉得难以接受”。但是戴高乐认为，“如果旧世界的欧洲人继续受新世界的支配，欧洲就永远不会成为欧洲人的欧洲，也永远不能使东西欧联合起来。”

7月18—19日，在波恩又举行了一次首脑会议。会议决定，以法国驻哥本哈根大使克里斯蒂昂·伏歇为主席的政治委员会负责起草一项条约，提交首脑会议讨论批准。10月19日，法国提出了“伏歇方案”，它的主要内容有：（1）建立一个政治联盟机构。这个机构，包括由各国首脑或外交部长组成的理事会，一个欧洲议会（与欧洲共同体共有），以及一个设在巴黎、由直接对本国政府负责的各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2）理事会每四个月举行一次高级会议，理事会表决时至少在头三年内实行一致通过

《希望回忆录》，第193页。

《希望回忆录》中描述得很生动，见第199页。

制，缺席或弃权国家不受决定约束。(3)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这与大西洋联盟有关)。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戴高乐的一贯主张。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反映了戴高乐要建立一个由法国居领导地位并独立于美国的欧洲邦联这个愿望。这个方案，受到其他国家的批评，他们想的是“大西洋的欧洲”，想的是在共同体范围内发展经济一体化并逐步地导向政治一体化，想的是加强同美国和北约的紧密合作，害怕的是法国在德国的默许下建立新的霸权。1962年1月18日，法国又拿出了一个修改稿，这个第二稿使其他国家更加难以接受，认为是一个“显著的倒退”。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明确规定将欧洲共同体的机构置于政治联盟理事会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政治联盟的权限扩大到了经济一体化机构。而且修改后的方案，从序言到条文，通篇都不谈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1962年4月17日，六国外长在巴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比利时和荷兰坚持以同意接纳英国加入共同体然后再加入政治联盟为先决条件，使戴高乐的欧洲政治联盟计划流产了。

戴高乐的欧洲观，说到底，是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高尚目标”的一部分。戴高乐很清楚，在战争中遭到削弱的法国，只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欧洲执牛耳的，更不用说在世界舞台上争取大国地位。他要凭借德国和欧洲联合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因此，戴高乐关于欧洲建设的主张一般是从他对法国地位的概念中产生的。在他心目中，欧洲建设应为法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服务，他在谈到欧洲建设时，首先想到的是法国在其中的地位，而不是欧洲建设本身。因此，他提出的“各国的欧洲”、“欧洲人的欧洲”，往往被人称之为“法国的欧洲”或是“戴高乐的欧洲”。正如埃德蒙·儒弗所说：“只有一个原则支配了共和国总统的政策，不是建立一个六国欧洲，不是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也不是建立一个在两大势力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的欧洲，这些目标都是第二位的。他唯一明确无误的打算是要让法国重新回到最前列。这个迫切需要，使国家元首在战争时期、在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紧密地协调一致起来。”

戴高乐与第三世界

法国是一个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戴高乐也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他曾是法国殖民帝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法国的殖民活动是同它的资本主义同时开始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国殖民者就已在印度、加拿大、非洲等地建立据点，开展殖民贸易和奴隶贸易，进行海盗式的掠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法国的殖民活动成为它同其他帝国主义争霸的主要目的。1830年，法国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1856年，法国远征军出征印度支那，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1862年，法国又派殖民军远征墨西哥。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面积约达7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50万。

1881年，法国从阿尔及利亚进攻突尼斯，武力强迫突尼斯接受保护。1896年，法国吞并马达加斯加岛。1912年，又强迫摩洛哥签订“菲斯协定”，接受法国保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已拥有面积1060万平方公里，人口5640万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四大洲，成为继英、俄之后的第三大殖民帝国。

殖民地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法国殖民者的反抗。在马达加斯加、阿

尔及利亚、墨西哥、印度支那和中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摩洛哥，都暴发过声势浩大的反抗殖民统治和侵略的武装起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反抗虽然给予法国殖民者沉重打击，但并未能取得彻底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它具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不同的性质，将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推到了首要位置。因此，当粉碎了法西斯的侵略和奴役，许多民族国家获得解放和恢复主权之后，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并受到启发的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纷纷提出了解放和独立的要求，使民族解放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向旧殖民统治发动了冲击。

戴高乐从小就崇尚殖民战功。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将法国殖民事业的成果看成是法兰西光荣、伟大的一部分。他为“法绍达投降”感到悲痛。他以征服塞内加尔的殖民将军费德尔布为荣，甚至乔装打扮一番再回家，说是“费德尔布将军来访”。他在圣西尔军校时，他所在班级被命名为“菲斯班”。1929年，戴高乐少校曾在中东服役近两年，到过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在他的印象里，这些地方是与法国无法相比的一片化外之地，他认为，化外之民只有接受法国文明才算得上开化。他从贝鲁特给友人的信中，道出了心底里“离开法国文明殖民地人民无法生存”的顽固偏见。他说：“我的印象是：我国在此地的影响甚微。此间人民一如当初，与我们格格不入；反之亦然。我国想使此间人民自理其事的行动方针简直是拙劣透顶，……君不见，若无鞭笞，焉有尼罗河灌渠，巴尔米拉渡槽，罗马大道，乃至橄榄园之开辟。依我所见，我们将面临两种前景，或者诉诸鞭笞，或者一走了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在维护法国的伟大和完整时，他脑子里装的是包括所有殖民地在内的法兰西帝国，他为这些殖民地不惜与英美唇枪舌战甚至动武。战争结束后，戴高乐于1945年8月任命他最得力的将军勒克莱尔担任印度支那远征军司令，“决心把法国国旗插到它还没有重新出现的唯一的法国领土上去”，终于导致了长达九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在这之前，5月8日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当地人民利用停战日争取独立解放的起义，遭到戴高乐的残酷镇压。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法国的镇压是残酷无情的，动用了海陆空部队，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伤亡”。直到1956年苏伊士危机，他还是非常遗憾自己当时不能“作主”，要不然他两小时内就可以让伞兵占领开罗。

但是，正是这个一贯坚持殖民主义立场、以维护殖民历史业绩为自己“高尚目标”一部分的戴高乐，在重新执政后，不得不面对现实，顺应新的历史潮流，亲手完成了在法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

1958年夏天在关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新宪法草案的讨论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即新宪法如何确定法国同海外领地——旧殖民地的关系问题。早在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宪法中，已经将过去的“法兰西帝国”改成了“法兰西联邦”。按照戴高乐的意思，法属海外领地应当同法国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那末，这个“法兰西共同体”是一种什么相互关系呢？也就是说：是邦联制，还是联邦制？前者，就是承认海外领地为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1卷，第164页。戴高乐对殖民业绩的颂扬还可见《希望回忆录》，第43页。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第431页。

同上书，第543页。

后者，就是同意海外领地实行有限制的自治国家。被吸收参加宪法咨询委员会的塞内加尔政治家、诗人列奥波尔德·桑戈尔坚持实行邦联，同德勃雷等人激烈争论。当然，获胜的是德勃雷，因为他代表的是戴高乐的精神，戴高乐此时还没有走到彻底放弃法属殖民地这一步。从8月20日至29日，戴高乐访问了法属非洲。他希望能劝说并引导当地政治家和居民支持他的海外领地政策，他的目的是“引导‘海外法兰西’各民族实行自治，在我们双方之间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在戴高乐看来，问题很简单：在即将举行的新宪法公民投票中，在成为主权国的同时仍与法国保持互助合作关系的就投“赞成票”，与法国断绝一切关系的就投“反对票”。

戴高乐黑非洲之行在几内亚碰到了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场面。在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中，沿途排着一队一队的人群，但他们不是在欢迎戴高乐，而是齐声高呼“独立”。在同塞古·杜尔会谈时，他明确指出，如果几内亚同法国分离（他不用“独立”这个词），法国将立即撤回各种援助，并警告说：“没有几内亚，法国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即使几内亚与法国分离，法国今后仍将长期生活下去。”

戴高乐还是在用“殖民者养活了被殖民者”这种观点看问题。他没有倒过来想想：没有法国，几内亚是不是也生活了很长时间，即使法国撤走所有援助，几内亚今后仍将长期生活下去。

1958年9月关于新宪法的公民投票，除去几内亚否决以外，共有12个法属非洲国家通过。这样，根据宪法规定，这12个国家就成了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它们是：马达加斯加、达荷美（即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刚果、加蓬、塞内加尔、马里、毛里塔尼亚。宪法规定，共同体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国防、财政经济以及战略物资的控制权仍由法国政府掌握，法国给予成员国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权，法国参议院分配给成员国98个席位，成员国有退出共同体的权利。但是，这些让步和改革，在战后强大的民族解放潮流中，已不能满足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1959年3月，联合国作出决议，喀麦隆于1960年1月1日结束法国托管宣布独立。1959年12月，法兰西共同体内的塞内加尔同法属苏丹组成的马里联邦提出“在共同体内独立”的要求，戴高乐亲赴达喀尔，经过协商达成协议。1960年6月，承认马里联邦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独立国家。这就等于承认共同体成员国不用退出共同体就可以宣布独立了。后来，塞内加尔退出马里联邦，法属苏丹改名为马里共和国，于是，塞内加尔和马里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法国为了维持影响和利益，仍然提供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保持“合作”关系，并没有采取1958年对待几内亚那种态度。紧接着，法属非洲其他国家纷纷效法，援引马里联邦独立先例，要求独立。经过协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布承认这些国家独立。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戴高乐的“非殖民化”。

在1960年，法属非洲除法兰西共同体的12个成员国之外，还有喀麦隆和多哥这两个托管地获得独立，直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之后，戴高乐的“非殖民化”才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法国长达几个世纪的海外殖民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1卷，第66页。

《希望回忆录》，第45页。

《希望回忆录》，第63页。

统治的基本结束。

戴高乐的这种转变，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确实是残酷的”，“痛苦的”。他说：“在重新执掌法国的领导权时，我就作出决定，从今以后，要不惜任何代价把法国从过去的帝国义务中摆脱出来。人们可以设想，我这样做，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轻率决定的。像我这个年纪和像我所受过的教育的人，成为自己倡导的这项变革事业的主持人，这确实是残酷的。”他在颂扬了殖民历史之后，感叹道：“对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啊！”

但是，戴高乐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历来不拘泥于陈规旧俗，他总是善于审时度势，他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戴高乐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已成燎原之势，亚非拉三大洲的殖民地人民和国家，纷纷采取各种形式，为争取解放和独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运动，与过去的民族解放运动有明显的区别。在无产阶级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之下，它不仅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形成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而且，武装斗争又成了它的主要斗争形式，并得到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广泛的声援和支持。这一严峻的形势，使一贯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戴高乐，有可能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去考虑殖民地问题。

戴高乐认为，“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他认为殖民地人民由于长期受到“下等人”的待遇，受到歧视和打击，“在人格上有一种强烈的、刻骨铭心的要求，即不再受外来统治。他说：“我们目前的时代，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是每一个民族都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在他看来，面临的重大问题是非殖民化问题，殖民地时期已经结束，这一页应当翻过去了。“只要尊重这些新生的或重新组成的民族，……一个建立在友谊和合作基础上的大集体就会建立起来”，他“希望法国能利用这种机会消除过去的仇恨、偏见，把从前的臣属关系改变为伙伴关系”。

其次，从法国的切身利益考虑，戴高乐认为，继续维持过去那种旧殖民关系，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得不偿失”了。他说：“过去，我们在殖民地所付出的代价，与我们从殖民地获得的利益相比，似乎是值得的”，因为那是在压力和屈服下，只须付出“缓慢的、落后的生活开支”，而现在要求不一样了，负担也在不断增加。更何况不甘屈服的愿望终于导致反抗，使法国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战争。

战后，从1945—1952年，印度支那战争就耗去了近44亿美元，占了马歇尔计划对法援助的80%。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1956年法国财政赤字达6400亿法郎，1958年达1.25亿法郎，欠外债30亿美元，储备金仅剩6.3亿美元。由于战事不断，政局不稳，几十万军队被拖在阿尔及利亚。戴高乐感到再也不能维持这种现状。他认为如果不改变政策，法国在政治、财政和军事上就会“陷入无底的泥坑”，部队就会陷入一场徒劳无益、难于终止的镇压殖民地战争的“死胡同”。他明白表示，实行非殖民化，“首先是因为

《希望回忆录》，第43、44页。

《希望回忆录》，第52页。

同上书，第46页。

如果继续去承担那些同我们的力量 and 影响不相适应的义务和负担，这同法国目前的利益和新的抱负是相违背的”。“由于许多原因，我们国家的直接利益，就是要摆脱代价昂贵而又无结果的负担，让过去在我们治理下的人民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他要断然结束“从前是光荣的，而今后却是导致毁灭的殖民统治”。

最后，既然维持旧殖民统治是与“新的抱负相违背的”，那末，这句话必然归结为维持旧殖民统治是与争取法国大国地位不相符的。

戴高乐要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除去法国本身要有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足以显示实力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之外，当然还必须在世界上拥有“伟大的形象”。但是，在战后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由于法国长期顽固坚持旧殖民主义立场，不惜动用武力，采取最野蛮残酷的手段镇压报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它在国际舆论中已经声名狼藉，它不仅遭到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谴责，而且也常在国际讲坛上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利用。显然，殖民地问题也成了戴高乐试图在美苏之间保持独立性、争取大国地位的制时问题。

美国在战后，为了进一步控制英法这些老殖民主义西欧国家，为了渗透插足英法原来在第三世界的势力范围，经常以一种反对老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面孔出现。美国宣称，“不百分之百地与所谓殖民国家为伍”。1956年，在苏伊士危机中，美国先是宣布反对使用武力，接着在联合国安理会同苏联一起提出停火建议，乘机机会，“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美国利用联合国谴责法国，要求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给阿尔及利亚独立，而且未经同法国磋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代表。

戴高乐感到民族独立已成大势所趋，并“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拒绝承认他们有自决权，就会违背我们的理想，就会引起无休止的斗争，并招致全世界的谴责，即使付出一切代价，所换来的东西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我们手中化为灰烬”。所以，他必须彻底摆脱法国的“老殖民主义”形象。

戴高乐在推行非殖民化后，感到不仅卸下了包袱，而且有了资本。他在殖民地问题上不仅不被动了，而且极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并以此作为独立于美国、争取大国地位的资本。

1961年2月，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不久，就给戴高乐写信，希望戴高乐支持他的政府在联合国提出的干涉刚果（利）的建议，戴高乐称之为要夺取刚果（利）的军事、政治和行政领导权加以拒绝。仅隔一月，戴高乐又拒绝了肯尼迪关于扩大东南亚条约组织保护范围的建议。5月31日，肯尼迪访问巴黎。戴高乐同肯尼迪谈话中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警告美国不要在印度支那走不该走的路。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这一段话：

你们在这个地区插手干预是永远也脱不了身的。民族觉醒以后，任何外国势力，不管手段多么高明，都是站不住脚的。这您以后就会看到。即使您能找到几个为了自己利益而投靠您的当地领导人，可是人民不同意，他们还是要反对你们。您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3卷，第290—291页。

同上书，第329—330页。

《希望回忆录》，第90页。

再宣传您的理想也不起作用。此外，当地人会把你们的强权和理想混在一起看。因此，您在那里越是反共，共产党人就越是能以民族独立的捍卫者的身份出现，越能得到人民的帮助，首先是得到感到无望的人的帮助。我们法国人是有经验教训的。你们美国人过去要在印度支那取代我们的地位。现在，你们又要步我们的后尘，重新点燃我们已经熄灭了的战火。我提醒您，你们将一步一步地陷进一个军事和政治的无底洞，不管你们能在那里投入多少开支，作出多少牺牲。你们、我们以及其他他人，对这个充满不幸的亚洲应该做的，不是由我们在他们的地方顶替他们的国家权力，而是给他们提供摆脱贫困和屈辱的东西，而贫困和屈辱正是产生极权制度的原因。我是以我们整个西方的名义对您说这些的。

肯尼迪，还有后来的约翰逊，都没有听从戴高乐的劝告，使美国在印度支那卷入了一场劳民伤财、欲罢不能的侵略战争。

1963年4月，法国首先恢复了因苏伊士危机和阿尔及利亚问题同阿拉伯国家中断了的正常关系。1964年1月，法国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明显地独立于美国的一个最大外交决策。3月，戴高乐访问墨西哥，并拒绝了美国请他顺路拜访约翰逊总统的建议。在1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谈到了东南亚国家中立化的问题，4月，他指示法国代表团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会议上发言，主张越南中立化，反对美国干涉越南。1965年5月，法国代表就像当年美国利用联合国批评法国一样，在安理会谴责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1966年9月1日，戴高乐在金边发表演说，谴责美国干涉越南，赞扬柬埔寨保持中立的态度。郑重声明法国绝不卷入这场冲突。他还在金边会见了越南北方的代表。10月28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呼吁美国从越南撤军，让东南亚实现中立化，并希望美国学法国的样，承认中国。1967年中东爆发“六日战争”，戴高乐的态度明显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6月21日，法国政府在声明中把中东战争和其他国际争端统统归咎于美国侵越战争的结果。

戴高乐对这一切行动深感满意，他说道：“法国敢作敢为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引起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注意。……法国在精神、外交和物质地位上的变化，使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相继到巴黎访问。随着这种访问的日益增多，必将使我国首都最后成为世界的政治中心。多少世代以来，它从未显得这样活跃。”

戴高乐主义的现实与理想

体现在东西方关系、欧洲观、非殖民化以及同第三世界关系中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高尚目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这种以维护民族

《希望回忆录》，第274—275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438页；《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5卷，第75—78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5卷，第99—100页。

《希望回忆录》，第279—280页。

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为主线的戴高乐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于战后的 60 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自己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思想基础和客观历史条件。

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是什么？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就是法兰西民族主义。

戴高乐出生在 1890 年的法国。此时的法国，已告别了它那历史上纵横捭阖、独霸一方的世界强国地位。1870 年的战争虽然过去了 20 年，但那耻辱仍像一个铁砣一样压在法国人心间。旧耻未雪，戴高乐又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土被践踏，人民受蹂躏。历史上法兰西民族那些抗御外侮和振国建威的英雄都哪里去了？

人们在寻找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眼里看到的却是拿破仑三世、贝当和赖伐尔。法国无可奈何地走下坡路了。戴高乐正是生活、成长在这个走下坡路的年代，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孕育了自己的思想，培养了自己的个性，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弗朗索瓦·德雷弗斯在分析戴高乐思想时，认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民族主义。他认为，在戴高乐出生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在法国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可以说那时候法国大部分政党都是民族主义政党。自从法国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复兴法国同有朝一日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想法，成为法国几代人的奋斗目标。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在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可见到这种情感的流露。欧内斯特·拉维斯的《法国史》成了最畅销的教科书，在 1880—1960 年间出生的孩子中，几乎 80% 手里都有过这本书。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性，都有它体现一定特色的民族传统思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演化到近代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在压抑下的反抗性、在落后中的进取性、在分裂中的向心性。以法兰西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戴高乐主义，正是体现了这种反抗性、进取性和向心性。

1969 年 12 月 11 日，已辞去公职，在家安享晚年的戴高乐曾问过马尔罗：你发明了“戴高乐主义”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尔罗回答，“戴高乐主义”不是弱者的民族主义。在战争中，戴高乐主义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答复不甚满意，因为马尔罗没有点出戴高乐主义的实质。反法西斯主义可以照搬在众多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那不是抹杀了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了吗？戴高乐补充道：“任何一项政策的真正灵魂，都是民族。”

米歇尔·德勃雷这样解释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本质蕴含着一种法兰西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保障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维护理性权威的意志，并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换句话说，戴高乐主义崇奉的是，捍卫法兰西命运的理想。”

可见，民族这个观念在戴高乐的思想 and 政治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与戴高乐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在戴高乐的思想中，他谈论国家，国家后面就是法兰西民族，他谈论人民，人民后面也是法兰西民族。他的思想植根于法兰西民族之中，扎根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中，待到开花结果之后，他又将它奉献给法兰西民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所有的政治思想活动和实践，

《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第 45—46 页。

安德烈·马尔罗：《砍倒的橡树》，法国伽尔玛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47、154 页。

引自《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第 9 页。

都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

戴高乐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他说，产生于1940年戴高乐的“六·一八”号召。因为从那时起，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就开始了。这种斗争，在战争期间主要表现为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即要将法兰西民族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给法国以独立和自由。但又不完全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它还包含了为争取法国未来地位，为恢复法兰西的光荣伟大，同一切损害法兰西民族利益的行为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不同意马尔罗看法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戴高乐主义中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这一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了，显然，为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就突出出来。戴高乐历来认为，法国的地位问题，就是法兰西民族的地位问题，任何歧视法国、阻挠法国发挥世界作用的行为，都是损害法兰西民族利益，侵犯法国主权的行。他说道：“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恢复法国的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意味着国家必须重新绝对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窃取国柄的势力，不论来自国内或国外都必须摧毁肃清。”正当戴高乐想乘战争胜利，去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时候，他却无力战胜围绕内外政策角斗的政党政治，只好退出了法国政治舞台。这一退就是12年。在这12年里，戴高乐主义的实践似乎停顿了，但是，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却通过戴高乐著书立说得到总结提高，为他1958年重新执政后全面实践戴高乐主义奠定了基础。

那末，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戴高乐主义可以完成它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的历史使命，到战后，直至差不多整个50年代，戴高乐却无法继续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呢？

翻翻戴高乐战后的言论，不难看出，他把这一切原因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时期执政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戴高乐憎恶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政策，认为在这些政府领导下，“我们的国家除了外国命令我们做的事外，自己什么也不做”。这个外国，当然指的是美国。为戴高乐当过多年外交部长又任过总理的顾夫·德姆维尔也说过：“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控制了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在财政上依赖美国——马歇尔计划；我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北大西洋公约。”

的确，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主要执行了一条亲美大西洋政策。在这一政策下，法国的独立性受到限制，民族利益和愿望不能得到最惬意的满足。就连当时的法国总理拉马迪埃也不得不承认：“每一笔贷款的给予都取决于政治现实，每获得一笔贷款，我们的独立就要减少一些。”但是，戴高乐将这一切原因都归咎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及其政治家们，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就有欠公允。

实际上，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及政治家们，也不是完全听命于美国，更不是心甘情愿地听命于美国。在战后对德政策问题上，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危机、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第四共和国政府同美国都有着尖锐的分歧，甚至皮杜尔在私下先戴高乐五年提

出过建立“三国政治小组”领导北约的想法。而在美国的核技术封锁下，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1卷（下），第653页。

顾夫·德姆维尔：《1958—1969年的一项对外政策》，法国普隆出版社1971年版，第18页。

引自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页。

法国核武器发展计划也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制定并实施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战后的客观历史条件，迫使法国不得不接受一项亲美大西洋政策。

1946年初戴高乐辞职下野，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曾说道：

“很多实业家对我的行为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行动扰乱了他们依靠美援的前途。”戴高乐被迫下野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戴高乐虽然当时仍有继续推行戴高乐主义的雄心，却不具备推行戴高乐

主义的能力。退一步作一个设想，如果1946年戴高乐没有下野，继续执政下去，他是否就能按他的设想去实践戴高乐主义呢？历史总归是历史，谁也无法对假设的历史作出准确的回答。但它却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可以肯定说明的是，即使戴高乐当时继续实践戴高乐主义，那时候的戴高乐主义，决不会像他重新执政后实践得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具有份量，那样意义深远。

不应该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际舞台就被美苏两个大国所支配。这两个大国无论从其国土面积还是从其经济和

军事实力来看，都在其他国家之上。美国实际上成了世界上唯一的既发“政治财”又发“经济财”的国家，它利用战后初期西欧国家经济、军事上的虚弱困境，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将西欧国家控制在掌心，在西欧独霸一方，形成了同苏联在欧洲对峙的冷战局面。西欧国家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和安全上的考虑，只有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全方位地依赖美国，整个西欧对美国实质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依附关系。第四共和国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出了选择。这个历史条件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就是法国从外交到军事都与公认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联盟趋于一致。许多迹象表明，当时的法国各种传统政治势力（除共产党之外）以及社会舆论，都是赞同这一选择的。因此，戴高乐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扭转法国的对外政策方向，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进入50年代，随着西欧国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美国与逐渐成为一个松散整体的西欧在实力对比上慢慢在起变化。这种变化到50年代末已比较明显，进入60年代更甚。美国从原来的绝对优势地位变为相对优势，西欧国家已不是战后初期对美国那种全方位的依赖者，经济上对美国有了竞争性，政治上也开始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导致了西欧国家要求摆脱长期依赖美国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矛盾给国际形势带来了新的特点。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成为战后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尖锐突出而又复杂的问题。说它尖锐突出，是因为涉及面广，几乎所有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都与此有关；说它复杂，是因为不仅在不同国家或敌对集团之间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各集团内部盟友之间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甚至非常激烈。也就是说，战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既反映为战后新独立国家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反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还反映为在美苏两极体制内，不满美苏控制的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

很明显，在战后新形势下，除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不管意识没意识到，不管承认不承认，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一个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问题。因此，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是个普遍问题，它并不被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限定在某一部分国家之间。这就是戴高乐开始全面实践戴高乐主义的客观历史条件。

应肯定的是，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与这个客观历史条件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它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才得以发展并取得成功。戴高乐主义的实质主要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保罗—玛丽·德拉戈斯曾经说，在戴高乐的历史观中，“民族性高于意识形态、政治态度和社会制度”。

他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出发，去观察世界，去考虑问题，去制定法国的行动战略。

戴高乐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待同美国的关系，因此，他认为从政治上法美是一致的，但法国不能允许美国压制法兰西民族意志的表现，不能损害法国的利益，不能阻挠法国去争取大国地位。在战争结束时，他曾表示：“必须指出，如果美国——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认为自己能够领导法兰西民族，那么在欧洲有若干世纪经验的各国，却从来没有这种幻想。”

他也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苏联，因此估计到苏联集团内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他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美苏两霸，认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霸权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因而断定霸权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霸权主义会给世界也会给它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决不能向霸权屈服。而美国却仍然从两个阵营的争夺来看待国际关系。他不希望美国出来做“全世界的法官和警察”，他认为法国同样也可以在世界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他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因而终于作出决策实行非殖民化，允许法属殖民地国家实现独立。

通过法国对外政策反映出来的戴高乐主义，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戴高乐反对美苏称霸，反对美国的霸权，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法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西欧国家中，他说出了其他国家想说又不愿说或不便说的话，做了其他国家想做又不愿做或不便做的事，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在西方国家的盟主地位，使美国再也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独自在国际事务中代表西方作出决策了。因此，无论怎么看，戴高乐在60年代实践戴高乐主义的行动，实际上是整个世界反霸潮流的一部分，它绝不是孤立的。

戴高乐实践戴高乐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努力下，战争结束时法国终于争到了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戴高乐的理想，也不是戴高乐主义的目标。经过60年代的努力，法国的地位不一样了，它的确确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形象，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地位，往往能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一种独到作用。由于法国的独立自主，法国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赢得了友谊，在第二世界国家中赢得了领导地位，而且也迫使美苏对它另眼相看。照戴高乐的说法是：“我们的国家突然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了，以前人家总是把它当作一个跑龙套的。至于各国政府，不管是属于盟国一方的，属于东方国家的，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都

1992年10月德拉戈斯同本书作者的一次谈话。

《战争回忆录》，中文本，第2卷，第38页。

《希望回忆录》，第258页。

懂得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法国重新和它过去的历史衔接起来了，再也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了……”，“最近这几年，法兰西在世界上已经恢复了它原有的面目和地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国重新卓立于世界。”

当然，法国的形象是改变了，法国的实力是增强了，法国的地位也改变了。但事实与戴高乐追求的“大国地位”仍不一样。时势已非，戴高乐终日难忘的，法国历史上那种称雄一世、独霸一方的“大国地位”是决不可能再现了，法国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在世界上数二流的地区强国。

戴高乐想象中的大国地位，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作为戴高乐的一种理想，是可以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现实政治目标，那又是脱离实际的。

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初期曾给予戴高乐极大帮助，并将戴高乐引向政坛的保罗·雷诺，在60年代成了戴高乐主义的最坚定的反对派，他曾作为宪法咨询委员会主席通过了第五共和国宪法，但在1962年他坚决反对戴高乐修改宪法和扩大总统权力的措施。他曾写了一本《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全面抨击了戴高乐主义。他在书中反驳戴高乐关于法国地位的看法。

……所有这些话都是要法国站在最前列。它可能在某些领域，例如道德、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处于前列。但是它不再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了。

在美国已经处于最前列，这个美国与法国相比，经过了四次大发展，它的农业和工业在一个大陆上依赖两个大洋而向外开放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能站在最前列呢？

在苏维埃俄国已经处于最前列，这个俄国自战后以来在莱茵河东岸扩展了100公里，在太平洋上占有了符拉迪沃斯克

托克，它横跨欧洲和亚洲，它的人口据大数学家们统计比美国

还多，它的老百姓在贫困中生活，它在为实现一个贪婪的超级

强国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能站在最前列呢？

雷诺的反驳就这一点来说，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他据此要求改变法美关系是另外一回事）。在美苏两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下，法国怎么可能争取到同它们平起平坐呢？

戴高乐之所以顽固地抱着这个想法不放，还要从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去找原因。

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法兰西民族主义历史悠久，它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都具有两重性。即在一定条件下，它是进步的，爱国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可能是退步的，甚至反动的，表现为排外性的或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现象，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以全民族的名义同封建阶级进行斗争，斗争胜利时产生了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后，资产阶级的扩张性与民族主义融合起来，使民族主义又具有了另一种属性。

拿破仑也是法兰西民族史上的一位伟人。拿破仑以他辉煌的业绩在法国史，甚至欧洲史上创造了一个“拿破仑时代”。他靠的是什么？除去客观历史条件和他本人的才干之外，是他以法兰西民族为后盾，将民族的命运和利

《希望回忆录》，第222、224页。

《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第15—16页。

益与个人的志向与抱负融合在了一起，才能顺应法国大革命的要求，才能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才会有那么巨大的成功。但是，当拿破仑获得击溃反法联盟的胜利、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之后，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扩张性与他所依赖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终至野心和权欲膨胀，超出了客观历史条件对他的要求，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

戴高乐主义虽然植根于悠久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中，但它却是萌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和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自然不能与战后没有获得解放和独立、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类比，甚至不能与战后新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类比，它们既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也不会有同一种归宿。戴高乐主义中体现的这种法兰西民族主义，一方面，它在强调抵制外来影响时，往往表现为排他性。另一方面，在强调自身发展时，又往往带有扩张性。

在战争时期，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为解放、独立和自由而战，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这是进步的，是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但是，在争取法国战后地位的斗争中，戴高乐主义展现的蓝图仍然是陈旧的法兰西帝国，这种将老殖民主权权益作为国家主权来捍卫的做法，显然是保守的、退步的、不合历史潮流的。

在 60 年代，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联合欧洲国家反对美苏霸权、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但是，戴高乐主义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和扩张性。

戴高乐主义的扩张性，或者说戴高乐对外政策主张中最易被人怀疑有扩张企图的，是欧洲问题。戴高乐在反对美国控制西欧，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露出了要取代美国在西欧的地位，首先是控制西德，接着是充当六国欧洲的领导，然后是整个西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野心。他认为法国应该是欧洲的“中心和首领”，“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这种赤裸裸的语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动，不能不使他的欧洲盟国心存戒备。

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乐将军和欧洲建设》这本书里，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转述了西方舆论下的“法国的霸权野心”。戴高乐被描绘为“欧洲或共同市场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欧洲皇帝”、“拿破仑第一”、“家长”，等等。在一些人的笔下，戴高乐的欧洲观成了“欧洲就是我”，戴高乐成了“欧洲的总统”，人们指责他有建立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梦想。

戴高乐当然也了解欧洲盟国的看法，他说道：“我们的邻国拒绝接受法国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的呼吁，这是因为按照他们的传言，在某种程度上害怕我们称霸。”正因为这个原因，共同体其他成员国拒绝了他的政治联盟建议，不想完全放弃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赞成接纳英国。因为他们不情愿法国像美国那样来控制自己。

戴高乐主义中另一个引起轰动和怀疑的事例，是戴高乐 1967 年 7 月访问加拿大时在蒙特利尔市政厅阳台上的即席演说。

《戴高乐将军与欧洲建设》，第 1 卷，第 691—693 页。

《希望回忆录》，第 215 页。

17 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印度、加拿大开始发展殖民地贸易，1608 年建立了魁北克城。1763 年 2 月 10 日签订的巴黎条约，结束了“七年战争”，标志着英国在争取商业和殖民地霸权斗争中的胜利，法国被迫把加拿大和北美其他地区，以及几乎全部在印度的属地割让给英国。当时根据条约留在加拿大的法国人约有 6 万，但却保持了法兰西人的传统、语言和宗教信仰，到 20 世纪 60 年代，加拿大的法裔已增加到 600 万人，魁北克城成为主要集中地。在这个过程中，法语居民和英语居民一直没有解决好民族矛盾问题，加拿大的法裔长期以来就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倾向，致使魁北克地方政府与加拿大联邦政府常处于不和之中。

1961 年 10 月，魁北克地方政府总理访问了法国，并以魁北克的名义在巴黎设立了代表处。1967 年 7 月 24—26 日，戴高乐赴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当他到达魁北克时，官方乐队演奏的乐曲是“上帝保佑女王”，而欢迎人群中却齐声唱起了“马赛曲”。加拿大法国后裔的激动情绪使戴高乐也激动起来，这位 77 岁的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在蒙特利尔的最后一天，戴高乐在市政厅阳台上发表即席演说。他公开许诺，法国将对魁北克掌握自己命运的努力给予支持。当人群中“戴高乐万岁”，“法兰西万岁”，“自由法国万岁”，“魁北克属于魁北克人”，“自由魁北克”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时，戴高乐也高呼：“蒙特利尔万岁！魁北克万岁！自由魁北克万岁！法兰西人的加拿大万岁！法兰西万岁！”

“自由魁北克万岁！”显然侵犯了东道国——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主权。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为此召开了内阁特别会议，声明不能接受戴高乐的言论和态度。这等于宣布戴高乐不再是受欢迎的人，戴高乐只得取消了访问渥太华的计划，提前回国。迎接他的，是法国铺天盖地而来的批评和指责。

“自由魁北克万岁！”恐怕不能简单地视为年迈的戴高乐的一时失言，“如同他面对穆斯塔加奈姆的穆斯林高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一样，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戴高乐仍然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待加拿大的民族矛盾，但是他的出发点是站在法兰西民族主义立场上，无视世界上多民族国家的存在以及它们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区别。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种言行只能说是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利己主义、排外性，甚至扩张性的流露和表现。

当然，戴高乐主义中的这种局限性，并不抹杀戴高乐主义在法国、在欧洲，乃至国际关系中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戴高乐推行戴高乐主义，他为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不妥协精神，使法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地位，使法国起码在“二流强国”中站到了最前列。由于戴高乐主义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顺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当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由此而演化出来的“新戴高乐主义”或者“半戴高乐主义”，成了戴高乐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的最好说明。而在法国，不管是戴高乐派执政，还是曾激烈地反对过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的派别执政，虽然其对外政策有过适时的调整，但体现戴高乐主义实质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方针，却始终继承下来。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 3 卷，第 521 页。

《跟随戴高乐将军》，第 226 页。

第九章

夕阳无限好……

进入 1968 年，戴高乐已经 78 岁了，他重新执政也已满十年，正当他陶醉在自己的暮年之精力为法兰西绘出的五彩光环里的
时候，几年来正悄悄向他逼近的种种不满和厌倦，终于汇集到一起爆发了。1968 年，成了给戴高乐政治生活划句号的一年。

五月风暴

1968 年震撼整个法国、从根本上动摇了戴高乐政治统治的“五月风暴”，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

1967 年 11 月，位于巴黎郊区的农泰尔文学和人文科学院不安静起来。大学生们对现行教育制度提出了疑问和指责，要求改革考试制度，要求参加学校管理。在随着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中，所讨论的议题不断扩大，政治倾向也愈加明显。与此同时，政府从情报部门也得到警告，正在西方国家首都蔓延的学生运动很快将波及巴黎。农泰尔学院当局在政府支持下，暗中掌握领头学生名单，并出动警方人员加强戒备，激化了同学生的对立。1968 年 3 月，巴黎学生纷纷上街，抗议美国侵略越南，与警察发生冲突。3 月 22 日，农泰尔学院社会学系学生丹尼尔·科恩·邦迪组织了“3 月 22 日运动”，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招致警方干预。

科恩·邦迪是德国籍学生，这更加剧了警方关于外来势力煽动的看法。4 月，学生运动已扩展到外省。26 日，科恩·邦迪在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说，遭到警方拘捕，并搜查了他的住宅。尽管在蓬皮杜过问下释放了科恩·邦迪，但矛盾已经激化。5 月 2 日，巴黎学监宣布大学停课。

就在这一天，蓬皮杜总理和顾夫·德姆维尔外长按计划仍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访问，将国事交给司法部长若克斯代管。5 月 3 日，警察开进了巴黎大学，逮捕了一批学生。当晚，在拉丁区引起了骚乱，汽车被烧毁，铺路石被掘起，成了学生与警察械斗的子弹。到 6 日，在冲突中受伤者已达 600 人，警方拘捕了 400 多人。

学生运动组织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留守的政府部长们也严阵以待。

戴高乐一直没有露面。但是他的态度很明显，他不满意政府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他说：“警察局长是在和科恩·邦迪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但事与愿违，警察局长不是猫，而是一只老鼠！”5 月 10 日，他打电话给内政部长富歇，不准学生进入巴黎大学。当晚，在拉丁区学生和防暴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11 日清晨在新闻广播之前，若克斯叫醒了戴高乐，汇报了局势。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工人联合会与全国学联，宣布 13 日举行总罢工。巴黎大学校长和政府部长们都希望对学生作些让步，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戴高乐表示不能让步。

《跟随戴高乐将军》，第 191 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 3 卷，第 673—674 页。

11日晚7时，蓬皮杜回到巴黎，紧接着召开了部长会议，制定了同学生和解的计划，部长们都担心到戴高乐那里通不过。9时，

蓬皮杜去见戴高乐，并最终说服戴高乐同意了他的和解计划。据说戴高乐曾对蓬皮杜说：“如果您赢了，这好极了，法兰西就和您一起赢。如果您输了，那您就倒霉了。”晚10时10分，蓬皮杜在电视屏幕上露面了，他宣布：“我决定，巴黎大学从星期一开始自由开放……”第二天，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辞职。警方认为总理等于承认学生做对了，警察做错了。左派认为“戴高乐政权被迫让步了”。

蓬皮杜的和解计划并没有能取消5月13日的行动计划。这就像十年前促使戴高乐上台的另一个骚动的日子。历史竟如此残酷地捉弄人，十年后的同一天，又作出了让戴高乐下台的决定。5月13日，尽管有戴派组织的宣传活动，但是，几十万的工人、学生联合行动，已预示了戴高乐政权的暗淡前途。游行示威群众打着标语牌，喊着口号：“58—68，十年了，太长了！”“别了，我的将军！”甚至有人喊将戴高乐送进修道院。

戴高乐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听从了蓬皮杜的劝告去访问罗马尼亚。在14—18日的访问期间，巴黎的事态愈发严重，而且全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有学潮和罢工，工人也开始占领工厂。原来就反对戴高乐这时出访的内政部长富歇、司法部长若克斯，还有德勃雷等人，又是电报又是电话，催恳戴高乐提前回国。有意思的是，戴高乐同蓬皮杜通了长时间的电话，他仍然听从了蓬皮杜的劝告：无须提前回国。这是戴高乐出于对蓬皮杜的信任，还是有意让他在这个“倒霉”的事中陷进去？如果考虑到事后蓬皮杜失去了总理职位，不能不说戴高乐确实是有深谋远虑。

5月18日戴高乐回到巴黎，他对政府的无能表示不满，他坚持“改革可以，胡闹不行”。在机场，他邀蓬皮杜同车返爱丽舍宫，蓬皮杜明确提出请求辞职，但被拒绝了。戴高乐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正像一周前蓬皮杜拒绝佩雷菲特辞职一样，戴高乐补充道：“在激烈的战斗中不要放弃责任，首先是赢得战争，然后再说……”

戴高乐这时还怀着信心，因为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出面——戴高乐出面肯定效果不一样，二方面同危机保持一定距离给了他主动权，他要重新掌握一周来有意交给蓬皮杜的领导权。

法国已经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国民议会中各党派围绕局势问题就是否信任政府展开了激烈辩论。多么像1958年的5月13日。所不同的是，警察和军队这次是在帮助政府维持秩序。

5月23日，戴高乐主持了内阁会议，决定通过公民投票来平息骚乱。提案是围绕是否赞同政府新的改革计划——实行合作。像以往一样，戴高乐又将他的前途押在公民投票上。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2卷，第466—467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676页；《戴高乐共和国史》，第2卷，第467页。

《戴高乐》，第3卷，第678页；《戴高乐共和国史》，第2卷，第471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681页；《戴高乐共和国史》，第2卷，第497页。

5月24日，戴高乐在全国800万工人的罢工浪潮中发表电视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法国发生的事情表明“我们的社会必须进行改革。所有一切都表明这种改革必须是大家更广泛地参与有直接关系的活动，并且分享成果”。同以往一样，法国人民要自己解决问题，否则，将面临内战、冒险与篡权。他宣布将于6月份举行有关国家改革的公民投票。如果得到通过，他将使法国重新活跃起来，如果多数人不同意他，“那么不用说，我就不能再干下去了”。戴高乐提请法国人注意，他曾经多次在危急关头引导国家主宰了自

己的命运，他希望这一次，尤其是这一次，能同以往一样。

但是，戴高乐的希望落空了，十年前的奇迹再也不重现了。巴黎的冲突仍在继续。戴高乐现在真是感到自己丧失了元气，他觉得无能为力了。他让蓬皮杜去与工会代表谈判，他在灰心沮丧中度过了几天。

但是，反对派的急功好胜和对权力的过激欲望，给戴高乐造成了利用的机会，这个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军人政治家，瞅准机会，进行了最后一次较量，也是他政治生活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须在他动身前见到他！”

看来蓬皮杜是真着急了，他不知道戴高乐在想什么，他不知道戴高乐是否从此就在科隆贝呆下去，他还会回来吗？

过了10分钟，蓬皮杜接到爱丽舍宫一个令他惊奇的电话通知：“戴高乐将军同您说话。”这种情况自从蓬皮杜入主马提翁大厦以来，每年难得有一次。

戴高乐平静他说：“听着，亲爱的朋友，我离开一会儿。我感到累了，我要休息，一个人呆着……我退后一点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我去科隆贝，明天回来”。

蓬皮杜说：“这很重要，我的将军。因为我不能肯定您是否回来

“啊不。我明天下午还要参加内阁会议……就算我不回来了……我老了。您还年轻，您是有前途的，有希望的。但我告诉您：我会回来的。我拥抱您。”

戴高乐回科隆贝干什么，当真是去休息吗？

下午2时，特里科惊慌地告诉内阁部长们，“将军不知去向，他没有去科隆贝。”直到整个内阁不知所措地度过两个钟头后，才得到军方的通知，戴高乐到了西德的巴登—巴登。下午5时，蓬皮杜接到戴高乐从科隆贝打来的电话：“我在拉布瓦斯里，明天回去，在内阁会议之前见您。”戴高乐要反击了。

5月30日中午，戴高乐回到爱丽舍宫，2时30分见了蓬皮杜，然后召开内阁会议。戴高乐决定，先不举行公民投票，先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大选。4时30分，他在电台发表讲话，电视系统因工作人员罢工已瘫痪，法国人未能看见戴高乐与5月24日大不相同的精神面貌。但他们大多数人听得出来，他们熟悉这个在1958年，在1960—1962年的多次危机听过的声音，虽然显得苍老了些，但还是底气十足。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700—701页。

同上书，第701页。

作为国家政权和共和制的监护人，24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考虑怎样维持共和国的各种可能性。我已作出了决定。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不能辞职。我受人民的委托，我要履行我的职责。

我将不更换总理……

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然后，他强调了法国面临的属于“共产主义的极权独裁的威胁，”他号召所有支持政府的公民立即组织起来，“随时随地防止任何破坏活动”。戴高乐以退为进的策略成功了。他短暂的沉默，他短暂的不知去向，使所有的人，包括他的总理和部长们都以为他要永远离去了。戴派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反对派，特别是左翼政党欣喜若狂，已经准备如何分配权力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戴高乐的反击，结果，反对派内部因争权夺利陷入分化，广大市民，特别是中产阶级害怕局势进一步发展不可收拾危及自身利益，他们更害怕学生的狂热和冒险被法共乘机利用，学生与工人的想法又是那样的不一样，一个声势浩大，但组织松散、没有统一目标的自发性运动，招架不住戴高乐出其不意的反击，形势迅速变化了。

当戴高乐通过电台向法国人发出呼吁后，在波旁宫的议员唱起了马赛曲。在协和广场，按预订计划与戴高乐的讲话相配合的戴派集会，迅速扩展为五月风暴以来最大范围的一次集会。从协和广场到凯旋门，在整条爱丽舍田园大街上，聚满了热情洋溢的人群。事后有人估计是50万人，也有人翻一番，说是100万。参加集会的有居民，中产阶级人士，有各式各样的退伍军人，还有抗战时期的老战士，有不愿再跟着或原来就不愿跟着“造反”的大中学生，还有工人，外籍居民。人群中呼喊着“戴高乐不是一个人！”“把捣蛋鬼吊到电线杆上！”“密特朗是江湖骗子！”

由于巴黎人突然感到了空虚和恐惧，也由于戴高乐突然恢复了斗志，戴高乐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又一次胜利了，危机很快就平自下来。

一度灰心丧气的戴高乐，不愧为资产阶级的军人政治家，不愧为政治竞技场老谋深算的拳击手。他知道从何处寻求力量，知道在什么时候对准对手的弱点给以致命一击。

戴高乐能够扭转局势，肯定是因为他从军队得到了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支持。他突然恢复斗志，与他的“神秘失踪”有关。这一点，戴高乐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的回忆很说明问题。

1968年五月风暴开始时，德布瓦西厄担任第1军第7师师长。5月8日，他因公务从驻地到巴黎，见到戴高乐，并了解到戴高乐对政府处置危机不力不满。戴高乐还询问了军队对事件的看法。“5月13日这一天出现了一个转折，陆军对此已开始反感和不安了”。

5月27日，军队接到命令，做好采取准备的准备，派遣部队向巴黎靠拢，维护地方治安，准备应付“任何颠覆或破坏活动”。在斯特拉斯堡，第7师所属第6旅同意省长的要求，准备出面维持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秩序。

5月28日，电台广播了密特朗要组织临时政府以及罗歇要求参加政府的消息后，德布瓦西厄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目前国家受到了威胁，军队的干部绝不能眼看着国家毁于阴谋家的威胁而袖手旁观”，他们研究了动用部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5卷，第292—293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719—720页。

队维持治安的各种方案。

这一天下午 5 时 30 分，德布瓦西厄接到戴高乐要他赶往巴黎的电话。他带着第 1 军军长和军区司令官的信去见戴高乐。

5 月 29 日上午，德布瓦西厄笔下的戴高乐是“烦恼不安，忧心忡忡”，对形势作了悲观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民不需要戴高乐的领导了，我最好还是回家写我的回忆录！”

德布瓦西厄此时站起身来对戴高乐说：“将军，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你的女婿，而是第 7 师的师长，他要向你转交他的军长和军区司令给你的信。”然后，他向戴高乐详细汇报了军队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防范措施。

戴高乐说：“看起来，共产党人把孟戴斯·弗朗斯、密特朗等几个反对派的政治家推到前台，他们想以这些人作掩护，采取极端行动……要是最后必须进行较量，军队是什么态度？”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戴高乐站起来说：“好，我去看看马絮是不是也这样想，……”他告诉德布瓦西厄，除了马絮“在这里，不管对谁，什么都别说。为了重新控制局势，我打算让法国人，甚至让政府陷入疑虑和不安之中”。

戴高乐与马絮的谈话没有正式的文件可供参考。据德布瓦西厄回忆，戴高乐认为在结束五月风暴危机这件事上，“马絮将军是有功的，那就是马絮将军说服了他，除了返回巴黎之外，别的办法都必须放弃”。

马絮不同意戴高乐那种“酷似最终引退”的做法，认为这与戴高乐“过去的做法和他的历史形象是不一致的”。“马絮将军向戴高乐将军表示，如果发生武力较量，他和他手下的部队是忠于戴高乐将军的。戴高乐将军对此铭记难忘。”

军队的支持使戴高乐又恢复了斗志，使他在 5 月 30 日的讲话更有份量，这种斗志和份量又感染了更多的群众。一场风暴结束了。戴高乐开始收拾风暴过后的惨象并想重振旗鼓。

为了“保护干部”，戴高乐将那些在风暴中首当其冲的部长调离了岗位，改组后的内阁准备大选。解散国民议会使反对派乱了阵脚，因为他们被迫面临选民的重新选择。随着事态平息，秩序逐渐正常，社会舆论已明显与学生运动和罢工者保持距离。6 月 12 日，政府勒令解散了一批群众组织，16 日，警方在巴黎大学采取措施驱赶聚会的人，都未引起激烈的反应。

因为在五月风暴中的表现，左翼政党失去了许多选民的信赖，而且内部相互指责，追究在风暴中的责任。结果，在 6 月的大选中，左翼和中间势力惨遭失败，多数派占了全部席位 485 席中的 358 席，戴派的保卫共和联盟独自占了 294 席。

局势稳定后，戴高乐决定“深化改革”，进行最后一搏了。

最后的较量

7 月 10 日，戴高乐更换了政府总理，由顾夫·德姆维尔接替了蓬皮杜。在新政府里，埃德加·富尔负责教育部，雷蒙·马塞兰负责内政部，这两个人将负责五月风暴的清扫工作。勒内·加比唐负责司法部，让-马塞尔·让纳内任国务部长，这两个人将负责筹划下一步的改革计划。

在平息危机，大选完毕，政府改组后，戴高乐的头等大事就是为下一轮公民投票作准备，他要再检验一下法国人对他的信任程度。虽然他已不抱过高的希望，但是总可以通过的吧？因为他还想一直干到任期结束。

公民投票的主要内容有两项：即关于地区改革和参议院改革。改革的主

要原则是戴高乐由来已久的“合作”、“参与制”设想。早在1962年，戴高乐就对这项改革表示兴趣，他曾仔细地阅读过一本名叫《争取企业改革》的书，书中提出应当让工人从企业中直接分到“利润”。按戴高乐的想法，各个方面都要按“合作”和“参与”的原则进行改革。1968年11月首先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就废除了传统的大学校长负责制，改由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共同指导学校的教学和行政工作。戴高乐强调，“合作”与“参与”不仅在学校、企业，而且在各地区一部分国家管理机构中也要实行。在即将表决的提案中，建议在现有的省、市镇两级行政区划之上，增设大区级行政单位，行政长官由中央委派，大区议会成员由省、市议员和社会各界专业团体组织指定的代表共同组成，对大区的经济和建设规划拥有决定权。全国将分成21个大区。对于参议院，戴高乐早就想对它动刀子了。因为参议院早就成了反对党独霸的天地，每每与戴高乐闹别扭。谁都记得，他在“贝叶演说”中就提出过改造“第二个议院”的想法，要扩大参议院的组成成分，以便让社会各界代表参与国家大事。在提案中，现有参议院由一个协商参议院代替，由各级议会选举团产生的议员和由社会各界团体组织指定的议员，共同组成协商参议院，负责对正式表决前的各项议案进行审议。

这个提案一开始看来就注定要失败。

对反对派来说，戴高乐等于无偿提供了一个让他们反击的极好机会。5月的冒险失利，6月选举的失败，反对派正苦于如何聚集到一起，以什么为突破口向戴高乐重新发动进攻。关于改革提案的公民投票，正好使他们暂时内部休战，一致对付戴高乐。所以，提案的具体内容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因为无论如何总是要反对的，关键是要抓住这个机会。

戴派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歧。只有少数几个部长持坚定态度，支持戴高乐这次公民投票。总理顾夫·德姆维尔对此没有热情，一再建议推迟表决，罗歇·弗雷、吉夏尔都不太赞成举行公民投票。至于蓬皮杜，他不仅反对，还在等待这次公民投票的结果给他创造机会。

吉斯卡尔·德斯坦为首的独立共和党也表示反对这项改革计划，多数派已陷入分裂。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几经推迟投票日期，最后确定在1969年4月27日举行公民投票。

4月4日，政府公布了提案全文。一共68条，4000多次字。如果这个提案通过，就涉及宪法的三分之一的条款需要修改。普通公民一看，这就是个令人心烦的文件。4月23日星期三，戴高乐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在告别时，戴高乐说：“我们下周三再开会……如果不是这样，法国历史上的一章就此结束了。”4月24日《费加罗报》发表了最后一次民意测验结果：53%的选民反对。戴高乐预感到结果了，他决定回科隆贝双教堂去听候裁决，他已经事先写好了辞职公告密封交给了顾夫·德姆维尔，得到他的通知后即可发表。

4月27日的投票结果，赞成票不足47%，反对票占53.2%，弃权票19.4%。晚上11点，特里科根据戴高乐的指示通知顾夫·德姆维尔，请他第二天早上公布已交给他的密封信函。

4月28日凌晨零点10分，法新社广播了戴高乐的辞职公告：

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职务。这个决定从今日中午生效。

戴高乐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已经 79 岁高龄，该退休了。但是，他退出政治舞台的时机总是与众不同。像 1946 年那次一样，人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时候辞职。1946 年，他正年富力强，满载荣誉，正该大显身手时，他退出了政治舞台。1968 年五月风暴后，在大选胜利之后，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他都可以心安理得地退出政治舞台。照中国人的看法，激流勇退嘛！可他偏偏作了个冒险的决策，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宣布辞职。

也像 1946 年辞职后一样，社会反应平平，没有出现什么激动人心或者令人不安的现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法国人已接受了戴高乐辞职这个事实，也说明他们对戴高乐辞职早有思想准备。因为动摇戴高乐政权的因素不是起源于 1968 年。

“福兮祸之所伏”

有人批评戴高乐，认为他将精力过多地倾注于对外事务，不管理想是否现实，全力以赴，结果忽视了国内问题，终于爆发成灾。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对这种批评嗤之以鼻。他说：“作为法国的元首，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问题始终是我关心和采取行动的首要问题。它在我的工作、接见、访问、演说中占去了一大半，只要我负责领导国家，还将这样做下去。”他接着说：“顽固地责备戴高乐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在我看来是多么荒谬可笑。”

但不管怎样说，戴高乐作为一个著名政治家，他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主要是他在国际事务中的生动表现。不能说这种批评没有一点道理。以正式发表的《戴高乐言论书信集》为例，1966 年发表的言论书信占 130 页，但其中关于国内问题的不足 20 页。

当然，“戴高乐共和国”时的国内政绩是不能抹杀的，经济上也是如此。

1958 年戴高乐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他刚上任时，就获悉赤字将达 12000 亿法郎，外债超过 30 亿美元，储备金只有几亿美元，进口贸易是出口的三倍。戴高乐通过起用专家，发行公债，稳定货币，制止通货膨胀，到 1959 年下半年，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 3%，1960 年上升了 7.9%，1961 年上升 4.6%，1968 年上升 6.8%。这些年里，工业生产率增长 5.4%，农业生产率增长 5%。1962 年外汇储备达 40 多亿美元。

战后从 50 年代末期起，是法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历时 15 年，戴高乐执政期中占了头 10 年。以 1960 年至 1969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例，在西方主要国家中，法国为 5.7%，仅次于日本（11.6%），超过了美国（4.2%）、西德（5.0%）、英国（3.0%）。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占比重也不断提高。1950 年只占 5.2%，1960 年占 5.5%，到 1970 年占 5.7%。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提高。从私人消费看，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50 年代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 4.5%，60 年代增至 7.1%。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和要求。新体制与旧传统的矛盾，新价值观与旧观念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引

同上书，第 757 页。

《希望回忆录》，第 144 页。

发新的社会问题。

因此，当经济发展，政治上稳定，外交上又获得重大成就的戴高乐政权步入 60 年代时，如果因势利导、处置得当，逐步缓和一下已经冒头的各类矛盾，也许 1968 年的风暴会是另一种抗议形式。但是，戴高乐的风格里缺乏忍让和妥协，他的主张历来要么“是”，要么“不是”。结果，社会问题被政治斗争所利用，那些在同戴高乐较量中屡斗屡败的政治势力，无时不在重新组合，寻找机会。1968 年的学生运动，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机会。当然，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戴高乐的“失误”或者“处置不当”，也不在于戴高乐失去了往日的智慧和才华，而在于现在的法国已经是今非昔比，它所存在的问题，它难以治愈的痼疾，不仅戴高乐回天乏术，换上别人也无济于事。至今仍活跃在法国政治思想界的阿兰·佩雷菲特说过一句比较实际的话，他说：法国“在前一个世纪初，还是天下第一强国，今天却远远落后了。最近虽然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要一面实现现代化，一面不至于失掉平衡，要就此赶上比它更富生气的国家，毕竟感到有些吃力”。法国是真正地“老”了。

从 1959 年起，法国每年都爆发几次较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1959 年 5 月，全国铁路、煤气、电力工人，巴黎地铁职工为提高工资罢工。10—12 月，电力、煤气、铁路工人和国营企业职工为提高工资，举行全国性罢工。

1960 年 1—2 月，法国东南部农民抗议政府的农业政策，举行大规模示威。4 月，约有 40 万农民再次示威。

1961 年 10—12 月，法国全国交通运输、电力和煤气工人先后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2 月，罢工又蔓延到东北部矿场，德卡斯维尔矿工坚持罢工一星期，次年 9 月又举行了五个月的静坐罢工。

1963 年 3 月，以煤矿工人为主的矿业联合会下令总罢工，政府不肯妥协，并下令征召矿工入伍，一个月后，政府被迫让步。7 月，公交系统职工罢工，使巴黎陷入瘫痪。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公用事业罢工须提前五天通告。11 月，170 多万工人和学校教职员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964 年 3 月，公用事业工人大罢工，紧接着牧场主因牛奶价格问题罢工。12 月，公用事业职工大罢工，法国陷入一片瘫痪。

1965 年，由于农业政策问题，法国在共同体内采取强硬政策，法国土地所有者协会号召投戴高乐的反对票。

1966 年 5 月，各大工会组织总罢工。

1967 年 2 月、5 月各大工会联合大罢工。

1968 年初，失业人数急剧上升，达 45 万人。1 月，西北部的富热尔，还有雷诺工厂都爆发了工人示威游行并引起了冲突。矿工、海运和航空公司也都出现了游行示威。

在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中，一般还看不出特殊的情况，因为为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工资之类的罢工示威早已有之，年年皆存，并无特殊的政治要求。但是，法国社会中还潜存着一个能够释放重大能量的青年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如果同其他社会问题纠结到一起，那无疑是干柴遇烈火，火上再浇油。

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法国出生率长期下降的现象得到扭转。

1968年，法国人口达5000万。其中三分之一强是20岁以下的年青人。由于青年比例增大，升学、就业带来了许多实际问题。特别是青年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同许多西方国家的青年一样，他们崇尚“自由、解放”，政治、生活、道德和伦理，无一不在“自由、解放”之列。中国人80年代才意识到的“代沟”，在法国60年代就在两代人之间交锋了。

如果断言戴高乐从来不考虑和重视这些问题，应当说是不公平的。戴高乐1969年拿出的改革方案，其中关于“合作”“参与”的原则，就是他一直考虑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先抛开这个办法是否真能解决问题不说，问题在于，戴高乐连用这个办法尝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完全争取到。

1958年关于戴高乐政治体制的公民投票，得到了连戴派也觉得出乎意料的辉煌胜利。紧接着在经济、外交和国防上一连串显示法国强盛、显示着戴高乐功绩的成就之后，戴高乐又乐陶陶地举行了1962年关于加强总统权力、修改宪法的公民投票。与1958年的公民投票相比，1962年10月这次戴高乐的支持率下降了17%。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1962年关于修改宪法的大辩论，使在1958年几乎被戴高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各反对党，有了一个初步显示恢复活力的机会。不仅如此，对戴高乐更严重的是，1958年曾支持过戴高乐的许多政治家，这时成了坚定的反戴派。像保罗·雷诺、勒内·普利文、加斯东·德费尔、居伊·摩勒、雷蒙·阿隆，还有那位执掌参议院议长之席的加斯东·莫内维尔，从此使参议院成了同戴高乐唱对台戏的场地。

百分之六十的选民赞同了戴高乐关于修改宪法普选总统的提案，“公民投票获胜了，全民表决失败了”。因为戴高乐指望的是更多的支持。从1958年的“全体人民的信任”（或者叫绝大多数人的信任），变成了1962年的“多数信任”，这使戴高乐受到了打击，这是对他的一种抵抗。多数派的分化，政治场上对戴高乐的有力角斗，从1962年就开始了。

戴高乐肯定感到了这种反抗的力量。1963年1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经过公民投票和选举之后，法国的政治前景时，戴高乐谈到了他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要发展繁荣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其中包括“涉及到所有从事经济工作的职工更了解实际情况和更有效地分担起责任，这就意味着在基层，要有更广泛的职工参与企业活动，在上层则要求全国的经济、社会、行政、文化活动的代表者，在制定和监督我们的区域发展和全国发展规划的工作中，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戴高乐指示路易·瓦隆，就加强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权限提出改革方案。戴高乐希望，加强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有助于体现“合作”和“参与”的原则。

1963年4月19日在电视广播演说中，他对刚刚结束的矿业工会大罢工表示了遗憾，并认为这使人感到更需要改革。他指出：“工会，……也要摆脱对政党的从属地位，摆脱党派的怨恨，而且在同公共利益的负责人的关系中表现出全国合作的精神。这还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这个全国各个不同活动部门的代表进行合作的机构，应该充分扩大它的作用，以便更好地启发和阐明由政权机关、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负责制定的决议、法令和法律”。

1963年7月2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提出“在企业内部初步实行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4卷，第65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4卷，第94页。

工人参与管理及分红的制度”，有助于“缓和阶级斗争”，“一切都促使我们规定以合作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原则”

12月31日的电视广播演说，戴高乐列举了1964年应该抓紧的八项国内工作，其中最后三项是：“关于对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发展加以安排；关于促使社会、经济各阶层之间进行更好的合作，促使它们同国家机构更好地合作；关于使国民教育适应我们时代的条件而且适应于学生日益增多的情况”。

1964年7月23日，戴高乐在记者面前重申了改革的想法，他说：“我认为，在总统选举确认了我们共和国的连续性以后，共和国应该向国家建议实行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这一重大改革。”

看来，戴高乐是想缓和社会矛盾的。但是，紧接着的1965年的总统选举，迫使他投入了无暇他顾的战斗。

在1962年关于修改宪法的辩论时，戴高乐就表示，普选总统不是为他自己争个人权力，而是为了他以后的继承人能够有足够的权威治理国家。因为1962年戴高乐72岁，到1965年总统选举时75岁。如果再次当选，他能以最后的精力干满七年到82岁时换班吗？

可是，1965年的形势使他暂时还不能动引退的念头。反对派在对外政策和核力量问题上已经空前团结起来了，他同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较量还没有结束，在欧共体内的斗争正在关键时候，他还要战斗下去。

第一次总统普选定于12月5日举行。戴高乐迟迟不宣布他是否参加竞选，这是他惯用的策略——他总是想在混乱中出面收拾残局，因为他总是确信法国人会选择他。11月4日，他正式声明参加竞选。

12月5日选举结果，所有的候选人都未能取得合法票数当选——包括戴高乐在内。戴高乐得票占43.71%，密特朗占32.23%，勒卡尼埃占15.85%。对于不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当选，戴高乐没有精神准备。他将面临一个难堪的局面，与那个比他小整整26岁的政治对手密特朗，一起站到选民面前请他们第二次挑选总统。

12月19日第二轮投票，戴高乐以54.50%的选票当选，密特朗虽然落选，但却赢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他的票数占了45.49%。两个人所得票数的百分比，对戴高乐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1965年底的总统选举结果，明白无误地向法国社会舆论提供了一个信息：戴高乐政权的根基不是不可动摇的了，戴高乐的个人威望与1958年，与1962年相比，已大大下降了。

总统选举之后，法国各派政治势力又忙于投入下一轮政治角逐——1967年3月的议会选举。在这段时间内，政治家们的精力都放在如何击败对手上，所有国内和国际的重大问题，不管具有何等重要性的，引起他们注意的只有一个原因：是否对自己不利、是否对手有利。由于多数派内部的团结，戴高乐这次又赢了。

但是，戴高乐关于社会经济改革的主张却迟迟不能实施。这个阻力，主要不是来自反对派，问题出在戴派自身。

同上书，第116页。

同上书，第154页。

同上书，第225页。

《戴高乐共和国史》，第2卷，第190页。

戴高乐选中的几位总理，从德勃雷、蓬皮杜到顾夫·德姆维尔，对戴高乐的改革计划都不热心。直到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时，戴高乐的所谓“合作”和“参与”并没有落实什么实际措施。1959年，德勃雷政府拖了七个月，才颁布关于工人获取企业经营利润的8月9日法令。1962年，蓬皮杜不支持戴高乐授意的研究小组的报告，他劝戴高乐推迟实行社会改革计划，他担心会遭到企业主的反对。1968年五月风暴后，顾夫·德姆维尔也主张推迟公民投票，他认为政府主要面临的是财政和教育问题。

戴高乐同他的几位主要助手在政策上的不一致，最后集中地反映到戴高乐同蓬皮杜的关系上。戴高乐先是对蓬皮杜在五月风暴中的妥协无能不满，接下来是戴高乐的巴登巴登之行使蓬皮杜伤透了心。蓬皮杜根据戴高乐的意思辞去总理后，在戴派中的声誉却比在职时还高，这使戴高乐感到不自在了。1968年底，关于蓬皮杜夫妇的生活丑闻四起，戴高乐没有利用自己的条件为他消除影响，而是听之任之，使局外人都感到戴高乐不可理解，过于无情。由此，蓬皮杜却赢得了同情，其中，有他长期不和的德勃雷，有吉斯卡尔·德斯坦，还有沙邦—戴尔马。1969年1月15日，蓬皮杜在罗马访问时同记者谈到：“继承戴高乐将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他必须离开总统职位和他的继任者必须由选举产生。当举行总统竞选的时候，我将成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了。但我现在一点也不着急”。

但是戴高乐着急了，他虽然看重蓬皮杜，但也不能容忍蓬皮杜暗示他要辞职的谈话，他说再也不想见蓬皮杜。但到6月4日，当蓬皮杜当选总统后，他还是去电祝贺。

戴高乐在戴派中的威望只是一种荣誉感了，它不再具有号召力；戴高乐在公众中的威望已成为历史了，它不再具有魅力；戴高乐的威望在反对派中已成强弩之末了，它不再具有战斗力。戴高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历史尽头。这绝不是偶然的，就像他当初登上政治舞台一样，一段历史有了开头，自然也就会有一个结尾。以后的历史，该由别人去写了。

第十章

伟人和凡人

戴高乐是真正引退了。尽管还有人期望他发挥作用、对某些事施加影响，尽管还有人害怕他在科隆贝双教堂遥控巴黎的政治，但是戴高乐自己是感到一切都结束了。他拒绝接待无论直接或间接与政界有关的人士，拒绝参与任何与官方有联系的活动，拒绝答复任何政府成员的有关问题。他不愿使人感到他还在“幕后操纵”。

戴高乐希望很快就渡过“被法国人抛弃”后的那一段痛苦时期。1969年5月10日，戴高乐前往爱尔兰访问，他想换一个环境，暂时离开这个生他养他，给他荣誉和信念，他终身为它奋斗而又最后使他陷于忧伤的法兰西。而且，他有意想躲开“六·一八”这个纪念日，这是他自法国解放后第一次在国外过这一天。

1969年6月18日，是“六·一八”号召29周年纪念日。戴高乐和夫人在都柏林法国大使馆，参加埃马纽埃·达尔古大使举行的午宴。达尔古大使是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他是解放功勋团的理事。达尔古举杯缅怀“六·一八”，戴高乐却平静地说：“你在这一天感到光荣，因为你是达尔古，而且你是在向戴高乐致词。我也感到光荣，因为我是戴高乐，而你是达尔古。”达尔古请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上签字留言，戴高乐在书的扉页上与了尼采的几句格言：“一切都毫无价值。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然而什么都遇到了。但这也无关紧要。”还有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从这本书里你们将了解我，那就为我祈祷吧！”还有一句“吃苦多的学到的也多”。

6月19日，戴高乐回到科隆贝。他也知道时日不多了，他要抓紧时间，将他计划中的《希望回忆录》写出来，以便像《战争回忆录》展现他的大半生一样，将他最后20多年的所作所为留给历史去验证。他说：“到84岁我将完成我的作品和生命”，“这部回忆录，我多么想在死前能把它写完呀。我要加紧，我要加紧……我希望在不到一年内写完第二卷。这是我死前的使命”。《希望回忆录》计划写三卷。第一卷《复兴》写的是1958—1962年的事，内容包括阿尔及利亚问题，1962年关于总统普选修改宪法，以及这些年他所经历的重大国际问题，于1970年出版。第二卷题为《努力》，只写了头两章，后五章未来得及动笔即去世了。第三卷《终点》，原想写的是1966—1969年的事。

《希望回忆录》虽然未能终稿，但同《战争回忆录》一起，已经较完整地叙述了法国当代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中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将一些重大的史料通过戴高乐优美流畅的文笔留给了世人，而且通过叙述一生奋斗的经历，将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实质和实践活动留给了后人。因此，戴高乐的回忆录，无论从文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的传世之作。与此同时，戴高乐还与普隆出版社商定，出版他的《言论书信集》。《戴高乐言论书信集》分为五卷，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767页。

同上书，第782页。

时间跨度从 1940 年到 1969 年，第一卷的第一篇是他著名的“六·一八”号召书，第五卷的最后一篇是他 1969 年 4 月 28 日的辞职公告。1970 年 4 月，戴高乐还同意成立“戴高乐研究所”的建议，由他原来的助手之一皮埃尔·勒弗朗负责，在“戴高乐将军著作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筹建。

1970 年 6 月 18 日这个“六·一八”纪念日又要来临了。这是 30 周年纪念日，戴高乐周围的人都希望并劝告他参加今年的纪念活动，那怕是将过去的官方纪念仪式改为私人活动仪式。但是戴高乐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六·一八”虽然是个历史纪念日，但无论如何会带有政治色彩。而他是一个脱离了政治的人。看来不完全是避“政治嫌”，戴高乐是真正地因被抛弃而感到伤感了。

6 月 3 日，戴高乐夫妇动身去访问西班牙。这个月份是有意选择的，他要在西班牙过“六·一八”。整个访问共 25 天，西班牙政府把他当客人接待，佛朗哥会见了戴高乐，并满足戴高乐不要张扬、随意逗留的要求。25 天里，戴高乐在 13 处留宿。他在一个最荒凉、交通不便、一派乡村风味的胡阿那尔山区的“小客店”里过了 6 月 18 日。不会客、不访友，戴高乐上下午都在工作，没有人谈起历史上的“六·一八”，唯一与此有关的，是在午餐时客店经理送上了一个印有洛林十字图案的蛋糕。

1970 年中戴高乐有生之年的最后几个月，一切都平淡得很。戴高乐按他自己的计划工作：撰写回忆录，整理出版言论集，准备 1971 年访问中国的计划。然后是同家人团聚、休息、散步……

死亡是有预感的，但又是突然到来的。

11 月 2 日，亡灵日。戴高乐夫妇在女儿女婿陪同下，来到早逝的长女安娜的墓前默哀。他曾多次说过：“这就是我将来要安葬的地方。”这一天，他重复了这句话后又补充说：“墓地的门太窄了。将来我到了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客人，应该在墙上再开一个门。”（他死后照办了。）这是他同儿孙们的最后一次相聚。他同儿子菲利普·戴高乐的最后见面是在这之前的 9 月 27 日。

11 月 8 日星期天，戴高乐参加了科隆贝教堂举行的弥撒，主持弥撒的克洛德·若盖教士看着身穿黑外套的戴高乐，感到“我发现他很苍白……”，“好像很不好，我感到时间不长了”。

11 月 9 日，戴高乐上下午都在工作，抽空到花园散步。晚上 6 点半以后，戴高乐同夫人在他的图书室里像往常一样等候开饭，他在玩纸牌，戴高乐夫人在一张小书桌前写东西。在离 7 时还有几分钟的时候，戴高乐突然惨叫一声，低声说道：“噢！太痛！”他用手指着背，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1970 年 11 月 9 日 19 时 25 分，戴高乐因心脏病猝然去世，离他 80 岁生日整差两个星期。

11 月 10 日 9 时 40 分，法新社播出新闻快讯：“戴高乐将军逝世了。”下午 1 时整，蓬皮杜总统发表电视讲话：

法国的男女同胞们：

让·莫里亚克：《戴高乐将军之死》，法国格拉瑟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5 页。

让·莫里亚克：《戴高乐将军之死》，法国格拉瑟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47 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 3 卷，第 786 页。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3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唁电中称：“美国知道，戴高乐将军在战争时期是坚定的盟友，在和平时期是真正的朋友。他的逝世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人类的损失。”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在联名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希特勒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杰出的国务活动家戴高乐将军”。

毛泽东主席在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唁电中说：“戴高乐将军以战斗的精神和不倦的精力闻名，他强有力的个性给我们的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英国首相希思称戴高乐是几个世纪以来法国许多伟大人物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领袖，是法国不可征服的精神的化身”。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唁电说：“戴高乐将军在欧洲与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是永垂不朽的。他在黑暗的年代里，担当了拯救法兰西的任务。……他领导他的国家回到了世界大国的行列并给欧洲以新的重要性，他成了法德谅解和友谊的象征。”

在法国，人们听到的反映是：“我的孩子们，父亲去逝了。”“他退出了政治生涯，但在国家不幸的时候，人们还会想到他。”法国共产党承认，戴高乐在法国和国际上“起了重大作用”，由于这一点，他的去世不能使“任何法国人无动于衷”。曾激烈反对戴高乐的社会党领袖密特朗说“谁也不比戴高乐更加热爱法国”。60年代与戴高乐决裂的戴派老人苏斯戴尔说：“不能忘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他起了历史性的作用”。一位普通百姓说：“我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我没忘记他是法国的解放者”。

全世界都在悼念戴高乐。从华盛顿到伦敦，从北京到莫斯科，从非洲之角到加勒比海湾，代表国家尊严的国旗，沉重地降到了旗杆的中段，各国领导人都前往当地的法国代表机构，向戴高乐表示他们的敬意和怀念。

11月12日上午11时，法国全国4万多个教堂钟声齐鸣，政府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共有120个国家的著名人士参加了这次盛大的仪式，其中约有80名原任或现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小时的仪式使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些甚至是交战双方的头面人物汇集到一起，像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像北越人和南越人，他们在巴黎圣母院竟近在咫尺，暂时忘却了他们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战场，默送着戴高乐的灵魂安息在天堂。

巴黎圣母院的仪式结束后，巴黎民众几十万人响应市长的呼吁，经爱丽舍田园大街，过爱丽舍宫，来到凯旋门。他们在《马赛曲》声中向戴高乐致敬，在寒风冷雨中寄托哀思。从此，凯旋门下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1990年，是戴高乐诞辰100周年、逝世20周年。这一年，在法国被称为“戴高乐年”。当年11月，深秋的巴黎迎来了戴高乐将军诞辰纪念活动的高潮——法国戴高乐研究所发起的“戴高乐在他的世纪里”国际讨论会。60多个国家的2000余名代表云集巴黎，探讨戴高乐的一生以及他对法兰西民族乃至世界的影响和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的杰出历史人物，像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毛泽东，还有铁托，谁也没有像戴高乐享受过如此场面的殊荣。且不问千秋功罪如何评说，也先不必深究发起如此规模、声势的纪念活动是否另有它意，就此芸芸数千位世界各地的名人隐士、

专家学者汇聚巴黎，已足以证明戴高乐真正是个值得研究和剖析的人物。

1990年夏天，在中国学者和法国驻华使馆官员参加的戴高乐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关于戴高乐是法国伟人，是欧洲伟人，还是世界伟人；关于戴高乐主义是一种战略政策，还是一种理论指导思想，众说纷纭，难以统一。也许，这正是伟人的博大精深之所在，是他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推敲、体味、探索的有价或无价之物。

蓬皮杜在戴高乐逝世第二天发表的讲话，精辟地总结了戴高乐一生对法兰西的贡献，勾画出了戴高乐的伟人形象。

戴高乐这个伟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应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出现的历史人物。早在评价拿破仑时，马克思曾引用过爱尔维修的一段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恩格斯也指出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

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这就是说，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没有戴高乐，也会有另一个人出现适应历史的需

要，没有戴高乐主义，也必然会有另一种主义的产生。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但是，正如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

动构成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原理在世界现代史研究中，无论是对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507页。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还是资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应当说都是适用的，关键在于杰出人物如何对待历史赋予他的职责和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戴高乐毕竟适应了 40 年代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需要，适应了 60 年代整个

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大势，而且为法国置身其中创造了条件，如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艰难创业，国内新政治体制的建立，“非殖民化”的实现，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等，这些都是戴高乐克服困难创造的条件，也正是戴高乐个人的历史价值所在。

当然，戴高乐是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指导思想和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他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他所处的世界和社会，难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也不可能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

伟人最易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什么？当然是他们的功绩和瑕疵。

对功绩，人们会颂扬、崇拜，有时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还会近于发狂似地吹捧；对瑕疵，人们会猎奇、惊叹，甚至难以容忍。可是，伟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戴高乐也是这样一个人。

戴高乐热爱法兰西，一生以法兰西的独立、光荣和伟大为奋斗目标。可是他心底里看低法国人民的自我优越感，使他无法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去解决法国的问题，最终导致他 1968 年五月风暴后在政治上被法国人民所遗弃。

戴高乐从民族利益出发，不能容忍超级大国的主宰和控制，他不服，他挣扎，他拒绝，他在困境中毫不妥协地走自己的路。可是他对付美国的态度和手段又往往施之于他人，欧洲邻国不能不对他强加于人的野心报以戒心。

戴高乐主张独断专行，他行使权力的准则是“只听你自己的！”“握有实权，这很重要！”靠着这些，他振兴了法兰西，创建和巩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初竭力反对戴高乐重新上台，咒他为“独裁者”、“波拿巴分子”的一些人，至今仍沿袭他那一套治国方针和政治体制在领导法国，只不过他们不像戴高乐那样有权威。

戴高乐在他的《剑刃》一书里，主张领袖人物应具备神秘品格和威风的素质。他一生以此为准绳塑造自己的形象，成就了他的独特处世才能和领导风格。他为显示自己的“正式权威”，每次公开演说前都要将讲稿默记在心。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他坚持在电视转播时不戴眼镜，在旅途中不解领带。

戴高乐性格刚强，他有惊人的毅力，有使不完的精力，他顽强不息，毫不退让。他使对手退避三舍，他使部属敬而畏之，可是，他对先天残疾的女儿又有着一颗凡人常有的慈父怜悯之心。

戴高乐一生为法兰西，功高盖世，他以报效法国为己任，他以报效法国为荣耀，他以报效法国为己欲。当他意识到法国已不需要他时，他像以前果敢地挺身而出那样，明智地悄然而退。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领袖人物都有过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但有哪一位是像他这样，两次主动挑起重担又主动卸下呢？

戴高乐对法国终身无所求。他为法兰西付出的是伟人的智慧、伟人的才干、伟人的力量，而索求的仅是凡人之所以需。在最善于从生活轶事中攻击对手的西方政治斗争中，又有几位能像戴高乐那样以清廉之身始终严于律己呢？

戴高乐 1944 年 8 月以胜利者身份返回巴黎以后，作为临时政府首脑，他将办公地点设在圣多米尼克路的布里安宫，而没有选择有传统象征意义的爱丽舍宫。他认为那样会增加开支，“与全国的困难处境很不调和”。他以个人名义在布洛涅公园附近租了一所私人住宅，同夫人、两个女儿住在一起。1959 年 1 月担任总统时，戴高乐仍不想住在爱丽舍宫。迁往哪儿呢？凡尔赛宫“太浮华”，万森宫修缮费昂贵且有珍贵文物，大特里亚农宫有倒塌的危险，还有人建议罗丹博物馆、荣军院、军事学院。方案一个个被否定，戴高乐只好还在爱丽舍宫。

1945 年 8 月访问美国时，杜鲁门总统曾送给戴高乐一架非常漂亮的 DC4 型飞机。1946 年戴高乐辞职后，他将飞机交给了军方。当时报界曾有传闻，戴高乐辞职后仍支配军队的五辆汽车，并接受汽油补贴。戴高乐的所有车辆实际上都是私人财产，他的夫人在科隆贝开一辆普通的小轿车外出采购必需品。只有当戴高乐外出时，才有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提供的保安司机和副官乘坐的汽车。1969 年辞职后，除去帮助戴高乐写作回忆录的工作人员外，戴高乐身边的后勤人员只剩下一位厨师、一位服务员、一位司机。

戴高乐从来不看重金钱。1946 年辞职后，按照规定，他应该领取将级军官的退休金。但是，在管理局的一位负责官员发现，1940 年戴高乐是临时被任命为准将的，于是，这位显然对戴高乐有偏见的官员咬定：“按照法律的规定，他只是个上校”，只同意付给上校军衔的退休金，被戴高乐严辞拒绝。他宁肯不要，也不接受这个带有侮辱性的待遇。

1946 年 4 月，政府总理费利克斯·古安要求国防部长，考虑将戴高乐的军衔提到国家能授予的最高一级。8 日，国防部长埃德蒙·米歇勒给戴高乐一封征询意见的信。12 日，戴高乐回信：“亲爱的部长：我回答您 8 日的来信。自从 1940 年 6 月 18 日我离开军官的岗位，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已使人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作出合法规定。况且，在五年七个月零三天的时间内，显然没有人曾想到要改变。因此，今天想用一项行政措施来改变这个地位，会令人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果真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解决的。”

戴高乐靠其他私人收入过日子。

1959 年当了共和国总统之后，戴高乐年薪 75000 法郎，这个标准低于其他主要领导人。十年任期内，他拒绝增加自己的薪金。他按年资总额交纳所得税，而部长们却享受 10% 的减税优惠。不管是因公还是因私外出，包括出国访问，戴高乐随身携带着私人支票本，随时支付私人开支。1970 年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出国访问，西班牙当局招待他，从第一站起就不送帐单。戴高乐推迟不掉，只好在每一地留下一笔相当的费用，作为各项开销。

1969 年辞职以后，戴高乐如同 1946 年放弃准将退休金一样，宣布不接受原共和国总统应享受的年金和宪法委员会成员的薪俸。他靠自己的稿费和一个农场的收入生活。

戴高乐将他稿费的大部分,用于设立以他残疾女儿安娜的名字命名的“安娜·戴高乐基金”,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个慈善保育院。

戴高乐历来坚信荣誉和威望是靠自己的努力产生的,它是客观存在的,无须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赐予。因此,他拒绝任何荣誉称号。1946年8月在华盛顿,杜鲁门知道如果先告诉他,他不会接受任何功勋荣誉,于是给戴高乐一个突然“袭击”,在会谈结束时,突然打开办公室的门,在一群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记者面前,出乎意料地给戴高乐披上了“功勋”绶带。1947年1月,新当选的第四共和国总统决定授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戴高乐军功勋章,戴高乐写信拒绝,他说他所做的一切是以国家的名义做的,“国家不能给自己授勋”。

戴高乐不仅生前拒绝任何荣誉称号和勋章,而且死后也拒绝接受。1970年11月10日,在戴高乐的亲属坚持之下,政府于蓬皮杜总统讲话之前播放了戴高乐生前遗嘱,这份遗嘱立于1952年1月16日,一式两份,分别由戴高乐亲属和蓬皮杜掌管。其内容如下:

我希望在科隆贝双教堂为我举行葬礼。如果我在别处去世,应将我的遗体运回我家,不举行任何公开仪式。

我的墓地就是安葬我女儿安娜的地方,日后我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碑文是:夏尔·戴高乐(1890—)。别的都不要。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在我的办公室的协助下进行安排,务必使之极其简单。我不要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和公共机构代表参加。只有法国军队可以以军队的身份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哀乐,不要军号,不要教堂的钟声。

在教堂和其他地方不要发表演讲。在议会里不要念悼词。

举行葬礼时,除给我的亲属、解放功勋团的战友和科隆贝镇议会留出席位外,不要留别的位子。

法国的男女同胞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我的墓地,以此作为对我的纪念。但我希望在静默中将我送往墓地。

我事先声明拒绝接受法国或外国的勋章、晋升、称号、表彰。无论授予我什么都将违背我的遗愿。

11月12日,巴黎圣母院的仪式盛大而隆重肃穆。但是,下午在科隆贝举行的葬礼,按戴高乐的遗愿却极其简单。

戴高乐的遗体安放在一具只值350法郎(合63美元)的橡木棺材里,这是科隆贝双教堂材木工为他赶制出来的。这一天从早到晚,约有两万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戴高乐送葬,还有数万人因交通堵塞不得不停留在他们的汽车里,而科隆贝双教堂村只有394位村民。下午约4时,12位本村农民的儿子抬起戴高乐的棺木,在15位戴高乐亲属的护送下,静静地将戴高乐送往墓地,与他的女儿安娜安葬在一起。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硕大的花圈,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之卷,第284页。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791页。

同上书,第797页。

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

戴高乐去了。他同一个凡人一样无法抗拒死神降临，他又同一个凡人一样悄悄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但是，这样一个凡人却使法国人难以忘怀，他在法国史和世界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一个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凡人，毕竟是一个伟人。

第十一章

戴高乐与中国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且有一定声誉的当代西方政治家，可能有数的也就是戴高乐、田中角荣、尼克松等几人。中国人民记得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推进同中国的双边关系上，能够审时度势，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策。但对戴高乐来说，中国人的印象还不仅限于此。因为戴高乐拯救民族、复兴国家的思想与实践，尽管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上与中国不同，但却发生在同一个时代，具有相同的国际环境，因此，沿着同一个历史轨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戴高乐和中国几乎采取了完全一致的行动，这就不能不给中国人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历史性的决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主要国家就面临着一个怎样同新中国发展关系的问题。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由于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的对抗，西方主要国家迟迟不肯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1954年6月，英国同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同年7月，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当时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伯尔尼有过接触，透露过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但是，仅隔几个月，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深一步的接触被搁置起来。不过，此后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有所加强，为进一步发展政治关系打下了基础。

1957年5月，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夫妇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访华，周恩来总理热情会见了富尔夫妇。富尔回国之后，写了一本书，题名叫《龟与蛇》。书中，富尔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提出了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外交联系”的想法。富尔将书寄给了戴高乐。戴高乐看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看法”，但他又补充道：建立这种关系的“条件是法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据长期担任过法国外交部长的顾夫·德姆维尔回忆，戴高乐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同他谈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两个人都有一致的看法，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建立外交关系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1960年，戴高乐还曾专门请富尔前往爱丽舍宫，给他讲中国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法国当时面临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使法中两国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直接讨论建交问题。

1961年5月—1962年7月，戴高乐关于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已基本明朗，中法两国外长在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又进行了多次会晤，顾夫·德姆维尔外长和陈毅外长都表示了准备建交的愿望。到1963年初，戴高乐已作出了同中国建交的原则性决定。

1963年10月21日，戴高乐以个人名义派埃德加·富尔为特使访问中国，并让他将一封信转交给中国领导人。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440页。富尔的《龟与蛇》是因毛泽东1956年6月的词《游泳》（水调歌头）而起名，词中有“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的句子。

埃德加·富尔这一次重访中国，显然负有特殊使命，他受命就两国建交的条件、规格和方法作出试探，然后就总的印象向戴高乐提出报告。因此，当时的舆论都认为这是一次“半官方性质”的访问，富尔在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待，11月2日，周恩来总理和富尔签署了“备忘录”。富尔在归国途中落脚新德里，先将会谈情况及“备忘录”报告了戴高乐。

中法之间建交的关键问题，是戴高乐必须克服美国的压力只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断绝同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当局的“官方政治关系”。富尔也好，戴高乐也好，当然很清楚这一点。这是一个在磋商和接触过程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戴高乐的态度也很明确。

在中法之间频繁来往接触过程中，台湾当局和美国都加紧活动，企图阻挠中法关系中这一重要历史进程。1963年11月、12月，美国驻法大使波伦，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会见戴高乐时都表示对中法接近表示不安，询问是否打算建交，何时建交。12月24日，蒋介石给戴高乐写信，询问法国是否打算改变现有关系的形式，

式，

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夏尔·吕塞约见美国大使波伦，通报中法即将建交的决定。紧接着，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也向美国国务院通报了这一决定。1月14日，戴高乐复信台湾的蒋介石。信中仍然对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表示敬意和友谊，但明确通知：“的确，用不了多久我的政府将同建立在北京的政府缔结外交关系。……法国再也不能长期无视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

富尔回国后，法国政府代表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在伯尔尼就建交的具体细节问题同中国驻伯尔尼大使进行磋商。由于主要环节均已取得谅解，所以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了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很快将互派大使。从此，中法关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64年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中法两国各自对外关系的一个突破，为全世界所瞩目。其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决定给美国长期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和试图逼迫欧洲盟国长期听命于己的盟主地位以沉重打击，符合中法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为战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提供了范例。顾夫·德姆维尔在纪念两国建交20周年时曾撰文指出：“1964年的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首先是美国同北京的关系。这就是法国的主动行动产生的效果。”

当然，戴高乐作出这一重大决定，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法中两国社会制度迥然不同，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对中国有着中国人民不能同意的评价和看法。但是，戴高乐的明智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从不同中看到了“同”，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传统古话：“求同存异”。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441页。

顾夫·德姆维尔：《必然性的伟大意义》，法国费加罗报，1984年1月26日。

戴高乐怎样看中国

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戴高乐是把中国同苏联放到一起看待的，中国在他眼中“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共产主义国家”。进入50年代后期，中苏分歧开始明显，戴高乐看到了这种变化。但对中国还是抱有西方人传统的偏见。

1959年11月10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苏分歧，说是“白种人的俄国”和“黄种人的中国”相对立。在他眼里，中国是“人口众多而又贫困，不可摧毁而又雄心勃勃，正在顽强地建设成为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并且正在窥视着周围的地区，有朝一日，它一定要扩张到这些地区”。

安德烈·方丹认为，“‘黄祸’一直困扰着戴高乐”。他认为，戴高乐决定同中国建交，虽然主要是针对美国和苏联，但“也是为了提防‘黄祸’”。他引用了戴高乐对埃德加·富尔说的话：“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并让它了解我们，我们应当承认它。这样可以防止中国误入歧途，我们要从老虎变成朋友。”

1963年7月29日，离他同中国建交作决策已为时不远了，可他同记者谈到中苏分歧时，还是那样看中国，他说：“中华帝国——它有7亿人口，是一个不可摧毁的、野心勃勃的、什么都缺乏的帝国。”

戴高乐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次最重要的谈话，应当是中法建交后于1964年1月3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谈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深奥的文明，谈到了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国家许多次凌辱和瓜分。他在再次向蒋介石表示敬意的时候，承认新中国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成就”和“成果”。不过，在他看来，这些成就和成果的取得，代价太大了。“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一部分是由于极权机构的行动，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个自豪的民族热情所取得的。”

戴高乐在谈话中明确表示，两国互派大使，“在我们这方面，这个决定丝毫不意味着对于现在统治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示任何赞同”，“法国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

那么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戴高乐从他的民族观出发，认为中华民族“下定决心不论怎样也要上进发展，同时这个民族具有充沛的勇气和才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能广泛地把它们发挥出来”。他认为苏联指望控制中国来控制亚洲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一个7亿人口的国家的态度和行动事实上是由它自己的政府来决定的”，“这个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它的法律，而且中国在国外表现出它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他看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在亚洲无论是关于柬埔寨、老挝、越南，或者是关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朝鲜，或者是关于苏俄，或者是关于日本等国的任何一个政治现实情况，都不会不关系到中国，涉及到中国。在这个大陆上，特别不可能想象有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战争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3卷，第130页。

《同床异梦》，第75页。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4卷，第122页。

和和平。”“中国本身的庞大、它的价值、它目前的需要和它将来的广阔前途，使得它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心和注意。由于这一切原因，显然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

中法之间都互相听到对方的什么声音呢？他们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它们都反对美国和苏联对各自的控制，它们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它们都决心拥有核武器和独立的防务手段。戴高乐还认为，中国同美国关系一直紧张，中苏关系又已经恶化，法国加紧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肯定会提高法国在美苏面前的身价，有助于独立于美国，有助于改善法苏关系。这个事实，使“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

法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戴高乐最后忠告道：“法国认为，目前还在等待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1966年10月28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重申，“美国人必须承认，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重要条约都是无效的；此外，美国人还必须看到，对于同这个大国建立各种关系、对于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人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必须作出结论”。

戴高乐提的这两个问题，在1971年和1972年都由美国人作出了结论。他虽然没有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个结论，可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见性。

尽管戴高乐对现实中的中国有自己的看法，但毕竟不是他实地的直观印象。他曾多次谈到访问中国的愿望，也曾多次设想过访问中国的计划，也曾收到过毛泽东主席的非正式邀请，可是，“他到死也没有实现看一看中国和会见毛泽东的梦想。”

1964年中法建交后，仅过两年，中国就出现了长期动乱。在这期间，法国又发生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戴高乐的访华计划当然是拿不出来了。直到1969年辞职之后，戴高乐的这个计划才又提上议事日程。许多人都认为，1969年的“六·一八”，戴高乐是在爱尔兰过的，1970年的“六·一八”是在西班牙过的，1971年的“六·一八”，应该在哪儿过呢？本来计划在中国，可是，死神提前夺走了他的生命。

1970年3月24日，戴高乐收到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于3月2日写的信，马纳克是自由法国的老战士，与戴高乐私交极深。顾夫·德姆维尔任外长期间，马纳克长期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曾具体负责印支政策、对华政策，安排过戴高乐访问金边，也设想过安排戴高乐与胡志明的会面。这次来信，他给戴高乐提出了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的问题。

马纳克在信中谈到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敬意。他相信，如果戴高乐访问中国，这对法国、对历史，都是一件大事，这个重大行动会使法国处在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马纳克甚至说：“有了这样一件大事，当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4月25日，马纳克在北京收到戴高乐4月10日的信。信中没有明确答复是否同意马纳克的建议，但明确表示“已经把这件事记录在案了”。7月30日，马纳克又给戴高乐写信，通报了法国计划和领土部长安德烈·贝当古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4卷，第178—181页。

同上书，第5卷，第100页。

吉尔伯·贝洛尔：《在戴高乐将军身边》，《希望》杂志，1976年3月号，第15页。

访华时，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崇敬之情。8月1日，马纳克在巴黎同黄镇大使商谈顾夫·德姆维尔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并谈到戴高乐访华的计划。

9月9日，离戴高乐去世还有两个月，他的外甥女玛丽—泰蕾丝·德科尔比来到科隆贝，她是来辞行的。德科尔比即将赴法国驻华使馆任参赞。戴高乐对外甥女谈到马纳克对他的建议，“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他询问去中国哪个季节最好，他需要接到正式邀请，他要同毛泽东主席交谈。他认为毛泽东具有威望，才使中国具有了成就。

中国政府在发出正式邀请前，希望得到戴高乐肯定接受这个邀请的答复。10月20日，英国作家韩素音女士受周恩来总理之托，前往巴黎设法向戴高乐转达这个信息。可是，时间已经不允许了，戴高乐中国之行的“美梦”随着他的突然去世破灭了。

戴高乐未能访问中国，成为戴高乐的终身憾事，成为那些热心促成此事的人的终身憾事，也是中国人民感到永远遗憾的事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戴高乐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对戴高乐的崇敬心情。

戴高乐在中国

戴高乐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是戴高乐在中国并不使人感到陌生。

正如戴高乐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出发，不能赞同中国人民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制度；正如因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戴高乐对中国的看法会有偏见一样，中国人民也不能赞同戴高乐的政治信仰和他维护的政治制度，对戴高乐的看法也难免会有值得重新研究之处。

不管在不同条件下对戴高乐有过什么不同的评价，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对历史上的事情人们的认识不见得完全一致，后来的人首先不能改变历史，但他可以重新认识历史，从历史中找出指导现实的依据来。没有这种重新认识，也就不会有历史，更不会有将来。中国人民对戴高乐最精辟的重新认识，当属毛泽东主席在戴高乐逝世后发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毛泽东主席在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毛泽东主席对戴高乐的这个评价，绝非偶然。这是毛泽东主席几十年献身中华民族、献身中国革命的思想反映，是他透过历史和现实作出的正确结论，是他绕过分歧，在自己和戴高乐之间寻找到的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点。

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一样，都是历史伟人。不过，他们一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一位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们有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胸怀。但是，他们首先都是各自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这两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伟大民族的英雄。

毛泽东的毕生理想，如果简单地归纳为一句话，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使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要使中国彻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地位，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戴高乐也有类似的崇高理想。这两个历史伟人不仅在志向和理想上有共同之处，而且在为实现各自的崇高理想进行的斗争实践中，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940年6月法国投降之前，戴高乐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压境之际，大声疾呼，到处奔忙，反对以贝当、魏刚为首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

拉古杜尔：《戴高乐》，第3卷，第779—780页。

《人民日报》，1970年11月12日。

这时在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一直坚持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方针。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到投降主义时，明确指出：“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1939年6月，针对国内投降派“战则亡，和则存”的投降主义论调，毛泽东以“反对投降活动”为题发表文章，指出“战则存，和则亡”。

戴高乐同毛泽东一样，在民族危亡、国土沦丧的紧急关头，坚持反对民族失败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不过，毛泽东的任务比戴高乐更重，除去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之外，他还要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以民族大义和国家为重，响亮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将有限的兵力率先投向抗日前线。戴高乐孤身一人，在伦敦举起了抗击法西斯的大旗。

戴高乐在自由法国时期，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政权地位，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毛泽东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团结人民坚持抗战为宗旨，迫使国民党中央政府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戴高乐在抵抗法西斯、解放法国的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要以法国人自己的力量亲手打开通向解放法国的大门。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惧压力，完成了解放国土和民族统一的事业，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国际援助看成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个必须条件，但不看成是唯一的、决定性的条件。毛泽东反对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他认为在众多条件中，中国人民能否团结一致抗日，是最主要的条件。毛泽东坚持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

早在1940年6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就用焦虑关切的眼光，密切注视着欧洲战场的局势变化。关于戴高乐1940年6月18日号召的消息，第一次见于报端，是在1940年6月20日。上海《晨报》以“戴高乐将军在英国决心将抗战进行到底”为题，报导说雷诺政府原国防部长戴高乐将军在伦敦电台发出号召继续进行战争，并摘要报导了“六·一八”号召的部分内容。

1943年6月，当戴高乐到阿尔及尔同吉罗握手，共同组成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时候，中国抗日战争已度过了1941—1942年最艰苦的阶段，正当中国人民更需团结一致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在精心策划第三次反共高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6月21日的《新华日报》以“法兰西的曙光”为题，报导了戴高乐与吉罗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消息。8月1日，中国中央政府宣布断绝同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并于8月27日宣布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当时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都报导了这个消息。

1944年8月巴黎解放，蒋介石以中国总统身份致电戴高乐以示祝贺。8月29日，《中央日报》和《解放日报》以“蒋介石总统致电戴高乐将军祝贺巴黎解放”为题作了报导。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38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442、524、538页。

可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与法国人民是息息相通的。作为两国的民族英雄，作为两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领导人，毛泽东同戴高乐之间肯定会有许多共同的感慨。

1958年戴高乐执政后，历史条件又将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历史人物，在更多的问题上沟通起来。由于中国和法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它们的作用不相称，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侵犯他国权益，由于中国和法国都执行一项独立的外交政策，由于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个领导人都坚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许多重大问题有着一致或者相近的看法。

戴高乐从1958年起同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联盟闹独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不顾还未解除的美国封锁的压力，带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了反对苏联“老子党”的霸道行径、反对苏联“指挥棒”的斗争。在面临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中印边界战争，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停止援助，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的多重压力下，毛泽东却在讲“不怕鬼的故事”。

当戴高乐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机构中撤出飞机、调回舰队，将美国的战略武器赶出法国领土时，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要在中国设长波电台、两国组建共同舰队的建议。

当法国不顾美国的技术封锁，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的时候，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也在遭受同样的处境；苏联拒绝提供情报技术资料。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个不服输、不怕硬的历史伟人，一个在1964年，一个在1960年，终于使他们的国家成为核大国。

应当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临的困难，要比当时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面临的困难严重得多。这不仅因为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刚刚发展的穷国，而且因为中国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来自好几个方面。因此，在不同程度的困难面前要取得相同的，甚至更大的成果，毛泽东自然要比戴高乐具有更大的胆略和魄力，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智慧。但是，中国人民仍然非常钦佩戴高乐，因为他不仅为法国和世界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而且在困难时直接给予中国人民支持和帮助。他不愧为“不屈战士”。

马纳克曾经多次向戴高乐转达过中国人民对他的敬佩之情。这种敬佩之情，不仅是私下里的，而且是中国领导人多次公开表达的；不仅是戴高乐在世时如此，在他去世后仍然如此。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宣布建交后几天，周恩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曾公开赞扬道：“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政府，采取了与某些西方国家不同的态度，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树立了一个勇于面对现实、敢于独立自主的榜样。”

1984年，在为庆祝中法建交20周年向法国人民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指出：“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20年前，戴高乐将军代表贵国人民作出这个重大外交决策时所表现的勇气和远见卓识，中国人民至今深为敬佩”。

199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江泽民指出，1964年，戴高乐将军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使法国成为同

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大国。他在回顾中法关系时称颂戴高乐将军的远见卓识。

反法西斯战争和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共同经历，使戴高乐同中国人民的距离拉近了。当人们今天重新回顾这些历史时，就愈加感到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中，戴高乐同中国人民之间无形的友谊和相互支持的珍贵。

1993年在上海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国际讨论会上，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说：“现在的社会变化很快，许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还被记着。在法国，比如戴高乐将军，人们知道他，敬重他。在中国，对毛泽东也是一样”。

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话应该补充的是，戴高乐将军不仅法国人民知道他，敬重他，而且中国人民也知道他，敬重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戴高乐对法国和世界的贡献，更不会忘记他为推进中法关系作出的贡献。不管是在什么环境和形势下，始终如一珍惜这个事实，这个友谊。因为中国人民坚信一点，促使戴高乐当初决策的共同基础始终存在着，它将继续成为促进中法关系的有利因素。记着戴高乐，中法关系就有可能排除各种干扰和困难，健康地、友好地发展下去。这也是本书作者将这本书献给读者的主要目的。后记

戴高乐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还是在我的少年时代。那是50年代末的一个春节期间，在我居住的小县城的街头，看到一场活报剧。记得有三个身穿条纹西裤、戴着长筒高礼帽、安着大红鼻子的洋丑角——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在手持大刀、长矛、步枪的世界人民面前发抖。我自己也没有想到，20年后，当我步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后，会将戴高乐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至今，我还常常想起那幕活报剧中的戴高乐，他与我今日所理解的戴高乐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区别呀！

本来，给一位当代国外资产阶级政治家立传就有若干难处，何况在“传”字前又加了一个“评”字。我曾多次自问：是否忒胆大了？可是，自己又架不住要尝试一下的强烈愿望。因为——恕我寡闻——极少见国内学者评述国外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专著。

由于自己的学识水平，也由于许多档案材料未到50年才能开封启用的年限，更由于这的确是一种尝试，书中难免有点评不到，或是点评有误之处，还望读者批评见谅。

作者在撰稿过程中常得陈乐民同志指教和帮助，脱稿后又蒙其欣然作序；人民出版社王德树同志为本书付梓问世做了许多工作，初时因作者工作冗杂交稿时间一拖再拖，待交稿后又急盼出版见书（这是一般作者之常见心态）。在此，向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的同志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周荣耀
1994年4月

主要参考书目

- Charles de Gaulle 夏尔·戴高乐：
Memoires de Guerre 《战争回忆录》，1-3 卷，法国普隆出版社 1980 年版。
- Memoires d'Espoir 《希望回忆录》，法国普隆出版社 1971 年版。
- La France et Son Armée 《法国和它的军队》，法国普隆出版社 1971 年版。
- Lettres, Notes et Carnets 《书信、札记和杂感》，法国普隆出版社 1980 年版。
- Discours et messages 《戴高乐言论书信集》，1 - 5 卷，法国普隆出版社 1970 年版。
- Jean Lacouture 让·拉古杜尔：
De Gaulle 《戴高乐》，1-3 卷，法国瑟伊出版社 1984 年版。
- François-G. Dreyfus 弗朗索瓦·乔治·德雷弗斯：
De Gaulle et le Gaullisme 《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法国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François Kersaudy 弗朗索瓦·凯尔索迪：
De Gaulle et Churchill 《戴高乐与丘吉尔》，法国普隆出版社 1982 年版。
- Raoul Aglion 拉乌尔·阿格隆：
De Gaulle et Roosevelt 《戴高乐与罗斯福》，法国普隆出版社 1984 年版。
- Paul-Marie de la Gorce 保罗·玛丽·德拉戈斯：
De Gaulle entre deux Mondes 《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法国法亚尔出版社 1964 年版。
- Pierre Vianson-Ponté 皮埃尔·维昂松·蓬特：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Gaullienne 《戴高乐共和国史》，1-2 卷，法国法亚尔出版社 1970 年版。
- Paul Reynaud 保罗·雷诺：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Gaullisme 《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法国茹里亚尔出版社 1964 年版。
- L'Institut Charles de Gaulle 戴高乐研究所：
Espoir 《希望》杂志，1 - 83 期，法国普隆出版社。
- André Malraux 安德烈·马尔罗：
Les Chênes qui tombent 《砍倒的橡树》，法国伽尔玛出版社 1971 年版。
- Maurice Couvede Murville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
Une politique étrangère 1958 - 1969 《1958 - 1969 年的一项对外政策》，法国普隆出版社 1971 年版。
- Jean Monnet 让·莫内：
Memoires 《让·莫内回忆录》，法国法亚尔出版社 1976 年版。
- Roger Massip 罗歇·马希普：
De Gaulle et l'Europe 《戴高乐与欧洲》，法国弗拉玛里翁出版社 1963 年版。
- Edmond Jouvenot 埃德蒙·儒弗：

LeGeneraldeGaulleetlaCOstructiondel'Europe《戴高乐将军与欧洲建设》，1-2卷，法国法学与法律出版社1967年版。

GillesGozard 吉利·戈扎尔：

DeGaullefaceàl'Europe《面对欧洲的戴高乐》，法国普隆出版社1976年版。

AefredGrosser 阿尔弗雷德·格罗赛：

LaIVeRépubliqueetsaPolitiqueextérieure《第四共和国和它的外交政策》，法国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1年版。

JeanMauriac 让·莫里亚克：

MortduGénéraldeGaulle《戴高乐将军之死》，法国格拉瑟出版社1972年版。

AadréFontaine 安德烈·方丹：

Unseullitpourdeuxrêves《同床异梦》，法国法亚尔出版社1981年版。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1-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奥利维埃·吉夏尔：《我的将军》，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陈乐民：《戴高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阿兰·德布瓦西厄：《跟随戴高乐将军》，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威廉·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版。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康纳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戴高乐生平大事记

1890 年

11 月 22 日出生于里尔市。1905 年戴高乐 15 岁，写短篇小说《德国的战役》。小说描写了“戴高乐将军”统率法国军队击溃来犯的德国军队。

1907 年进安托万中学。

1908 年转入斯塔尼斯拉斯中学。

1909 年

9 月 30 日考入圣西尔军校，并先在步兵 33 团当兵一年。

1910 年

10 月 14 日圣西尔军校“菲斯班”正式学员。1912 年

9 月以第 13 名的成绩毕业于圣西尔军校。

10 月 10 日选择贝当指挥的步兵 33 团服役，任少尉排长。

1913 年晋升中尉。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 月 15 日第一次负伤。

1915 年

3 月 10 日第二次负伤。归队后晋升上尉，负责指挥 33 团第 10 连。

1916 年

3 月 2 日在凡尔登前线受伤被俘，在德国战俘营中度过两年零八个月，曾多次逃跑，未成功。

1918 年

12 月 3 日大战结束，返回法国。1919 年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前往波兰。1920 年参加俄波战争。后任朗贝尔托夫军校战术教官。

12 月 11 日在巴黎休假，首次见到伊冯娜·旺德鲁。1921 年

3 月从波兰回国。4 月 6 日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

10 月 1 日任圣西尔军校战争史教员。

1922 年

5 月 2 日考取高等军事学院。

1924 年

3 月出版《敌人内部的倾轧》。

6 月因毕业成绩和评语同军事学院教授们结怨。毕业后到莱茵区驻军负责后勤工作。1925 年

7 月 1 日奉调到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贝当办公室任秘书。

1927 年

4 月在贝当支持下，返高等军事学院连作三次演讲。

9 月晋升少校，奉命指挥第 19 轻步兵营，驻防特里尔。

1929 年

10 月前往贝鲁特供职。1931 年

11 月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任职。1932 年

7 月 22 日出版《剑刃》。

1933 年晋升中校。3 月，希特勒上台。

1934 年

5 月 5 日出版《建立职业军》。

12月5日与保罗·雷诺相识。1936年
3月7日希特勒进犯莱茵区。
5月法国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勃鲁姆组阁。
10月勃鲁姆在马提翁大厦召见戴高乐，但对戴高乐关于“建立职业军”的建议未予重视。1937年
9月任驻梅斯507坦克团团长。
12月24日晋升上校，已47岁。1938年
9月出版《法国和它的军队》，与贝当发生矛盾。1939年
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月2日出任驻阿尔萨斯第5军团装甲司令。1940年5月11日奉命组建指挥第4装甲师。
5月23日晋升准将。
6月5日出任雷诺政府国防部次长。
6月9日赴伦敦首次会见丘吉尔。
6月11日在奥尔良附近第二次会见丘吉尔。6月13日在图尔第三次会见丘吉尔。
6月16日再赴伦敦第四次会见丘吉尔。雷诺辞职，贝当组阁，向希特勒德国乞求停战投降。6月17日戴高乐只身飞往伦敦。
6月18日在伦敦BBC发表“六·一八”号召，宣布“自由法国”将战斗到底。
6月19日伊冯娜·戴高乐和孩子抵达伦敦。6月28日英国政府承认戴高乐为所有自由法国人的领袖。
7月2日贝当政府从波尔多迁往维希。
8月7日“戴高乐—丘吉尔协议”发表，这是英国政府同自由法国的第一个协议。
8月26—28日乍得、喀麦隆、刚果宣布归属自由法国。8月31日英法联军夺取达喀尔的计划失败。10月27日发表《布拉柴维尔宣言》，宣布帝国防务委员会成立。

1941年
5月因叙利亚和黎巴嫩问题同英国发生矛盾。6月21日苏德战争爆发。
9月24日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24日委任让·穆兰为代表，负责法国国内各抵抗运动组织的联络工作。自由法国海军攻占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险同美国发生冲突。

1942年
1月1日让·穆兰空降回国。
5月5日英国独自攻占马达加斯加岛。
5月24日在伦敦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7月“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9月国内抵抗运动组织领导人赴伦敦会见戴高乐。
11月8日英美联军北非登陆。美国扶植达尔朗执掌北非军政大权。

1943年

1月17日英美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邀请”戴高乐前往会晤吉罗。

1月22日戴高乐会见吉罗。

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支持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法国军队应在执委会统一领导之下。

5月15日让·穆兰组成法兰西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通电宣布支持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成立，戴高乐与吉罗共任主席。

6月21日让·穆兰被捕遭害。

8月26日美、英、苏三国不同程度地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

9月9日解放科西嘉岛。

9月17日发布关于成立协商议会的法令。

11月3日阿尔及尔协商会议开幕。

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

1944年

6月3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阿尔及尔成立。

6月6日诺曼底登陆。

7月6日访问美国，会见罗斯福。

8月1日勒克莱尔指挥的装甲第2师在诺曼底登陆向巴黎进军。

8月24日巴黎解放。

8月25日戴高乐从奥尔良门入城返回巴黎。

10月23日美英苏三国同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11月23日解放斯特拉斯堡。

12月2—9日访问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签署法苏互助同盟条约。

1945年

2月4日雅尔塔会议。

4月25日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

7月17日波茨坦会议。

8月22日访问美国，会见杜鲁门。

11月13日被立宪议会选为临时政府总理。1946年

1月20日宣布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

6月16日发表著名的“贝叶演说”。

1947年

4月7日在斯特拉斯堡发表讲话，号召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

4月17日法兰西人民联盟正式成立。

1948年

2月6日安娜·戴高乐去世。

1949年

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签字，戴高乐有保留地表示赞同。

1951—1952年法兰西人民联盟在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逐年下降，戴高乐退居科隆贝家中撰写回忆录。

1953年

5月6日退出法兰西人民联盟。

1954年10月《战争回忆录》第1卷问世。

1956年5月《战争回忆录》第2卷问世。

1958年

5月13日阿尔及利亚危机。阿尔及尔法国人支持戴高乐重新执政。

5月15日发表声明，准备接管共和国权力。5月29日科蒂总统要求议会授权戴高乐组织政府。6月1—3日戴高乐获议会授予特别权力。

6月4日前往阿尔及尔说：“我理解你们！”9月14日在科隆贝会见阿登纳。

9月17日致函美英首脑要求成立北大西洋公约“三国指导小组”。

9月28日公民投票通过第五共和国新宪法草案。10月1日保卫新共和联盟成立。11月30日议会大选，保卫新共和联盟获议会多数。12月21日戴高乐当选共和国总统。

1959年

1月8日就任总统，入主爱丽舍宫。

3月25日表明建立独立核力量的决心和从北约撤出地中海舰队的原因。

6月拒绝在法国部署美国核武器。9月《战争回忆录》第3卷问世。

9月2日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

9月16日在电视广播演说中提出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

11月3日在高等军事学院讲话，强调建立独立的国防核力量。

12月19日邀请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阿登纳到巴黎，商四国首脑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1960年

1月18日“马絮事件”。阿尔及利亚又出现动乱。2月13日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3月23日赫鲁晓夫访问法国。

4月5日访问英国。

4月22日访问美国。

5月16日四国首脑会议在巴黎流产。

5月拒绝将法国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

9月5日建议欧洲六国加强政治合作。11月4日在电视广播演说中第一次称呼“阿尔及利亚共和国”。1961年

1月8日公民投票通过阿尔及利亚自决。

2月11日欧共体六国巴黎会议，成立“伏歇委员会”。

4月22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叛乱。

5月20日法国政府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埃维昂正式谈判。

5月31日肯尼迪访问法国。

8月9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

1962年

3月18日埃维昂协定签字。

4月14日德勃雷辞职，蓬皮杜组阁。

4月17日关于欧洲政治联盟的“伏歇方案”未获通过。

7月1日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

8月22日和夫人坐车遭秘密军伏击遇险。

9月4日访问联邦德国。

9月12日提出修改宪法、改总统选举为直接选举，遭到各反对党和知名人士反对。

10月22日古巴导弹危机。

10月28日公民投票通过修改宪法，改总统选举为直接选举。

12月18日肯尼迪和麦克米伦拿骚会谈。

1963年

1月拒绝将原驻阿尔及利亚军队划归北约指挥。

1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拒绝“多边核力量”和英国参加共同体。

1月22日法德合作条约签字。

6月21日宣布法国北大西洋舰队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收回归北约指挥的法国飞机中队指挥权。

8月5日拒绝参加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1964年

1月27日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月16日访问墨西哥。

7月2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建设欧洲人的欧洲。

9月20日开始访问南美十国。

1965年

1月24日丘吉尔逝世。

2月4日提出反对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

6月30日法国暂停在共同市场的合作，“空椅子”事件。

12月19日在第二轮选举中击败密特朗，再任法国总统。

1966年

3月7日致函约翰逊总统，宣布要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要求限期从法国撤出北约所有基地和总部。

6月21日开始访问苏联。

8月25日前往亚洲访问。

9月1日“金边演说”，谴责干涉越南。

10月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委员会，北约总部迁往布鲁塞尔。

1967年

5月11日英国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

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表示反对以色列的侵略行动。

7月26日在蒙特利尔高呼“自由魁北克万岁！”。

11月27日再次拒绝英国参加欧共体。

1968年

1月15日法国出现罢工潮，部分学校学生活动频繁。

3月22日农泰尔学院科恩—邦迪成立学生组织。

5月3日法国“五月风暴”开始。

5月13日巴黎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冲突。

5月14日按计划访问罗马尼亚。

5月27—28日孟戴斯·弗朗斯和密特朗公开宣布要接管权力。

5月29日秘密前往德国巴登巴登，会见马絮将军。

5月30日发表广播讲话，戴派举行盛大示威集会。

7月10日蓬皮杜辞职，顾夫·德姆维尔组阁。
8月20日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
1月17日蓬皮杜在罗马发表要竞选总统的谈话。
2月28日尼克松访问巴黎。
3月11日宣布4月27日举行关于改革方案的公民投票。
4月27日关于改革的方案未获公民投票通过。
4月28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5月10日开始访问爱尔兰。6月15日祝贺蓬皮杜当选总统。
6月19日从爱尔兰返回科隆贝，撰写《希望回忆录》。12月11日马尔罗前往科隆贝，同戴高乐长谈。1970年
3月24日收到马纳克建议访问中国的信。4月21日《戴高乐言论书信集》第1卷出版。6月3日动身访问西班牙。
10月23日《希望回忆录》第1卷出版。
11月9日因心脏病猝发在科隆贝双教堂村寓所逝世。

